

獨立評論

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出版

引言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憲政問題

上海戰事的結束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中國的包工制

丁文江

胡適

適之

蔣廷黻

翁文灝

湛然

獨立評論每週

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元六角

，國外加郵費

八角。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引言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歡迎各方面的投稿。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丁文江

本月十五日犬養毅在日本首相官邸被刺，不但日本的政治完全露骨的恐怖化，而且從此以後，恐怕日本的政黨內閣與立憲政治要根本動搖了。

在凶手沒有審訊以前，我們原不能斷定主凶的背影，但是暴動的人都是着海陸軍的制服，可見行凶的人都是軍人。自從一九二九年民政黨組閣以來，因為世界經濟恐慌，失業的日多，青年的軍人，對於政黨政治已經明目張膽的攻擊。最初藉口民政黨對中國外交軟化，攻擊政府。於是濱口遂被暗殺。若槻內閣時代，井上大藏大臣繼續實行他的緊縮政策，海陸軍都受影響，軍人怨恨更深。但是當日民政黨的要人，比較的清廉，所以社會上對於軍人的舉動，還有相當的反對。等到去年九月東三省專變起來，軍人的主張完全勝利；一方面中國不能抵抗，一方面美國和國聯並沒有干涉的舉動，於是日本大多數的青年，都贊成軍閥，厭惡政黨。軍人專政和法西斯蒂主義，漸漸得到日本社會的同情。

去年十二月政友會組閣，重新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在議會佔有絕對的多數：四百四十六個名額，政友會佔有三十

百餘名之多。但是政友會內部極其複雜：犬養毅的死黨，不過二十多人；此外有鈴木系，久原系，床次系。舊政友系和中立派。因為各系不能相下，而中立派擁護犬養，所以犬養可以組閣，而實際上對於黨的統治指揮，都談不到。本年三月因為內務大臣的更選，黨內幾乎發生破裂。其後經床次調解，方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黨內意見極不一致，一切政策都不能實行。

政友會的大敵不是民政黨，而是軍人。軍人是主張根本不承認國聯，對中國澈底用兵的。文治派的政客對於世界大勢比較的明瞭，不能完全服從軍人的意旨，於是軍人把從前厭惡民政黨的心理，一轉而移到政友會的身上。政友會抵抗軍閥的能力，還不如從前的民政黨，因為從前民政黨的首領，如濱口，如井上，都有清廉之名，受社會上相當的敬仰。政友會的歷史，污點甚多：除去犬養，高橋幾個人以外，許多人都有過行賄營私的嫌疑，為社會所指摘。因此軍人攻擊他們，更可以得國民的同情。

軍人與政友會公開的衝突，第一次是更換南滿鐵道總

裁的問題。南滿鐵道總裁是著名的肥缺，向來都是黨出身的政客去做。民政黨的內閣任用不是黨員的內田康哉做總裁，頗得一般人的稱許。犬養內閣不敢公然撤換內田，于是先逼江口副總裁辭職，使內田不安于位。但是內田的輿論很好，許多人不贊成政友會的舉動。軍閥遂乘機反對，說當外交重要的時候，政府不應該只顧黨的利害。犬養沒法，只好慰留內田留任。政友會內閣的威信遂從此掃地。

同時對國聯的態度，對中國的外交，軍人同政黨的意見日見衝突。三月十四日荒木陸軍大臣在新聞紙發表意見，說日本應該取用獨立外交政策，建立東亞的門羅主義，不准英美干涉遠東的政治。但是政黨只知道爭政權，專門的外交官只知道追隨英美；所以在政黨內閣之下，決不能實行這種外交。

五月六日日本的報紙忽然宣傳一種狠可驚異的新聞。內容的大概說，目前日本內憂外患非有強有力的政府不可。政友會雖新在議會有絕對的多數，而內部分裂，政策不定，不能擔當重任。樞密院副院長平沼騏男承受荒木的意旨，得內閣書記長森格的同意，向各方面活動，預備于本月臨時議會開會的時候，推翻政友會內閣，另行組織軍人的法西斯蒂內閣。

這種消息的確實，大概是毫無問題。因為五月八日政友會關東大會在橫濱公園開會，犬養毅演說，就公開的討論這個問題。他說：「近來一部分人有否認議會的傾向，以為議會距政治實際迂遠，不能改善。我們相信議會政治的妙用有十分改善的可能。政界百弊的根源是因為選舉要莫大的金錢，所以先不可不改正現行選舉法。：改正了制度，然後政治家能活用牠。：我們相信可以把否認現行政治制度的極左傾和極右傾的大部分緩和同化。」

這段演說，就變了犬養毅的催命符！

不論何人來繼犬養組閣，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的。政友會的勢力以鈴木為最大，然而各系聯合起來反對他，鈴木也無法統治。最可注意的是與鈴木接近的森格也加入了法西斯蒂運動。以目前情勢而論，政友會或者要擁戴高橋大藏大臣，來和緩各派。但是此事縱然成功，也不過短期的過渡。因為不但政友會內部不團結，民政黨自從井上被刺以後也毫無生氣，都不能抵抗；而且軍人的主張，大得社會的歡迎。我們只要看全民社分裂以後，一部分人出來組織國民社會黨，就可以知道日本政治的真正趨向了。

軍人的主張是：否認國聯，排斥英美在遠東的勢力，

建立東亞們羅主義，對中國澈底的強硬。現在這種主張不久要具體化了。可憐我們國內的統治者還是四分五裂，還要借外交問題來爭政權！ 一九三二，五，十六。

憲政問題

胡適

附註：此文寫成後，報載大養毅已於五月十六晨因傷重死了，高橋藏相已奉命代理首相，陸相與海相皆引咎辭職。軍人有反對政黨內閣之說。（編者）

最近幾個月之中，憲政的運動頗有進展。國難會議開

會之前，多數非國民黨的會員都表示贊成早日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政府與國民黨的領袖對於這一點頗多疑慮，所以把「內政」一類問題不列入國難會議討論範圍之內。許多會員因此不願意赴會。然而國難會議開會時，居然也有一個「內政改革案」的產生與通過，決定於本年十月十日以前成立國民代表大會，由各都市職業團體及各省區地方人民選出代表三百人以上組成之。

不久政府依據去年十二月底國民黨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通過了市參議會與縣參議會的組織法。

住在上海的孫科先生於四月二十四日發表他的抗日救國綱領，其中主要的主張是（一）於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憲法草案；（二）明年四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憲法，決定頒布日期；（三）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之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

治；（四）於本年十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會。

此外還有民選立法院和監察院委員各半數的辦法，聽說政府擬有草案，正在審查中了。孫科先生則主張立法和監察兩院的委員都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

住在香港的胡漢民先生近來也屢次發表談話，表示他贊成憲政的實行。並且贊成黨外可以有黨了。

○ ○ ○

我們考察這些主張，可以說，這些主張無論內容有多大的出入，都可以表示憲政運動的開始進展。其中最大的異點，約有這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張縮短訓政年限，要到民國二十四年才算訓政結束；而在野派（包括暫時在野的孫科先生們）則主張提早憲政的開始。其實這一點不成多大問題。如果在這兩年半之中，政府和人民都能積極準備憲政的施行，如果訓政的目的是（如汪精衛先生去年十二月十日說的

（一）「在訓練民衆行使政權」，——那麼，兩年半的光陰也許是值得的。如果訓政的延長只是爲了保持政治飯碗，畏懼人民參政，執政權而不能做點治國利民的事業，號稱訓政而所行所爲都不足爲訓，——那麼，訓政多延一日只是爲當國的政黨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第二，政府派（包括國難會議中通過提出政治改革案的先生們）雖然勉強承認民意機關的必要，而處處縮小民意機關的權限。如國難會議原案的國民代表大會，只有議決預算決算，國債，重要國際條約的三項職權。反之，在野派如孫科先生則主張國民代表大會有很大的權限，爲「代表中華民國國民統治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不受解散及任何之干涉」。這一點是值得討論的。晉國難會議原案辯護的梅思平先生（在時代公論第六號）說：「我們從過去北京時代國會的經驗看起來，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國家，議會的權力越大，他的腐化也越容易。」歷史是可以有種種看法的。我們研究民國初年國會的歷史，也可以說：在初行民治的國家，如果解散國會之權在行政首領手裏，議會政治是不夠制裁那反民治的惡勢力的。梅思平先生指出「質問，查辦，彈劾諸權，都變成敲竹槓的利器；官吏任命的同意權，簡直是納賄的好機會。」梅先生何不進一步說

：預算決算和國債的議決權更是敲竹槓和納賄的好機會？敲財政部的竹槓，豈不更肥？如此說來，還是爽性不要議會爲妙！

○ ○ ○

奇怪，在這個憲政問題剛開始進展的時候，悲觀的論調早已起來了。在時代公論第六號，我們得讀何浩若先生的「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一文，根本懷疑民主政治的功用。他的結論是：

民主政治便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便是保護有產階級而壓迫貧苦民衆的政治。……

建國首要在民生；舍民生而談民主，便是舍本求末。

在國聞週報第九卷十八期上，我們得讀季廉先生的「憲政能救中國？」一文，也是根本懷疑憲政的，他說，實行憲政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教育進步，（二）交通發達，（三）政風良好。因爲中國沒有這三個條件，憲政是無望的。況且憲政論的根本立場就不甚健全，因爲

第一，從理論上言，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現在資本主義早踏上沒落的階段，議會政治

更破綻畢露了。

第二，從事實上言，英美的民主政治並不足取法。

第三，從中國需要上言，憲政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如

「土皇帝」及共產黨等等。

第四，爲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我們應該採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這種議論都不是在短評裏所能討論的。我們只想在這裏提出幾個問題，作這種討論的引子：

第一，我們要明白憲政和議會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方式，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專有，也不是專爲資本主義而設的。在歷史的過程上，議會政治確曾作過中產階級向獨裁君主作戰的武器，但現今各國的普遍選舉權實行後，也會屢次有工黨代表因議會政治而得掌握政權。近百年來所有保障農工和制裁資產階級的種種「社會立法」，也都從議會裡產生出來。一種政治制度就好比一輛汽車，全靠誰來駕駛，也全靠爲什麼目的來駕駛。我們不因爲汽車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就不用汽車，也不應該用「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一類的話來抹煞議會政治。

第二，議會政治與憲政不是反對「民生」的東西，也不是和季廉先生所謂「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難道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一

種方式？如果只有這一種方式，那麼，不信中國可行憲政的先生們，難道以爲中國已具備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條件了嗎？

第三，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論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依據法律，和政府對於人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而已。議會政治只是人民舉代表來辦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難制裁，但黨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們何妨試試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當倪嗣冲馬聯甲盤踞安徽的時代，一個很腐敗的省議會，居然能反抗鹽斤加價，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個錢的負擔。現在堂堂黨國之下，有誰能制裁我們的綏靖主任呢！季廉先生舉出最近一月二十日何應欽部長提議削減各軍經費，二十二日便有各軍駐京七十二軍事機關代表齊赴軍部請願，要求維持原案。季廉先生何不想想，那七十二個軍事機關都有駐京代表在那裏替他們七十二土皇帝爭權利，我們四萬五千萬萬的老百姓受了無窮的冤屈，不應該請幾位國民代表去說說話，伸伸冤嗎？難道我們應該袖手坐待季廉先生說的「那應運而生的政治集團」起來，才有救星嗎？

一九三二，五，十六

上海戰事的結束

適之

上海停戰協定已於五月五日簽字了。協定的全文凡五條，附文三件，都已見五月六日的各報。協定中最不滿人意的，是沒有明文規定日軍撤退的期限。在完全撤退以前，日軍仍可暫駐和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毗連的區域。日軍的撤退已在五月六日開始了。

日軍撤退期限的問題會引起最久的爭執，停戰會議幾乎因此破裂。國際聯盟特別委員會的草案本主張：由關係各國合組混合委員會，得用大多數的表決，規定日軍撤退的時期。但這一條最受日本反對，後來由英國公使藍博森提出調和辦法，根據停戰協定附件三所規定，混合委員會對於締約國之一方意於履行協定第一二三條時，有喚起注意之權。這就是否認混合委員會有規定日軍撤退之權。

撤兵期限的問題，以國聯十九國特別委員會的壓迫，終不能得日本的承認。所以此次協定第二條只規定「日本軍隊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狀態」的原則，而沒有撤退日期的確定。

此次的協定本是一種「城下之盟」，我們對他本來就不存多大的奢望，所以我們對於這次簽定的條文雖然不能

滿意，也不願苛責當局的諸人。平心而論，此次協定的結果，確定了日本撤兵的原則，收回了日軍佔據的各地，拒絕了那盛傳一時的「中立市」的野心企圖，確定了撤退區域內中國警察維持治安的主權；這都不能不說是中國停戰代表失敗之中的成功。

我們忍痛回想，自一月二十八日以來，我國死傷了幾千個愛國健兒，損失了幾十萬萬元的財產，結果只換得了這樣的一紙城下之盟約。這自然是最可痛心的事。然而我們把眼光放的遠一點，也可以在慘霧之中看見一線的光明。我們覺得，這三個月的淞滬事件至少有兩種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是因這事件發見了我國民的抵抗力，增高了我民族的自信心。自九一八以來，許多憂國的人都陷入了極端的悲觀，眼見那「勇於私鬪，怯於公戰」的惡劣現狀，都幾乎不信這個民族有競爭生存的能力了。十九路軍在淞滬一帶的三十多日的血戰，用熱血和愛國心替我民族一洗無抵抗的奇恥，使敵人震驚，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國人人感覺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希望。雖然血肉搏戰終久抵不住世

界最精的武器，然而這一個月的抵抗可算是已爲我們這個老病民族注射了一針老還童的靈藥。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九十年中，不曾有過這樣振衰起懦的興奮劑。民族自信力的恢復，國家的振作，都可以說是在這一役建立下了精神的基礎。

第二，因這事件的外交經過，稍稍引起了政府負責人的態度。自九一八以來，政府除了迷信國聯與九國公約之外，幾乎束手無策。民衆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應該利用激昂的民氣和國際的輿論，來爭外交上的勝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衆，高唱「抵抗到底」而實無抵抗的準備，高唱「兼用外交」而實無外交的方針。天不能助那不自助之人，何況那無制裁實力的國聯？一誤再誤，直至整個的東三省丟了，政府還在高唱絕交而不抵抗的怪論！這種不戰不和又不交涉的外交，不能不說是政府的大罪過。但自從淞滬戰事發生以來，尤其是停戰之後，政府的外交似乎稍稍

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

蔣廷黻

國難會議發表之初，我對牠就不抱甚大的希望，因爲

我根本不信任任何會議能救國。不但不能救國——普遍的救國——就是對目前的國難有所補助也是很困難的。個人單

表示一點責任的態度。上海在全國經濟上財政上的特殊重要地位，使政府不能不急謀結束戰事，救濟工商業，恢復政府的財政來源。上海在國際商業上的特殊地位，又使有關係的各國不能不出力斡旋。停戰會議開始以來，中間有不少的波折，也有不少與論非難，但中央政府始終表示負責任的態度，極力慰留辭職的代表，明白表示中央決心負責交涉結果的責任。前日上海憤激的民衆有毆辱我國代表郭泰祺君的舉動，汪精衛君爲此事正式表示「停戰會議經過情形，迭經中央及政府審核，認爲力持大體，不辱使命」。這種積極負責任的態度，可算是政府的一大進步。八個月的國難，到今日才看見這一點點肯負外交責任的表示，真叫我們不勝感慨係之了！

附註：此文寫成之後，日本政府已宣布決定一個月之內撤完駐軍。

廿一，五，八。

獨想不出辦法，而望把想不出辦法的個人集在一處就能找出辦法來——這豈不是夢想？當時有一派想利用國難會議

來改造中國的政治局面，即所謂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設

立聯合政府。這些提議的發生是極自然的。國難未發生以前，國人對政府久已不滿意。所謂國民黨訓政，論其成績，尙不及宣統年間滿清的預備立憲。又加上了東北三省的喪失，宜乎人民要求政治的改造。但改造能在國難時期成功嗎？改造的運動不至引起更大的糾紛而分散國人對外的力量嗎？改造倘功就能於國難有所補助嗎？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由於一黨專政的原則，還是因為國民黨的專政是不光明呢？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仰雖然不大，對在野各黨派的信仰是更大嗎？因為我心中有這些疑問，所以我覺得這般提倡政治根本改造的人過於樂觀，偏於理想；國難會議是不能這麼利用的。

同時還有一派人對於國難會議的召集過於猜疑。他們說這會議的用意不過要找人替政府「分謗」。這兩個字——「分謗」——最足表現中國人玩政治的滑頭和卑鄙。「謗」也要看是什麼樣的「謗」。避謗不能作為有血氣的人的人生哲學。如果政府是在那裏竭力的去幹，在這時這地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只能幹到這種地步；而人民不能諒解，偏偏要與政府為難，那末，這樣的謗分擔一點，是義不容辭的。萬一政府是有心誤國或賣國，那末，謗有應得，會員應羣起而攻之。照我看來，「分謗」二字是不應出世的

。會議之應否召集；既召集了，會員是否赴會，都不應該與分謗不分謗有關係。這種滑頭心理不改革，中國會教我們滑亡了！

憑良心說，國民政府雖不好，日本佔據東三省不是因此而起的。再憑良心說，政府雖不好，政府人員的平均道德和知識也不在在野人士平均道德和知識之下。政府為政府計，能對外得一勝利，牠的權威也就加高了。政府苦於沒有辦法，而其所以沒有辦法因為力量不夠；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加增政府的力量；最低限度，為政府壯膽；這是國難會議可有的使命。政府所聘的會員既然很難——其實不但各黨派，各地方，各職業，甚至各時代都有代表——會議更能完成這個使命。對外的目的大致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政府的政策，在這個當兒，也沒有多大的選擇。保存國家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是絲毫不可減少的最低限度。與日本和而能達此目的當然是和；不能呢，當無是戰。戰而敗，敗而亡——這樣的亡國是遠勝於不抵抗而亡的。在這個立場上，政府和會議是容易得諒解的。有了這個諒解，會議可以對政府說：「這樣的，你只管努力作去。我們可擔保你無後顧之憂。有政客想與你搗亂的，我們羣起來制止；有軍野心家想趁機來爭地盤的，我們至少使他

爲全國人民所共棄。到了對外戰爭開始以後，在軍事有關各方面，我們無不盡力幫助你。你——政府——只要瞻前；我們來顧後。」政府得了這個表示，牠的負擔就可減輕多少。同時日本人西洋人也知道了中國雖然不統一，不是日本人所說的「現代式的國家」，至少對日本，對東北問題，中國人不分黨派階級是一致的，且是有決心的。我對國難會議雖不抱很大的希望，這個精神作用的希望我曾有過的。

不幸，事與願違。開會以前，枝節橫生。我的理想的國難會議也無從實現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在尙開會以前的四個月，無黨派色彩的領袖肯出力壓制黨派的競爭，這個理想未嘗無實現的可能。一般人的感想根本討厭在此時期鬧黨。至於憲法呢，二十年前也與中國人民行過結婚禮，渡過短期的蜜月，可是不久夫婦不和就離婚了。我不覺得中國人民對舊婦有一點回想之心。在這種空氣之下，有領袖肯出來以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來號召天下是容易成功的。失敗之咎不能不歸之於在野的政黨色彩的領袖。以後我的赴會不過把會議當作一種政治標本可供研究者的剖解。

到會的人士，國民黨員，尤其是左派的居多數。此外

有幾個毫無所爲的人如我自己的。民國元年的議員也有幾個，這些可說是中國初期革命的產物。國民黨左派的會員可說是近年革命的產物。論議會規則的熟習，口才，普通知識，舊革命家遠不如新革命家！會議的組織——主席團，審查委員會等——給了大會許多節省時間的便宜。國民黨似乎已經練熟了這種開會的專門技藝。或者這就是我們中國二十年革命在政治訓練上的貢獻。

主要的議案當然是設立民意機關案。其主旨是：訓政時期不縮短——其實也只有兩年了——；在未行憲政以前，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會議。會員約三百人，大都市佔一半左右。其職權有二：監督財政及審查條約。可注意的，這個國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法不承認一人一票的基本民治原則。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請提出抗議罷！更可注意的是提案人——梅思平先生——在大會的演說詞，他不主張即時立憲，但主張設立這個「民意機關」，因爲——這是他說的話——憲法不是人造的，是生長的；曹錕的憲法美則美矣，因無歷史的背景所以未曾生效。我所了這段演說覺得我們的政治知識實大進步了。可惜民國初年在南京製憲法的時候，梅先生未在大會！可惜孫中山先生最初立志革命的時候，梅先生的政治哲學尚未出世！

可惜梅先生不澈底，因為兩年的民意機關實不能供給憲政那必須的歷史背景！

政府對國難會議的態度全不一致，連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倘以牠們對會議的報告為標準，顯然是無誠意的。汪精衛先生則又當別論。他的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大家知道鋼鐵在近代工業中是如何的重要，所以豐富的鐵礦幾乎是近代國家富強的一個最重要條件。假使有一國如日本努力求他的工業和軍事上發展，而天生的資源中偏缺乏最要緊的鐵礦，他們將如何彌補這個缺憾呢。看他們如何用人力戰勝這個天然的困難，我們就可想見人家做事是如何的努力。

據地質調查的結果日本本國所有的鐵礦砂儲藏量總算起來不過六千萬噸。中國鐵礦雖說不多，但即就交通較便的地方計算也可有九萬萬餘噸（連東三省在內）。所以中國鐵礦至少要比日本多十五倍以上。但是照現在的鋼鐵業看來，除了遼寧幾處日本人經營的鐵廠之外中國新式煉鐵廠出產的生鐵每年不過一萬噸，鍊鋼爐都停了，連一噸也不產。日本的鋼鐵業却是非常的發達。每年要出生鐵一百

人品和演說就是誠懇的象徵。他是天生的民衆領袖。長期抵抗的戰爭一開始，他就是我們的 Gambetta。他的政治前途恐須靠與民衆接近。這或者就是在洛陽民意機關所以能產生的原故。

七十多萬噸，鋼，件二百萬噸以上。他的鋼料自用有餘，還可行銷遠東各地與歐美出品相競爭。日本的化鐵爐每年要用礦砂三百萬噸，如果專用本國的礦砂來煉鐵，他的全儲量不到二十年就要完了。所以他們對於本國礦砂用的非常節省，不願輕多開採，現在所開採的每年不到二十萬噸，其餘百分之七十的鐵砂需要額都向他處設法取得供給。如何能達此目的當然是狠不容易的事。

日本所用鐵砂的來源第一便是中國的長江流域。在一八九〇年的前後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西法鋼鐵的經營，中國方面創辦漢陽鐵廠，日本也在門司西面的八幡設立最大的國營鍊鐵廠。日本國營鐵廠設于八幡的理由在於靠近九州筑復煤田，易得焦煤的供給。但對於鐵砂的供給他們實在毫無把握，所以聽到了湖北大冶鐵礦的豐富他們便立刻

要收爲已有。恰好中國辦理漢陽鋼鐵因缺乏經驗屢次失敗資本不足，於是便進行售砂的交涉。一八九九年大冶鐵礦與八幡鐵廠第一次訂立售砂的合同，一九〇〇年八幡纔得開爐出鐵。可見日本最大的八幡鐵廠的鐵砂供給自始即靠大冶鐵礦爲唯一重要的來源。這種關係中國當時似乎不不知道，一批一批的只管售砂作爲一種籌款方法。到了民國元二年中國政府與漢冶萍公司爭先的要向日本借款，結果是訂立借款合同要在四十年內供給日本鐵砂及生鐵，合共等于鐵砂三千萬噸。其實大冶鐵礦爲漢冶萍公司所有的實際不過二千萬噸，所以他們把大冶鐵礦整個的賣盡了，還要倒欠日本鐵砂一千萬噸。

大冶鐵礦儲量的不足日本人也漸漸的明白了，所以他們又想攫取安徽省內的鐵礦。但民國三四年間中國政府已覺悟日本壟斷中國鐵礦的野心及保存礦產爲自己發展的重要，所以日本人的進行已不及從前的順利。他們往往利用威迫利誘各種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雖然經過若干阻力究竟被他們在繁昌當塗二縣買去了不少鐵砂。從民國七年到現在止，安徽鐵砂往日本的也已不下五百萬噸。近幾年來長江流域即湖北安徽二省鐵砂運往日本，每年約計九十餘萬噸，十年便可賣出一千萬噸，六十年便可等於

日本全國鐵礦的儲量了。

但是長江鐵礦儲量亦甚有限，即使中國方面不加限制，也眼見得四五十年便可開完，而況中國已有相當覺悟。所以日本人早就向他方面另打主意，便是朝鮮及中國遼寧省的鐵礦的開發。朝鮮鐵礦砂的產額從以前的每年幾萬噸到民國八年突增至四十餘萬噸，到現在每年五六十萬噸，一部份在本地煉，一部份也運往日本。遼寧鐵礦先有中日合辦的本溪湖公司，出產不甚多，到民國四年二十一條要求內便有合辦安山等地鐵礦在內。其實安山鐵礦名爲聯辦，鐵廠却是南滿鐵道會社獨辦，所以事實上完全成爲日本人獨佔事業。到現在遼寧省內每年開採鐵砂八十萬噸，都是他們的利益。不過遼寧鐵砂儲量雖然非常豐富，但是成分太低，所以沒法把他運到日本國內去，只好就地設廠煉鐵，把生鐵運出去。至於是否就地煉鋼呢，他們還有許多討論尙未決定。

南滿鐵砂既然就地製煉自成一局，朝鮮鐵礦亦不甚多，此後產額恐亦有添無加，長江鐵礦除已售者外中國又有亡羊補牢留爲自用得趨勢，所以日本的鐵砂供給雖然費盡心機還是覺得不足。於是他們再向各處張羅，居然又得了相當結果。最重要的是馬來半島鐵礦的取得。其中最大的

是新嘉坡西北柔佛的鐵礦，民國十年就有日本人向本地政府領得礦權，僱用華工大施開採。又有脫崙噶奴邦的鐵礦也于民國十六年由田中政府中人給八幡鐵廠訂立了長期售砂合同。所以自從民國十三年起馬來鐵砂向日本進口的逐年增加，到現在每年已有一百萬噸左右，已在長江鐵砂之上。馬來鐵砂成分甚高頗與長江鐵砂的性質相近，日本既得了那方面重要的供給所以對人國的抵制政策便不怕了。甚至在最近時期還有中國人要售砂他偏不願收買的神氣。因為中國老的鐵廠都閉停了，新的還沒有辦成，所以開鐵礦的人有砂無處賣，原來是專靠日本人做主顧的，現在日本都並不在乎此了，豈不可歎！

日本以一個鐵礦儲量最貧的國家竟能發展遠東最大的鋼鐵業，實在狠虧他們的經營。即如遼寧安山一帶鐵礦有許多西洋技師還說成分太低不能化煉，日本人却努力研究居然大規模出鐵了，雖然經濟上成功或失敗還待細考，但

中國的包工制

我們的勞工，比從前覺悟了：他們現在大多數有了社會的組織，能用團體的力量要求增加他們的工資，改良他們的待遇。近幾年來，罷工的事各處發生了不少。不但資

已見得他們做事的魄力。中國鐵礦照面積役口比例看來也不算甚多，而且煉焦煙煤與鐵礦大抵距離甚遠，交通上更有許多困難，但是與日本比較起來總還是中國礦產多些。然而光緒中葉中日兩國同時發起的鋼鐵業——漢陽鐵廠與八幡鐵廠——何以一則煙消灰滅，一則產量擴充到每天三千噸之多巍然為遠東鋼鐵業的巨擘呢？在民國十年以前日本人正努力取得遠東各處鐵礦之時候，英美政府或資本家似乎還要想設法與他競爭的意思，所以美國曾經派人到中國調查了一次，英國也曾想在遠東經營鋼鐵業。但是距離太遠了，英美的若干計畫都沒有實現，現在似乎都已甘拜下風了。斐律賓鐵礦甚多，但他們沒有自己化煉的計畫，還在售砂與日本的希望。澳洲似乎最多只能自給。印度賣鐵買鋼，英國鋼料已在那裏感覺日本出物的競爭。俄國也似乎感覺煤鐵遠離交通不便的困難。

湛然

本家方面着了急，就是社會裡一般的人對於勞工的境遇，對於他們的心理及行動，亦發生了相當的注意。但是有一個極大的問題，在勞資兩方，都沒有研究；社會一般的人

，更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各處通行的包工制。

包工制是什麼呢？就是資本方面不與工人直接發生關係；將所有工作，包給第三者。由第三者，即包工者，僱人辦理。只要工作的結果合格，資方就照原來與包工者議定的價目付錢。對於工作需用的人數，工人實得的工資，全都不管。工人方面，只要得到包工者許給他們每人的錢，亦就滿意；資方到底給了多少錢，與他們所得的相差多少，他們一概不問。

在現時勞工覺悟的期間，大家最反對的是「不勞而獲」。凡所作的事，不應社會有用的需要，不是生產程序中所必需而獲得利益的，都是不勞而獲。資本是一種儲蓄的勞力，又是墊付工價及原料機器價值的必需品；在生產程序中是不可少的。勞工不必說，自然是生產的要素了。但是包工的既不供給資本，又不自己勞力。因為資方的懶惰，勞方的知識簡單，就得了極大的利益。即使在生產上有些微的幫助，他們所得的利益，遠過于他們在生產上所盡的責任。所以我們社會裡的包工者，都是不勞而獲的人，包工制是不勞而獲的制度。

我現在將我最近二年以內調查所得的事實，寫些出來，証明我以上所說的話。

上海有一某公司，每年在上海一處所銷的貨物，有八十萬噸左右。他們的貨物，用輪船裝到了上海，有起艙，有上棧，出棧，過駁等各樣的工作。公司照合同付給包工的工價如下：

| | |
|----|-------|
| 起艙 | 每噸銀九分 |
| 上棧 | 二錢五分 |
| 出棧 | 二錢一分 |
| 過駁 | 二錢 |

但是工人所得的，究竟是多少呢？

(甲)起艙 這件工作，就是將貨物從艙內起出，放在船面上。所用工人，共有三種：一種是在艙底將貨物裝在竹籬裡，預備起重機將竹籬提放在船面上的；一種是將岸上空籬檢齊，送還艙裏的；一種是管起重機的鈎子的。裝這項貨物的輪船，載重每隻都在五千八百噸左右。需用起艙的工人，是每艙裝籬的至多十人（至少八人），檢籬的一人，司鈎的二人。全船四人，需用裝籬的四十人，檢籬的四人，司鈎的八人。工作的速率；每日九小時，可起一千五百噸。

包工的付給工人的工資，是按每天九小時的工作。裝籬的及檢籬的，每人制錢二千二百文，司鈎的每人大

洋一元。照去年四月二日上海的銀市；每制錢三千六百八十五文，體銀一兩的計算，裝籬同檢籬的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可得銀子六錢，司鈎的每人每日九小時，可得銀七錢二分。

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所得的報酬是多少呢？

裝籬工人，每日九小時，每人可裝世七噸半。照每日六錢的工資計算，裝籬工人實得酬報，是每噸合銀一分六厘。司籬及檢籬的，合在一起，每噸合銀五厘四毫。三種工人合在一起，每噸共得銀子二分一厘四毫。包工獲利每噸六分八厘六毫！

全船照五千八百噸計算，公司付給包工的五百二十二兩，工人實得一百廿四兩一錢二分！如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人每日九小時的工作，平均應察二兩五錢八分。

(乙)上棧 就是將貨物從船面抬到棧內。工作的方法，是二人用一槓棒，抬了裝滿貨物的竹槓，從船面經過跳板，走入棧內，將貨物倒在貨堆上。需用的人數，視起艙時所用鈎子而定。起艙用一個鈎子，上棧就須有十二或十三根槓棒。起艙用兩個鈎子，上棧就須用廿五根槓棒。照全船用八個鈎子，一天起貨一千五百噸

的標準，上棧須有一百根槓棒。每根槓棒，一天九小時，可抬十五噸。

包工的付給槓夫，每槓二人，每日九小時，官價五千二百制錢。實付八折，四千一百六十文。即每日每人得銀一兩一錢三分，每噸工人實得七分五釐。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五分。

每船包工的得一千四百五十兩，工人實得四百卅五兩！若是公司所出的錢，全給工人，每槓二人每日應得三兩七錢五分，每人每日應得一兩八錢七分。

(丙)出棧 就是二人用一槓棒，將一竹籬從棧內貨堆，將籬裝滿，抬到岸邊，倒入駁船的工作。

公司付給包工的錢每噸二錢一分。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官價二百六十制錢，實付八折，計二百零八文。折合銀價每噸五六釐。

因為出棧工作，不是整日不斷的。有駁船來卸貨，才有工作，所以全日工資，不易計算。

(丁)過駁 就是從大船直接將貨物倒入旁靠的駁船。公司給包工的，每噸銀子二錢。包工的付給工人，每噸一百六十制錢，合銀四分一釐。

以上的事實，可列成一表如下：

| | 公司付 每噸價 | 工人實得 每噸價 | 百分比 | 工人實得 每日工價 | 如無包工 工人每日可得 |
|----|------------|-------------|------|--------------|----------------|
| 起艙 | 銀九分 | 二分一釐四毫 | 二三，八 | 六錢 | 二兩五錢八分 |
| 上棧 | 二錢五分 | 七分五厘 | 三〇，〇 | 五錢五分一釐 | 一兩八錢七分 |
| 出棧 | 二錢一分 | 五分六釐 | 二六，六 | | |
| 過駁 | 二錢 | 四分一釐 | 二〇，五 | | |

照此表看起來，實際工作的工人，所得甚微。公司所出的工價，從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都被包工的得去了。如有人到上海碼頭去看輪船卸貨，就可看見所有的工人，都是穿着破衣，赤着雙足，滿頭灰土，帶着汗不停的工作。遇是熱天，更是受苦。包工的却都不在場：只派幾個監工的，在碼頭督促。上海的物價高貴，生活艱難。工

人每日所得，不過三頓粗飯；有家小的，妻女還須到紗廠工作，以補不足。至于包工的，却都是上海的大富翁了。現在談勞工問題的，他們不是說資方剝削勞方，就是說勞方壓迫資方。但是就以上的事實看起來，在包工制度底下的生產事業，是勞資兩方，都受了包工的剝削及壓迫。

獨立評論

第 二 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
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再版)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 森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吳 憲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哲

庚款與教育(通信)

叔 永

獨立評論每週

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

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國外加郵

費八角。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日本的新內閣

二

丁文江

在犬養被刺的次日，我們就覺得日本的政治要發生重大的變化；預料軍人的法西斯蒂運動不久一定要成功。果然因為軍人反對的結果，在國會擁有大多數的政友會不能繼續握政權，而組閣的使命反屬於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犬養毅於十五日夜間因傷而死，代理內閣總理的高橋于十六日率領全體閣員向天皇辭職。直到廿二日使齋藤組閣的命令方始發表。一星期之久，組閣的人選纔能決定，是日本政治史上從來所沒有的。

組閣的困難並不是因為政友會沒有首領。我們最初以為政友會內部不統一，新總裁不容易產生。但是政黨中人知道軍人反對政黨政治，惟恐他們藉口政友會不統一，出而干政，所以於十六日由政友會的元老岡崎望月兩人向床次談判。結果床次完全同意推舉鈴木為總裁，並且用推薦的方式產生，避免投票。但是因為陸軍方面極端的反對，組閣的使命遂不能下于鈴木。

陸軍的意見是推舉法西斯蒂運動的首領平沼麒組閣。表面上說國家有大難的時候，非有「舉國一致」的內閣不能號召；實際上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軍人獨裁的變

相。

同時政友會和民政黨都有擁護憲政的表示，反對軍人干政，與軍部對抗。於是牧野內大臣上奏天皇，照日本的慣例，請垂詢于西園寺元老。西園寺於十九日到東京，與政黨領袖及海陸軍重臣見面，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在他沒有到東京以前，鈴木於十八日曾與荒木會見，請他諒解。但是軍部將校反因此硬化，荒木也不能制止。

因此倉富樞密院長和牧野內大臣提出折衷的辦法，向西園寺推薦山本權兵衛與齋藤實擇一組閣，號稱為「協力內閣」；不完全否認政黨，但不令一黨擁有政權。西園寺最後于廿二日推薦齋藤實，就是這種調停政策的實現。

不令議會中最大黨的首領組閣，日本原有很多的 precedents，不能說是違背憲法，但是事實上已經走出最近十年來的憲法常軌。其結果如何，很難預言。陸軍方面的主張，這次還不能完全實現，大原因是海陸軍不能一致。日本的海軍與陸軍，派別不同，各有傳統的政策。政治上的勢力，向來陸軍優於海軍。如陸軍的舊日的首領是山縣有朋，在他未死的時候，完全掌握日本的政權。而海軍方面的東鄉

元帥向來不肯與聞政治。犬養被刺以後，海軍方面曾有干涉政治的表示。所以西園寺利用海軍的第二名首領齋藤實組閣，一方面和緩政黨的反對，一方面避免完全屈服於陸軍的嫌疑。因為齋藤于原敬時代被任爲朝鮮總督，連任八年，與政友會，民政黨都有感情，而陸軍對於海軍不能無所顧忌，一時或者可以苟安。

齋藤實內閣的運命，第一要看閣員的分配。西園寺的主張是以政黨爲基礎，組織協力內閣。換言之就是兩黨的混合內閣。民政黨在議會是絕對少數，一部分熱中的投機分子，一定歡迎協力內閣。政友會雖是大多數的政黨，然而內部極不一致。不願意鈴木的床次和久原等人，或者願意入閣。若是鈴木系不能滿意，則政友會或者分裂，齊藤實可以利用贊成協力內閣的議員與他抵抗。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爲甚麼日本忽然有「舉國一致」內閣和「協力」內閣的提議？在普通政治狀況之下，這種主張是不能實現的。日本的兩大政黨政策上主張根本不同：政友會主張積極的，所以對外主張強硬，對內主張膨脹（inflation）；增發公債，擴張紙幣發行額，都是這種主張的結果。民政黨是主張緊縮的，所以對外主張妥協，對內主張減收；不發公債，金解禁，減少軍備，都是這種主張

的結果。要使得這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可以合作，成立所謂協力內閣，或是舉國一致內閣，一定是國家真正出了重大的事故，各方面不能不協力，不一致。日本內政的危險完全沒有到這種程度。軍人所謂國難，完全指實行對於中國的侵略政策，或是因爲對於中國侵略而發生的危險（如日俄衝突列強干涉）而言。可見得這一次的政變，是日本軍人對於中國政策絕對硬化的結果。所以齋藤的協力內閣縱然沒有陸軍的「舉國一致」內閣的徹底，但是一定比政黨內閣還積極，這是可以斷言的。

此外我們還有兩件事應該注意的。第一是西園寺到東京的時候，有人散傳單說，「與其尊重元老的意思，不若請問八千萬同胞」。這可見在軍人干政之下，左傾分子並沒有完全消滅。第二是二十日陸軍部軍事參議會表示，若是政黨繼續組閣，難免再發生不祥事件。換言之，日本的陸軍軍人公然以恐怖手段威懾政黨。並且廿一日陸軍當局集議要徹底根究護憲聯盟圍攻擊軍部干政的傳單。在這種狀況之下，要希望日本政治安定，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政治不安定并不是中國之禍，所以我們正不必幸災樂禍，尤其不可自己騙自己，希望一時的苟安！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姚森

在國難期中，財政金融界有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本年二月底財政部所發出的整理內債辦法。發表以後，全國人民因爲一致對外，多不十分注意，報紙上也沒有詳細的評論。事實上整理案的辦法，對於財政金融及人民生活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個月，仍舊有討論的價值。

政府所整理的公債，包括十五年以前北京政府所發的公債在內，現在我們把十五年以前，同十五年以後所發的公債，作一簡表如下：

(一) 北京政府發行的內債（七年至十五年）十四種

有担保者七種，無確實担保者七種。

發行總額爲二五八，三五二，〇〇三元。

截至二十一年一月底未償還額爲一九三，八八八，八六〇元。

(二) 國民政府發行的內債（十六年至二十年）二

十一種

皆有稅收担保。

發行總額爲八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截至二十一年一月底未償還額爲六三二，一八一，五

〇五元。

總計 內債發行總額

一，〇七五，三五二，〇〇三元。

未償還額

八二六，〇七〇，三六五元。

右上列兩表，二十年來內債發行總額共十億另七千萬元；其中北京政府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五年，共發行二萬五千八百萬元，平均每年發行一千七百餘萬元。國民政府從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年，五年之中共發銀八萬一千七百萬元，而其中二十年一年中所發行的有三萬零六百萬元（另有二十年賑災及二十年金融兩種，共一萬六千萬元，未行銷市上，不計在內）平均每年發行一萬六千餘萬元，二者比較，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內債，幾乎十倍於北京政府。這不是因爲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國民經濟日見良好，購買公債的能力增加；也不是因爲北京政府財政比較寬裕。近五年來國民政府所以能發行這許多公債的原因：第一，

是稅收增加。在北京政府時代，中央稅收極少，担保無着，而且內債基金歸總稅務司保管發行，內債非經總稅務司允許不能舉辦。國民政府成立後，稅收增加，公債基金由

內國銀行團組織基金委員會管理，政府隨時可以發行內債。第二，是金融業停滯。銀行原應該依賴工商業放款以資生存；連年內爭，百業停滯，致全國金融界無處可投資，為保持本息計，祇能購買公債以套利息。（即買入本月份貨，賣出下月期貨，本月交割，收入公債交出現款，下月交割，收入現款交出公債，所得買賣的差數即是利息，謂之「套利」。）所以內債可以暢銷，債價得以維持。第三，是投機者多。連年內地苦於兵匪，不能安居，中產階級紛紛携資避居上海。上海生活奇昂，久居不易，所以都做投機事業以作發財之想。公債市場，無現貨交易，做期貨一萬，祇須交証據金八百圓。到期如無力收現，可在銀行押款或套至下月，（即賣出本月，買進下月。）本輕而利大，致投機者日見增多。上海的証券交易所每日所成交的數目約在千萬以上，可証投機者之多。第四，是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多為公債，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多為庫券。公債還本付息，年分兩次；庫券則按月攤還本息，較為活動。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最大年息八釐；國民政府所發行的庫券

至少年息八釐，多數為月息八釐；發行時雖說八九實收，結價時平均不過七扣，以每月收回之利息，同還本所得的差數合併計算，利息實在月息分半以上。

綜觀上面所說，可以知道近五年來公債之所以能發行，價格之所以能維持，都是因為經濟不健康的原故。同時政府揮霍過度，收支不能相抵，公債越發越多。中央收入每年不過六萬六千萬元左右，而內債還本付息就佔有二萬萬元之譜。再除去了三萬五千萬元的軍費和一萬萬元的外債，還剩什麼呢？我們早已料到將來必出於整理之一途。去年九月十八事變發生以後，稅收驟減，金融界為補充實力起見，都將到期的套利公債交出，吸收現金，並停止公債抵押。所以市場的價格狂跌，一蹶不振。當本年元旦孫科做行政院長，就有停止本息的提議，因為銀行界反對，沒有實行。二月宋子文再起，遂有二十一年二月底的整理辦法，當時上海事變發生，銀行界一致擁護政府，安然通過。

財政部所定整理辦法，約有這幾點：

- (1) 利息一律改為長年六釐。
- (2) 還本期限，由財政部擬定程表，分別展延。
- (3) 每月由海關稅入劃出八百六十萬元，作為支配各

項債務基金。

前面內債總表所列三十五種債券，除去那些北京政府所發行「無確實擔保」之七種外，其餘有擔保之二十八種，皆依新定整理辦法更定。這二十八種債券之中，可分四類：

第一類為按月還本付息的債券。國民政府發行之續發二五庫券，十八年關稅，十八年編遣，十九年捲煙，十九年關短，十九年善後，二十年捲煙，二十年關稅，二十年統稅，二十年鹽稅，凡十種，屬於這一類。

第二類為每三個月抽籤還本付息的債券。國民政府發行的軍需公債，十七年善後，十八年賑災，十八年裁兵，十九年關債，二十年賑災，二十年金融，凡七種；又北京政府發行的七年長期，十四年公債，二十四庫券，凡三種；共十種，屬於此類。

第三類為每三個月付息，但四年內不還本的債券。北京政府發行的整理六釐，整理七釐，春節庫券，治安債券四種屬於此類。

第四類為辦法參差不一的四種債券：十七年金融短期週息改八釐為六釐，十七年金融長期不改動。海河公債，及江浙絲業公債，各另案規定。

我們依這新辦法，把各種債券作比較表如下：

| 類別 | 債券名稱 | 原利率 | 新利率 | 展長還清期限 |
|-----|-------|-----|-----|---------|
| 第一類 | 續發二五 | 月八釐 | 月五釐 | 二三月 |
| | 十八年關稅 | 月七釐 | 同 | 三六月 |
| | 十八年編遣 | 月七釐 | 同 | 四二月 |
| | 十九年捲煙 | 月八釐 | 同 | 二二月 |
| | 十九年關短 | 月八釐 | 同 | 四四月 |
| | 十九年善後 | 月八釐 | 同 | 四三月 |
| | 二十年捲煙 | 月七釐 | 同 | 四三月 |
| | 二十年關稅 | 月八釐 | 同 | 四三月 |
| | 二十年統稅 | 月八釐 | 同 | 四六月 |
| | 二十年鹽稅 | 月八釐 | 同 | 四五月 |
| 第二類 | 軍需公債 | 週八釐 | 週六釐 | 四五月 |
| | 十七年善後 | 週八釐 | 同 | 三三月 |
| | 十八年賑災 | 週八釐 | 同 | 四二月 |
| | 十八年裁兵 | 週八釐 | 同 | 四八月 |
| | 十九年關債 | 週八釐 | 同 | 四八月 |
| | 二十年賑災 | | 同 | 最近發行，未詳 |

就這一個月(二月)，內債的負擔減輕了六百萬元；以百分計，減去了百分之五十。此次整理內債的功用，可以推想了。

但是照上列的辦法，各債的利息減少三分之一，期限延長一倍，欲恢復去年九月十八以前的公債行市，必不可。將來交易所開市，以票面最多之統稅鹽稅作標準，市價大約不過四扣。照此計算，持票人損失當在十分之四以上。內債未償還總額為八萬二千六百餘萬元，持票人損失即為三萬三千萬元。政府每年還債的支出，從兩萬萬元減為一萬萬零。如果政府將來的財政能收支相抵，收入不十分減少，公債信用可以維持，則國民雖然受了很大的犧牲，為共赴國難計，也許還算值得。若是仍照二十一年以前的辦法，財政當局只能為政府增加收入，而不能過問支出的是否正當，又不能為國家的財政做澈底的計畫，縱然因為市價的關係，不能再發行新債，那些已經整理的公債，必不能維持目前的價格了。日子久了，這幾年之內，國民所借給政府的八萬萬八千萬元，終必完全犧牲。到那時候，中產階級必然破產；靠中產階級維持的政府，又豈能單獨生存嗎？

| 類 | | | | 類 | | | | 類 | | | | | |
|-------|------|-------|------|------|-------|------|------|-------|-------|------|------|--|--|
| 二十年金融 | 七年長期 | 十四年公債 | 二四庫券 | 整理六釐 | 整理七釐 | 春節庫券 | 治安債券 | 十七年金短 | 十七年金長 | 海河公債 | 江浙絲業 | | |
| 週八釐 | 週六釐 | 週八釐 | 週八釐 | 週六釐 | 週七釐 | 週八釐 | 週八釐 | 週八釐 | 週二釐半 | 週八釐 | 週八釐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週六釐 | 同 | 同 | 同 | 週六釐 | 週二釐半 | 週六釐 | 週六釐 | | |
| 三十月 | 七二月 | 十五月 | 三十月 | 十七年 | 十七年三月 | 十六年 | 四年 | 不延 | 不延 | 不延 | 四二月 | | |

新定整理辦法使政府能得的便宜，我們看這個表就可以完全明白了。即如本年二月底到期還本付息的債券十一種，依舊程表與新表計算，有這樣大的不同：

依舊程表

元

應還本 8,570,049.46
應付息 3,984,590.54

依新程表

應還本 3,417,000.00
應付息 2,667,707.53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日本的會計年度，是從上年的四月一日起，到下午的三月三十一日止。本文都簡用上年；即如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的預算，省稱一九三一年的預算。

日本的預算有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的分別。特別會計是殖民地與鐵道院的兩部分。本文所引的預算，除特別聲明的以外，都指一般會計。

日本對外貿易的統計，分日本本部與日本帝國（包括殖民地）在內。○本文所引皆指日本本部。凡數目字一萬萬爲億，一萬萬以下，則仍用千萬、百萬。

二十世紀的日本可以分做三個時代：第一時代自一千九百年到一千九百十三年，這是歐戰以前的日本；第二時代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第三時代自一九一九年到現在。

歐戰以前的日本

第一時代的開始，在中日戰爭以後，日俄戰爭以前。當時因爲預備對俄，積極的擴張軍備，每年的經常軍費已經到了六千萬圓，比中日戰爭的時候增加了五倍。此外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四年，還用去四億圓于臨時經費，比中國交付日本的賠款——三億六千萬有餘——還多四千萬

。所以在中日戰爭的時候，日本的國債不到九千萬圓，到了一九〇三年，已經增加到了五億三千萬以上。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取得了南滿洲鐵路，旅順，大連朝鮮，薩哈連的南部；內部經濟的擴張，和國外貿易的發展同時並進，遂一躍而爲頭等的國家。但是一方面國家積極的補助獎勵實業，一方面又不斷的擴充軍備，歲出和國債都逐年的增加：一九〇三年的預算案，不到三億；到了一九一三年，就增加到六億八千萬以上。在同期內，國債也從五億三千九百萬，增加到二十五億以上。

國外貿易在一九〇〇年不到五億圓，到一九一三年，增加到十三億圓，但是因爲需用外貨的關係，除一九〇六同一九〇九兩年之外，其餘的十二年，進口都多于出口；平均入超約爲每年六千五百萬元。所以統計國際的貸借總賬，一九一三年日本仍虧十二億圓。

歐戰中的日本

第二時代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年，是日本的黃金時代。不但遠東的市場完全爲日本所壟斷，而且澳洲，非洲，南洋都開闢了新的市場。聯盟國僱用日本的船，購買日

本的軍械，美國繁華的結果，生絲的需要驟然增加。日本的歲入從六億增加到十億，而稅率並未加重，國債也未增發；對外貿易從十三億增加到四十多億，而且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每年出超平均在三億五千萬圓以上，所以國際貸借的總賬，在一九一三年原來虧十二億圓，到一九一九年，一變而為盈十四億圓。

歐戰以後的日本

第三時代是歐戰以後的日本。爲敘述方便起見，我們可以把它這時代再分爲三期：第一期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年，第二期從民政黨執政到一九三一年，第三期從一九三一年的十二月到現在。

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年

我們看見歐戰終了的時候，日本的經濟前途異常的可以樂觀。但是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這十年的經過，完全與當日期望相反。歐戰一停，日本的對外貿易立刻由出超而變爲入超，而且歐戰以前的人超，每年平均不過六千萬圓，本期內十年的平均，每年爲三億二千六百萬圓。同時國債從二十五億增加到五十九億。國際的貸借總賬從盈十四億圓變爲虧八億圓。

推究其原因，約有二種：第一日本的政府和人民，受

了歐戰期中繁榮的催眠，不但不肯緊縮，(Deflation)而且任意的膨脹(Inflation)。其結果戰後各國的物價都逐次的低落；如英國的物價指數，一九一九年爲三一〇，到一九二四年已跌爲一六六，而日本的物價不但不低落，而且增高——一九二八年的指數還是二二五。物價不能低落，預算當然不能減少。同時政府積極的擴充各種事業：一九一九年的預算總數爲十一億七千萬，到了一九二八，增加到十八億一千多萬。收支不能相抵，只靠發行公債。十年之中，每年平均要發二億七千萬。歲出項下，大宗是軍備。一九一八年軍費是一億八千三百萬。到一九二一，增加到三億六千五百萬，佔歲出的總數百分之四十九。直到了大地震以後，方纔減少，但是一九二九年的預算，仍舊有二億四千四百多萬。

第二是大地震的影響，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東京橫濱的大地震，居民死了十萬人，房屋燒去三十七萬所，財產損失在五十五億圓以上。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用在救災同建築的款項，合計爲十八億圓。同年的歲入，比預算減少了一億三千萬。于是國債增加了五億四千五百萬圓，其中一部分是重利的外債。

這兩種原因合起來，造成功一九二七年的金融大恐慌

。因爲不但救災的損失一時不能恢復，而建築繁榮的計畫更增加了膨脹的期限和程度。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鈴木財團破財，影響到台灣貴族兩銀行，金融界遂發生了空前的大恐慌。同時三十六家銀行停止付款。政府一面令日本銀行救濟各銀行，由政府擔保五億圓的損失；一面用二億元救濟台灣銀行，一時金融方得安定，然而國債又因此增加了七億圓。

民政黨的内閣（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九年七月，民政黨內閣成立，井上準之助爲大藏大臣。他的政策是（一）金解禁，（二）緊縮政策。

日本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即禁止金銀出口，歐戰終了仍未能開禁。其結果是匯兌價格不定，物價指數不能低落，財政上永遠是膨脹政策。井上是向來主張恢復金本位的，所以上台之後，第一是籌畫取消禁止金銀出口的法令。恰巧一九二九年對外貿易，入超只有六千七百萬；國際貸借總賬，比較于日本有利。當時日本銀行所存現金還有十億〇六百萬圓，井上又于倫敦紐約兩處儲存現金五千萬元。然後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解除金出口之禁。不久金圓就恢復歐戰以前的匯兌價，同時物價指數也于六月中低落在一九一六年春天的程度。

實行緊縮政策却不如金解禁的容易。井上的主張：一不募新債，二不辦新事業，三極力縮減歲出。不募新債之能否實行，當然要看第二與第三是否能貫徹。而且原有的經常歲入不能減少。不幸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工商業大不振，美國絲貨不銷，銀價低落，中國購買力減少；英屬殖民地又增加關稅，于是日本對外貿易，大受影響。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貿易總數平均每年出口爲二十億三千九百萬，進口爲二十二億四千二百萬。一九三〇年出口減爲十四億六千九百萬，進口減爲十五億四千六百萬。不但關稅收入受了直接的影響，而且各種工商業都陷于困境，政府還要拿出錢來救濟。所以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決算，歲入爲十八億二千六百萬，歲出爲十七億三千六百萬，表面上雖有盈餘，其實歲入之中，經常收入只有十四億八千一百萬，其餘所謂臨時收入一億九千萬還是新公債。不過歲出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的決算，已減少了七千八百多萬，不能不說是井上的成績。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預算更比往年爲難。經井上努力的結果成立的預算爲十六億一千萬元，較之上年，又節省了一億二千五百萬。但是因爲收入比預算減少了二億四千九百萬，雖然極力節省支出，結果還虧了一億七千一百萬，不

能不挪用下年度盈餘及賑災公債餘額彌補。

一九三一年的預算，于是年一月提出議會。井上詳細說明因為百物跌價的關係，預料本年收入要減少一億四千九百萬。同時因為失業的人太多政府設法救濟，要用九千二百萬興築鐵路公路，用九千五百萬借款于小商人，農民和漁業。一面節省海軍修理費，減削政費，定預算為十四億一千萬元，是為日本一九二二年以來最少之預算案。但是實行之後發生了種種困難。一方面減俸案頗遭反對，不能不酌量通融，所省尚不足一千萬元，而陸軍當局雖贊成

裁兵四師團，要求移節省費用于軍械；結果僅海軍省減八十萬元，陸軍反增加一百二十餘萬元。一方面收入逐次減少：計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九月，對外貿易出口不過八億八千八百萬元，進口九億七千五百萬元；比一九三〇年同月份進出口合計，已經減少六億七千八百萬元。到了九月，兩件重大的事變，遂使政府財政上沒有辦法。

第一是東三省的侵略。自九月十八日事變以後日本的對外貿易，大受影響。看下列的表自然明白：

日本對中國各部的貿易表

| 一九三一年十月 | 東三省 | | 北部 | | 中南部 | |
|----------------------|----------------|---------|-------|-------|-------|--------|
| | 輸入(到日本) 百萬元 | 輸出(從日本) | 輸入 | 輸出 | 輸入 | 輸出 |
| 十一月 | 四, 二二 | 〇, 八一 | 三, 九六 | 一, 七〇 | 二, 七四 | 二, 二七 |
| 十二月 | 五, 三二 | 〇, 五一 | 三, 二〇 | 一, 九八 | 三, 五三 | 一, 七三 |
|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 九月每月平均數 | 二, 一四 | 一, 〇四 | 三, 八四 | 〇, 八六 | 四, 六八 | 八, 八六 |
|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 十二月每月平均數 | 一, 八二 | 二, 八五 | 三, 九三 | 六, 三一 | 三, 九五 | 一〇, 五九 |

從上列表看起來，從中國輸入日本的貨物，九月以後比一九三〇年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八，比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影響還不很大，而由日本輸出到中國的貨物，每月平均的每月平均，減少百分之五十八。全國的對外貿易：

一九三一年十月到十二月，輸入共計爲二億二千八百萬，輸出二億三千五百萬。比一九三〇年最後的三個月，輸入減少了百分之十九，輸出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財政經濟的困難，當然可想而知。

第二是九月二十日，英國的禁金出口。當一九三〇年一月，日本解放金禁的時候，日本銀行所有的金幣，共爲十億四千三百萬圓。以後因爲貿易人超的關係每月逐次減少，但是到一九三一年的九月，還存有八億一千八百萬圓。而十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八十九天之間，金幣流出國外，有三億五千一百萬圓之多。其原因固然是國際貸借有虧，匯兌跌價，政府不得不運金幣出口。尤其是因爲日本的資本家，唯恐國內紙幣落價，紛紛購買外國貨幣，及用外國貨幣發行的公債，所以現金逃出國外。

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若槻內閣最後成立預算，歲入爲十三億零七百萬，歲出爲十四億七千九百餘萬。出入不敷共爲一億七千二百萬圓。井上也不能不打破不發公債之政策。但是他仍堅持緊縮政策，并且維持金本位，于是民政黨內部發生破裂。政友會遂出而組閣。

犬養內閣

犬養內閣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成立。所編的預算大致

抄襲若槻內閣的原案，初定爲十三億九千七百萬圓。表面上看起來，比若槻內閣的預算，反爲減少，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第一犬養內閣的預算，把本年減債基金的支付從四千九百萬圓，減爲一千八百萬圓（此外特別會計的減債基金也從二千四百萬，減爲八百萬圓）。第二許多費用，都陸續的列入追加預算。在三月中臨時議會開會的時候，軍事費一項就追加六千七百萬。等到四月十二日閣議通過的追加預算爲八千九百萬。所以本年的實行預算爲十五億四千四百多萬。同時收入項下不但未增，而且大減。到二月底的統計，上年度歲入不過八億五千〇五萬，而歲出已經有十億八千一百萬圓。本年一般會計的經常收入，預算爲十二億六千四百萬，除臨時歲入三千八百萬之外，要發公債二億四千一百萬之多。其中已經決定爲東三省事變費用的有五千九百萬。其餘的一億八千一百九十萬，大部分爲抵補歲入的不足（所謂赤字公債）。這單是一般會計。此外特別會計收支也不相抵，又要發公債七千三百萬。兩種合計起來，公債額共爲三億一千萬圓。據東京朝日新聞的預計，本年的軍事費，匯兌損失費，失業救濟費等等，將來都要加發公債，總數恐怕要到六億圓。上年度日本的國債總額爲六十億。一年內再發六億，就等千分之十

的增加。

與財政有密切關係的就是政府的金融政策。犬養內閣一成立，首先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再行禁止現金出口。當日的希望，以為（一）可以免除現金再行流出國外；（二）國際匯兌跌價，出口貨物可以增加，工業可以復活；（三）國內物價提高，稅收可以驟增。但是實行五個月之結果，幾乎完全與希望相反。

第一政府為維持相當匯兌價格起見，仍是要運現金出口。一九三一年底，日本銀行所存現金，還有四億六千九百萬。到了本年四月三十日，只剩了四億二千九百萬，四個月，現金又減少了四千萬圓。

第二國際匯兌雖然跌價，而世界商業，毫無起色。日本的生絲主顧，又把關稅增高。結果本年一月到四月的對外貿易（殖民地在外）輸入為五億四千八百萬，輸出為三億四千二百萬；入超為二億〇五百萬，為日本從來之所未有。受影響最大的是生絲業。因為絲價陸續跌落，政府為救濟絲業起見，只好把所謂補償生絲，和共同保管生絲（都是生絲的存貨），一齊在海外處分。損失的負擔，除以前定的補償額三千萬之外，國庫再損失二千三百萬。同時製絲家扣任三千五百萬，銀行一千五百萬。這一筆損失就

在一億圓以上。

第三國內物價必需品雖然相當的增高，而都與政府的稅收，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日本最重要的收入是租稅，是不隨物價轉移的。所得稅，營業稅，都是根據去年的數目課稅。酒稅是論量的。烟草專賣的利益，因為原料加價收入反為減少。

由此看起來，禁止金出口的結果，可以說完全失敗。舉凡「膨脹」政策一時的好處，都沒有得着，而匯兌不但低落，並且價格不能安定；上下常在三十到四十（美金分數）之間，將來還有到三十以下的危險。同時日本銀行的現金只存有四億二千多萬，而到五月三日，紙幣已經超過十一億二千七百萬。目前政府決定修正日本銀行發行紙幣的條例。其最要的是：（一）把原來的保證發行額，從一億二千萬，擴充到十億；（二）把限外發行稅，從百分之五，減為百分之三。原來日本銀行于現金準備之外，又可以用政府的公債等證券為保證金，發行一億二千萬的紙幣。如現有現金四億圓，就可以發行五億二千萬圓。發過了此數，謂之限外發行。政府照所發行限外的數目收百分之五的稅，以限制濫發紙幣。現在的修正案，一面擴充發行的限制額，一面減收限外發行稅，完全是希望積極實行「膨

賬」的政策。

五月一日，大藏省又決定用預金部（大部分爲郵政儲蓄）項下二億圓借給勸業，興業，拓殖，農業各銀行，爲各項承受不動產抵押券的保證。如果各行利息有損失，可以用此款抵補。這是所謂「不動產資金化」方案。因爲日本各地方銀行，承受不動產抵押品的，大部分財產固定不能流通，經濟異常的困難。政友會主張用國庫支出來救濟。高橋大藏大臣初起很反對；最後纔用上列的方法來解決，比較的國庫損失不多。但是各銀行不動產的抵押品至少在十六億以上。二億圓的救濟，能發生多大的效果，還是疑問。而且將來勸業興業等銀行的不動產投資，本錢無着，預金部的二億圓是否能收回，也沒有把握。

結果

一國的財政經濟完全看兩件事實爲定：第一是預算收支是否相抵；第二是國際貸借總賬的盈虧。我們看見日本自從歐戰以後到如今，歲入總是不足，貿易總有入超。到了本年，歲入的不足在三億五千萬到五億之間。對外貿易入超四個月在二億以上，本年至少也有四億。國際貸借的總賬，至少總虧到十億。因爲禁止現金出口的原故，滙兌已經跌價。國外的支付，以日金計算，已經要加百分之三

十五以上，所以將來國際貸借的付款，一定要增加紙幣的發行；同時紙幣增加，滙兌更要低落。照最近的計畫，日本銀行限內的發行可以到十四億。限外發行稅既然預備減少，將來限外發行必不能免。我們可以預言，本年之內，紙幣或者要到二十億左右；滙兌價格，或者要落到二十五分以下。如此則國內的物價恐怕增加到一倍以上。

這種狀況，一半由於世界商業的不振，一半由於侵略中國的結果。此後軍備不能減少，收支恐怕永遠不能相抵。中國方面縱然抵制日貨不能如近六個月的澈底，怕是感情不恢復，對中國的貿易也不能有很大進步。

但是我們要覺悟的是照目前現狀，日本的經濟雖然很可悲觀，距崩潰的程度還遠。知期以內不會有絕大的變動。我們不是可以單希望日本自敗，而就放棄我們的自衛運動的。

參攷書報

朝日年鑑 昭和七年

國勢俱樂部 昭和七年二月

經濟論叢 昭和七年二月

Japan,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ppraisal, by H.

G. Moulton

吾國人之吃飯問題

吳憲

國事敗壞至此，溯其原因，咎在乎人。國人之大病

董者。

有二：一曰自私，二曰懦弱。前者乃道德問題，俟他日再論。後者則體育問題，與營養有密切關係，故作是篇。

太古之世，人以游獵爲生，所食之物，皆動物也。其後人知取火，烹飪之法以興，堅固之穀粒，可以使之軟化，人類之食物，遂董素兼備。吾國農業發達甚早，三代之世，人民之膳食，已以五穀爲重。然其時獵狩之事，散見於典籍者尚多。且地廣人稀，人民不受經濟壓迫，食物可自由選擇。是以穀食之風方興，而肉食之風未艾也。秦漢以降，文事日興，武風漸弛，農爲邦本，而游獵之事，漸不聞焉。且人口日繁，生計日窘，人民之膳食，遂偏於素食。何者？肉食貴而穀食賤也。况自佛教流入中土以來，迷信之徒，以殺生爲罪惡。俗人食長齋者，雖不甚衆，而以素食爲美德之觀念，深刻人心，於吾國人之膳食，亦有相當之影響焉。

園丁之養花也，栽諸沃土，灌以肥料，而後可望其枝葉茂盛，花萼輝煌。牧人之食畜也，放諸新草，飼以蔬菽，而後可望其皮毛豐滿，骨格堅強。苟非有適宜之土壤，則雖奇葩珍卉，亦將見其枯槁。非有適宜之養料，則雖駿馬良羊，亦將見其瘠弱矣。動植物之生長，至何程度，視乎營養。人類何獨不然？人之體育，一視乎遺傳，二視乎環境。而環境中之最要分子，則爲食物。蓋人身一毛一髮，其物質皆取諸食物。一舉一動，其能力皆來自食物。遺傳雖優，非有適宜之營養，亦無以發展其天賦之美質也。

歐西諸國，開化較吾國爲晚。况以最爾之地，而爭雄者十餘國。磨礪砥礪，人存戒懼之心。是以文事雖興，而武風未弛。富貴之家，至今以游獵爲娛樂，其民族之精神

吾人之食物，不外植物動物兩種。完全植物之膳食爲素食。完全動物之膳食爲葷食。動植兼用者爲雜食。

者十餘國。磨礪砥礪，人存戒懼之心。是以文事雖興，而武風未弛。富貴之家，至今以游獵爲娛樂，其民族之精神

世各國之膳食，大半爲雜食，但有偏於素者，有偏於

武風未弛。富貴之家，至今以游獵爲娛樂，其民族之精神

可見矣。且競爭劇烈，人口之增加不速，經濟之壓迫不甚。迨乎近世，承平日久，科學昌明，工業發達，人口漸繁。而大假以兵車之利，關拓殖民地於美澳非三大洲。歐洲雖小，國無人滿之患，民有致富之術。其膳食之偏於葷食，勢使然也。

素食與葷食，苟配合適當，皆可以供最低限度之營養的需要，然而優劣懸殊。質言之，幼者皆可以生長，而遲速不同；長者可以生育，而嬰兒之強弱不同；老者可以生存，而壽命之長短不同也。世界諸民族之膳食，皆足以供最低限度之營養的需要。不然，則滅絕久矣。然其體育發達之程度，觀其體格之大小，精神之強弱，即可知其迥不相同。此其屬於遺傳者固不尠，而由於膳食之不同者，亦多多也。檀香山之華人，粵人之後也。但今日檀香山華人之體格，比之粵人，偉大遠甚。二十世紀之初年由日本遷往美國加利福尼亞省之日人，比其同輩親族之生長於日本者，亦較為高大。此乃環境改良所致，而膳食之改良，實其主因。聞者疑吾言乎？則請觀動物之營養的試驗。

鼠之生理，與人類相同者甚多。即以膳食而論，則鼠與人皆葷素雜食者也。吾嘗擇同胎之小鼠若干頭，於斷乳之後，分爲兩羣。一羣食葷一羣食素。此兩羣之鼠，各羣

皆而浸蕃，今已十數傳矣。是二羣之膳食，皆足以供營養最低限度之需要。然試以素食者與葷食者，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日而語矣。欲知素食與葷食之優劣，請言食物之成分及其功用。

食物所含之物質，其要者有五。一曰糖類，二曰脂肪類，三曰蛋白質類，四曰鹽類，五曰維生素類。糖與脂肪皆所以供體內燃燒之用。其於人身，猶之煤炭之於機器也。蛋白質亦可以充燃料。但其主要功用，則在乎供給構造肌膚之材料。鹽類之物，如鐵之於血，鈣之於骨，亦供構造。但鹽類之大部，其功用在於調節生理。此四類物質之外，尚有一種有機物質，在食物中爲量至微，而爲營養所必需。其功用亦在調節生理。因未經鑑定爲何物，故暫以維生素名之。維生素之已經發現者有六種：甲以防乾眼之病，乙以防脚氣之病，丙以防血疽之病，丁以防軟骨之病，戊以防不育之病，庚以防癩皮之病。

以上所述五類物質，動植物中皆有之，第多寡不同已耳。素食與葷食營養價值之不同，即由於此。舉其大者有四點。

一，食物中有渣滓，可以利大便。但渣滓太多，則食物之消化與吸收，均發生障礙。植物之渣滓，比動物多。

是以素食者比葷食者，多食而少得。

二，植物之蛋白質，不若動物蛋白質之適用。凡生物各有其特殊之蛋白質。人體之蛋白質，比之植物之蛋白質，相差甚遠，比之動物之蛋白質則較近。故以植物之蛋白質，改造人體之蛋白質，則可用者十之五六，不可用者十之四五。若以動物之蛋白質改造，則可用者十之七八，不可用者二三而已。

三，植物中鹽類之成分，大半比之動物為高。但牛乳中鈣質之多，而且易於消化，為任何植物，所不能匹。

四，各種維生素，皆來自植物。但其成分，有不若動物之高者。肝臟中維生素之富，即綠葉之菜蔬，亦所

不及。

總而言之，營養之要素，植物中雖皆有之，而其成分不若動物之高。草食之動物，具鉅大之臼齒，又有復胃與長腸，故能食多量之草，而取其菁華，人類之消化器官，非可比草食之動物。直接取諸植物，不若間接取諸動物。猶之登山採玉，入海尋珠，不若購之珠寶店之易易也。

英美諸國人民之膳食，有精確之統計，其成年男子平均每日所食之各種食物，皆有數可稽。吾國人之膳食，素無統計。然近年以來，關於膳食之調查有數起。所得結果，雖不能視為全國人民之平均，而中等社會之膳食，於此可見一斑矣。茲將中美兩國人民之膳食，列表如左。

中美兩國膳食成分之比較(以百分計)

| 總數 | 美國中等家庭 | | 北平中等家庭 | | 北平工人家庭 | | 上海工人家庭 | |
|------|--------|-------|--------|-------|--------|-------|--------|-------|
| | 蛋白質 | 發熱量 | 蛋白質 | 發熱量 | 蛋白質 | 發熱量 | 蛋白質 | 發熱量 |
| 穀類 | 15.5% | 35.5% | 27.7% | 27.7% | 55.9% | 25.5% | 6.1% | 21.3% |
| 豆類 | 37.3% | 36.2% | 7.9% | 8.0% | | | 6.1% | 7.1% |
| 魚及肉類 | 35.3% | 19.0% | 10.8% | 3.8% | | | 15.5% | 5.4% |
| 蔬菜內 | | | 3.8% | 3.8% | | | | 5.4% |
| 魚及肉類 | 35.3% | 19.0% | 9.7% | 6.1% | 1.7% | 0.2% | 5.4% | 3.3% |

| | | | | | | | | |
|-------|---------------|------|-------------------|-----|----------|-----|---------------------|--|
| 蛋及牛乳 | 1.62 | 10.1 | 0.9 | 0.3 | | 0.8 | 0.3 | |
| 油 | 0.3 | 10.3 | | 3.9 | | | 7.9 | |
| 糖及澱粉 | 0.1 | 10.1 | | 3.4 | | | 0.6 | |
| 蔬菜及水果 | 10.4 | 11.4 | 3.8 | 2.5 | 1.9 | 2.7 | 0.6 | |
| 雜物 | 0.3 | 0.5 | 0.9 | 1.1 | 1.8 | 0.8 | 1.7 | |
| 備考 | 見許孟氏「食物與營養化學」 | | 見吳憲吳儼彩韻「北平人膳食之研究」 | | 見陶孟和「北平生 | | 見楊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 | |

試以吾國人之膳食，與美國比較，則我之偏於素，彼之偏於葷，顯而易見。城市之居民且然，鄉間更勿論矣。按發熱量計算，植物的食物，在彼之膳食中，佔十之五六，在我則佔十之九。美國人每日每人得一百公分之蛋白質。吾國人得九十公分，二者相差不遠。但彼之蛋白質，屬於動物者過半，而我之蛋白質，則屬於動物者不及一。牛乳雞蛋二者，食物中之最優者也。美國人不特用牛乳為飲料。即沖湯煮菜，亦在在用之。雞蛋之用法尤多。是以此二種食物，在美國人之膳食中，以發熱量論，佔十分之一。以蛋白質論，則佔百分之十五。吾國雞蛋之產量雖不少，而輸出甚多。中等之家，視為盛饌。若牛乳則用者更鮮矣。吾人膳食之所以遜於西人，由於肉類之缺乏者為輕，由

於牛乳雞蛋之缺乏者為重。綠葉之菜蔬，乃植物的食物中之最優者，以其富於維生素與鹽類也。米與麵之維生素與鹽類之成分甚低，而尤以白米白麵為然。以之供飽有餘，養生則不足。吾人之膳食，雖曰偏於素食，實只偏於穀食。菜類之物，如菠菜油菜之屬，比之西人，不特未曾多用，而且較少。此似不可信，而實易於了解也。俗謂用膳曰吃飯。是吾人之膳，以飯或麵為主體。其他食物，皆輔助品，用以開胃口便下咽而已。兩塊鹽菜，可以配一碗飯，一根葱可以和一斤餅。此吾人所常見也。西人之膳食，葷素兼用，各採其優。吾人之膳食，葷食之優點既缺，而素食之優點，又未能盡量採擇。宜乎營養之不良矣。因營養太劣所生之病，如乾眼腳氣軟骨等等皆吾國所

常見；然共數尚不多也。若因營養之劣而不甚劣，體質衰弱，而無特殊之病狀可稽者，則十人之中，恐有八九。斯乃吾國積弱之直接原因，惟知之者尙鮮耳。此不僅吾國爲然。試以亞洲食米諸國人民之體格精力，與歐美食肉飲乳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書名與著者 HUMANITY UPROOTED, by

Maurice Hindus.

出版者Cape and Smith, New York

這是一本實地研究蘇俄革命的著作。全書共分三編，

二十一章。第一篇凡九章，講一切制度的革命，而集中于宗教，產業，個人，及性與愛的四個題目。第二編凡八章，講組成俄國社會的各種人民，一農民，二平民，三共產黨，四青年，五智識階級，六哥薩克，七猶太人，八婦女。第三編曰『尋求』，乃是世界各國對俄態度的研究，凡四章，爲英國，美國，革命，及戰爭。

作者本是俄產，到十四歲時，方跟著他的家人來到美國，故他最能了解俄民的心理。同時，因他的高等教育是在美國得來的，故他又能不爲本國的習俗思想所錮蔽，而能以超然的眼光，來觀察那變化的社會現象。他又爲著作

之人相較。則強弱勝負之數，豈待問政治的狀況而後知哉？遺傳不可變，而營養可以改良，有心國事者，幸勿以飲食爲小事而忽之也。

（書評）

此書之故，到俄國去了六次，故他的觀察是精密的，是科學化的。他在寫作之時，極力的避免主觀的褒貶，任讀者自己去下斷語，這尤其是本書的特別優點。因爲對於一個掀天動地的普遍人生一切活動的大試驗，如蘇俄革命所表現的，我們是應該用客觀的及虛心的態度去觀察的。何況那個試驗尙正在猛烈進行之中？

本書雖重客觀，却不枯寂，他有的是文學的意味。比如在第二編中，我們可以看見一種種的人民，各穿着不同的衣服，負着不同的擔子，懷着不同的恐懼與希望，在蘇維埃新制度之下，結隊遊行。有飽的，也有餓的，也有歡呼高唱的，也有短吁長嘆的。形形色色，各呈不同的個性及對於環境的適應。這幾乎要使此書成爲一本好小說了。除去文學意味之外，本書又是一本極爲具體而又極爲經濟的著作。全書之中，沒有一個情形不是用事實來寫明的，

也沒有一件事實是濫引的。作者看清楚了他的題目，抓住了題目中的幾個中心點，再用全副精力去寫他們。這是本書技術成功的第二個理由。

我們讀過此書之後，所發生的感想是什麼？

第一，我們更加深信，制度的改革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人的理智與情感的改革，却困難得多，尤其是在情感方面。故我們讀了第一編制度的革命之後，心中雖然充滿了希望，然讀到第二編時，不免又發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感了。這個矛盾現象本是人類本體的弱點，不過他在革命過程中更爲顯着罷了。

第二，那些自以爲進化民族的人生觀與蘇俄的人生觀相比之下，似乎前者的封建臭味還是十分濃厚。比如靠了種種人爲的激勵，一般青年對於性的關係，都不自知的發生一種病態的興奮與追求。而我們讀了此書之後，知道蘇俄的青年男女因爲沒有神秘的激勵之故，乃是現代人民中最少性的自覺者。這實是一個極健康的現象；雖然這在流淚派的詩人看來，未免有點煞風景。

庚款與教育 (通信)

適之兄：

我此次南下，經過南京，無意中買了幾本中央大學教

第三，我們感到革命的不經濟。即使一切革命都是進步，那進步亦如激流冲岸，冲場一度堤岸，留下一層泥土，這泥土的代價可算是大了。但在這個愚闇及自私的社會中，舍此之外，似乎又沒有旁的道路。

第四——這是我們中國人最不應輕輕放過的一點——是蘇俄現在最期望的，乃是在世界各國創造一個『緊急的革命形勢—An imminently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而在世界各國中，中國乃是創造這個形勢的條件最完備的國家！所以在資本國家看來，我們固然是天字第一號的市場及投資地點，在反資本的蘇俄看來，我們又是產生世界革命的理想區域。四方風雨，交集一身，我們打算怎樣的自處？

總而言之，我們讀過此書之後，絕不能再說這樣的一句膚淺話『蘇俄是值得讚美的』，或是『蘇俄是應該詛咒的』，我們的唯一結論，是『我們若欲了解現代的世界，及預知他未來的命運，是非親到蘇俄去住幾年不可的。』

(哲)

授們新出的一種週報『時代公論』看看。在這個週報的第二期中有程其保先生著的『庚款與教育』一文，對於各國

庚款的退還及用途有所論列。本來程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的關於『庚款與教育』的意見，是我們早已領教過的。不過此次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間，有的爲我們所不能了解的，有的爲程先生對於事實未能了解的，我以爲有一點討論解釋的必要。現趁着船中無事，把他寫出來，請你斟酌發表如何？

第一，程先生說『自美國首創退還一部分庚款，開辦清華學校，各國皆隨聲附和，截至現在，退還庚款者有英，美，俄，比，日諸國。（日本庚款以辦法未得我方同意，當屬懸案。）』據我所知，退還庚款的，除了上舉各國之外，尚有法國，而日本則係自己直接管理所謂東方文化事業，決不能認爲退還。但我所不解的，程先生既主張各國庚款，應有『通盤之籌畫』，何以討論所及，僅舉美國爲例，而置其他各國於不論不議之列？程先生動云『各國已經退還之庚款，爲數約近萬萬。』不悟若僅就一九二四起退還之美款一方面而言，每年所得之數，不過國幣百數十萬而已。這個數目，抵不過一個國立大學的經費。程先生若問『十餘年來，所謂教育事業何在？所謂文化又復何在？』我們可以說近幾年來，由美款設立的圖書館，生物館，調查所，科學研究補助金……似乎至少與中國的大學

教育有同樣價值罷？

第二，程先生說『各國庚款之保管權，大都付之於少數之人，故其用途亦怕爲少數人所支配』。又說『各國庚款既直接或間接以提倡教育文化事業爲標榜，則負有主持全國教育之責者，應有全權支配之權。』照程先生的意思，各國庚款委員會都不必組織。只要把各退還的庚款交與中央教育部就得了。因爲一個庚款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是不能太多的。所以一組織庚款委員會，庚款的保管權就不能不『付之於少數之人』。再說『主持全國教育之責者』當然是除了中央教育部外，沒有第二個機關。不過我們回頭想想，當日庚款委員會的設立，不是因爲恐怕政府官吏挪用庚款作軍費政費的原故嗎？這種疑慮，在今日似乎還不能完全免除。我們不見俄款的挪用嗎？不見最近英美庚款的停付一年嗎？教育部對於這種事件，何嘗有抗議的權力？全權的支配更不用說了。我們對於程先生爲受教育經費的困難，而仍能保持他信賴中央教育部的決心，固然表示欽佩；但這個問題，恐怕不是這樣單簡的方法可以解決的罷？

第三，程先生不贊成庚款的支配，『所謂提倡，所謂協助，均屬零星，毫無通盤之籌畫，以至輕重緩急，未曾

顧及」；而同時對於中基會在北平新設的圖書館，以為用款過巨，又不贊成。程先生對於中基會補助科學研究辦法，以為「此校五千；彼校一萬，……零星碎散，實際上對

則中大理學院農學院皆受相當的補助。教育學院亦有中基會設立的教授席」，而認為「不平之例，未有甚於此者」了。

於研究事業，或因款項微細，或因計畫缺乏，究難切實執行」；而同時對於北大「每年獲得二十萬之補助費」與中大教育系「區區萬元之數，獨不可得」，不勝其憤慨不平之情。我們所曉得的，中基會的分配款項，有一個「主要政策」，是圖吾國自然科學的發達。要圖自然科學的發達，所以提倡科學研究。要提倡科學研究，所以要設立科學研究教席，設立調查所，設立一個較大的參攷圖書館；而不主張設立許多分散的民衆圖書館。這些事業，在程先生以為是「因人設事」，實則是由「詳細擬定」的「主要政策」而來。至於集中財力，做一點比較有效的事業，也是近年中基會「主要政策」之一。程先生若見到這一點，似不必因北大的得了補助，與中大教育系的未得補助，（實

總之，我們對於程先生——可以說無論何人——發表的關於庚款用於教育的意見，表示歡迎；但對於他們有誤會或不合事實的地方，也不能不加以解釋及討論，我個人的意思，以為庚款用於教育，現在不過是一極小部分。除了美款用於清華大學及中基會，法款的一部分用於中法大學外，其餘所謂幾千萬萬的英庚款俄庚款及其他庚款，何嘗用在教育上來？現在就美庚款的一部分，也要發生問題了。教育界的同人要責成美款的一部分以全部庚款萬萬元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事體。我們希望教育界同人，再拿出前幾年的熱心與勇氣，多爭出一點庚款來辦教育，那嗎，教育經費就有一條出路了。

叔永 二一，五，四，書於安慶船中。

| | | | | | |
|-----|----|------------------------------------------|----|-----------------------------|----------------------------------|
| 寄售處 | 北平 | 北平各大學售書處 北大出版部 國立北平圖書館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 上海 | 四馬路 新月書店 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 | 本刊歡迎各地 代派，另訂有 詳章，函索即 寄。 |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郵政罷工感言

孟真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丁文江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三，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志摩日記的一頁

徐志摩

獨立評論每週

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

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國外加郵

費八角。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島開富文齋
西單遊藝商場

米市大街新書
米市大街新書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
法租界天津書局

五馬路東亞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獨立評論

第三號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再版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三版

廢止內戰大同盟

二

胡適

五月二十五日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銀行公

會和錢業公會聯合通電全國，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

同盟章程十條，其中第二條說的是廢止內戰運動的方法，共分三個步驟：

- (一) 平時發表文字或演說，宣傳內戰的罪惡。
- (二) 如有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本會應勸告雙方信任若何民意機關（正式國民代表機關未成立前，法定民間職業團體可替代之）調處之，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解決。
- (三) 不幸內戰竟發生時，本會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應一致拒絕合作，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

這個通電發表後，北方輿論大體贊成，但也有很悲觀的論調。有北平晨報五月二十八日的社論，對於上列三項方法，都很懷疑。第一項宣傳和平，晨報認為「紙上空論」；第二項調解辦法，「亦與第一方法，得同一結論」。第三項不合作及制止方法，晨報認財閥拒絕合作為比較有效，但「僅賴此一法，尙未足以止戰」。

晨報的結論是：

今日我國所需要者，不特斷絕內戰禍根，且當消滅敵對狀態。……欲求取消敵對狀態，祇在政治上謀其公正與光明而已。而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則有待於全民之奮鬥。……倘不求內戰之根源，而謀長治久安之道，則內戰既未得苟免，而國難亦無可挽救。

這種批評自有他的立場，但我們不應該因為一時沒有根本治療方法而就菲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廢止內戰的運動並不是反對「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我們都會說：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內戰必不能完全廢止。然而我們也可以說：內戰不斷發生的狀態之下，也決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可說。這是一串連環套，在文人筆下顛來倒去，永遠解不開。但在事實上，這種連環套，止有學那位齊國君王后一錘敲碎下連環的方法，敲斷的一點就是解決的一點。今日東南人士的發起廢止內戰運動，也不過是認定這連環套上的一個起點，想喚起全國人的努力，先擊破這一點。這正是中國政治具體化的一個好現象。不然，我們只好高談「

根本解決」，「全民奮鬥」，「長治久安」，而這一整套的連環終沒有解開的希望。

我是贊成這個廢止內戰運動的。我贊成這個運動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個運動的發起可以代表國內財閥商人的一種新覺悟。內戰不全是軍人造成的，是有錢階級和有鎗階級合夥造成的。此次上海的商业和銀錢業的領袖，從切身的痛苦和恥辱裏得到一點點悔悟，公然宣言他們願意用「拒絕合作」爲制止內戰的一種方法，並且宣言「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所謂「和平適宜方法」，我們希望他們老實指出即是罷市罷工的手段。倘使南北各經濟中心的商業銀錢業領袖真能有這點「一致拒絕合作」的決心，再加上民衆的援助，我們相信內戰發生的機會應該可以消除不少。

但這一點並不是我贊成這個運動的主要理由。我相信這個運動可以造成一種道德的制裁力。近幾年來，大家濫用名詞；明明是內戰，偏叫做護什麼的革命，或叫做倒什麼的革命。砲火停息之後，人民死傷了整千整萬之後，半年一載之後，當日機關鎗對打的仇敵又早已攜手合作了，當日共同作戰的文武同志也許又早已分崩離析，準備第二次機關鎗對打了。大家回頭想想，究竟打倒了誰？究竟擁

護了什麼？究竟解決了什麼糾紛？究竟革了什麼的命？現在這個廢止內戰的運動，只是要八把拳頭叫做拳頭，巴掌叫做巴掌，內戰叫做內戰。凡用武力來伸張私人或黨派的意見，凡用武力來謀政治糾紛的解決，凡用武力來壓迫剷除政治上的異己者，都是內戰，都是應該廢止的。這種心理本是多數人所同有，只是在那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壓迫之下，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直到外患來臨，國家遭了最大的恥辱，人民才敢出來公然宣告內戰時罪惡。這雖然是太晚了的覺悟，然而這點覺悟究竟是一大進步。我們應該積極抓住這個因外患而痛恨內戰的心理，造成一種有力的道德制裁。悲觀的人們也許要嘲笑「道德制裁」的迂闊無力。但我們試看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央政府會陷入最窮最窮的危急狀態，然而各方的土皇帝和軍人政客至今還不敢公然開始內戰，並且曾有幾處的軍人聲明不再參加內戰。這裏我們不能不承認一種無形的道德制裁的力量。今日的廢止內戰運動即是繼續擴充這半年來因國難而興起的道德制裁，要使他成爲有形的，有組織的，自覺的權威。如果我們受了此番大恥辱之後，還不能造成全國一致制止內戰的道德權威，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真成不可救的了！

最後，我們也感覺大同盟章程列舉的方法很有可以討

論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天津益世報有一篇贊成廢止內戰運動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日希望廢戰運動成功，根本即須設法免除武力維護政權，武力爭奪政權的事實。在此點上，唯一方法即在建設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今日倡廢止內戰大同盟的人即應澈底認清目前的政治環境，在今日局勢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是否已經存在？

其實大同盟的發起人早已認清了在目前局勢之下完全沒有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政制，所以他們想暫時用那現有的民間職業團體來作調處政治糾紛的機關。我們也承認只有早日走上憲政的路才可以根本免除用武力攘奪政權的內戰。在憲政實行之前，我們希望廢止內戰運動應該努力做到這幾件：

第一，大同盟應該求那些曾經表示不參加內戰的軍人加入這個運動。如十九路軍，在日本發難之前就表示不肯打廣東。我們希望陳銘樞先生們能擴充這

一點不肯打廣東的志願，進一步作軍人反對內戰的大運動。

第二，大同盟應該忠告現在掌握政權的國民黨至少要先在黨內建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制度，不可再年年火併唱武戲給黨外人喊倒好了。

第三，大同盟既有用經濟不合作來制止內戰的決心，應該同時做提倡裁兵的運動。每年花三萬多萬元供養的軍隊，一旦國家有危急，不能守土，不能抗敵，或者發慷慨激昂的通電而不肯受政府的電調赴援淞滬：這種軍隊除了內戰殺同胞之外是別無用處的。

第四，大同盟應該督促政府早日實行憲政，因為只有法律的解決可以根本替代武力的解決。

同盟章程第三條說：「本會除專為廢止內戰運動外，不得為他種之行爲。」我們提出的這幾點大概不能算是「他種之行爲」罷？

☆ ☆ ☆ ☆ ☆

郵政罷工感言

孟 真

這次郵政大罷工，突然發動，驟然停止，除去給社會

一個幾天的不便大損失以外，更使人驚異，何以這樣大

事起得這樣急驟，不有作用，焉能這樣倏然動作呢？於是「背景」之疑是人人心上有的，不待政府這樣表示，並且扣留了交通部郵務司長郵政總局局長，人民已經免不了想，這事的「裏面」不簡單了。然而這事政府處置得總算不大差，事情一發，陳公博等便飛到上海，三五天內，便成立了一個公式而復工。我們希望這次事件能弄出一個好結果，而不希望牠樹一個惡榜樣，不妨從局外人的皮毛觀察上，談談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我們以為求政事之進步，每每不可推求「背景」。凡事總有一個背景，這背景每每複雜到大聖人不能分解的地步。若處理一事，就背景推闡下去，可以引起無限的枝節和感情，愈弄愈不得要領，若但就票面理處，是是非非，應當不應當，轉可以看得清楚，處分得乾脆。求政治上軌道，非略去枝節不可，即非以公開的立場為注視之對象不可，即非忽視背景不可。這話誠然不是對歷史政治哲學家說的，然確是「實際政治」的一個要律。

第二，我們以為就「民國」的立場論，凡是政府與人民或人民的一部分衝突，只有「民國」的勝利或失敗可言，並無政府或其反抗人之勝利或失敗可說。凡一事鬥爭之結果，可益于國的結果，兩方皆無喪失面子之可言。反之，若

有害於國的結果，兩方皆無志得意滿的權利。所以我們懇切盼望這事將來之根本解決，在政府不必苦苦追求背景，在郵工不必斤斤計較勝利。這話具體說來如下：

一，我們雖非熟知郵務的人，然年來感覺，深慮郵務的情形是江河日下了！若干年前非經考試不得入郵界的，近年頗有不走這一道的了！若干年前郵政是盈餘的，現在年復一年的虧短了！當年郵務的效率是差強人意的，現在是不能保持的了！總而言之，官場的腐化侵入郵政了！誰負這事的責任呢？或者不應歸罪于一方面，然歷年的交通部是不能辭其咎的。截至五個月前，四五年來交通部未換長官，故王伯羣等尤不能不負責任。即如所謂儲金匯業局者，郵界與報界久已對之議論紛紛，說交部曾以個人或眷屬的關係，引用了些並無資格無能力與經驗的人。此事真實到如何地步，我們誠然不能揣想，然交通部並不會對此事拿出事實的辯證來以息流言，則亦徒召網紀之凌遲而已。凡是一事之腐化，每每發端於主持者自己之不振作，管理者徇其自己之私，即不能不遷就被管理者擴張其自己之利益，於是雙方的日就敗壞。然則縱使郵工之年年加俸為郵政虧累之一主要原因，而交通部及郵務管理人之自己不

振作，即須負此事之全部責任。現在的交通部既不在王伯羣手，且交通部長又是一位愛國而勇于負責的人，大可藉此機會痛痛快快把郵務情況和盤托出，斷然整理。只能先做到這一步，才可以取信於國人，然後可以強力制裁出軌的舉動。若高談綱紀，而將自身之健全問題掩着，政府的威信是維持不下的。且郵務腐敗積年已久，現在的交通部負責者任職不到半年，何必代北京的交通部王伯羣的交通部受過？所以我以爲交次陳孚木所打的官話，頗像是專對自己過不去的。

二，郵政罷工確是一件不可爲訓的事。郵政罷工之危迫人民生活，至輕也僅僅下於自來水電燈罷工一等，國家社會愈有組織，愈擔當這事不起。這樣獲罪人民的事，是於郵工最不利的。縱以罷工有所得，而最後結果所得的不償所大。此次罷工雖在國難期中，而所以未曾激動人民公憤者，一因罷工恰在政府加郵資以後，人民正恨政府之謬舉，二因罷工的文章不會全做在郵工利益上。然而這樣的環境湊合，機來是難得再有的。敬告郵務工友，這樣舉動，一之爲甚，不可以再。

三，所謂「以郵養郵」者，固是一個很合道理的標語，然而斷不能解作以郵資養郵工。郵政是一個有機體，牠應

該有有機體的發展性。郵政盈餘固應分一部份爲郵工的利益，然而添郵路——航空郵在內——增郵局，確是必要的。航空郵是近代國家的必備品，在遼闊而交通不便的中國尤其是絕對的必要，否則新疆甘肅儼如外國。此時中國航空郵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至於交通部以及鐵道部管的航空公司是否腐敗，用人是否得當，乃是關於局務精良或腐敗的問題，不關航路之應否存在。至於開闢普通的郵路，增加偏遠的郵局，都是郵政發展的經程上必要的事業。郵工待遇固應合於社會主義的要求——我們相信一切職工應享此權利——我們同時也要顧全中國人的一般經濟狀況，和郵政的事業。

然則當前的所謂「郵基」問題只是一句話，即是「把郵政建設在一個『建強的商業基礎』之上」；所有除積弊，去冗員，維持並增加郵工的效率，保障員工，以考試登庸，以甄別加薪，以買賣的便利定匯業局之獨立與否，不再做奢侈的建築，等等，都是這個主義下的實際方案。郵工所提出的事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不特此中大可研究，此外亦不少可以研究者，郵務效率其一也。政府必須有誠意，有膽量，有方法，激底的整頓郵務，然後可以維持其威信，然後可以彌補其郵政加價之失人心；若特別注

意背景，必弄得一團糟。郵工必須站在郵政進步的立場上，然後可得國人之同情，若以私人之利益，每每危害及

。人民的生活，中國人雖愚鈍，也免不了有起來自衛之一日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劃

丁文江

近幾天北平的報紙忽然宣傳教育部因北平公私立各大

學院共有十二個，計三十多學院，「院系重疊，勢難發展」

，有電令到平，令蔣夢麟沈尹默二人組織評定會，將相同學系歸併。同時發表教育界某要人的談話說「北平各大學均具有相當歷史。例如北平大學之各學院，均為以前之獨立大學；農，工，醫又為北方教育之骨幹。師大為全國師資之最高學府，清華更具特殊精神……交通大學直隸交通部……北大成績甚佳，惟其學系與國立各校重複。法學院北平大學有之，文理二學院師範，北平，清華，三校均有，故可合併者僅北大一校」

聽說到本日止部令尙未到北平，所以我們無從曉得這種消息的真假。但是北平各大學校院，很多重複，很不經濟。如果教育部真有決心改革，使高等教育得合理化，我們是極端贊成的。不過這是一件狠重大狠不容易的事。事前必須有公開的，公平的調查，然後可以定合併的標準。決不是蔣夢麟沈尹默兩個人所能評定的。

合併的標準我們以為應該完全以學生的成績為定。學校的目的是教育學生。假如教育的結果，學地質的學生不認得岩石，學化學的不能做分析，學文學的文法不通，這種學校無論牠有多麼長久的歷史，都應該裁併。若是不然，滿清政府有二百七十年的歷史，就不應該被人革命了。

北平各大學的種種不能滿人意的狀況，當然不是一天養成功的，也不是可以歸咎于那一個人的——這也是「俱有相當歷史」的。學校的當局未嘗不說要改革。但是最大的理由，是經費不能按時領到。教職員變了學校的債主，當然有特殊的地位，改革起來，困難更大。然而平心而論，北平的各國立大學，每年的經費有三百六十萬，就是只領到一半，也還有一百八十萬。加上清華的一百二十萬元，一共也有三百萬。各大學的學生一共不過五千人，平均每一個學生每年要費國家六百元。果真各大學能合理化，就是照目前的情況，經費也應該可以夠用的。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重大的改革，決不是北京北平兩個大學的校長所能評定的。不但他們本身有切己的關係，評定一定十分爲難，而且縱然他們破除一切困難來改革，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信服。我們以爲改革第一步，應仿照英國所謂王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的辦法，先切實的調查研究。這種委員會，在英國的習慣，不但有權可以調取十所調查有關係的卷宗賬目，而且可以用法庭的儀式開會，招集証人請他們答覆問題，表示意見。開會的時間無論何人可以旁聽。問答的話報紙上逐一登載。如是方面使得多數人同時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真相，一方面免除一切秘密運動。調查完了，委員會公同做一報告，如意見不能一致。少數的委員可以另自做一報告。這種報告都由政府公佈。然後以牠爲根據把改革方案提出議會。假如中央政府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派七個到九個資望學識爲社會所公認而與北平各大學校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充當委員。給與他們同英國王家委員會一樣的權限，到北平來調查。不但他們可以把各校院的設備，賬目，統計，教職員和學生的成績，澈底的調查，而且可以把發生疑問的各點，招集有關係的人，請他們公開的說明。這樣一來，凡一切

腐敗的內容，無從掩飾，而萬一外面所傳說，攻擊的話，與事實不符，當事人可以有機會更正否認。事實既然完全明瞭，而且爲一般人所公認，然後做一個整個的計畫，選擇設備最完，或是成績最優的院系做每系的根底，把其他重複駢枝的院系一齊裁減歸併，任何人也不能反對。

這種辦法，看來好像迂緩，其實並不難實行——只要政府有改革的決心公道的誠意。在這種辦法沒有得到結果以前，政府應組織一個大學畢業試驗委員會，也以與北平各大學沒有關係的人來做委員，于本年或下學年來北平致試各大學應該畢業的學生。然後以各校放試的成績互相比較，得到各校學生成績的大概。放試的結果應該立刻公佈，使人人都知道真相。成績太壞的院系，立刻禁止她下半年再行招放新生。

若是不然，政府隨便的處置，縱然公道，一般人不明真相，也不能心服，何況不經慎重的公開研究，單憑一兩個人的意見，處置絕不會公道呢？處置不公道，或是受處置的人不能心服，一定要發生很大的糾紛，于各大學院系不但沒有好處，而且使將來的改革，更發生一重障礙。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近數年來對於中國人口研究的人頗多，很有幾篇重要文字，但那幾位著述家的目的皆注重於人口數目的估計，沒有討論到人口分布的情形和他的意義。我狠想從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可惜有若干材料的測算尙未完全，須等將來再圖發表。但是大概的結論也用不著專等精密的數字，現在不妨提出討論，數字雖待修改，意義或不至大有出入。

中國人口姑作爲四萬四千萬人，面積照通常承認的數目是四百二十七萬八千方哩，平均密度是每方哩一百零三人。日本人口平均密度據說是每方哩四百一十人，中國比他們幾乎少三倍，表面上看來似乎中國還是地廣人希，其實不然。以上所說的中國總面積包括三千尺以上的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許多又高又峻的山脈，再加溫度的低下與雨量的缺乏，這種地方都是極端不適宜於人生，不能與其他地方一概而論。中國全國的面積三千尺以下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一萬尺以上的却有五分之一。

全年降雨量不到二十吋的地方至少佔全面積的二分之一。在如此環境之下，人口分布當然是絕對不能平均的。

簡單的說來，中國人口是集中在很少數的幾個地方，第一是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在冀魯豫皖諸省之間，爲中國最大的平原，也可稱爲中原區，共有人口約八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五十人。第二是揚子江的中下流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陽湖安徽及太湖流域等好幾個局部盆地，但爲揚子江所連貫故可稱爲揚子區，共有人口約七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八百五十人，局部的多至一千人以上。第三是以上平原附近的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低山寬谷，以及局部盆地，茲擬總名之爲邱陵區，合起來人口總數約九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方哩三百五十人。第四是浙閩粵三省爲主的東南沿海區，人口算他七千萬人。平均密度約與上同。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域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哩，（和新疆一省差不多）佔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佔全國百分之七

十以上。人口密度總平均約每方哩四百八十人，遠在S本德國以上，與荷蘭相近，而其中的中原區與揚子區人口之多，更遠在世界各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英國和比國之上。

在上述各區域之外尚有四川盆地亦為人口集中之地，四川省的人口密度雖然只有每方哩二百幾人，但沿邊山地人口極稀，四千四百萬個四川人差不多都集中於赤色盆地之內，平均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人，局部的成都平原甚且多至八百餘人乃至一千人。

以上五個區域總算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哩，佔全國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則有三萬五千數百萬人，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密度總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佈於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積，平均密度每方哩只有三十五人。可見中國人口分布是極端的不平均。我們雖然號稱擁有如何大的土地，但是我們真正利用的不過很少的一部份，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土地究竟是否能利用呢，應該如何利用呢，這便是當前問題。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從以上所說各區域的人口密度，我們可以計算每人可

以分得到養活他的土地面積。照一方哩約四千畝計算，中原區每人得六畝，揚子區每人得四畝七分，鄧陵區及東南沿海區每人得十一畝，四川盆地每人得六畝半，總平均每人得六畝半。每人分得畝數略多的區域當然是因為那邊的土地不好，並不是那邊的人民較富。而且事實上每人分得的若干畝土地還不盡是可以耕種的。因為上列區域內還包括不少的山巒江湖第宅道路等等不能生產的面積。如果專從可以耕種的地方計算，每人分得的當然還不及上列之多。美國人倍開 (Baker) 整理中國農業統計，算出每人分得耕地的面積(把他們的一個愛克化作六畝)是直隸四畝，山東三畝，江蘇二畝半，廣東一畝半。劉大鈞的估計是湖北五畝四，江浙二畝一。其餘可以類推。據國際聯盟會出版的佛靈 (Vollme) 的估計，耕地在每人七畝以下至三分六釐的要佔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以上數目正可互相證明其大致不錯。假使我們真要平均田產的話，我們平均每個人大約只得三畝田地，世界上真不容易找得出比我們再窮的國民。

據金陵大學卜克 (Buck) 教授的考察，中國麥田的產量大約與美國相等，美國每個愛克每年約產十二倍舍，即合中國每畝六斗。如果每人只有三畝田，則我們平均每人

每年只能吃一石八斗，如何能吃得飽？即使在上述若干區內利用各種方法來增加農產推廣種植，增加一倍已了不得；我們也僅僅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稍有水旱兵災，雖吃盡草根樹皮，還是不能生活。這種窮苦現象是一切談經濟談建設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所以中國土地雖廣，但人口壓迫已到世界少見的嚴重，要減少這種壓迫似乎只有二條路。第一是歷史上常走的路，人口多了使起內亂，內亂之後互相殘殺，人口減少暫得少康。但太平之後人口又增，又起內亂，如此周而復始。所以我想近來李四光先生所談的中國歷史戰亂的循環周期，一定與人口增加率有密切關係。第二條路是和平的，將人口太密地方的人，有計畫的移殖於人口稀少的區域，去開闢尚未開闢的地方。中國土地面積既如此之大，人口分布又如此不平均，似乎這條路是應該走的大路。惟是如此，所以開發東北呀，開發西北呀，便成爲普通的呼聲。但可惜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應在那裏，往往毫無研究，只是憑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談，如何能有結果。最顯明的例是負有建設重責的某國立機關發表的開發西北計劃，開頭便說甘肅有可墾之田一千四百七十萬餘頃，比全省面積還大二倍有半，常識如此，計劃如

何能成！

三 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中國人以農業民族爲中堅，所以要求中國人可以繁殖之地，其地必須適於農業爲發展。中國人的農業發展從來是由北而南，至中原區起始，揚子區以及沿海區一一都開發了。只有東北方面向來開墾僅到遼河下游與遼東半島，地勢上原與河北山東相連。較北的地方，亦即松遼平原之大部份，向來爲東北民族所居；以游牧漁獵爲生，從古以來未經多少墾植。比較進步的滿洲人因武力征服了中國幾乎全數入關，同化于漢人，更剩得一片曠土無人經營。直等到二十世紀才有大批的中國人從關內出去，每年自十萬乃至一百萬人。東三省的人口一八八零年華納 (Werner) 估計爲一千二百萬人，一九一〇年民政部的估計只一千五百萬人，那三十年之間只多了三百萬人，增加很慢。但到現在已有三千萬人。這三十年之間，多了一千五百萬人，增加一倍，顯是移民出關的結果。

遼吉黑三省人口約計三千萬人，平均密度僅每方哩八十人。但大多數人口皆集中於松遼平原，即嫩江松花江及遼河的寬谷。在此平原上約已有二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

方哩一百五十人。此平原的面積共有十二萬方哩，比中原區相去無幾，比揚子區還要大些。他的雨量有每年自二十吋至三十餘吋，並不在中原區之下，局部的且更在其上。

他的土壤在遼河流域與中原區相近，在松花江及嫩江區域則為有名的黑土 (Chernozem) 與灰土 (Podzol)，富於植物滋養質，不假肥料自然豐富。且其多地方在中國人開墾以前向未經農業民族的開闢，為世界上現已少見之處女土。他的溫度固然較低，但在農作需要的時期天氣甚熱，稻米都能生長。種植最多的是富於營養質之大豆，次為高粱，又次為小米，又次為麥。在本篇第一章所述五區域之外，適於中國人農業發展的實在要以松遼平原為最好了。

照松遼平原的種種環境，人口可以增殖到每方哩五百人，不過到此程度又要像中原區一樣大感壓迫了。所以我們應該從低計算，假定可增至每方哩三百五十人，像邱陵區一樣。如此則除現在人口外，每方哩還可增加二百人，

十二萬方哩大約可再容納二千萬人。假如全從中原區移植，一方面開發東北的新天地，一方面能使中原區域減少人口四分之一，即可使我們每人多增加一畝田。

現在東北有國際競爭的關係，將來不知如何結局。其實東北的富源不祇農業，在礦業工業都很重要，但中國人天生的還只是農業的民族，在農業以外的競爭是不足畏的。至於開發一個新地方的農業，則中國人真是天然的好工具，他國人決沒有像中國受人口壓迫之嚴重，肯逃命似的華路盤纏去墾荒。假使閉塞了中國人移植的門路，一定也會停滯了或延緩了東北農業的發展，實在也非地方之福。我們中國方面更應該覺悟東北平原是我們農業民族唯一最好的出路，萬不可輕輕的放棄。在地勢上看松遼平原東北西三面皆為山脈所包，只有南路與中原區天然相連，實在是分不開的。

(下期續完)

黨化教育是不可能的嗎

叔 水

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教育的「黨化」，便成了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可是問題雖然重要，却不會有人討論過。這當然是言論不自由的結果，而非問題的本身無可討

論的餘地。作者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不敢說有甚麼深切的

研究，但很希望作一個討論的發端。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固定的政策嗎？這句話許多國民黨

的朋友們根本上就不承認。真的，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曾經正式議決，取消「黨化教育」這個名詞。不過黨化教育的進行，仍是目前的一個事實。這事實的發生，正是國民黨一貫政策的表現，名詞的存在與否，是不關重要的。

那嗎，黨化教育究竟是甚麼？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

(一) 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他漸漸的浸灌到學生腦經裏去。

(二) 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黨指揮。

以上兩種意義，當然不是絕不相關，而有相助相成的作用。譬如說，要做灌輸黨義的工作，最要緊的方法，是抓住重要教育機關；而同時在黨化教育名義之下，也可以使壟斷教育的行動，成一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毅然行之而無所顧慮。

但是，照這樣辦法，黨化教育便可實現嗎？我們可以遲疑地回答說不可能。現在我們試看一看不可能的理由在那裏。

第一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

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爲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爲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我們只看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對於發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計畫，一點沒有注意，但小學的黨義教科書，却非有不可。教科書與黨義有不合的地方，非嚴密審查不可。老實說來，教八九歲的小孩們，去念那些甚麼「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們的理解，簡直於小孩們心靈的發展有重大的妨害。但這是黨化教育所不能免的結果。

我們暫且離開小學教育，就一般的教育來說。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事理有正確圓滿的了解，對於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識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於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纔是我們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確定的了；他們的問題，是怎麼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

情形，恰恰與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類。當時的教會，不願意一般人自由思想，於是乎不恤用教會的法庭來壓制葛理略，逼着他發誓承認地球繞日的學說，是和聖經抵觸的，是不對的。他們那種辦法，不但是要壓服葛理略，使他不再妖言惑衆，并且要懲一儆百，使同時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們所得的效果是怎麼？葛理略在簽名悔罪書之後，口中卻喃喃的說道，「地球是動的」；而地球繞日的真理，也不因葛理略的受壓迫而遂至湮滅。自近世文藝復興以來，專制思想與自由思想衝突的結果，總是專制思想失敗，黨化教育也不能獨成例外。

照上面所說的看法，黨化教育，幾乎成了一個矛盾的名詞。那就是說，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而黨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

第二黨化政策，雖然與教育的原則不相符合，設使黨的主義或主張，可藉教育以宣傳，也不失為黨化教育的一個大理由。關於這一層，我們的答案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是可能的；在普遍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但是黨化教育的目的，當然在普遍而非特殊，所以我們的答案，還是一個不可能。我們所謂特殊的情形，譬如現今的黨務學校

，中央政治學校之類。以這樣特別組織的學校來宣傳黨義，自然是可能的。不幸我們現在要黨化的學校，不是這樣的一類，而是全國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學程度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面去宣傳黨義，便立刻有許多問題發生。我們會經聽見中小學校的黨義教課，怎樣的學生不感興趣；大學校的黨義教員，怎樣的被學生轟了又轟，趕了又趕。這不見得是因爲教員的不濟，而是因爲黨義這一門功課，實在不爲學生所歡迎。黨義不爲學生所歡迎，也不是黨義之過，而是凡挾貴得勢的主義，所必得的結果。所以天主教自定爲羅馬的國教後而天主教就漸漸衰落，我國的孔教（假定孔教也是一個教），自漢武帝定於一尊後而孔教也從此不振。這種歷史上的前例，是不勝枚舉的。我們以爲宣傳黨義的最好方法，是把黨義放在一個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牠放在特殊階級之上，使牠失了自由競爭的機會。因爲一放在特殊階級之上，牠既不用與人競爭，便漸漸地失去向上改進的本能；同時在課室中或教科中強迫輸入的黨義，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愛之適以害之嗎！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爲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教化育，於黨義的傳播，并無一點好處，也可以

概見了。

以上係就黨化教育在傳播黨義而言，牠的失敗，是不難預先斷定的。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黨化教育的又一方面，用黨的機關或人才來主持教育事業。

我國的政客中間近來有一種新的主張，或可以說是誤信，以爲一個政黨或政客，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動，必須有一個有勢力的學校，作他們的後盾。因此他們在台上的時候，儘管於教育漠不關心，但一到下台他們便拚命的抓學校，做校長。有的容許是因爲閒着無聊，慰情勝無，有的的確是想利用學校地盤，造成一班噍囉，將來替他盡那登台捧場，搖旗吶喊的義務。這個情形，可以說明許多學校的風潮，何以發生，也可以說明許多學校教育，經過政客官僚的熱心，而愈加腐敗。一言以蔽之，辦學校以教育爲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

國民黨是一個成功的政黨，他的第一義務，在使全國

志摩日記的一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日記——

耶穌誕日，蟄居終日，屋爐火熱，坐久便昏昏欲睡。

月色昏朦，如蔭負披紗，態色至慘。每一坐靜，即馳神郊外，寢草上有風動焉。

教育循序平均的發達，原用不着存甚麼割據疆域，封殖勢力的思想。不幸這個黨化教育的政策，把牠不知不覺的引到包攬學校的地位；既然包攬學校，便免不了一班官僚政客地盤勢力的野心。結果，徒然塗加了教育界無數的紛擾，且使一班人對於黨人抓學校的行爲，發生了不少的疑慮與反感。關於這一層，我們不必繁徵博引，只請讀者檢查一下一兩年來，幾個國立大學易長風潮的近事，便可明白了。

以上是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問題提出的一個單簡討論。設如我們在黨或黨外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更詳盡的討論，我們非常歡迎，我們現在先請提出兩句單簡的說話，來作本文的結束：

(一) 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二) 國民政府，是應該對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牠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

詩意亦偶有來者，然恍惚即逝，不可捕捉。要亦少暇，心不靜，如水常擾，景不留也。

勸食亦一墮志事。習成，少間即感不懌，非手有所拈，口有所嚙，即不能安坐。眉害我也。

榴子漸萎，色亦漸衰。眉持刀奮切，無當意者，則棄置弗食。然此時令爲之，榴實無咎。

雪裏紅燒細花生，真耐啖。爐邊白薯亦焦炸透味。糖葫蘆色艷艷迎人，蜜汁櫻桃一瓶，僅存底漿。然媚兒猶曉曉苦口不嘗新味，嬌哉！

臘梅當已吐黃，紅梅亦蚤結蕊。眉亦自道好花，尤嫵梅，奈何屋具太俗艷，即邀冷香客來，慮不俳適。想想一枚疎影，一彎寒月，一領清谿，一條板橙，意境何嘗不遠妙？然眉兒怕冷，甯躲繡花被中熏酥入夢也！

並坐壁爐前，火光照面，譚去春顏色，來春消息。戶外有木葉飛脫作響，坐墊殊軟細，肌息尤醉人。眉不願此否？

快樂時辰容易過，是真的。容易過故痕跡不深，追憶時亦只一片春光爛熳，不辨枝條。苦痛正是反面，故爾容易記認。

眉，你我幾時到山中做神仙去？

關在籠子裏的仙鶴，與家鷄有多少分別？

臭紳士！有架子就該罵，管他紳士不紳士！

朋友交情有時像是糕上的糖衣，天氣一燥，就裂紋踏，你要聯住它，除非再勻上一層糖去。

只有戀愛專制，從沒有戀愛自由。專制不一定是壞事。自由像是一件腰身做太肥了的大褂。我願意穿瘦的，不問時宜。

翊唐開口便問文章做得怎樣了。文章原不必用字來砌，一凝睇，一含瞋，一紅臉，一淚淚，一親吻，一相偎，有真和諧，就有真文章，不必貪多，做得這一篇文章，就有交代。

今年北京火氣太旺，天空中的雪都叫烘化了。總得接近泥土。將來即不能抗着鋤頭耕田，至少也得拿一把鐵鍬試種種白薯芋艿荸薺之類。眉，我替你定做一把分量輕，把手便的，何如？

志摩的日記殘稿，是他和眉結婚前在北京的日記，文字最可愛，所以我鈔了一份。獨立評論出版後，有些讀者嫌我們登的文字太專門了，太單調了，所以我們從這一期起添一點文藝作品，就用志摩的遺文來開始。

適之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監察院與汪精衛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停付庚款事件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四，西北的農業區只有小小幾處
五，此外地方人口皆不易繁殖

定縣見聞雜錄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孟真

蔣廷黻

叔永

翁文灝

濤鳴

楊振聲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

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

加郵費八角。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西

單遊藝商場君中

書社

米市大街新月書

店(代定)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法租界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五馬路亞東圖書

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中央大學內時代

公論社

獨立評論

第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
三年六月再版

監察院與汪精衛

孟 真

監察院委員高友唐四人彈劾汪精衛違法成立上海停戰協定。高友唐等四人的提案通過於監察院，故成了監察院的彈劾。彈章一上，便送發各報，被南京警備部扣了，監察院又于次日通知各報照發。我們知道他所彈劾的是指責汪精衛等未經立法院通過便簽字，不是說他「喪權誤國」等等，換言之，乃是以法律的立點彈劾，不是以政治的立點彈劾。

法律的立點應求法律的解決。關於此節，汪精衛的答辯如下：（錄自五月三十日北平晨報所載南京特約通信）

「……主席，兄弟自聞悉監察院長于右任同志，以上海停戰協定未經立法院通過為理由，對於兄弟提出彈劾的消息，即決定兩個意思，其一是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其二是兄弟個人願意接受彈劾。何以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呢？四月三十日，行政院會派外交次長徐謨同志，出席立法院，報告此次協定內容與其經過。五月三日，兄弟向中央政治會議第二十九次臨時會議報告此次協定內容與其經過之後，並曾聲明，此案曾經報告立法院，惟應否先提交

立法院通過，然後批准，敬候指示。隨經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如下：「此次協定既非搆和條約，應照外交部所擬辦法，交行政院，俟辦理完竣，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報告」。依此決議，則于右任同志的彈劾案，實無從成立，按照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條，「憲法未頒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各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則行政院遵照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辦理此案，自屬當然，兄弟所謂上海停戰協定，不能推翻者以此。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此次協定非搆和條約」，實為至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為目前應付國難之根本方針。抵抗不是宣戰，停戰也不是搆和。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長曾令滬淞駐軍對於日本軍隊之侵佔閘北斷然抵抗。二月二十日又曾拒絕日本的哀的美敦書，當時都是未經立法院通過的，為什麼監察院不以此為理由，而加以彈劾呢？就因為抵抗不是宣戰。抵抗既然不是宣戰，自然停戰不是搆和。于右任同志的彈劾案內，引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二十七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大赦案宣戰案媾

和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之職權」。以爲停戰協定，即使不是媾和案，却不能不說是重要國際事項。殊不知所謂「重要國際事項」其範圍至爲廣泛，若無解釋，則外交部所辦的事件，何者應先經立法院議決，何者不應先經立法院議決，實無一定的標準，可以隨時發生爭執。兄弟所以請求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就是爲此。」

我以爲這個回答是中肯的。監察院既以法律的立點彈劾，則應認清負此事法律之責任者爲中政會，那麼，若再彈劾，只能彈劾中政會。不過中政會是不能彈劾的，因爲中政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會議，而「……監察……各院各自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監察院不能彈劾自己所對之負責之機關。此事中央的處置，是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個決議注銷。我以爲在法律的立點上論，這辦法是不錯的，因爲此事責任既在中政會，而以中政會與中常會的關係，卽不負責任在中常會，然則只有中央監察委員會有權平衡此事了。

此事經過之最應使人不滿意者，是牠頗有掀動政潮的形跡，而監察權之行使，若有了政治作用，是極其不幸的事。

何以說這事有掀動政潮的形跡呢？監察院一上彈章，

便送到報上發表，警備部扣了，牠又設法達到發表的目的。警備部本不應該扣，然監察院的確不應該在中央決定之前，送報發表。我曾經碰到一個監察院委員，問他何以監察院參的官那樣少，他說，實在參了不少，只是在中央決定之前，多不發表，若發表了，也很够驚動人們的了。我後來又問一個監察院委員，他也如此說。我想，這辦法是頗對的，因爲政府中一事之解決，先在報上混一陣，每每生枝節。監察院的作用，應收清政之實，不應博敢言之名，所以大體上應以先在中央解決後再發表爲是。這個辦法，正所以增進監察的功能，避免無謂的枝節。這個辦法，誠然不應是沒有例外的，凡是一切不至成爲政治鬥爭的彈劾，大可早早給我們老百姓知道。不過此次彈劾汪精衛事，却恰恰應當在先解決後送報的範圍內，因爲這事在這個時候，最容易引出無限的政治糾紛來。上海停戰協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是非正待詳密的考量；汪精衛違法不違法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其真其否亦待中央的解釋。且上海事件本是極複雜的事，其法律的政治的方面均應計較得到，而且此時正有一堆人在上海，專待機而鬧，又有一般人在廣州，專待機而鬧，所鬧皆是政爭的鬧，換言之，即是在上海協定之政治的法律的意義以外的鬥爭，即是將上

海協定作爲政爭工具的鬥爭。果然蕭佛成先生響應于廣州，大大的恭維了子右先生一陣，而請他擴大彈劾，彈劾不已。若使我們以小人之心度人，我們可說這是「求仁得仁」，若以君子之心待人，這可說是「出于意外」。如果然這事哄動全國，大多以爲大規模的政爭與政變已暴發了。監察院能將若干受賄案賊的事件待政府解決再發表，何獨對此一件煤油上措火柴的事獨不能先待中央之處理？此事接二聯三，送報，辭職，遠引，再彈劾，大像一個愛國的宣示(Demonstration)。這樣，在監察院是失態的！這樣失態，在政治上是極危險的！因爲在未能達到維持風紀的目的以前，先可弄出一場大紊亂來。

何以說監察權之行使，一有政爭的作用是極不幸呢？監察的作用，有淺有深，淺是清仕途，振綱紀，深是平衡政事，弼輔國體。所有清風亮節，直言敢諫之臣，史籍相傳以爲美談，這誠然是美談了，然而明朝很多清風亮節直言敢諫之臣，何以愈鬧愈糟，直鬧到國亡？明之亡國，那些給事中老爺們負不少的責任，因爲他們分黨分派，有門有類，吵的政局永不能穩定，政治永不能進行，任遼事者，一籌莫展，戰也不是，守也不是，這是什麼緣故呢？這緣故很容易解釋：他們的不肖之徒，借彈章作政爭，他們

的賢者，又不知政治的大體，事無大小，一齊付之感情，政治失其安定，失其重心，國家安得不亂且亡？歐陽永叔說，諫官與宰相等，因爲凡百有司，各有專職，只有宰相與諫官可以論列一切的。唯其如此，諫官應與宰相同有認識政治大體之必要。所以清風亮節的諫官，固是美談，體大扶危的諫官，尤合大道。唐朝韓退之責備陽城，做了五年諫議大夫，不發一言，以爲不足以振諫官直言之風氣。過了兩年，陽城遇姦臣裴延齡害陸宣公事，大諫特諫，諫得裴賊不登相位，宣公不致被害，自己失了諫官。歐陽永叔說他「一諫而罷，以塞其責」，這真是誣枉陽夫子的話。陽城是一位認識政治的人，可以他的化行中條，政成道州爲証。他初徵爲諫議大夫時，直是喝酒，不談小事，直到陸贄有見殺之慮，然後大諫。推陽城的行事，當是以爲有宣公等在朝，諫官不必談瑣碎，一旦天昏地闇，諫議大夫義應扶危定傾。韓退之歐陽永叔都是文人，雖有才氣，却不了解實際政治，以爲諫官只在敢言，這真把事情看小了。只有司馬君實的話最對，認識最深，他說，「居是官(諫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溫公是實際政治家，不是文人，故能說出

這樣最澈底的話來。把溫公的話參合著明季的政治一看，我們尤其不能不佩服溫公之見識卓越，且歐陽永叔所要求的范諫議，只是一個七品小官，韓退之所譏的陽城，也不過居下大夫之秩，今之五權制度，監察與行政立法齊尊，爲監察院長者，其地位遠非唐宋諫官之比，實是一個平章宰相，則對於國家政事，尤應有大體的認識，不便拿出明代給事中的態度來，自是不待說的。監察權用作政爭，必不能收監察之效，必致亂政之實，而以今日監察院之地位論，若不從最大處着想，勢必流成政爭，至少也要被人借作政爭的。

兩年來于右任先生所領導的監察院成績如何，我們雖不能斷言，然而確不是不說話的，也不是盡能滿人意的。比理想不足，比事實差可，在五院中，他算是作些事的。雖然不曾辦了何人（辦人不是監察院的事）却也參了（多是間接的）幾個皇親國戚，較之司法考試，高明得多了。然而大體上能滿我們的意嗎？曰，不能。去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政變，無端一個院長被關起來，我們覺得此風一開，大

禍真要臨頭了！已而果然！當時于公恰逢其鄉先賢陽公所逢之大關頭，似乎于公應有舉動了，然而不然！有人說監察院原本要參胡的。將彼時于公靜默的態度和此時動氣的態度一比，我們誠不免于悼惑。我們深知于不是軍閥，且革命二十餘年，自有其獨立的立場，決不至有意無意的爲軍閥做工具，則去年之默然，不可以攀龍佐命揣之，今日之昌言，不可以別有作用論之，他必然對兩事都有他的見地。不過，我們總應希望他老先生還是在大事上細心想想，權衡輕重，認清政事之前因後果，然後可以盡監察院之最大的責任。今日之局，恐怕已經談不到好政府壞政府的問題了，只是有政府無政府的問題了，汪如一倒，我們實在想不起更能出產一個政府，因爲蔣已單身出不了臺了，然而此時外交內患，斷斷不許無政府的（關於此事下次再論）。明朝的諫官把明朝吵得無政府，希望今之諫官不要弄得現在無政府。現在亡國的條件幾乎應有盡有，比起明朝亡國的局勢來，都是變本加厲的，所以大可不必要添給事中譁衆的一齣戲！

☆

☆

☆

☆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蔣廷黻

一星期以前，日報忽傳陳果夫先生在中政會有所謂「澈底改造教育之新動議」。電文雖簡略，大旨已甚明顯。

陳先生的提議就是中國的教育應於十年之內專重農工醫各項專門人材的造就。他的辦法不外停辦高等學校的文法，及藝術各科，而移其經費作爲擴充農工醫科目之用。我們初讀這電文的時候，以爲必是報紙造謠，不可置信。後來雖然知道了消息的可靠，仍以爲不必評論，因爲這不過是一種提議。將來中政會是否通過；通過了，是否實行；實行到什麼程度和時期；這些都是問題，恐怕還是連提案人不能答覆的問題。但是這個提案究竟代表一種思想。近年來，發表類似的主張的亦頗有人。作爲一種思想的代表看，陳果夫的教育政策大有共同研究的必要。

提案的根本思想可分三點說明：

一、中國的病根在於窮；挽救的方法當靠生財，生財必須有生財的教育，而農工醫等科就是生財的教育。這個邏輯的連環似乎是很顯明的，堅固的。我們承認第一環和第二環的確是不可破的堅固，但談到「生財的教育」就大

有疑問了。我們暫且不問教育是否應限於生財的；就以生財爲教育的目的而論，專辦農工醫等項未必就得達到目的。中國近二十年受過農工醫教育而不從事於農工醫諸職業的大有人在。學醫而不行醫的比較少些。學過農而從事於農業的簡直是例外。學過工程而改就他種職業或閑居無事的也不少。近年教育和職業所以不能相輔而行的原故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制度與狀況不容這般所謂專門人材執行專門事業。另一方面，專門人材的專門知識和經驗都不够；或雖是夠了，但他們的生生活習慣或慾望阻止他們從事於生財的事業。人是整個的；當作生財的動物，他仍是同時受專門職業內的和專門職業外的知識和觀念的支配。社會也是整個的：徒求物質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結果必會連物質亦不能改造。

前清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李鴻章，奕訢，文祥諸人也曾專心專意圖謀中國的物質改造。他們雖然偏重了軍事，但他們也辦輪船，修鐵路，設電線，立紗廠。倘若他

們的眼光不是這樣偏狹，倘若他們覺悟了中國的問題是整個現代化的問題，那末，中國何得有今天的內亂和外侮？與他們同時但比他們眼光較遠的郭嵩燾，出使倫敦時，曾寫給李鴻章說：『嵩燾所見（日本留英學生）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嬰策款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效行之。……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郭嵩燾在那時就能看到日本的留學政策遠勝於中國的專求造船造廠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不佩服的。中國近五十年進步之慢與乎日本近五十年進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於教育政策的不同。

二、文科，法科，及藝術科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爲牠們一方面費了國家的錢，另一方面又替國家造了許多不知法不守法的份子。那末，何不把這些不生財而徒費錢的教育停了？我們要知道，大學的科目是應人求知的慾和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的，並非憑空捏造的。無論大學有無文科，法科，及藝術科，人們自然而然的要知道政治經濟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來源和變遷，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創造。國家怕亂就把這些功課停了；停了的結

果徒然使國家更加亂，因爲國人的思想更加會亂。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使人不去思想是不可能的。爲國家社會計，大學正應求思想的訓練化，那就是說，科學化。這可以說，就是大學的使命。

三、中國的教育向來無全盤的計劃。近年世界各國，尤其是蘇俄，都注重國家生活的計畫化，包括教育在內。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完全贊成的。不過計畫要根據事實，要經過客觀的，仔細的調查。第一，我們要知道中國現有多少農業專家，多少工程師，多少醫生，及其他技師。五年之後，十年之後，中國將需要多少，將需要那種，及什麼程度。就工程說：我們是要土木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還是電學工程師呢？如若是要電學工程師，我們是要電力工程師，還是要電氣交通工程師呢？或者中國現在所最需要的工程師還是各門工程都具有普通知識和經驗的？第二，我們要知道全國國立省立私立的高等學校共有多少，總共經費多少及分配的方法，是否文科法科占了太多，什麼經費可省。此外我們還要知道全國能够及願意擔任應用學科的教職的有多少，究竟一年內，二年內，能得多少學生。第三，小學及中學的教育也須經過類似的調查。不這樣辦，反憑空通過議案，突然裁這個，加那個，這不是計畫

化，反是意氣化。通過了，也不過等於一紙空文；就是實行了，也不過形式的，短期的。中國近年的教育忽而學美，忽而仿法；忽而由專改大，忽而由大改專。效果永遠是沒有的，不過國人飽受了糾紛和混亂。推其故，皆因定政策的人不願出定政策的代價，不願事先費力去調查。

中國教育之宜改良，這是人人所承認的。國家對教育有通盤籌畫的責任和權力，這也是人人所承認的。在計畫之中，斟酌時代的需要，政府可以區別科目的緩急而定經費的多少，這也是必須的。但在政府定教育政策的時候，我們希望政府對於上面所說的三點加以考慮，不要輕舉妄

停付庚款事件

在這個國難當頭，財政困難的時期裏，財政的當局，居然能辦到停付庚子賠款一年的交涉，那不能不說是政府外交的——或者應該說是財政的——成功。不過在我們恭賀政府的成功以前，我們不要忘記了下列的兩個事實。

一，據我們所知，此次答應我們停付庚款一年的，只有英美兩國，其餘如日本，法國，意大利等賠款數目較大的國家，都不曾停付。

動。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對於教育本身及對於大學在國家生活上的地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了解。教育的目的是教養全人的。教育愈能教養全人，其增加生財的努力愈大。大學——包括各門科目，提倡各種求知的學府——是文化的結晶，也是促進文化最要的利器。大學的課程很繁雜，因為現代的文化是複雜的。大學所以要包括全知識界，因為這種辦法有種種精神上及行政上的方便，因為學問是一貫的。近年中國處處設大學固不對，但無論教育政策是怎樣的，三五個完全的大學是全國所必須努力建設的。教育改良是可以的，因改良而摧殘是不可以的。

叔永

二，英美兩國的庚款，早已退還與中國，做了我們的教育及實業經費了。所以此次的停付，與其說是對於英美兩國而停付，不如說是對於國內的教育實業而停付，較為切當。

照上面所舉的兩個事實看來，所謂外交的成功，根本上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不但如此，我們以為若是停付庚款，僅僅限於英美兩國的話，與其說是外交的成功，不如說

是外交的失敗——至少也是外交的失態。事情是很顯然的。我們政府開始停付賠款的交涉，決不限於英美兩國，而必定對於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有同樣的交涉。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交涉的結果，止有英美兩國，允許停付一年，而其餘的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毫無影響。這是第一個失敗。第二個失敗，是英美兩國的賠款，早已退還我中國人手中，英美兩國，不過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國人自己的錢來給他們兩國買一個情面。更進一步說，已經退還的賠款，已經指定教育文化用途的賠款，應該問中國教育文化事業是否需要此款，沒有再向英美兩國請求的必要。現在我們對於這種不必要的請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僅僅得到。即使不是外交的失敗，也不能不說是外交的失態。

關於外交一方面的種種失敗，既如上所說了，關於財政一方面又是怎樣？我們曉得英國庚款每年約有英金六十萬磅。美國的庚款，合第一第二兩次退還的計算，每年約有美金一百九十萬元。（其中屬於清華大學的約有美金一百三十餘萬元。屬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約有美金五十餘萬元（拿現在的金價換算，約合國幣八百餘萬元。英磅部分，拿現在磅價換，也可合國幣一千餘萬元。兩

項合計，不到國幣二千萬元。這個數目，拿來與國庫歲入六億餘萬元相比較，不到三十分之一，可見得他與國家的財政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可是這個數目，從教育一方面看來，他的關係就很大了。我們曉得，英國庚款的一部分，在倫敦購買鐵道材料，一部分投資於國內的各種實業，這就是將來教育事業的基金。美款第一次退還的部分，做了清華大學及留美學生的經費，第二次退還的部分，做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基金及事業費。這兩個機關與國內教育文化事業的關係，是國人所深知洞悉，用不着我們多說的。單就美款部分而論，每年約八百萬元，幾乎等於國庫支出的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三。（十九年度中央豫算，國庫支出的教育經費為一千二百餘萬元。）所以美款的支付，即等於國家的教育經費，忽然減少了八九百萬元。這在教育界上，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值得我們注意的。

據我們所曉得，這件事情正在進行，還未達到最後決定的程度；同時清華大學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當局與中央財政當局接洽的結果，財政當局允許在停付期內，由中央銀行撥出二百萬元，作為維持清華大學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事業費。拿二百萬與八百萬比較，不過全數四分之一，這個數目，不足以維持兩個機關的一個

事業，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我們要問財政當局把這一點教育文化事業的經費，硬搶了去，究竟有甚麼用處？充其量不過多發軍費的一成半成，或多買幾架機關槍或幾架飛機罷了。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維持幾個重要的教育文化機

關，比多買幾架機關槍或飛機要重要得多。這是一點極普通的常識。希望我們當局的政治家，不要因為財政困難的原故，把一點極普通的常識也忘記了。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續第）

翁文灝

四，西北的農業區只有少小幾處

現在開發西北的呼聲是很高了。其實西北交通不便，鑛業工業都不容易發展，因為他的產品只能供給本地，不能運銷外面。而本地又是人口稀薄，生活甚低，銷耗的力

，而且究竟也養不了很多的人。

如果我們承認發展農業是開發西北根本之計，我們不能不感覺西北農田的缺乏，像某機關的移民九千萬的計畫未免幼稚得可憐。

量甚是有限的。固然鐵路延長公路推廣之後，可以好些，但也不能完全銷滅了天然的距離。譬如有大同的煤在前，綏遠大青山的煤礦便不易外運。在鐵路未到豐鎮以前，大青山的煤還能外銷到豐鎮，在鐵路到了綏遠之後大同的煤反而內銷到綏遠。陝西也是一樣。隴海鐵路到了西安之後，陝西的煤未必出潼關，而河南的煤一定要到陝西。所以開發交通固然是十分必要，但是地方到底能否開發，還是根本的要靠農業。況且中國人是天然的農業民族，畜牧森林

等經營紙上雖有人提倡，事實上從來未見有幾分能夠實行。

西北面積雖廣，但有種種天然限制。（一）雨量太少，最好的區域也在二十吋以下，更有許多不到十吋的地方，所以非有灌溉的水利，農業是極困難或不可能。（二）大部份是山脈及高原，不適耕種。（三）大部份是沙漠，最好的部份算是黃土，沖積平原面積極少。從以上幾個條件我們可以把西北最好的農業區確定如左。

最好的當然是局部平原，可以有較大的灌溉水利的區域。這種平原都是面積甚少散而不整。現在把他列舉出來

。第一，是陝西的渭河平原，從郿縣到華陰，狹窄的一條

，面積最多四千五百方哩，約合一千八百萬畝。其土壤爲黃土或黃土再沉澱的沖積土。每年平均雨量十四吋，但旱年只有十吋左右。此平原有南北二山出來的河流，可以灌溉。其中最大的是涇水，據李儀祉先生的計算，因地勢的關係，最多也祇能灌溉四百四十萬畝，即一千方哩稍強。

第二是緩遠平原，大部份在薩拉齊、托克托二縣境內，面積約三千方哩，合一千二百萬餘畝。緩遠平均雨量約十五吋，變化大約從十吋到二十吋。向來只有用大青山下來的水灌溉沿山一帶的扇形沖積地。去年始得華洋義賑會的幫助開了民生渠，引用黃河之水。可以灌溉的面積不到六千方哩，約合二百四十萬畝。但總渠自西而東，引水稍感困難。又據美籍土壤學家潘德頓 (Pendleton) 的調查，頗慮土壤鹹性很廣，渠水通了之後地下水逐漸升高，也許會將地下鹼質因毛細管作用逐漸引至地面，日久將更加重土壤鹼性。

第三是河套平原，即黃河以北，包頭以西，五原至定口一帶。面積約四千方哩，即一千六百萬畝。已有從前所開的永濟等八十渠引用黃河的水利，灌溉的面積約一千八百方哩，合七百三十餘萬畝。並非全平原皆富水利。河套平原的土質與緩遠平原是差不多的，也有一大部份的鹼土

。但是河套開渠的時期已較長，不知是否會將鹼性加烈，從此點應可證明潘德頓學說之是否可靠。也許水利的好處究竟勝過鹼土的害處。

第四是甯夏平原，從青銅峽到石嘴子窄長的一條，也有四千方哩，即一千六百萬畝。甯夏平原從秦漢以來即有渠灌田，漢唐元清代有興修，向爲西北的樂土，不但種麥而且有名出米，可見水利之富。不過靠西爲賀蘭山脈所阻，故灌溉範圍無從擴充，天生的只有此一窄帶可以耕種。

第五要算甘肅省的西部，涼州肅州甘州一帶。大致以涼肅甘三州爲中心，分爲三區。可以屯田開墾的地方，各有四千方哩上下。合起來共有一萬二千方哩，即約四百八百萬畝。此區域內的水利不是靠什麼大河，而是靠高山上的溶解的雪水及深溝中的溪流。因爲此狹長地帶北有合黎山，南有祁連山，後者尤爲高大，在一萬五千尺以上。山下雨水不多，而山上水量較足。每年春夏之間積雪消融，溪流漲發，恰值農作需水的時候，引渠灌田不怕旱荒。在蒼涼的西北真是難得的農業要區。他的地位介在蒙古戈壁及青海荒原之間，像一只臂膊似的從甘肅省伸入新疆省，從古以來是中國通中亞的惟一要道，我們要進而經營新疆或退而保存陝甘，皆非發展此要道不可。

第六便是新疆各地，新疆的面積真大極了，比浙江省要大十七倍。但新疆幾乎全部份是內陸盆地，四面高山環繞，氣候太乾，沙漠甚廣，要想安插下像浙江的二千萬人，實在絕不可能。比較的水土豐富的地方，只有沿崑崙及天山山脚的一窄帶可以用山水灌田。在崑崙山的脚下要算塔城，且木，于闐，莎車，疏勒附近幾處水利最好，但向北便是流沙，所以面積不能甚廣。這一帶水利加以修整，約佔最多可有田地一萬方哩，即四千萬畝。天山的兩邊，北有迪化烏蘇一帶，南有拜城阿克蘇一帶，也可利用些山水，合計起來恐怕還不到一萬方哩，姑作爲七千方哩。還有伊犁河流域，要算新疆水土最好之地。但是較大部份已劃入俄境，在新疆境內的田地最多不能過三千方哩。所以新疆全境容易開墾之地，從寬估計也不過二萬方哩，即八千萬畝。

以上六區地方合計面積約四萬七千方哩，還不及東三省省的松遼平原之一半，土壤也不及東北之肥。西北的農業原實在不過這少小幾處。假定人口密度發展到每方哩三百人，則共計可容人口一千四百萬人，到每方哩四百人則共計可容一千九百萬人，似乎已臻極度。而且在這幾個區域內現在已有不少人口，如加以大略估計，渭河平原人口密

度至少已有每方哩三百人，壘平原可加的不到五十萬人。遼遠河套及甯夏平原可加的每區也不過幾十萬人，合計他二百萬人。涼肅甘及甘肅省其他各地最多也許可加二萬人。新疆各地合計現在也許已有三百萬人，可加的或可到三百萬人。如此西北各農業區，可加的人口不過八萬人，從寬作爲一千萬人已是西北殖民之最高限度了。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以上幾個區域雖然面積不大，他們的地位却非常重要。渭河平原是中國的腹地，經營甘肅大本營。綏遠河套甯夏各區是中國對蒙古的前衛，蒙古沙漠不能經營，再遠的外蒙終是鞭長莫及，只有這三區恰是天生的農業邊區。涼甘肅一帶是中國對中亞的咽喉，也是充實他守住他不可。新疆的可耕地照上估計亦不少，但因零星散布，又且地近俄邊，恐還須等甘肅充實了之後纔能輪及於他。西北之希望既然不過如此，所以我們雖然須開發西北，但萬不可因此反放鬆了中原東南及東北的經營。

五，此外地方人口皆不易繁殖

以上各區域總計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五，還有百分七十五的面積作什麼呢？我們可以把他分爲三等來說。

第一等最好的是黃土高原，包括甘肅東部，陝西北部

，山西全省，察綏南部及河南西部，面積甚廣，平均現在人口密度約每方哩一百五十人，總數約三千萬人。在此區域內很有局部的平原，如河南之伊洛流域，山西的折代及汾河平原，甘肅的平涼等處，較有灌溉之利，地方比較豐富。但面積太少，不能過於發展。洛陽之不易建都即以此故。至於黃土高原的本身黃土並非不肥，但雨量不足井水又深，在灌溉水利缺乏的地方農業決不能盛。而且峭壁深溝，往往爲不能耕種之地。此類區域採用耐旱種子，改良農業方法，或可略增生產。但人口密度增到每方哩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恐已不甚容易，所以最多尙可四散的加一千萬人，但只能四散，不易集中爲繁盛區域。

其次是幾個乾旱的盆地，如新疆的塔里木及準噶爾盆地之一部份，地面雖是浮沙，地下尙有潛水，在若干地方例如疏勒河的舊河床，以及準噶爾，塔里木兩盆地的邊緣，潛水面並不甚深，也許可開自流井用以灌溉，使沙漠化爲良田。但此法適用亦必不能過廣，故經營儘應努力，希望不可太奢。

再次之即爲沙漠的流沙，戈壁的石田，參差的山嶺，冷峭的高原，無論如何皆非人口繁殖之地。雖然偶有幾處羣山間的小平原，例如秦嶺大巴山間的漢中盆地，究亦面積甚小，在這樣約略計算中於大數目上不會發生影響。

中國人向來好以地大物博自豪。大多數的人往往默認一切土地皆可同等利用，只要有人去開發。其實地的好壞大有分別，好的地方一方哩養一千人綽有餘裕，壞的地方一方哩養五十人還甚困難。這種分別在中國尤其是格外明顯，格外重大，這是講開發土地的人所必須親切認識的。也有許多人往往援古証今，說什麼漢唐舊都關中天府，其實渭河平原自古以來只有那一塊，漢朝時候早就感覺糧食欠缺，不夠發展，甚至要想鑿穿秦嶺去運漢中之粟。而現在經濟的比例尺與古不同，尤其是交通的關係，離海愈遠，發展愈難。天然的形勢是如此，我們不可專憑高遠的理想，抹殺了淺近的事實。

(完)

定縣見聞雜錄

濤鳴

我前幾天應朋友的邀請，到定縣去參觀平民教育促進

會（以下簡稱平教會）的工作。雖然住的不過幾天，却受

了很深的印象，並且發生不少感想。所以把我看見和聽見的事情，拉雜寫出來，給沒有到過定縣的川友們看看。

我們到定縣的時候是晚上。我同幾個朋友坐洋車進城。據車夫說，定縣只有八九十輛的洋車，所以坐洋車的人很少，當地居民出門，大半騎驢。平漢路定州車站在定縣城外，平教會在城內，相距有好幾里路。城內同城外是一樣的荒野；我們要不是走過那永不閉的城門，就不曉得什麼時候是進城了。城內有一條馬路，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路傍另外有一條大車路。據車夫說，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不過近二三年來，定縣駐了許多的兵，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所以現在這一條路是已經壞的不堪了。

平教會的辦公處，是從前定州的貢院，建於清道光年間，算是定縣獨一無二之大建築物。地方紳士對於平教會的工作，十分了解，出力贊助，所以把貢院借給他們用。貢院前有很高大的照牆一座。牆上寫「除文盲，作新民」六個大字。這就是平教會的標語。

我在會裏宿了一夜，第二天起來吃早飯，我吃了三個饅頭一碗小米稀飯和幾塊鹽菜。據說這是好飯。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就是吃白薯和小米兩件東西。青菜不多用。

除了元旦端午中秋三節外，全年差不多沒有看見肉類的食物。農民用油極省。用油的法子，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把牠鉤住，然後把錢放在油裏。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放在菜裏頭。他們決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因為這樣就怕用的太多了。

我參觀平教會的第一天，差不多可以說是上課。整天就是坐下來，如學生一樣，聽他們會裏的人說明會的各種工作。頭一件事，就是社會調查。這一種工作，可以說是會裏工作的基礎。因為我們想改良平民的生活，當然是先要知道現在平民的生活的狀況，纔能想出來可以施行的法子去改良牠。好像醫生治病，是先要知道病人的狀況，然後纔能對症下藥。

社會調查部已經有幾年的歷史。所得的成績也很不少。從歷史地理人口政治以至於交通教育經濟風俗等等，都有調查與統計。所以平教會各種工作的計劃，都是切合事實的。

我聽平教會的人說社會調查部的工作，經過了許多的困難。因為農民受過了貪官及軍閥的教訓，凡事都不肯實說。有十畝地，只說五六畝，因為怕抽捐。有十個壯丁了，只說四五人，因為怕拉夫。並且農民的腦筋不慣於精確的

估計，就是無利益關係的問題，也不肯直截答復。平教會裏有一個調查員，到鄉村去調查，問一個農民說：你這村裏有多少家？他說，有幾百家。問是二三百家或是八九百家？他說一二百家。問是一百多家或是二百多家？他說一百來家。問一百來家是不到一百家，到底是幾十家？他說八九十家。又問到底是八十幾家？他纔說出來八十三家。

社會調查的結果，很多有真趣的材料。據說他們現在正在整理，不久可以出一本的詳細報告。有一件事據我看是很重要的，可以先說一說。那就是人口的問題。吾國人口，號稱四百兆。這是幾十年來的傳說，到現在實在多少，沒有人知道的。有的人說加了，有的人說減了，都是不可靠的。據人口學專家松氏 (Sundberg) 說，人口之增或減的趨勢；可以從牠的成分看出來。比方把人口分爲三類：年齡在十四歲以下者爲第一類，十五歲至四十九歲之間者爲第二類，五十歲以上者爲第三類。那麼人口之增或減或不增不減，可以從下表看出來。

| | | | |
|---------|-------|----------|-------|
| 人口增減之趨勢 | 十四歲以下 | 十五歲至四十九歲 | 五十歲以上 |
| 甲 增 | 四十 | 五十 | 一十 |
| 乙 不增不減 | 三十三 | 五十 | 一七 |

丙 減 二十 五十 三十
定縣 三十三 五十 十七 以百分計
現在定縣人口的成分，剛剛和表中乙種的人口相符。假使定縣的情況，可以代表全國，那麼吾國的人口，可以說是不增不減。

定縣農民，每家平均有二十五畝田地。每家男女老幼，共有六口。比方把他折作成年男子計算，每家就有四，七人口。每畝每年收入，作十元計算，每家收入就是二百五十元。平均每成年男子每月收入不到五塊錢（四塊八毛五）。一切生活費，都靠在這五塊錢。這種生活，可以算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了。在這種生活狀況之下，人口是不會增加的。

平教會的朋友常說，中國人民的四大毛病，是愚窮弱私。這是多數人所公認的。所以平教會主張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這四種教育，會裏人都不憚勞煩，詳細的說給我聽，可是我現在記得不大清楚了。舉其大者，關於文字教育方面，除了平民千字課外，還有平民讀本，青年補習文藝課本等等，以爲粗識文字的平民讀物。關於藝術方面，他們提倡平民所能欣賞而有普及性之圖畫音樂戲劇等

等。關於生計教育方面，他們教農民改良豬種，以增產肉之量；改良雞種，以增產蛋之量。此外棉花、玉蜀黍、大花生、高粱等等，亦正設計改良，並且教農民用誘蟲燈殺蟲燈等方法，以除害虫。用過新法而知道牠的好處的農民，就由會指定爲「表証農家」，叫他轉教別的農民。

衛生方面的工作，開辦雖不過二三年，也有相當的成績。關於預防方面，他們有一個計劃，要縣裏個個人種痘。這一件事，差不多是辦成了。關於治療的工作，城內有新蓋的醫院一所，可以容五十個病人，不久就可以開診。鄉村間有試辦診療所兩處，是村民同平教會合辦的。診療所裏有大夫一人和助手一人，他們的薪水及藥品，都歸平教會擔任。此外有司務一人，是村民捐的。燈油什用，亦歸村民擔任。村民來所診病，只收掛號費兩個銅子。診療所的收入雖少，開支也少。大夫每月薪水，不過五六十元。每一治療所，可以供幾十村的需要。據說比方每村每月捐二元錢，那診療所就可以經濟獨立了。平教會所辦的事業，都是預備以後交給農民自辦。鄉村裏頭的診療所，算是一例。

公民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公共心，訓練團結力，作爲民治的基礎。可以算是四大教育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

難的最後的。總得生計教育有相當成效之後，公民教育纔談得到。

以上所說四種是教育的內容。至於教育的方法，則有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種。學校式的教育，已經有好成績。據說「平民學校」的畢業生，同高等小學的畢業生一同考試時，前者比後者攷的好許多。因爲「平民學校」的教材，都是切於實用的。關於社會式和家庭式的教育，平教會的法子，是叫農民自己組織各種的團體，如息訟會，戒烟會，賽棋會，平校畢業同學會等等。據說定縣人好訟，往往因小事而打官司，到傾家破產的地步。自平教會來定縣工作以來，這風氣已漸漸改變了。

我有一天同朋友騎驢出城到鄉村去參觀。我們出城，不是從城門走，是從城牆走。差不多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出城。因爲定縣城牆，雖然是很高大，已經年久失修。並且定縣三天有兩天起風。牆的兩面，不曉得從那一年代起，堆積沙土一直到現在，差不多與城牆一樣高，像一個大坡了。

我們走到一個鄉村，叫做高頭村。這村是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中心村，比較的可以是摩登的鄉村。我們去的那一天，剛剛有熊希齡先生來村參觀。村裏的農民，執旗幟

出來歡迎。男男女女都出來進熱鬧。我看見一個婦人，手裏抱一個小孩，在人叢中走。這小孩的頭和臉，是用一張紅布的小棉被完全蓋住。我覺得很奇怪。我同行的朋友，是平教會裏衛生部的人。他看這個情形，就問那婦人爲什麼把她的小孩子蒙頭蓋面抱到路上來？雙方交換了幾句話，我們纔知道那小孩子是犯猩紅熱的病。我聽到這一句話，更覺得奇怪。我就問我的朋友說，你們衛生部，爲什麼不把這種病人關起來以免傳染？我的朋友說，沒有辦法。除非他們病得要死，來求我們，然後我們纔能提出條件來，要他們聽。不然，同他們說什麼公共衛生的話，都是不行的。

因爲這一件事，我心裏生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現在要想把我們的國家弄好，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是使教育普及。人民知識程度增高以後，自然會來想法子去改良他的環境。這是自下而上的辦法，同時也是根本的辦法。但是時間恐怕太長了。第二是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運用政治的力量，來強迫人民改進他的環境。這是自上而下的辦法，是治標的不是治本的，並且有許多人反對的。但是政府果然是有力量的，並且是正大光明的，就是專制一點也無妨。可是照中國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兩種辦法，是要雙管

齊下，單獨來都是不容易奏效的。比方要人民做一件事，一定先要他們知道這一件事是對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纔願意去做。同時政府也得強迫他們去做，纔沒有人不做。平教會的工作，完全是照第一辦法。雖然牠有相當的成績，却是會裏有人已經覺得政治力量的重要。現在他們的工作，還在試驗時期。等到實施時期，恐怕是要政府幫助的。

我在鄉村裏看見一件事，是南方人沒有看見過的。定縣農民養豬的很多。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豬欄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廁所裏頭有預備給人家踏的地方，比豬站的地方，高二三尺。所以農民出恭的時候，他的豬就在旁邊等吃！

南方人養豬，有的用廚房的廢物，沒有聽過用糞的。定縣人以糞養豬，無他，窮而已矣。農民窮到這個地步，但是除正當的國稅省稅地方稅之外，還須繳納種種臨時特稅。這種稅的用處，是很少人知道的。近幾年來，因爲內戰的關係，定縣受了兵災的損失，不知若干萬。平教會也有估計，但其數目，我已經忘了。農民窮到這個地步，餓都不能吃飽。但是用麻醉劑的人却很多。據說定縣每年「白面」的生意，可以到一百萬。這豈不是一樁怪事嗎？假

使以政治的力量，來辨平教會的事，我敢說他們的成績，一定是比現在的好的多。

定縣是窮極了。有的地方比定縣好些。但是也有的地方比定縣更窮的。平均來說，定縣大概是可以代表中國的鄉村。中國人口，在城市的有十之二，在鄉村的有十之八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記得我們最後的一別，還是去年六月裏在北平中山公園後池子邊上，直談到夜深十二點以後。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一個夏夜！

月亮沒有。早斗是滿滿的，坐在枝葉翳翳的老柏樹底下，對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燈，下面池子裏的魚潑刺潑刺的飛跳，身子鬆鬆懶懶的斜靠在池邊的長椅上，腳蹠在臨池的欄杆上，眯着眼吸煙，得，這是多好的——個談天的環境與談天的姿勢？“Marvelous”他叫。

於是我們談到星星的幽隱，談到池魚的荒唐，談到古城上樓閣的黑輪，談到池子裏掩映的燈影，談到夏夜的溫柔與不羈，談到愛情的曲折與飄忽。最後，又談到他個人的事情上去了。如紫藤的糾纏，如綠柳的牽惹，如野風的

。我們住在城市的人，看見的事情，已經是夠不上摩登國家。但是我們不到鄉村去，是沒有看見過中國的。這又窮又愚又弱又私的中國，除非強有力的政府，來行四教育，恐怕強盛的日子，不知道是在那一天呢。

渺茫，如花霧的迷離。我窺見他靈感的波濤，多情的掙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發表的一段呀！

已是半夜以後了，露水把火柴打潮了，煙都抽不着。「沈靜着聽那夏夜的神秘吧。」他說。

忽然遠遠的幽幽的來了一陣細樂之聲。

「聽，那故宮的鬼樂！」他笑着說。

那音樂真像似從故宮方面來。「你想這音樂是在幽宮的一角，幾個幽靈泣訴故宮的舊恨好呢？還是在千門萬戶的不夜之宮，三千女魂一齊歌舞好呢？」是我問。

「唔！你去幽宮罷，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宮去找你。」他灣了嘴笑。

我們尋着樂聲往東走，經過一段幽涼的長路，到了來

今兩軒，也不見跳舞的。

「這音樂真來的古怪」他側着耳朵說。

出了公園的前門，我們又順着天安門東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們兩個影子。

「小曼來好幾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的說。

「你怎樣還不走呢？」

「等飛機呀！」

「幹麼必須坐飛機？」

「快歐。」

「你等上一星期呢？別頑皮啦？乖乖的坐車去罷，回頭坐船，到青島還得來看我們，我們陪你逛勞山。」

「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着，看我向你們招手兒罷。」

「我明天也就回去了。」

「這樣快！幾時見？」

「你一準到青島來。」

「好罷。」

志摩，你是答應我們了！但我們等來等去，只等到了
一個驚心的消息！

許多朋友來信說，「志摩死了，我們那裏更找到像他

這樣一個可愛的人！」

是的，我們的損失不只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詩人，
一個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類中失掉了一曲「虞陵散！」

談到詩，志摩實在給了它一個新的體魄，雖然在音節
上還未能達到調諧的完美。可是，只要詩得了新的體魄，
它不自然會找一個適當的調子嗎？我常想新詩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然是胡適之先主們打破舊詩的樊籠，造成
新詩的雛形。然在這一階段中作白話詩的都還脫不了舊詩
的氣味。只在形式上把詩的用字白話化，把平仄的拘束給
打破了。而內容上還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
西洋詩的薰陶來寫新詩，不但形式一脫舊詩的範疇，而取
材，用字，結構及氣味，都不是舊詩而是新詩了。為方便
，可說是到了第二階段。如他初期的嬰兒白旗毒藥諸篇，
是何等的力量！但這種散文式的詩，到底是丟了詩的主要
成份——音樂的美！志摩詩的進展，音節漸漸的西洋化，
這是看得出來的。但以單音字與複音字的不同，中西語調
的差異，中國新詩的音節，不是可以整個西洋化的。這必
要從中國語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樂來纔使得。所以第三階
段，就是新詩音節的追求。自六年前聞一多先生與志摩在
晨報所創辦的詩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詩刊，都是在這一

方向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較志摩的詩音節爲調諧了。誰知在這最後的奮鬥中，我正正想看他偉大的成績時，他却臨風而殞呢！

至于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爲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直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較多輕清，多俏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裏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湧，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裏不能不讓他佔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爲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現表他不羈的天才了。

再談到志摩的爲人，那比他的散文還有趣，就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罷。節奏他是沒有，結構更講不到，但那瀟灑勁，直是秋空的一縷行雲，任風的東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沒有方向。他自如的在空中卷舒，讓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沒有。他不灑雨，因爲雨會使人苦悶；他不會遮了月光，因爲那是煞風景。他一生決不讓人苦悶，決不致風景。曾記得他說過，「爲什麼不讓旁人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麼！」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樣義

氣？

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抨擊多了，但他并未抨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爲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他喜歡種種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蹟和宇宙的寶藏。那怕是醜，能醜得出奇也美；那怕是壞，壞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當媒婆，作法官，誰管那些。他只是這樣一個鑑賞家，在人生的行程中，採取奇葩異卉，織成詩人的袈裟，讓哭喪着臉的人們看了，鈎上一抹笑容。這人生就輕鬆多了！

我們試想想這可憐的人們。誰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憑着蒼蠅碰窻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書燈，總是那些先聖往哲今聖時哲們的格言，把我們格成這些方方板板的塊塊兒。於是又把所見的一切，現在不知不覺中，與自己這個塊塊兒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罵人家是錯了。於是是非善惡，批評叫罵，把人生鬧的一場糊塗，這般多蠢，多可憐！志摩他就不——一點也不。偏偏這一曲廣陵散，又在人間消失了！

✧

✧

✧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論對日外交方針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建設與計畫

漫遊散記(一)

△不吉利的深盆

△私帶軍械

△板橋第一壁上題詩與滇越鐵路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胡適

孟眞

詠寬

丁文江

衡哲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

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

加郵費一元六

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東亞書局

青雲閣富文齋

西單商場君中書社

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代定)

東安市場佩文齋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五馬路東亞圖書館

四馬路新月書店

中央大學內時代公

論社

新生生命書局

安徽新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獨立評論

第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論對日外交方針

胡適

五月三十一日的天津大公報有一篇很重要的社論，題爲，「對日新方針之確立與進行」，其中的主旨是：

外交應自主自動，乃獨立國當然之態度。今日東北情勢縱益於我不利，要當確定方針，昭告中外。藉令一時無法交涉，亦須明示態度，永作努力目標。

關於這個方針的綱領，大公報說，

今日主要問題乃爲如何取銷偽以，促進交涉機運。

關於進行的步驟，大公報主張：

中國亟應自動宣布：願於國聯好意周旋之下，與日本開始東三省善後交涉，其法應仿華府會議時交還青島之例，令中日出席國聯之代表，在歐洲簽立政治的協定，由日本聲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交回侵占各地。其詳細辦法則由兩國派員在中國開會協議。

如果日本不願在國聯解決，則可擴大範圍，根據九國公約之精神，仿照上海停戰之辦法，由遠東

有關係之各國，連俄國在內，互相邀約，在中國開一國際會議，進行中日爭議之調解，請兩國依友邦之獻議，以自動的形式，派代表簽訂上述原則的條件，而後商定實施細則。

我們讀了大公報的這篇社論，真有不堪回首的感慨！去年九月以後，袞袞諸公無人敢負外交的責任，事事推諉，日日拖延，就把整個東三省送在日本人手裏。民衆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樂得躲在這個喊聲裏，束手不作外交上的策畫。國際聯盟的理想主義者，——如德拉蒙，拉西門諸先生，——自然希望這個自有國聯以來的最大國際爭端能够由國聯處理解決。倘使他們的理想能够實現，國聯可以一躍而爲世界政治的共主，和平的重心，這自然是人類史上的一大進步。但國聯負責任的政治家，眼見日本的強烈抗拒，明知國聯威信之不可輕易嘗試作孤注之一擲，也明知中日直接交涉之不可避免，所以屢次的國聯議決案中無一次不暗示兩國直接交涉的途徑。然而中國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勢，又沒有肯負外交責任的決心，所

以始終只利用國聯來做延宕的工具，從不會運用國聯的組織和國際的同情來做外交上的奮鬥。名為信賴國聯，實則躲避責任，貽誤國家。四五個月延宕的結果，空毀了這班國聯理想家的希望，空毀了國聯本身的權威，只造成了滿洲的偽國，並且促進了日本軍閥的法西斯蒂的運動。

現在滿洲偽國的招牌已撐起來了，日本軍閥和浪人已在那偽國的影子底下實行統治滿洲了。日本五月政變以後的聯合內閣與議會公然討論承認「滿洲國」的時機了。悲觀的論者已感覺此時幾乎有雖欲交涉而不可能的形勢了！在這個時期，我國當局方才有討論對日外交方針的表示，方才擬議所謂「自動的」外交方案。「亡羊而補牢」，雖然太晚，究竟遠勝於這半年來的推諉延宕的誤國行爲。大公報所謂「今日東北情勢縱益於我不利，要當確定方針，昭示中外；藉令一時無法交涉，亦須明示態度，永作努力目標」，是我們極表同意的。此時若再不確立對日外交的方針，若再不肯積極謀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將來只有於我更不利的情勢，決沒有驟變或漸變爲於我有利的新局面，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大公報主張兩種交涉方法已引見上文了。六月十二日大公報社論又申明此意，而稍異同，其文云：

獨立評論 第五號 論對日外交方針

至其協商方式，或在歐洲由中日代表非正式交換意見，待至商洽成熟，然後由國聯正式調停，簽訂大綱；或由國聯主持，在遠東召集一種國際會議，於各國好意周旋之下，由中日兩國商訂解決辦法。

這幾種方式，我們認爲是在今日情勢之下較爲切近事實的辦法。我們希望政府和國人都能平心考慮這些提議。

大公報六月十二日的社論中又有這樣一句很大胆的提議：

日本前任幣原外相曾有五基本原則之提出，今苟據以接受協商，則國聯曾旋當易著手。

這裏所指的五項基本原則，即是日本政府去年十月十九日通告我國駐日公使，同時呈報國聯行政院的；在十月二十六夜，日本政府發表長篇聲明書，其中第四節又重提此五項原則爲中日直接交涉的先決原則，其文如下：

- (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
- (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全。
- (三)澈底的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

(四)對於滿洲各地之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的業

務與以有效的保護。

(五)尊重日本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

這五項原則，當時我國施肇基代表對於最後一項，曾表小願將條約解釋問題提交公斷。十一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在巴黎開會，白里安扶病主席，在演說詞中又提到這五項原則，他以為前四項皆為國聯行政院議案所包括，中國不會有異議；至於第五點，依施代表來函的輪廓，尙有相互諒解的餘地。依此看來，中國代表當日爭論之點只在民國四年中日條約的効力問題。但終以此一問題，國聯行政院所欲斡旋的中日直接交涉就無法實現。其時日本軍隊節節進展，巴黎之會未敢，馬占山已敗退，龍江已淪陷了。其後遼西又失，整個東三省在武力佔據之下，日本政局又已大變，軍人更跋扈了，一面攻佔淞滬，一面成立滿洲偽國。當日提出五項原則時所謂「確立兩國間常態關係之基礎大綱之協商，和日本軍隊撤回鐵路附屬地內」的問題，簡直沒有人重提了。我們現在平心回想，不能不承認大公報（五月三十）的議論的精警，大公報說：

自中國言，不承認民四中日條約，實則日本在

東三省之行爲早經超越該約，而縱容日本之超過者，固爲中國自身也。如韓僑到處移殖，承種水田，

乃出中國官許。故解決中日糾紛，應當根據事實情況，不可拘泥理論。

民四中日條約至今還有人稱爲「二十一條」，其實此約及其換文，除去已有新條約替代的（關於山東的部份），或已經日本在華府會議聲明放棄的（換文七關於南滿及東蒙鐵路投資及借款的優先權，換文九關於南滿聘用顧問的優先權，及二十一條第五項的保留）之外，其中採用二十一條的條款不過六條，而這六條所給予日本的權利，在事實上無一條不是日本享受至今的，並且在事實上往往超過條約的權利，如大公報所舉的例子。此種事實上的享用與超越，都在九一八事件之前；我們所爭的是紙上的廢約，而敵人所至今享受的乃是事實上的實惠。我們不能抗阻事實上的喪權失地，反因否認這條約而授敵人以不顧條約信義的口實。我們所持的理由是：「此約與他約有異，乃受威脅而承認者」。我們當日既不能抗拒「威脅」，則這「威脅」之下所簽訂的條約自應忍辱承認，至能報仇雪恥或和平修改之時爲止。況且事至今日，豈但這六七條的權利無法收回？連整個的東北都斷送了！如果這六七條的承認可以使我們恢復東三省的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如果這條約的承認可以給我們一個重新在外交上圖謀挽救東北的機會，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

固執這條約的否認。

我們很欽佩大公報肯犯全國所謂清議，屢次作平允的，負責任的忠告。我這篇文章不過是引伸他們的社論，作一種很誠懇的共鳴。現在我且暨括大公報的主張，參加自己的一點意見，提出下列的幾條，作為本文的結論，並且希望作為國人討論對日外交方針的一個底子：

(一) 中國政府應該表示願意依據十月中日在國聯提出的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後問題。

(二) 交涉的方式略如大公報所提議，仿華府會議的前例，在國聯或有關係的友邦斡旋之下進行兩國全權代表的交涉。其地點或在國聯，或在中國，或在中立的地點如檀香山之類，皆可。

(三) 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四) 中國應該自動的聲明，在滿洲國取消之後，在中國恢復東北領土與行政主權時，東三省的政治組織應該盡量現代化，政府人選應該以人才為標準，決不使軍閥割據的政治復活。

(五) 中國不妨自動的主張東三省的解除軍備，中國與日本兩國皆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

(六) 中國不妨自動的主張：東三省原有軍隊現駐關內者，應該逐漸編遣，使他們有家可歸的仍回關外，無家可歸的應由東三省政府日移至北滿各地留隸。其經費應由東三省財政整頓後之盈餘項下等畫供給；其編遣計畫，應由中央政府與北平綏靖公署會同聘任國內外專家妥籌。

(七) 關於鐵路的爭議，應該由兩國鐵路專家會議，依據現有各種條約，作切合事實的協商。

(八) 關於土地商租的問題，中國應該要求：在政治改良與司法革新的條件之下，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居住或經營農工商業者不得享受領事裁判權。

(九) 中日兩國締結的新條約，不但應該解決積年久懸的爭端，並且應該遠矚將來，確立遠東兩大民族可以實行共有共榮的基礎。

廿一，六，十三夜。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 眞

中國現在所處的危機，「國難」二字不足以盡之。國難是一個國家雖不常有而總嘗有過的事情，中國現在的危機却是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從內說，是文化的崩潰，社會的分裂，從外說，是若干倍危險于一九一四年的局面。何以說現在是社會與文化的崩潰呢？有史以來，一國立國之本，最大者有三事，一、政治重心，二、國民經濟，三、技術程度。中國現在政治沒有有力而穩定的重心，國民經濟整個分崩，而技術程度不及世界潮流者數百年。請看中國的共產黨，何嘗恰是俄國或德國有主義有經驗的革命黨？中國的共產黨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的崩潰而已。又請看中國的學潮，何嘗是所謂牛津運動，與十九世紀之德國學潮？乃是政府不是政府，校長不是校長，教員不是教員，所以學生不是學生而成之教育總崩潰現象。又請看所謂軍閥，何嘗成閥？只是叫化子頭兒，國民總失業，然後軍閥要多少叫化子便有多少叫化子。中國本無皇室貴族，而士大夫階級整個

失其重心作用，故流氓苦力平分南北政府（此一僥語是我的一位朋友說的。）社會組織與文化效用整個崩潰，今又以天災外患，加速度進行。何以說現在局面的危險若干倍于一九一四年呢？一九一四年僅是幾個帝國主義以膨脹之故不能相容，故出于拚命，彼時各國國民潛著的實力甚大，而社會危局不如今日之深刻化。現在則四海凋零，列國疲敝，休息猶不能更始，而工業革命所種下的種子，民族主義所種下的種子，大戰所種下的種子，都是愈醞釀愈深刻的，以疲敝的根基，運不制的感情，一旦暴發，其凶烈十倍于大戰，其紊亂百倍于大戰。而且上次大戰是奧拓曼（土耳其）帝國之形勢直接演成的，今後大亂之必是中華民國之形勢直接演成的，現在已可推知，則中國萬不能再以對上次大戰的態度對後之大亂。

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人家正以其經濟的政治的軍備的一切最有組織之能力全力對付我，我若全然表示出原形質的狀態出來，焉有生路？

所以好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了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國此時大有沒有政府的可能，因爲在此時中國形勢之下，能組織政府的花樣是很少的。

第一，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國民黨施政之成敗另是一問題，然國民黨在此時的中國中是比較上差有組織的一個政團，此外除共產黨有一種潛勢力以外，中國並沒有第二個有組織的政團。請國民黨交出政權，固不易，而接受政權爲尤難。一切殘餘的政治組織，如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江蘇省教育會系等等，和一切的殘餘軍閥，如所謂皖系，直系，奉系，陳炯明系等等，雖高官地盤至今猶有佔據者，然比比他們過去的成績，看看他們今日之力量，那一個能站起接受政權？兩三月前演所謂「國難會議」一齣戲時，有些人要以國難會議產新政府，要以國難會議與國民黨算賬，此事之是非居心都不論，這想頭真正再幼稚也沒有了！天下那有以做官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的！且責國民黨交出政權，給誰何人？給安福系？給研究系？給北洋系？給青紅幫？給所謂「全民」？縱使國民黨甘心禪代，其結果只是演一齣子嚙子之的故事，燕國亡得更快些。今日之局，國民黨一經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亂。

第二，此時國民黨之中心人物，能負國家之責任者，已經很少了。國民黨以歷年的「家爭」，中國人民出了一個死亡數十萬，財產喪失數十萬萬的代價，而國民黨自身之損失，亦不在少處。喪失牠的信用，墮落牠的領袖，紊亂牠的組織。國民黨今日之站得住者，不是牠自身充分的有站得住的力量，乃是其他結合沒有站得起來的力量。這不是國民黨應該自喜，而是國民黨應該自警的。我們至今猶同情于國民黨的人，尤其盼望國民黨領袖認清這個危機，而深自策勵。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曰汪，曰蔣。他們三人之有領袖地位，自然不是無因的。胡之人格堅固，江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志有強力，這是反對他們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如說汪先生的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之事務所應必有的。事實如此，這不能說不是今日中國的大困難之一。現在胡先生是不會到南京的，汪蔣合作而以汪負政治責任正面的政府，似乎還不是在此日局勢下的一個不好的事情。尤可顧慮者，是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們頗想不出能更有一個政府出來，能够真有政府的效用，好壞且不論。這個意思，且分幾層去說。

甲，汪精衛自做行政院長以來，頗負責任，而大體不誤。上海事件之結局自不能很滿我們的意思，然比起不負責任的拖延，國人損失尙小。且此事結局似乎是今日情況下的最多可得到者，此事之未附有政治條件，現在事實已足證明。汪之對付此事，事實上指出來他未存沽名避責之心。至于其他事件，都不見得有滑頭的態度，不曾說大話做小事。目前外交問題，俄交，國聯，等等，看來他是在有計畫的進行中。綜合起自有行政院以來的四個院長，譚組菴，蔣介石，孫哲生，汪精衛，汪尙是差強的。

乙，若干批評汪精衛的話，每不足爲大病。我聽人說，汪精衛上台兩個月，只是位置分配忙，一切舊有同派人索求地位，鬧得他頭大，而出了無數的笑話。我以爲這誠然是不幸的事，然而這是國民黨的普通現象，且此現象不足爲國民黨的深病。國民黨，或改組派，以在野革命的地位，自有牠的部隊，一旦上台，這現象是免不了的。這現象誠不可以鼓勵，而南京若已經建設出一個「文官服務」(Civil Service)的系統出來，這辦法是萬做不得的。不過今日南京還不會建設出此事來，而汪派此舉尙不至使政務大不得了。且所新用之人，比其當年王正廷王伯羣孔祥熙輩所用者，算是高明得多。又有人說，汪之處理事務異

常紊亂。這却不是等閑的事，然若施政之方策有計畫，此事可以在各部分的組織上得點救濟。

丙，我們誠不能說汪的政府是如何值得讚美的，然代替他者，正無其人。汪之行政院如塌台，則繼承者當不出個方式，一，出來一個居政府虛名而毫無政府効用的。這樣是萬萬不得了的。二，蔣之復政。這是行不通的。前年去年蔣確曾有過把政治建設起來的機會，然而他把那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放棄了。今日長江流域地方秩序之喪失，外交布置之忽略，極多用非其才之大官，國家實力之消耗，他負的責任至少不比任何一人小，所以他現在是不能單身出馬的，他出來便是一陣大紊亂。水滸所說「一條棍棒等身齊，打得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方式，在中國的其他時候未必不是一個可用的政治實策，然而現在的中國此法是不行了。愈順民之欲者，愈能以強力專政，而求專政必先順民之欲。我們姑且卑之無甚高論，亦應知道人民安居樂業然後天下歸心。現在國人對蔣公之感想又何如？

在如此的一個局面之下，所以我以爲一有政潮，便有無政府之危險，而今日之局，豈是容許中國無政府的？即是法國式的「內閣危機」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不願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爲之的！

不過汪的政府實在無多根基，而使汪精衛的行政院不
倒，中國不至無政府者，負最大之責者仍是汪氏，他若不
好生幹，瓦解是不能很遲的。因此，我們希望他抖起精神

建設與計畫

詠霓

「建設」是近幾年來很普遍的一個口號，中央地方都
有人在極力喊著。但究竟成功了幾件，實現了幾分，實在
不容易舉例。在建設呼聲初起的時候，大家聽了真是非常
高興。幾年之後只聞空言，不見實績，大家便有些灰心。
即使真有若干誠意的計畫，大家也往往不敢相信，甚且懷
疑到主張的人或者別有用意。在如此情形之中，如果還要
將並無把握的理想事業，一味空言宣傳，不但於事無濟，
而且反要使國民對於政府減少信用，與宣傳目的正好背道
而馳。所以從前俄國雖曾用宣傳喚起實行的興趣，目前中
國恐祇有拿實用來挽回宣傳的信用。但如何實行方能成功
呢，這便值得詳細討論了。

現在所稱爲「建設」事業之意義也很籠統，大約如造
路採礦開工廠興水利等等有益於經濟發展的事業，都可以
歸入此類。其實這類事業在前清光緒年間已經開始提倡，

來，應付此日之局面。第一要積極的布置外交形勢，第二
要建設社會的安寧秩序，第三要計算實力，並布置着，以
備國際上的劇烈變化。

而且提倡得狠是出力，不過結果却都失敗了。當時最足以
喚起中國人注意建設的，也是中日戰爭。光緒二十年以後
，幾年之中中央及地方政府興辦的鐵路煤礦鋼鐵造紙織
呢各廠都有。而且對於外國資本原來是狠小心而不歡迎的
，光緒二十年以後便大大的開放。下了幾次「上諭」，要
「招徠」外資開發富源，把各省礦產幾府幾屬的劃給外商
去辦。當時雖少宣傳，却能實行！但是實行的結果却是完
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第一是政府整個的政策真太糊涂
。譬如外資開礦固然也有利益，但豈能將全省或幾府的礦
權憑空送給外國公司。等到國民反抗，中國政府倒向出資
贖回。從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這種贖礦錢總共快到一千萬
元。狠有若干外國人未花資本一文，便賺了一大宗贖礦的
錢去。中國如果拿贖礦的錢來自己開礦，也早可開成幾處
好礦了。所以事先沒有研究胡亂實行，結果真是危險。

第二個失敗原因是當時舉辦的各個事業本身的經濟條件原未完備。即使順風進行，結果也非失敗不可。張之洞所辦漢陽鋼鐵廠的歷史，便是很好一個實例。地質調查所出版的中國鐵礦志內有一段記載很有趣味，摘引如下。

『前清光緒中葉建築蘆漢鐵路之議起時，張文襄督兩廣，謂造路須先製鋼軌，製軌必先煉鐵，因議籌建鐵廠於廣東，委中國駐英公使代詢設廠計畫，並購買機爐等事。其實礦在何處，煤在何地，尙茫然也。駐英公使據此詢英國機器廠名梯賽特者，廠主謂須先將鐵礦煤焦寄廠化驗，並須將礦量及距離地點詳細說明，方可計畫用何種方法，何式煉爐以製煉，非可貿然將事也。公使薛福成以是言告文襄，文襄曰中國之大何處無煤鐵佳礦，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迨機爐既定，文襄調用兩湖，……遂議建鐵廠於湖北。會盛宣懷所雇之英礦師，……發見大冶鐵礦，……有議設爐於大冶者，文襄曰大冶照料不便，若建廠於武漢，吾猶及見鐵廠之煙突也。乃得地於龜山之麓，……而地址狹小，一帶水田，不得不以鉅資經營之。又於各處徵詢煤礦，最後得馬鞍煤礦，所費已不貲。……又徵求煤焦之法

，而不知馬鞍山之煤灰礦並重，實不宜於煉焦也。英國梯賽特初定機爐時以不得中國煤鐵性質，故照英國所用酸法，配成大煉鋼爐（卽色麻爐）二座，……運載來華，遂於漢陽設廠。……惟煉得生鐵，不能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所以漢陽鋼鐵廠真是冒昧建設的一個好例。煤鐵來源尙未知道，便決定鋼鐵廠的地址，只要當局者在他的衙門裏能看見煙囪的冒煙！灰礦並重的煤，祇要拿來煉焦。沒有化驗鐵礦成分之先，便定做了最忌煇份的酸性鋼爐，而後來所用的却是含煇頗多的大冶鐵砂。結果是產出鋼鐵脆而無用，成本又高，只得廢了舊爐重新設備。資本虛耗既多，所以不能不借款，不能不賣砂，因此便與日本人結了不解之緣。所以漢治萍的失敗固然是由於後來的糊塗與貪私，但實在也因為建設之初早種下了失敗根苗，使得後來不容易成功。

從此看來建設真不是容易事。建設必先有計畫，計畫又必須有實在根據，不能憑空設想，亦不能全抄外國成法。計畫的必要中國現在大約已普遍承認的了，所以近幾年來雖然沒有多大建設，却天天可聽見許多計畫。但是計畫的內容往往離事實甚遠，所以一經實行便即失敗。

這種計畫的失敗，第一原因是不問本地情形，硬抄本國成法。例如要開某種工廠，當然須先調查原料來源，原料不足自然設廠無用。但是「中國之大佳礦何處度有，」至今還有許多人能保留着張之洞的豪氣。所以努力建設的某省，曾費巨資建了一座硫酸製造廠，廠成了偏找不到硫化鐵礦，至今擱着無用。

其實關於中國資源的大略根據，並非沒有。至少對於重要礦產的調查，現在已有了若干無疑的重要結論。不過有許多人總不願意讀現成的報告，偏喜歡做他們趁心的好夢。所以至今常常聽見許多離開事實的大計畫，例如山西尺許厚的褐鐵礦，四川幾寸厚的菱鐵礦，以及蒙古沙漠邊上，都可以樹立中國鋼鐵業的大中心。而聽者似乎並不覺得奇怪。

還有一部份人以為建設計畫是很容易的事。所以無論怎樣重要的計畫，「當局」要人自己不用費心，只要叫幾個初畢業的科員去起草。起草成了，要人們看都不看，只須做一篇序文，或題幾個大字，就可發表出去，作為他們的成績。科員們既無經驗，又少參攷，更無研究的組織與機會，迫於地位不能不強作解人，限期交卷便算完事。如此計畫不但決不能行，並且往往把極淺近的事實亦弄得錯誤。

誤顛倒。把不相干的數目字濫抄幾篇，連他們自己都不明白牠的根據及意義。如此計畫即使當作文章看，也實在太不成話。

其實正當程序恰是相反。應該由富有學識的頭腦來做計畫，再叫各部份的工作者各就所專去調查研究，去徵集應備的材料，或解決局部的問題。而這種計畫大部份純是專門問題，必須先搜集已有的材料，考察實際的情形，然後方能下手，決不是普通行政機關四壁蕭然毫無參攷設備的辦公室內所能憑空杜撰的。

講到參攷材料，又感覺有系統的整理的必要。例如水利計畫是必須有水文測量做參攷的。因為水文測量歷久未成，所以水利工程受了許多耽誤。這種辦理不經濟的情形，在建設委員會出版的整理導淮圖案報告內說的甚為透澈。他說。

「淮河流域地形河道及水文測量工作與整治計畫等……自民國紀元前一年起迄今已十有八年，其間尤以導淮測量處施測最勤，成績最佳。……其所遺圖案皆散存前全國水利局及江北運河工程局，今歲本會派員……接收，……但亦不過十分之六七。尚有一部份……以無底冊可稽，未能接收。餘皆

散佚不存，搜集靡由，尤以水文測量圖底全部遺失最爲可惜。

：據此可知淮河流域蘇皖兩省地形有測一次者，有複測二次或三次者，亦有一部份區域遺留未測者，因之各河流域分野及其面積，無從得精確之計算。事權不統一，工作無系統，用費不經濟，皆過去之缺點。：：」

每一次測量當然要費許多款項與時間，方始做了若干工作。工作做到半途，政局變化了，機關改組或是長官換人，一切推翻重新起頭，再做原來已做的工作，當然要費雙倍的款項，只得一份的成績。而況如此者並不止一次。同一地方一次二次三次的去測量他。但是旁邊要緊的地方却整個遺漏了，所以真正要用的時候還是不完全。如果把屢次重複的費用與工夫來推廣與補充，豈不都可完成了麼？這樣的情形其實並不祇淮河的測量，例如山東河北的南運河，從前測量的圖說聽說也不知去向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並不是局部的小事，經費的虛耗事業的耽誤，都是於國計民命有重大關係值得公衆的注意與監察的。

從這樣事情我們應得的教訓是政府對於建設機關及專門事業要慎重變更，不可不顧一切的輕易改組。這種事業

與空洞的政治不同，積漸的進步雖然有時似乎稍慢，但是總算起來却比年年從頭做起還要快些。進步是歷次的工作相繼續相積累而成的，尤其是重大的建設事業，非逐步前進不會成功。如抹殺前人的結果，要一切自我作始，事業便不會有進步。俄國的革命要算狠澈底的了，但對於專門機關還是大多數保存或恢復了原來的基礎。中國的革命從來不會澈底，但是官僚地位的爭奪却比什麼都利害。

古人說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現在可以說五年建設，必須先有五年的測量調查和研究。所以俄國五年設計畫比較可能，因爲他們預備功夫究竟比我們開始得早了許久。他們第二個五年設計畫成功必定更大，因爲已有第一個五年工作做了基礎。中國在前清末年的建設事業，差不多都是毫無計畫貿然實行，所以用力雖大而成效甚微，甚且還引起許多危險。民國以來方始有些測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但仍未盡得實用，或者因爲不能一貫進行，所有成績大半損失。或者因爲當局主持的人沒有利用此種材料的能力及信心，所以事業上仍得不著指導。在如此情形之中，如果依樣畫葫蘆，也強來一個四年或五年計畫，我恐怕東施效顰結果不如預期。

也有一部份人不究失敗的原因，而設法改進，却輕易

的對自己失了信用，便主張中國建設事業非整個的請教外國人來辦不可。關於特別的專門事業，借材異地當然是狠可以，而且有時是必要的。但是一國的整個計畫，或是重要事業的中心組織，究竟還是要中國人自己能擔任方好。

漫遊散記（一）

丁文江

這二十年來因為職務的關係，常常在內地旅行，二十二省差不多都走遍了。旅行的途中，偶然也有日記。但是始終沒有整理。現在把其中比較有興趣的事情，摘錄出來，給適之補篇幅。因為次序沒有一定，事實也不能聯繫，所以叫做散記。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不吉利的澡盆

我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從歐洲經過西貢海防，到了勞開。距我出國留學的時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那時候滇越鐵路剛剛通車。從河內起，到昆明，要走三天，每天要下車住。勞開是第一天的宿站，在紅河的右岸，對河的河口，就是雲南地方。

如認為一切事情都應該完全交外人去做，我們本國人只準備掛名戶位，坐享其成，未免過於自暴自棄，而且天下也決沒有如此便宜事。

我直接從歐洲回來，沒有帶鋪蓋，下了車要找一個外國旅館過夜。到了站口，遇見了一個華安棧的接客的，再三拉我到他那裏住。我到客棧一看，是一個廣東的酒樓；客房的佈置，也與上海香港的廣東酒樓一樣，用半截木板隔開，一間一間的連貫在一排。而且各房都沒有窗子。陽歷五月勞開的溫度已經在華氏九十度左右，一進屋衣服立刻濕透。我要出去找外國旅館。接客的人說，「先生不要忙，我帶你看我們頂好的房間。」

果然酒樓的後邊，樓上有一間大房，房裏有一張床，一張棹子，一把椅子。床上掛着白洋紗帳子，鋪着一張席子，放着一個小磁枕頭，比普通的客房好得多。我于是就勉強住下。汗出多了，要想洗澡：叫茶房拿一個盆來。他只是搖頭說「盆不乾淨。」我說「不管他，拿來再說。」

等了一會他拿了一個圓木桶來，雖然太小却是狠新的，並沒有甚麼不乾淨。他打了水來，就板起面孔對我說道，「先生，你不管盆乾淨不乾淨，一定要洗，洗出晦氣來，不要怪我」。我再三細看，竟看不出不乾淨的所在。他也急了，纔說道，「先生！你難道看不出這是女人用的盆！」我方纔知道，用女子用過的盆洗澡是不占利的！

我洗了澡，四面細看，房裏牆壁上一點東西都沒有，只掛着一張琵琶。我恍然大悟，這是妓女接客的房間，所以有不吉利的澡盆。果然吃了晚飯，左右隔壁都彈唱起來。一直到早上四點，纔漸漸沒有聲息。我通夜沒有能睡，不但彈唱的鬧得利害，而且不放帳子睡，蚊子太多，放了帳子，悶熱得受不住，席子上又有汗臭味，枕頭是又硬又方的。好容易挨到天亮，剛剛有點睡着，茶房已經來開早飯了。

這是我回來第一次住中國客棧的經驗！

●私帶軍械

五月十一日六點鐘，我從勞開上車過紅河橋，到了中國境內的河口。在勞開法國的稅關已經把我行李草草的查驗過一次。到了河口，中國的海關又有人上車來查驗。一個紅頭髮的外國人同了兩個中國助手，走上三等車，眼光

就注視到我身上。

「你是中國人嗎？怎麼沒有辮子？」，這位紅頭髮的先生用純粹的愛爾蘭口音問我。

「我是剛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到雲南來游歷。」

「留學生！你帶得有軍火麼？」

這一句話可把我呆住了。我有一個愛爾蘭的同學，他到火車站送我的時候，拿了一桿英國陸軍用的八寸長的手鎗給我。他說，「聽說你要到中國內地去旅行，不可不帶軍械。這是我常用的一件東西。送給你防身，而且做個紀念。可惜我沒有子彈了。你到了倫敦，千萬買幾百粒帶去」。我到倫敦，忙了上路，忘記去買子彈，只把一支空鎗帶走。不想一到本國，就因此發生了麻煩。

「我有一支手鎗，是一個愛爾蘭的同學送給我做紀念的」。我只好硬起頭皮老實的告訴他，一面拿手鎗出來給他。

「阿！我也是愛爾蘭人。這是軍械，不能私帶的。你有護照麼？」

「我有，我有！」我連忙把駐英公使發的一張護照給他看。他問他的中國助手，護照上寫的甚麼。

「護照上說他是英國留學生，回國來游歷的。並沒有

提起手鎗」。

「沒有提起手鎗，有護照也不行的！你知道私帶軍火，在中國是有罪的吗？子彈呢？」

「我只有鎗，沒有子彈」。

他一面搖着頭，一面把我的行李反覆細查。

「你這個人太奇怪了，竟帶了一支空鎗！」

「我對你說過，是一個同學送給我做紀念的」。

他想了一想，對我說道，「手鎗當然是要充公的。照例你私帶軍械，我應該把你送中國官廳扣留審問。但是你沒有帶子彈，又有使館的護照，我不難爲你了。但是這幾天接到命令，因爲廣東有留學生鬧革命，對於留學生，特別的注意。我不能不報告蒙自海關道台。我下去就得打電報，看你的運氣罷！」

我眼睜睜的看着這個愛爾蘭人把我的愛爾蘭朋友送我的手鎗拿着下車去了。火車到了蒙自，上來兩個警察，對着我狠注意。我把護照給他們看過，他們並沒有提起手鎗。大概紅頭髮先生電報打晚了，或是竟沒有打。我雖然犯了私帶軍械的罪，居然逃出了法網！

●板橋驛——壁上題詩與滇

越鐵路

我在昆明住了兩個多星期。當時葉浩吾先生做雲南高等學堂的監督，極力的留我在雲南教書。我因爲離開中國已七年了，決意先由貴州湖南回家一次。葉先生幫我做衣服舖蓋，僱夫了，介紹我見雲南提學使葉爾愷先生，派了兩名穿號掛子的兵手護兵送我到鎮遠。從昆明經貴陽到鎮遠單路一千六百里，按站走要走二十八天。我帶得有許多儀器書籍，本來想僱牲口。以後一打聽，馬行裡的規矩，僱牲口至少十二匹纔肯單走，不然要給人結伴，極不方便。只好做三個竹架子，僱夫子抬行李。我自己坐一乘「滑槓」。這是一種極單簡的竹轎。用兩根長竹子做槓，前後兩根橫竹板。中間掛一塊木板做座位，把舖蓋打開，舖在上邊。前面再掛一根小竹子做踏脚，只有兩個人就可以走長路，比四個人的轎子省便的多。一共八個夫子，一個空身的夫頭。都是從麻鄉約行裏僱來的。麻鄉約是西南最有名的夫行，專做運輸的買賣，據說創辦的麻鄉約是四川人，跟楊玉科平雲南回亂有功。他不願意做官，就組織了一個夫行。凡有四川，雲南，貴州旅行的人，都得請教他。半路上夫子偷東西或是逃走，都由他行裏負責。一直到民國十九年我到四川貴州的時候，重慶貴陽都還有他的分行存在。

五月二十九日我裝了假鬚了，留了鬚子，穿上馬褂袍

子，帶着黑紗的瓜皮小帽，同九個夫子，兩名護勇，九點鐘從昆明出發，下午一點半到板橋驛，夫子就不肯走，說前面沒有宿處了。住的客棧，很像北方的「四合廂」的房子。

前邊三間是櫃房廚房，朝南的是三間上房；東西各有三間廂房。我住的上房；地是土舖的，棹子也放不平。屋上瓦極薄，透光的不止一處。那一日下小雨，房子裏面已經漏濕了好幾處，房後面有窗，開了一看，正對着馬槽猪圈，

立刻飛進來無數的蒼蠅。房子裏面一張床，一張棹子，一條板橙，都堆滿了灰。棹子上有半分厚的黑油灰，擦不掉，抹不去。最不得了是我八點鐘吃的早飯，一點半到店，三點半纔有飯吃。因為客棧的規矩，只供給白飯，菜由客人自備。客人一到，先要買菜，然後挨着次序做菜。後到的客人。要等先到的吃過了，鍋子方始有空。我沒有帶廚子。幸虧帶的兩個護勇，有一個姓陳的跟趙爾豐當過哨官，到過西藏，是老子出門的。他雖不是廚子，在軍營裏住久了，會得炒青菜，雞子，不然沿路上只好吃白飯了。我纔曉得勞開的華安棧，已經是百二十分近代化的了。

外面下雨，不能出門，坐在房裡餓着肚子等飯吃，異常的煩悶，忽然看見牆上題滿的詩，仔細一看，都不狠通

，惟有一首引起我的注意：

「萬里作工還被虐，鄉山回首欲歸難。十人同路餘三個，五日奔波始一餐。乞食幾家飯韓信，干人有客愧袁安。寄言來往衣冠者，末路應憐范叔寒。」
丙午春偕同輩作工于滇省，不堪法人之虐待，相率辭歸。既出省城，資斧斷絕，同行者十人，惟存余三人而已。寒宵不寐，書此以自寫苦況。津門

窮客」

丙午是一九〇六年，是滇越鐵路開工的第三年。這條鐵路是米突寬的狹軌鐵道，最陡的坡度是四十分之一。全路工程異常的困難。從勞開到蒙自，一一三英里，有二八個山洞；蒙自到昆明，一七六英里，還有三十個山洞。全線二八九英里，一共有一五八個山洞；山洞的總長度為十一英里有半，所以全線的二十五之一，都是山洞。建築費每公里為三十五萬五千佛郎。而且路線的大部分在極深的峽谷裡面，溫度濕度極高，「瘴氣」極其利害。法國人修路的時候，本地人怕瘴氣，不肯去做工。於是法國人同包工的意大利人到山東直隸兩省，大登廣告，招募工人。招去的一萬多，死去五千以上。南溪一段，有「一根枕木一條命」的傳說。這一位「津門窮客」一定是一萬多

人中的一個，被法國或意大利人騙到雲南來的。當日招工的時候，山東直隸的地方官極力的幫外國人忙。到了雲南以後，雲南的地方官對於他們的待遇絕對不敢過問。這是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書名 The Red Bread

著者 Maurice Hindus

出版者 Cape and Smith, New York. 1931.

這是繼續 *Humanity Uprooted* (看本刊第二期) 的一本書。前書是泛述蘇俄革命一切的——制度，人民，及外交——此書則是專述集農制度的。前書因範圍太廣，故所述大抵屬於外表，此書則因注意力的集中，故能作深刻的人心的探求，而為農民申訴他們對於集農制的歡樂與怨懼。

革命本是一個無情的帳路機，他只懂得他的使命，他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此書的最大優點，是能用客觀的眼光，藝術的文筆，具體的說話與行為，隨事隨地的把這個人情與制度的衝突表現出來，使讀者能充分了解雙方的心理——農民的痛苦，與革命家的煩憂。

在中國修鐵路最可痛的歷史。所以津門窮客的詩雖不好，却有保存的價值。

衡哲

一個農民這樣的對著者說：

『誰聽見過，拋棄了我們的田地，我們的牛馬，我們的傢具，我們的房屋，成天成年的做工，與他人平分所有的物件？一家的人尙不能個個相安，尙要時時相罵打架，你說，我們這一羣路人倒能相安如一家的人嗎？』

『是的，有的女人有十個孩子，便十個孩子有牛奶吃，有的女人只有一個孩子，也只有一個孩子吃牛奶。她們做的却是同樣的工作。唉，這算得公平嗎？』

（三十三至三十四頁）

但革命家却對農民這樣說：

『你們這一羣不爭氣的，告訴我，假如你們老守著你們各人的田地，還有什麼希望？想想看……你們的人口是年年增加，你們的田畝便越分越小。你們

的阡陌是那樣的多而不平，即有機器也將不能使用。你們只能使用舊法，享受舊苦。在這樣制度之下，你們除了覆滅與餓死，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三十九頁）

集農制自然是于農民有利的，尤其是在貧農。在此制度之下，一切耕種與畜牧是有組織的，是科學化的，所謂用力少而成効大，實不能不說是農業史上的一個大進步。

但富農與中農的犧牲確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十年的冬天，所謂組織隊（The Organizers）在鄉村的強暴行爲，實使農民痛心疾首。他們用強硬的手段——監獄，充軍，沒收產業——強迫農民加入那個集農制。這個情形，斯丹林（Stalin）及中央政府那有不知的道理？但爲什麼直到一九三十年的三月，他們方下令禁止這個強迫農民的行爲呢？我以爲著者的解釋是很對的：

『我們實不能不說，他們（指斯丹林及政黨各方面的人）的遲遲禁止，是出于有意的。他們是在圖一個大利。我們再聽聽下面斯丹林的報告，便明白這個大利是什麼了。這個運動（即是一九廿九年冬間強迫農民加入集農制的運動）給了政府二百萬普得（Poods）的穀料，又爲集農場獲得了價值四萬萬金盧布的農作品

，又使四分之一有餘的農民加入了這個農場……靠了這些集農場及國有農田，俄國在一九三十年，遂又重爲世界穀場上的一個大勢力了；從黨的立場上看來，這些獲得是很重大的，但是，他的代價也是同樣的大。」（七十三至七十四頁）

爲什麼『從黨的立場上看來，這些獲得是很重大的』呢？因爲蘇俄的目的不但在經濟自給，無求于人。并且要人來求我，俾蘇俄能成爲工業世界的領袖。他的手段是集農產品及工業品，而集農制乃是此手段中的一個重要步驟。說到這裏，我又忍不住要譯引一段斯丹林的說話了。

『我們正在開足了馬力往工業化的路上走，往社會化的路上走，把那個古老的，退化的俄國，遺在後面。我們將成爲一個鋼鐵的國家，一個摩托的國家，一個機器犁的國家。我們把蘇維埃放到一個汽車上，把他的農夫放到一個機器犁上，到了那時，我們再請那些自謂文化甚高的資本家來，和我們比賽比賽，看到底誰是落伍，誰是進步？』（八十七頁）

這樣的大言，這樣的自信力，這樣的驚人計畫，又奇怪他們對於農民的犧牲與痛苦，漠然無動于中呢？一個碾路機正在工作之時，是絕對不能爲了一條小虫，一根枯艸，或一條黃毛小狗，而停止他的進行的啊！這是我們讀了赤色麵包之後，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想。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所謂剿匪問題

丁文江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黻

漫遊散記(二)

丁文江

△「地無三里平」

△「人無三兩銀」

獨立評論

第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

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

加郵費一元六

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開 | 安錫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開圖書局 | 安錫圖書局 |
| 琉璃廠文齋 | 西單商場 | 新華書店 | 各埠代售處 | 東安市場 | 開明大學 | 南開大學 | 天津大學 |
| 青島圖書局 | 現代書局 | 西單商場 | 新華書店 | 東安市場 | 開明大學 | 南開大學 | 天津大學 |
| 青島圖書局 | 現代書局 | 西單商場 | 新華書店 | 東安市場 | 開明大學 | 南開大學 | 天津大學 |
| 青島圖書局 | 現代書局 | 西單商場 | 新華書店 | 東安市場 | 開明大學 | 南開大學 | 天津大學 |

所謂「勦匪」問題

丁文江

現在國民政府又要大規模的「勦匪」了。不但派定了勦匪總司令和副司令，而且蔣介石先生已經出發到了廬山；李濟琛先生也有不日到蚌埠指揮的消息。但是同時忽然財政部長提出了辭職的呈文。

我們雖然不知道財政當局辭職的內幕，揣想起來，恐怕與勦匪經費問題總有關係。去年九月以前的財政狀況，中央的收入預算有六萬萬六七千萬，而軍費的支出，每月是二千八百萬，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去內外債的擔負，政費已經沒有着落，不能不靠發公債周轉。目前中央的收入，除去還債以外，每月不過一千五百萬。其中軍費是一千三百萬，政費二百萬。在財政當局以為軍費已經佔了政府的真正收入百分之八十六。公債既沒有法子發，政費又沒有法子減，勦匪再不能增加額外的經費。在軍事當局則以為不但調動軍隊，不能沒有特別的經費，而且軍餉減成發給，軍心不能穩固，勦匪就無從下手。兩方面的觀察不同，當然免不了衝突。

我以為這不是單是軍事和財政的問題，是國民政府整

個的問題。我們先要知道「勦匪」兩個字怎樣解釋。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勦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勦」，減少了武裝的實力。同時國民政府和政府的軍隊，却因為改變了口號，發生了心理上的變化。「匪」不是內亂，「勦匪」不是內爭，名稱一變換，就可以粉飾太平，說軍政時期終了了。

這種粉飾太平的辦法仍然不能抹煞事實。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政府之下，一樣的有委員，有主席，有軍長，有師長。政府之上，一樣的有黨部，有黨員。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合併起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這個政府統治之下。最近平漢，津浦兩條幹路都發生了危險。於是國民政府又提議要大規模的用兵，但是所用的口號還是「勦匪」。

我們對於國民政府，要請他們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敵。認清了這一點，政府負責任的人，纔能夠感覺到他們切身的利害。認清了這一點，纔能够明白政敵不是單靠軍隊可以消滅的。一個政治團體的生命，日子久了，總得靠他政治上的成績纔可以保存。共產黨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幾個主席幫他們忙的。最近政府似乎也有決心改革這幾省的政治，所以撤換了這幾省的主席，但主席雖然換了新人，而舊主席仍然是「綏靖主任」。「綏靖」的成績我們絲毫沒有看見，而綏靖主任却大有督軍化的趨勢。省政府的文官如何能制裁那有兵有鎗的新督軍？稅收仍然在軍人委派的人的手裏。軍人委任的縣長，省政府也休想更動得一個兩個！只看見省城裡添了一個非現役軍人的主席，只看見舊主席換了新銜頭，然而一省政治的改革在這種雙料政制之下我們真不知從何說起！製造遍地的土匪和共產黨的，原是這些舊主席和他們手下的虎狼。現在掛牌去「綏靖」的，仍然是這些舊主席變成的新督軍！如果他們有「綏靖」的能力，又何須政府的大舉征伐？如果他們不能綏靖，只能造匪養亂，政府又何愛於這些變相督軍，偏要維持他們來虐民樹敵呢？

共產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軍隊鎗械的政敵。國民

政府爲自衛計，想用兵力剷除這樣迫脅牠自身存在的政敵，這種心理是一個政府不能沒有的。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這種政敵是誰造成的？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無疑的，共產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齎寇兵，資盜糧」造成的。

昨天在一處的席上聽見汪精衛先生談起此次廬山會議得着各地將領長官的報告，說共產黨在他們佔據的地方並沒有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只可說他們用「威迫」，而不能說他們用「利誘」。

我們要請汪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們平心想想：即使共產黨不會實行他們的共產主義政策，難道國民黨在當國的幾年之中曾經實行過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等政策嗎？他們不能「利誘」老百姓，難道國民黨的政治有何種「利」可以「誘」老百姓嗎？同是「威迫」，何以擁有百萬大兵的政府之「威」反不如紅軍和梭標隊之「威」的有效呢？政府諸公何不想想：威迫與利誘之外，是不是還有「避害」「救死」等等途徑在老百姓心裡更爲重要迫切呢？

昨天聽了汪先生的談話之後，回家看見大公報社論的「剿匪要義」。大公報所謂「要義」，只是一句話：「於

全國中懲治一萬貪污文武官！

我們也有一點「剿匪要義」：

第一，用現在政府調來剿匪的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來解決皖鄂贛三省的不良軍隊，澈底裁遣。

第二，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畫和行動，用全力整

頓江浙皖鄂贛五省的政治。

第三，裁撤戴季陶先生的考試衙門，在這五省澈底

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

第四，取消這五省內的一切苛捐雜稅。

第五，澈底整頓這五省的司法行政和財務行政。

(附註) 丁先生寫成此文，給我全權修改。從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來不及送給丁先生審校了，只好

由我聲明負責。

(胡適)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農業之生產要素，為土地勞工資本三者。蓋務農之先決條件，必有土地；然有地而無勞力，則地荒；有勞力而無資本，則將多勞而鮮獲。故必三者具備，且其分配適宜，農業始能發展，農產始可以期其豐穰。

土地 吾國面積計為四，三〇〇，〇〇〇方英里，約佔全世界面積百分之五強，較之日本，約大二十九倍有餘，除英俄外，世界皆莫能逮。第此項面積中所包括之地，為類不一，有三千尺以上之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之西藏高原，此外尚有甚多大山脈和溫度低下雨量缺乏之沙地，此種土地，均極端不宜於耕殖。據美國農部專家貝克

君之估計，我國土地中有充分雨量之可耕地，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其中百分之九十至九五，皆在本部十八省及東三省。此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之中，氣候過寒不適耕種者，約佔百分之五，所餘可耕地為一，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其中山岳池沼之地，及因其他地形關係不能耕種者，做美國之比例，作為百分之四十，則所餘者約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再舉其中土壤過瘠不能耕作者，作為百分之五，所餘可耕地之淨數，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僅佔全國面積總數四分之一強。我國人口總數之估計不一

，吾人姑以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爲準，則平均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爲三一，較之日本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二七七四)，約小九倍；英國每英里可耕地之人口密度(二一七〇)，約小七倍。惟吾國可耕地，雖估計之數，爲七萬萬英畝，而實際之已耕已殖者，爲數有限，且大半集中於中原區(即白河黃河淮河等平原)揚子區(即揚子江下流平原)邱陵區(即中原區揚子區之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之低山寬谷)與沿海區(浙閩粵三省之東南)四區。其可耕而未耕之地，除東北之天然農區外，餘則或待水利之興治，或待鐵路之修築，墾發之功，非可望於旦夕。東北三省可耕地之儲量，計有四千四百萬英畝，惜該處土地之取得及分配，缺乏定法，人民生命之安全，缺乏保障，以及幣制之紛亂，信用制度及銷售制度之改善，均足使移民墾殖，困難叢生。年來直魯豫之農民，雖移赴關外者甚多，然按之實際，移赴東北之動機，由於東三省土地之利動者少，由於原籍環境之壓迫者多。自九一八以後，東北之紛亂益甚，移民返籍者，日多一日。作者最近赴山東益都昌邑等縣調查，得知該地今年因東北移民返籍過多之故，農工工資，較年前此時低落至一倍以上。

我國可耕地之已耕者，爲數多少，僅有估計可考。

貝克估計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劉季陶估計爲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此外尚有估計爲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見Report on Crops, markets May 1923)，及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見Report of Agricultural Commission, 1914)者。此四種估計之中，以劉君之估計爲最高，若以此最高之數爲準，則吾國現時之平均，每英畝已耕地之人口密度爲一〇二四強，每人有已耕地〇·六二英畝。按照英美諸邦現時之生活程度，每人須耕地二英畝半始足以供營養之資。若以此數衡之，則吾國平均每人之已耕地，尙少四倍。若與美國現時平均每人已耕地三·六英畝相比，則少六倍。因此之故，中國農家之耕殖面積(crop area)，至爲偪仄。據金陵大學院直隸陝浙閩蘇七省之農村經濟調查所得，平均每農家之耕殖面積，爲五英畝零一，此數似尙較高。作者在山東所調查之結果，農家之耕殖面積，少至一英畝或一英畝以下者，約佔調查家數(約三千餘家)散佈於益都昌邑二縣(百分之五五)者。吾人姑以金陵大學之調查爲準，則我國農家耕殖面積，小於美國者(約六二英畝)約十二倍有餘，即與丹麥(約三三英畝)相較，亦小六倍以上。農家耕殖之面積，狹小

如此，其收入之微，即可想見。按諸作者在山東之調查，平均每農家之淨收入，僅一四二元，其中百分之十七，尙爲農家之副業收入。所謂淨收入者，即農家全年農務收入減去其全年農務支出之謂。倘以每家五口計算，則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僅二八元四角，此與我國平均每人國入三十元之估計，相差無幾。農民生活程度之低下，於此可以見矣。

勞工 吾國農民佔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約三萬四千萬），爲數可謂極鉅。歐美各國農民佔人口總和之百分數，計美爲百分之二六，法爲百分之四二，德爲百分之三一，英爲百分之七，東亞爲日本，農民佔其人口總數百分之五五，印度佔百分之七二。是中國農民佔人口總數之百分數，較世界任何國家爲高，即較以農國著稱之印度亦過之。農村人口衆多，工資低賤，故農場工作，幾全用人力。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植棉所用之人力勞工爲六五〇小時，較美國（一一六小時）約多五倍半，種薯所需之人力勞工爲四七四小時，較美國（八二小時）約多六倍，種麥所需之人力勞工爲二四〇小時，較美國（十小時）約多二四倍。

農民耕種時所用之人力勞工，既已如此之多，其勞工

費在農務支出總額內所佔之比例，自必至鉅。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六四（約二十元）爲勞工費（包括僱工主農及其家屬之任工作者）最高者爲百分之八一（約七十元），最低者爲百分之二九（約四元）。按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等縣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七十爲勞工費（約三五元）。在東三省東山裏一帶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英畝農務支出中百分之六十爲勞工費（約七元伍角）中國農村之工資甚低，而每英畝所用之勞工費，對農務支出之比例若是之高，此足徵便宜勞工非經濟之勞工也。美人貝克以每小時農工所得之收穫爲標準，比較中美農工之效率，謂中國農工每小時種玉蜀黍之所得僅一·一，若羅格姆，美國則爲四五·五，若羅格姆，種小麥中國僅一·六，美國則爲三九·四，種米中國僅二·三，美國則爲一八·七。就此數字觀之，美國農工種玉蜀黍與小麥之效率，高於中國農工者約四十倍，即種米亦高八倍有餘。

農工可分爲主農，家屬工人，及僱工三種。三者在中國農村中之重要，尙無準確之統計可考。且各地情形互異，亦不能一概而論。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百分之一九爲僱工，百分之三八爲主農，百分之四三爲家

屬工人。三者之分配，隨農家耕殖面積之大小而異，大概言之，一英畝或二英畝以下之小農，平均僱工工資佔勞工費之百分數為四；三英畝至七英畝之中農，其平均僱工工資佔勞工費之百分數為一四；八英畝以上之大農，其僱工工資平均佔勞工費百分之三二。金陵大學之調查結果，與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調查之所得相似，山東農民之勞工費中，平均百分之十八為僱工之工資，其中小農平均百分之六為僱工工資；中農平均百分之十五為僱工工資；大農平均百分之三七為僱工工資。東三省則迥異於是，其僱工工資在勞工費中，平均約佔百分之四五，最高者約達百分之六五，是蓋由於東省之農家僱工較多，工資較高故也。由此亦可推知吾國鄉村中之農民，除東三省外，其非地主非佃農而為無產之工資工人者，極為少數。此極少數之工資工人，在中國農村中之地位，一如法國丹麥及德國南部之無產農業工人，尚不能自成爲一階級。大部分之農業工人，其本身亦擁些許之土地，或爲地主之佃戶，僅以其農隙之餘力，爲人傭工。故吾國鄉村之經濟，目前尚無顯著之無產農工階級問題，所有者爲多數耕地甚少之農民耳。

資本

農民之資本缺乏，實爲發展吾國農業最大問題之一。

據金陵大學之農村經濟調查，平均每農家之資本，計一七六九元，其中百分之九二爲不動產，如土地房屋樹林之類，百分之四爲牲口，百分之二爲農具，百分之二爲種子及糧食。作者在山東益都昌邑調查所估計之結果，與金陵大學所得者大略相同。茲將其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平均每家資本估計之分配列左。

自耕農 資本一七〇〇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九二；牲口佔百分之三；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二；農具佔百分之三。）

半自耕農 資本一一二〇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八六；牲口佔百分之五；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五；農具佔百分之三。）

佃農 資本二四五元（不動產——土地房屋佔百分之四三；牲口佔百分之二六；種子及糧食佔百分之一四；農具佔百分之一七。）

據上表所示，吾人所須注意者有二：（一）佃農資本較自耕農半自耕農均遠少。上表所載佃農之平均每家資本，尚不足以表示吾國多數佃農窘困之情形。據作者之調查，山東佃農之資本，在五〇元以下者，約占調查範圍內所有佃農全數（五百餘家）五分之一，大率僅有農具及牲口二種

。(二)資本甚微，農具所占資本總額之比例尤小，故耕種所用之動力，大都均為人力及畜力二種。水力風力及機力，雖現在中國各處亦有用之者，要多限於灌溉而已。貝克估計我國人力及畜力用為農場之動力者，約四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力。倘已耕地以劉季陶之估計為準，則每六英畝耕地，約有一馬力。每農家所有動力，（每農家之耕種面積，以金陵大學之調查平均五·一英畝為準。）尚不足一馬力。美國平均每七英畝耕地用一馬力，而每農家所有可用之動力，則為八馬力。是中國農民耕地一英畝所用之馬力，較美國農民耕地一英畝所用之馬力尚多，而美國每農家所有可用之馬力則九倍於中國之農家所有。推其故，蓋因中美兩國農場所用動力之性質不同所致。美國農務工作，多賴機器以為之用，而所恃於人力者少；中國農民資本微薄，而勞工之工資至低，故農民之耕種，則純賴人力與畜力，所謂資本之農具，殊甚鮮也。

結論 綜括上述，我國之農業生產要素，就土地言

，可耕之地，現已耕者尚祇十分之四；其他十分之六，除東三省為天然農區外，餘則均有待於水利及交通之建設。其已耕之地，數額既不足以敷農民之耕稼，而農民之耕稼方法，又均墨守舊規，故結果所產不增，農民之生活甚低。就勞工言，鄉村之人力過剩，工資甚低，農民耕稼之時，大率多賴人力，故農務費中之勞工費絕高，而各個人之生產額甚低。就資本言，農民之資本甚微，其所用之農具，為數千年來相沿用之物，無資力以置新式農器。且利農業工人之工資低賤，一切多以人力為之，故結果每畝所用之動力多而生產少。

吾國之農地，說者均謂已達集約耕種（Intensive Cultivation）之情形。就上述各點証之，足徵殊未盡然。蓋所謂集約者，只能自每畝所用之人力言之耳，農器之設備，及耕種之科學方法，則尚未足以言集約。約言之，吾國之農業，實為資本不足人力過用。故今後吾國之農業生產問題，在如何改善土地勞工資本三者分配之比例。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黻

露」。著者的姓氏是伯少達甫斯奇 (Bessedovsky)。伯氏原來是在烏苦連 (Ukraine) 革命界活動的，但不與列寧表同情。自列寧宣布新經濟政策以後，伯氏一派的人解散了他們的組織而起始與列寧合作。一九二二年，伯氏充當駐維也納的總領事，不久降代理公使。是年秋又轉任駐波蘭的代理公使。隸屬於蘇俄外交部三年之後，伯氏改到國際貿易部服務。一次蘇俄想派他到美國去作商業代表；又一次派他到南美去：均因故未果。於是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蘇俄派他到日本去作參贊，同時兼代理公使。因出使日本的關係，伯氏始深知蘇俄的遠東政策之內幕。他這部自傳給與我們的興趣也在乎此。伯氏描寫蘇俄外交官吏的缺乏常識似乎有太過分了。至於蘇俄怎樣利用使館的特殊權利在各國鼓煽革命——伯氏言之甚詳。我們若無旁証，則必謂他有意寫一部神話故事。不過他原來不與列寧表同情；就是在蘇俄政界服務的時候，他時常批評當局者的政策；最後在巴黎他與斯塔林完全決裂了。所以他要有心的或無心的與蘇俄爲難，這也是人之常情。

伯氏在東京服務的時候——民國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九月——正是中國革命最緊急的時候。革命軍從珠江出師而占領長江；鮑羅廷以客卿而支派中國的革命，都是這時

候的事情。在華北：民國十四年冬郭松齡倒戈；十五年正月張作霖逮捕了中東鐵路的經理易范諾夫 (Ivanoff)；是年四月又派警察進蘇俄使館去搜查。讀者倘記憶這些事情就能領會伯氏披露的重要。

受任以後，就職以前，伯氏當然向上峰請訓。外交部長齊趣林談了一陣日本的政治，如軍閥的跋扈，海陸軍的競爭，財閥派別的衝突，以及日美將來的戰爭；最後表示他對蘇俄駐日公使哥蒲 (Kopp) 的不滿，說他暗中阻碍了鮑羅廷和加拉罕在中國的進行。伯氏的使命是去變更哥蒲的手段，使日本給蘇俄在中國行動的自由。

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梅爾尼可夫 (Melnikov) 與伯氏的談話更加詳細。照梅氏的觀察，日俄的衝突有好幾點。第一：鐵路運輸的競爭，其背後就是大連與海參崴的競爭。

「第二：鐵路的建築。一看地圖，你就知道他們（日本人）想在軍事及經濟方面包圍我們的鐵路。最帶恐嚇性的路線要算洮南到昂昂溪線，將來還可向庫頁島發展（原文如此），及吉林到敦化線，將來可延長到清津。第一線橫截中東鐵路，並且過興安嶺的軍防區。第二線正與我們的鐵路平行，剝奪我們的路的經濟重要，且給日本人從東向西鑽營

的保障。我們雖再三抗議，但是總無效果。日本人說，這些路不是他們建築的，是張作霖建築的……

「第三：張作霖。張作霖想把我們驅出中東路，而加拉罕在張馮戰爭最緊急的時候又慫恿了郭松齡的倒戈，於是大得罪了張氏。加拉罕當然答應了郭松齡天下是他的（郭的），但實際加拉罕全食言了。郭捨了他的命，和他妻子的命。她原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的學生。加拉罕與郭松齡的交涉就是她居中的。加拉罕會要求中政會調兵進攻齊齊哈爾，以擾吳俊陞的後路。在新門屯之戰，吳氏的馬隊果然決了最後勝負。我當時曾贊成允許加拉罕的要求，因為三四旅入就可長驅直入，但是中政會是怕日本人的。張作霖知道了這種情形，於是毅然逮捕易范諾夫。現在張作霖硬想把我逐出中東路」。

當張氏逮捕易范諾夫的時候，莫斯科會想出師哈爾濱，但是齊趣林教哥蒲探試日本的口氣，而哥蒲報告說日本準備同時調一師團到哈爾濱。莫斯科就決定靜待。梅爾尼可夫想「哥蒲不過撒謊，目的在於給加拉罕一點麻煩」。

在莫斯科與東京的角鬥之中，梅氏以爲蘇俄很有幾件利器。東海的魚，黑龍江東北的森林，及庫頁島的煤礦和

油礦都是引誘日人的好餌，足以使日本不動，讓蘇俄在中國活動。

外交次長李特維諾夫 (Litvinov) 的觀察就大不同了。照他看來，鮑羅廷「不過是芝加哥交易所一個油棍，原名 Grusenberg」而加拉罕不過是鮑羅廷的走狗。李氏對伯氏說：

鮑羅廷會回來爲中國籌款，帶了一件他和加拉罕簽字的意見書。他要求五千萬元，五萬枝槍，一百十五尊礮。中政會那班傻子費了兩天工夫來決定。這樣作下去，我們簡直不會有餘款，可以經營國際貿易。中政會要齊趣林出席。他稱病；每次中政會要和他商議中國的事情，他總有不消化的病。我替他出席了。我堅決的主張不再費一文錢，因爲我們對馮玉祥的忠信絕無擔保。擁護他的結果不過助他在北京建設強有力的政府，及訓練一個好軍隊；他將來惟一的目標不過把我們逐出滿洲，甚至逐出濱海省。斯塔林於是大發怒，說協助馮玉祥不過是中國蘇維埃化的初步。費了許多無聊的辯論，中政會終決定給鮑羅廷他所要求的百分之三十。我簡直氣死了，想馮玉祥這個流氓又要得一千五百萬元，

等於妄費了。」

斯塔林給伯氏的訓令不外這句話：「你必須阻止日本與英國的聯合干涉。隨便你用什麼手段，但你必須記得成敗是要你負最後責任的。」伯氏問他蘇俄是否願意割讓庫頁島的北部和海參崴給日本作為代價，斯塔林回答說：

「我不是外交家，我不能給你具體的意見。如

果蘇維埃能在北京成功，就是放棄葉爾庫斯克以東的地帶，我們還能保蘇維埃的安全。事事都要看現

在的局勢。蒲來斯特立他維斯克尙要重演好幾次呢

！就是中國的革命須要蒲來斯特立他維斯克並不滅

於俄國革命。」

伯氏得到這些訓令以後，就去東京上任了。在東京，

他不久知道了哥蒲的意見。哥蒲覺得中國不但沒有共產革命的資格，連資產革命的資格都沒有。莫斯科不可忘記中國的民衆運動不但有損於英國的利益，並且有損於日本和美國的利益。英日合作雖不可能——因爲自聯盟取消和新嘉坡建港以後，日本是敵視英國的——日本在華中的利益也很大。爲保護這些利益，日本不惜單獨行動。到某等程度，日本不致反對蘇俄的行動，因爲日本想趁機奪取英國的勢力，但過了這等程度，日本是不能容許的。中國人也

不是一班小孩，任憑鮑羅廷和加拉罕去玩弄。要中國人承認蘇俄完全是大公無私，蘇俄必須退還中東路和黑龍江北岸的土地。現在蘇俄的政策徒然使俄國喪失中國的友誼。伯氏與日本外務次長出淵的談話也給他同樣的印象。關於東三省，出淵尤其要蘇俄不多事。

駐北平的俄國使館人員有時到東京去見伯氏。其中之

一，維台爾尼可夫（Vedernikov）和伯氏談過鮑羅廷與蔣介石衝突的原委：

「他（維氏）說根據一切的報告，蔣介石是個忠實的民主主義者，且是個有經驗的革命家。這樣的人永不會讓蘇維埃化中國。鮑羅廷一起始他的陰謀，蔣氏必敵視我們。蔣氏政策的突變一定引起國民黨的內鬨，使他失掉他以往的社會根據。他的革命工作受了這打擊以後，他勢不能不放棄改造中國的企圖。因此中國的革命份子必致痛恨我們。鮑羅廷，維氏告訴我，曾訓令蔣氏的俄籍軍事顧問，教他們與第三國際合作。實際這就是教他們倒戈；那這是說，要他們在蔣氏地位危急且有其他領袖足以代之的時候一部份的反蔣。這事頗容易作，因爲蔣氏的敵人不少；其中最要者就是孫傳芳。」

加倫將軍及其同事以爲鮑羅廷這個辦法顯然不合于軍人的道德，但莫斯科終擁護了鮑羅廷。維氏說過鮑羅廷實際倒蔣的計畫：

「當革命軍進攻孫傳芳張宗昌的時候，蔣氏得着鮑羅廷給德富羅斯奇 (Davrosky) 的密碼電，教他阻碍軍隊的前進。鮑羅廷以爲蔣氏一得上海，其權威必大加增，以後就不能再倒他了。有些中國軍官已受了鮑羅廷的錢，應許贊助共產主義。在上海呢，已起始訓練赤軍。鮑羅廷的計畫簡單極了：使蔣的軍隊失敗，舉一個贊助共產主義的軍官來替他。同時赤軍在上海發動，把張宗昌的軍隊逐出：

∴。上海之變一成功，一個蘇維埃式的革命政府就

在那裏組織起來，中國的赤軍也有所憑依了。」但這個密碼電被人截取了。蔣氏把德富羅斯奇關起來。上海終落在他的手裏。以後蘇俄要利用汪精衛；不成，就收買了賀龍和葉挺。

民國十五六年當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大關鍵。伯氏所述不無史料的價值。

附註：伯氏的書原名如下：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 By Gregory Bessedovsky. Translated by Matthew Norgat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1. Pp. 276.

漫 游 散 記 (二)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續)

●「地無三里平」——雍正以前的地圖——新舊驛道

貴州有個俗語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初聽得的時候，覺得未免形容過分。等到在

貴州旅行久了，纔知道這三句話都與事實相去不遠。我第一次在貴州境內旅行了一個月零七天，下了十五天的雨。民國十八十九兩年再到貴州，旅行了五個月，只有二十八天是真正的晴天。可見得「天無三日晴」的話是不錯的。我現在要舉幾個例，證明貴州是「地無三里平」的。但是

在這個以前，先要說明通行的貴州地圖的錯誤。

從昆明經過馬龍，霑益到白水鎮，有英國軍官戴維士所測的地圖；沿路的距離高度都還可信。過了白水向平彝縣，再向東到貴州境內就只有武昌輿地學會所出版的略圖可供參攷；高度完全沒有測過。照這個圖，從平彝到貴陽的驛道，要經過亦資孔，普安，盤江，鐵索橋，永寧，關索嶺到安順的黃菓樹。我從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針步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過了亦資孔，我以為一定快要到普安了，而大路忽然走向了東北，經兩頭河，劉官屯，楊松，罐子窰，花貢，向毛口河。以上的地名除劉官屯，毛口河以外，都不見于圖上。從亦資孔到毛口河要走五天。我天天打聽甚麼時候可以到普安，天天不得要領。以後快到毛口河，我詳細問我的夫頭。他說大路不但不經過普安，而且并不走鐵索橋，關索嶺。一過了毛口河就到郎岱，然後再經坡貢到安順的黃菓樹。他走了幾次，都只知道這一條驛道。我當時大惑不解，何以武昌輿地學會的圖竟會把驛道都弄錯了。以後到了貴陽，買了一部貴州通志，方始知道老的驛道原是走普安，鐵索橋，關索嶺，大概如圖所載，但是雍正七年鄂爾泰已經奏明把驛道改到毛口河，郎岱了。再仔細一想，武昌輿地學會的圖就是所謂

胡文忠公地圖，是根據乾隆年的大內輿圖翻刻的。大內輿圖雖是在乾隆年刻的，實際是用康熙年間天主教教士所測的圖做藍本的，並未加以絲毫修正。新驛道是雍正七年改的，圖是康熙年間測的，當然不會相符合的。所可怪的是這是雲貴兩省的大道，每年來往的士大夫不稱少數，竟沒有人發見圖的錯誤！因為不但是武昌輿地學會的圖如此，所有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中國地圖，和英，德，法，日文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圖都是如此！一條貫通兩省的驛道，在圖上錯誤了二百多年，沒有人發見，足見我們這二百多年地理學的退步。

據鄂爾泰的奏疏，因為舊驛道經過盤江，鐵索橋等處，異常的難走，所以纔改修新道。但是據我當日的實測，經毛口河，郎岱的新路也極其不平，而且向東北繞了一個大灣子，要遠了將近六十里路，狼不可解。當日狠想找個機會，把舊驛道也測量一回，來做比較，但是始終未得如願。直到民國十八年鐵道部提議要修滇湘鐵路，派了一隊人測量路線，一位姓周的隊長誤聽了本地人的話，從亦資孔經過劉官屯，盤江，鐵索橋，關索嶺測量了一條路綫到黃菓樹，方纔把這問題解決了。我現在把周工程師所測的舊驛道和我所測的新驛道，擇要列成兩個表如下：

舊驛道（高度以出海面公尺計算，距離以公里計算，各地自西往東排列）

| 地名 | 高度 | 從劉官屯 的距離 | 各地間 的距離 |
|-------|-------|--------------|------------|
| 劉官屯 | 一，六二四 | — | — |
| 三板橋 | 一，四六七 | 二二·二 | 二二·二 |
| 普安縣 | 一，六六七 | 二八·七 | 六·五 |
| 江西坡頂 | 一，六一〇 | 四二·七 | 一四·〇 |
| 洒米河 | 九〇〇 | 四八·六 | 五·九 |
| 江東坡頂 | 一，五〇〇 | 五二·五 | 三·九 |
| 安南縣 | 一，五一九 | 六〇·六 | 八·一 |
| 盤江鐵索橋 | 六二〇 | 八·四 | 一九·八 |
| 永寧縣 | 一，四五四 | 九〇·九 | 一〇·五 |
| 北口 | 九三一 | 一〇〇·一 | 九·二 |
| 關索嶺 | 一，一一〇 | 一〇五·二 | 五·一 |
| 壩陵橋 | 九〇三 | 一一四·四 | 九·二 |
| 黃巢樹 | 一，〇〇八 | 一一八·五 | 四·一 |
| 新驛道 | 高度 | 從劉官屯 起的距離 | 各地間 的距離 |
| 劉官屯 | 一，六二四 | — | — |
| 楊松 | 一，四四三 | 二一·三 | 二一·三 |
| 江西皮頂 | 一，五二五 | 二六·三 | 五·〇 |

江西坡底 一，二二〇 二九·七 三·四

炒米舖河 一，一九九 三八·五 八·八

罐子窰 一，四七三 四四·五 六·〇

鐵場 一，五八八 四八·三 三·八

河底 一，〇三三 六二·七 一四·四

花貢 一，一八〇 七一·二 八·五

毛口河西坡 一，二六八 八三·六 一二·四

毛口河 七一·一 九三·九 一〇·三

三王廟 一，七九四 一〇五·一 一一·二

郎岱縣 一，四三二 一一五·四 一〇·三

坡貢 一，二〇二 一四一·二 二五·八

黃巢樹 一，〇〇八 一五三·二 一二·〇

細看上面的兩個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地理知識。雲南東部是一個一，九〇〇公尺上下的高原；昆明的高度是一，八九二公尺，可以代表雲南東部的高原。貴陽的高度是一，〇九五公尺，可以代表貴州中部的高原。從昆明向東到平彝，經過的山不過二，〇〇〇公尺，所以路比較的好走。平彝的高度與昆明差不多。但是一過平彝經過兩道小山路就向下；亦資孔的高度不過一千七百多公尺，劉官屯剛過一千六百公尺但是路是逐漸向下的，還不十

分崎嶇。黃菓樹在貴州中部高原的西邊，高度是一，〇〇八公尺，與貴陽差不多。若是從劉官屯到黃菓樹，路也是逐漸低下去的，則一百公里，低下六百公尺，坡度並不能算陡。無奈劉官屯與黃菓樹之間，有三條很深的峽谷：在第一表上所看見的是（一）洒米河，（二）盤江，（三）北口。洒米河，北口都是北盤江的支谷。北盤江在鐵索橋這一處高度只有六百多公尺，洒米河，北口只有九百公尺。這三個峽谷的東西兩岸都是陡坡，成爲交通上絕大障礙。在第二表上所看見的是，（一）炒米舖河（河西也有個江西坡，但是與第一表的江西坡不有一條水中），（二）鐵場河，（三）毛口河。毛口河就是北盤江的上流，炒米舖河和鐵場河都是牠的支谷。所以也是三條峽谷，兩岸也都是陡巖。在這種地形之下，要從雲南東部直接修一條鐵路，通到貴陽，事實上絕不可能。

我們又可以了解爲甚麼在貴州「地無三里平」的了。第一牠是一個高原，但是比西面的雲南東部高原要低八九百公尺；從高的高原向比較低的高原走，路當然不能平。第二貴州高原中間又有許多五百公尺到一千公尺深的峽谷。第三所謂高原並不是平原，中間處處都有邱陵起伏，地形極其複雜。中國舊圖上硬要把這種複雜的邱陵峽谷畫成

了長蛇式的山脈，無怪牠一無是處了。要是拿新驛道來與雍正七年前的舊驛道比較，還是新驛道的路好走，因爲新驛道雖然也有三個大峽谷，兩岸的坡度，除去毛口河到三王廟一段之外，都比舊驛道的洒米河，鐵索橋，北口三處的峭壁要平。所以路雖然要遠到六十里，還是值得繞越；鄂爾泰把驛道改到毛口河，郎岱，還是不錯的。

●人無三兩銀——貴州人吃鹽的方法

我是生長在揚子江下游的北岸的。沒有到歐洲去以前，曾經到江南去過。從小就聽見說江南是中國的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我並不覺得江南有甚麼好處，尤其不知道爲甚麼蘇州可以代表天堂。到了歐洲以後，更覺得蘇州的六尺寬的石板路，弓背式的石橋，滿河的臭水，和滿街的馬桶是人間的地獄。等到我坐滇越鐵路到雲南，看見河口到蒙自的路，在高山峽谷裏面走，幾十里沒有人煙，而且火車裏頭二等都沒有客人，三等裡也不過三四個人。所有的中國旅客都在四等車裡面，我漸漸感覺到江南的好處。從昆明出發向貴州走，經過頭一個城是馬龍州，城是土牆砌的，城裏不過幾百口人。我更知道雲南不是個「好地方」。但是雲南雖然是一個邱陵起伏的高

原，中間還有許多「壩子」——西南人叫山中間的平原爲「壩子」。如昆明壩子，曲靖壩子，中間滿是水田，二里一個村，三里一個場，好像沙漠中的水草，還有幾分江南的風景。一到了貴州境內，連這種壩子都沒有了。每天所看見的，不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沒有水，沒有土，沒有樹，沒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峽谷，兩岸一上一下，都是幾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峽谷的支谷裏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幾處村落。所謂城市都在這種比較淺而寬的峽谷裏面，例如貴陽；或是比較大的古落水塘中間，例如安順。從雲貴交界的亦資孔驛起，到沅江上游航路終點的鎮遠止，一千里路，經過郎岱，鎮寧，安順，安平，清鎮，貴陽，龍里，貴定，清平，施秉，黃平，鎮遠十二個州縣，人口過一萬以上的只有貴陽，安順兩縣。如黃平，清平號稱爲州縣，人口還不到一千。沿途的鎮市村落，沒有過一百戶的。統計路線所經過的一千里路，自西到東，穿過全省，路邊上的居民，一共不到十六萬人，若是除去貴陽，安順兩個大城，其餘的不過四萬多人！

田地人口如此的少，省政府的收入當然很是有限——在前清時代，貴州全省的田賦不到一百萬兩，不過抵上江南的一個大縣。農產本來極少，而且因爲「地無三里平」的

原故，通省沒有車輪子的影子。除去靠湖南邊境，有幾條河，能勉強通小民船之外，一切的運輸不是人背，就是馬駝。當我第一次到貴州的時候，人工還很便宜，每一百斤的貨物，運一天的路，運費只要兩角多錢。在當日貴州生活狀況之下，除了鴉片之外，農產物已經絕對不能外運。農產物之外，只有少數的木材，硃砂，水銀，運出湖南。然而有兩件必需品，貴州不產，非向外省運來不可：第一是食鹽，第二是棉花。由這一點看起來，貴州連雲南都比不上；因爲雲南本省有鹽井，鹽比較的便宜。棉花也得向外面去買，但是雲南每年產一百萬兩的銅，一千多萬兩的錫，都銷到外省，所以省的貿易還是出超。貴州則幾乎一無所有。要吃鹽，穿衣服，唯一的辦法，是把貴州的鴉片運出去交換。但是宣統三年的時候，禁烟是極嚴厲的。沒有鴉片出口，食鹽棉花都發生了問題。所以「人無三兩銀」的話，在我第一次到貴州的時候，尤其是有目共觀的事實。

最足以使得我永久不忘的，是貴州勞動階級吃鹽的辦法。我一到了貴州境內，就只見辣子，少看見鹽粑（四川來的成塊的鹽叫做鹽粑）。大路邊的飯餚子，棹上所陳列的是，白米飯，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裏面都沒有

一顆一粒鹽屑，另外有一隻碗裏面放一塊很小的鹽把。吃飯的人，吃得淡了，倒幾滴水在這碗裡，然後把這幾滴鹽水倒在飯菜裏，得一點鹹味。我從兩頭河到楊松的時候，在半路上「打尖」。一個夫子喊道，「老板娘！拿點水來放在鹽碗裏」。一個五十多歲老婦人走了出來，慢慢的說道「鹽碗裡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們嫌淡，拿起來放在嘴裏呷就好了」。果然那個夫子照她的話把那塊鹽拿起來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見這一塊鹽在九個夫子的口裏各進出了一次！

我以後把這一段故事告訴我的亡友遵義人寔季常。

他說，「你真是少見多怪了。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纔真正可以代表我們貴州人吃鹽的方法。有一家人家，父子三個一棹吃飯。父親把一塊鹽高高的掛在棹子當中。對他的兩個兒子說道，「你們覺得淡的時候，吃三口飯，看一看鹽，就可以過癮了，不必吃鹽」。等了一會，他的大兒子叫道，「父親，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鹽！」「你聽他去罷。他不懂得事，等他鹹死！」

我聽了這個故事以後，只好向他苦笑道，「謝謝上帝！我沒有生在你們貴州！」

| 目價告廣刊本 | | | | |
|--------|-----|-----|------|------|
| 八分一 | 四分一 | 半頁 | 全頁 | 尺寸地位 |
| 四元 | 七元 | 十三元 | 二十五元 | 內前封面 |
| 四元 | 七元 | 十三元 | 二十五元 | 外後封面 |
| 三元 | 五元 | 十元 | 二十元 | 內後封面 |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注意

本刊第一號再版，現已出刊，惟因印刷關係，印書不多，而訂閱待讀者，復大有人在，凡愛讀諸君，固宜從速訂購，以免向隅；但其餘第二至第五各期亦存書無多，尤宜捷足，蓋俟再版，又須勞久待矣！

本刊已出各號的要目：

第一號

引言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
憲政問題
上海戰事的結束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日本人如何取得的鐵礦砂
中國的包工制

丁文江
胡適
適之
蔣廷黻
翁文灝
馮然

第二號

日本的新內閣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日本的財政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書評)
庚款與教育(通信)

丁文江
姚森
丁文江
吳憲
叔永

第三號

廢止內戰大同盟
郵政罷工感言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黨化教育是不可能的嗎？
志摩日記的一頁

胡適
孟真
丁文江
翁文灝
叔永
徐志摩

第四號

監察院與汪精衛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停付庚款事件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定縣見聞雜錄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孟真
蔣廷黻
叔永
翁文灝
濤鳴
楊振聲

第五號

論對日外交方針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建設與計畫
漫遊散記(一)
赤色麵包(新書介紹)

胡適
孟真
詠霓
丁文江
衡哲

歡迎與代售
訂閱

時代公論

第十二號六月十七日出版

時事 朝發金陵 (鳴)
述評 暮宿金城 (易)
國民黨的出路 赫赫兩件怪事 (易)
怎樣剿匪？ 薩孟武
中國青年與青年中國 郭壽華
再說「青年的出路問題」 張其昀
什麼是汎繁主義的教育？ 潘其光
羅廷光
憶經濟學大家李特教授
讀近代詩(二) 樓桐孫
白娘娘(五幕劇) 王辟疆
(讀者論壇) 論政治領袖與羣衆 顧一樵
致陳果夫先生商 章之鴻
通訊 教育改革意見書 程其保
打破虛偽粉飾 黃天任

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 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

周炳琳

從軍記

盛成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通信)

何容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
十期，連郵費
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
加郵費一元六
角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瓊州 |
| 北平圖書館 | 天津書局 | 上海開明大學(代定) | 南京亞東圖書館(代定) | 西安時代公論社 | 蘭州花牌樓書店 | 武封甘肅書報社 | 開封新生命書報社 | 安慶華新報社 | 無錫秋水書局 | 青島千鍾書局 | 濟南中華書局 | 廣州神州國光社 | 瓊州海口會文書局 |
| 琉璃廠東亞 | 文齋(代定) | 大生書局 | 現代書局 | 中央書局 | 正中央書局 | 統一派報所 | 和平報社 | 和報社 | 各大學書局 | 西里商場 | 富文齋 | 現書 | 現書 |

獨立評論

第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日出版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這一兩個星期裏，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 ○ ○ ○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閉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用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

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閑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捋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

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已，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喜愛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餬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

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 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爲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爲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會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

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綫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41），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生物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在生物體中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生物，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牠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

選擇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二十一，六，二十七夜。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

周炳琳

顧維鈞氏到京向政府報告參加國聯調查團調查東北經過情形後，即被邀偕行政院長汪精衛外交部長羅文幹等赴

尋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會晤于廬山，議商今後政治大計，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殆屬于對日新方針之確立。廬山會議後返京，汪羅顧諸氏復來平。在辭職中之宋子文氏亦於此時打銷辭意，與諸氏俱來。四氏到平後，連日在行動與談話上表示，令人判明其任務側重在外交問題。因國聯調查團不久即東渡，故先與該團交換意見。聞已有兩次之會見。同時，羅文幹氏對新聞記者表示，外交宜求之在己，不宜依賴他人。

可知對日問題近來已在急轉直下中，政府當局已在抖擻精神以應付此危艱之局。吾儕見此，不但解除了南京將有政變之疑慮，并敢信對日外交僵局將從此開始被打破。

惟所謂「求之在己」，此時雖未便追問究有何具體方案，應已在確定其方向中。據本日北平晨報載汪精衛氏對各記者詢問各點之答復，中有「……抵制日貨，非因滬事而起，實因東北問題而生。此事人民有自由權利，政府既不能干涉，亦不便干涉。關外義勇軍亦應加接濟。此可為諸君告者。」幾句話。特別提及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自然不見得便是說我們的新方針定後專賴這兩種方法來運用，但如果在不久之將來政府無其他宣示或行動足以証實此「求之在己」之說話，我恐怕人民將疑政府本就沒

有新方針，只是一時興奮，隨便說說而已。

至少在表面上，政府還沒有已經確定的新方針。但最近羅外長對記者說過：「現在我國雖未對外宣戰，而實際已陷于戰事外交。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而已。我們決定根據原來精神前進，設法謀一出路。」他又說：「去年九月到十二月間，國聯議決日軍應退至南滿附屬地，而日軍反進攻黑龍江。今年三月，國聯議決上海撤兵，其結果適相反。而所謂九國非戰公約及五國照會，最後之效力又將如何？上海方面因抵抗之故，藍博森詹森等乃得調停簽字撤兵協定。故無論至何地方，完全在自己靠自己。」從這幾句話看起來，又似乎外交當局確有了深刻的認識與強固的決心，並非一時興奮，隨便說說。

○ ○ ○ ○ ○

在此彷彿已經有了對日新方針，而又若尚未作較具體的決定之當口，此新方針之實質究應如何始能收不喪權辱國之實效，乃一極關重要之問題。依我個人所見，確定此新方針應着眼于下面幾點：

- 第一，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收振奮關內外民氣之效。
- 第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轉變國際視聽，增強國際

間對滿洲事變之注意。

第三，此新方針之實行，其本身應能稍抑制日本之野心。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南方受刺激較深，故民氣亦較激昂。自一二八事變轉移了全國人之視線到上海後，東北事件之深刻映象逐漸磨滅。自上海撤兵協定成立後，南方民氣亦逐漸銷沉。到了今日，關內已無復民氣可言。關外在日本軍閥運用傀儡政府橫施壓迫之下，民衆之憤慨蓄而未宣，其潛力本甚大。但若關內不爲援救，久之亦將轉生失望。因爲但見敵與賊壓力日增，未見同胞奮臂興起，結果亦惟飲泣吞聲，消失其抵抗力而已。故在今日，若非全國一致作有組織的動作，足以重振關內民氣，維繫關外人心，東北失地決無收復之望。汪精衛氏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抵制日貨與接濟關外義勇軍，殆已有怵于民氣銷沉，國將淪亡之大禍。但不在整個緊張的空氣籠罩之下，抵制日貨只是國人之無組織的極散漫的動作而已，其效力甚微。證諸歷次抵貨運動一遇空氣稍緩和即弛懈下去，應知信有是理。無整個的聯絡與指揮，而徒給予零星的接濟，關外義勇軍亦終將因勢力分散而處處受挫。此二事在民

氣已振奮起來，并有一種舉動使此振奮的空氣瀰漫于全國之時，行之始有效。並非由此二事之實行即能振奮民氣。其間因果關係不可倒置。

日本軍閥乘世界經濟凋弊，西洋列強方全力于本身及彼此間矛盾之解除之時，謀攫奪滿洲，國際間對此非不重視。但因不能分心力到此，故取延宕主義，冀由時日之假與徐謀傳統的對華勢力平衡政策之保持。日本軍閥亦知時間要素在其併吞滿洲之計畫中有戰略上的價值，故邇來於經營滿洲極其激進。事已如此，中國欲以一國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自然是萬無此力。不能不引他國力量相助。但他國力量適在此時不能東顧，若中國自己不能掙扎一下，勢將立遭摧毀。故時間要素在中國之抵制日本中亦有戰略上的價值。不寧惟是，中國若真能在此時掙扎一下，必且在轉移視聽中促起西洋列強對遠東事態注意力之尖銳化，而縮短其延宕時間。國聯調查團將提出之報告書當然全是理智的，欲其憑此而採取行動，尙須授以情感的推動。中國若能於此時奮發對付強敵，對於世界人類之情感自必有大刺激。故此時必須有一種舉動，其實行能轉移世人耳目，增強國際間對於遠東危機之注意力。政府當局對於此點似亦有了相當的認識。若是不然，何以維外長告訴記者，

上海因抵抗之故乃得藍博森暨詹森調停成立撤兵協定？

，不能不少抑其野心。

時機迫矣，即不從取攻勢以求對日整個問題出路之打

○ ○ ○ ○ ○

出設想，自亦當取守勢爲此整個問題之解決預留迴翔之餘地。日方現正併力吞滿洲，正是稍縱即逝之時。若我方不於此時積極行動使形成相持之勢，等到日本實行吞併滿洲或毫不掩飾的運用傀儡政府，我們豈尙能自救，國際間制裁豈尙能施用？不寧惟是，在戰略上日本必更進一步利用傀儡政府侵入關內，得勢則逐步推進，被阻亦足成屏蔽，在此屏蔽之後積極經營，正好遂其大欲。山海關方面爲何近來益復緊張？此中線索可玩味得之。故羅文幹氏謂山海關問題關係東北全部，不僅是山海關一地之問題，實具卓見。在此嚴重情勢之下，我們惟有突進始得保關內，惟有突進始能救東北。非如此不能成相持之勢，爲時間一要素留地步；非如此不能稍抑日本之野心。日閥以迅速成功爲利，我方以成相持之局爲利。相持之局成，日方財政將益陷窘境，日閥之聲譽將趨低落，日本社會將有解體之虞；日本將畢竟少斂其蠻橫，少恢復其理性。上海因抵抗之故，未完全爲城下之盟，固由于經此而國際間視聽爲之轉移，國際調解發生相當效力，然大半還是因爲日閥受了重創

依我個人所見，對日新方針中應有討伐偽國一着爲其主要部分。我們本應早有討伐偽國一舉，目前政府似在隱約中捉摸新方針，汪羅二氏談話中又似表示其對於此舉有相當的認識，故不妨在此明白說出來。自然，此事是下決心求自救，要有相當的準備與組織。同時，對偽國與對日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爲何要討伐偽國？也無庸再申說其理由了。

最近天津大公報社，與胡適之先生在本評論（第五期中），都有文論對日外交方針。其着眼都在對日問題最後解決中我們應持之態度。胡先生佩服大公報之有膽量，敢說平允的負責任的話。我亦佩服胡先生之始終不搖動其「智識上之誠實」。但我覺得中日間糾紛之最後解決誠非持如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所主張之純理性的態度不可，此情也，勢也。只可惜日本軍閥一味蠻強，根本不講理性，即令吾國外交當局依大公報社與胡先生指出之途徑，未必定有把握能使日本軍閥踏入同一平面以解決中日間整個糾紛。

廿一，六，二十夜。

從軍記

盛成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圍着一張圓桌子，垂頭喪氣，如同家裡死了父母一般，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悲鴻也不畫畫了，次彭也不寫劇了，濟昌也不出診了；唯有我，將桌子一拍，叫道：「我走了！……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的希望，在十九路軍之敗，不在十九路軍之勝！……」這恐怕就是國聯特委會開會的前一天晚上，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的晚上！

三月十六日下午我就乘平浦車南下。當時送行者，有悲鴻及同學多人。同車者，有左舜生王浩。車中談了不少國事，而他們都說沒有辦法。十八日到京，見了我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他對我說「要打！」又見了十九路軍的領袖陳真如先生，他叫我到前方去看看。這可說是我從戎的開始。

二十一日，我就搭法國參贊的專車，到前方去了。當晚，車停蘇州站，夜半宿在車中。寒山寺有華僑義勇軍駐紮，鐘聲是聽不到的。第二天早上，見着美國參贊。他的

階級，雖比法國參贊小，他的態度，却比法國參贊好。正午，車抵正儀站，我同鄒參謀下車，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自從真茹退出，就駐在正儀）。他去請示，是否帶法參贊，到前綫去。我去送禮，將凱馬爾送我的肖像，轉贈把蔡廷楷將軍。并請求入伍。蔡將軍適在蘇州博習醫院休養，未能見面。

總部不讓法參贊去前綫。因為大家懷疑他，實在他那種半拿翁半婦人的態度，令我都懷疑他後面有鬼。商之至再，我們陪他一同到太倉去視察前綫。由總部交通處預備了一隻小火輪。我們由崑山下車，乘船去太倉。在前方服務的童子軍以及交通處唐處長都來接我們。冒看唐處長，到有一點像李石曾，不過唐處長，帶的是軍帽。

兩個童子軍，兩個兵，陪我們到太倉去。一個童子軍，是雲南人，他來前方服務，已經一個多月了。另一個能說法國話，他曾在上海法文學堂念過書的。這位法國參贊，就想在他嘴裏套實話，這個孩子，調皮得狠！他怕他是偵探對他談戰事的經過，日本人怕死。兩個兵不是廣東人

，是山東人，從前都是在張發奎部下。

船到了太倉，軍士排隊來歡迎法參贊。進城，經過三月四日日本飛機炸毀的兩座樓房。破瓦搖椽，特立在城市中心！太倉縣長趙恩鉅，是我朋友趙壽人的姪兒。壽人回國的時候，他的通信地址，是上海趙恩鉅轉的。忽然想起此事，前方談到故人，格外的親熱！趙縣長就留我住在太倉。同時他介紹我張團長吳營長。那個法國人，也很想同我一齊耽擱在太倉。總部不許可。假如日本人來進犯，我們不能負責。他狠羨慕我是一個中國人。

西洋鬼子去後，東洋鬼子來了。太倉逼近瀏河，由嘉定到太倉又有汽車大道。天天有日兵來犯，時時有機關槍與「三八四」大正十一年所造新式槍的小接觸。最痛快的一次，要算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我軍第六團與敵軍第五十聯隊在太倉朝陽門外新木橋附近接觸。霹靂之間，那些既笨且重又無經驗又不善跑的日本兵倒下了好幾個。日本人倒不還手，他們趕緊來搶死兵的屍首。我軍見他們來奪屍首，又開槍，又打死了幾個。我軍奪回敵屍二名。一名武田利久，一名北澤竹一。同時奪回許多戰利品：鎗彈，軍裝，種種。在日兵屍內，搜出符咒多件。上書有「武運長久御守」「御守護」「正位松尾稻荷御守」「陣中守護

黑本尊御影」「南無妙法蓮華……」「撿拾撿擻」等等。上畫有神像，佛像。兩三角交叉之五角，米字形的雙十交叉等等。千奇百怪，迷信之至！

張團長君嵩，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的團長，也就是閩北最先抵抗，吳淞最後退出的張團長。他有二十多天不會睡覺，喜歡與日本人在槍林彈雨中來週旋。吳營長履遜是第六團第三營的營長。駐在太倉東門外。少年英俊。他要機關槍，就到日本人那裏去拿，他取回了「三八四」，沒有子彈；他說後頭沒有，前面藏的很多；不要怕，你們跟我取去些來！

我同一張一吳，談了三天。他們教我去見翁旅長。他們說：「我們十九路軍，只有翁旅長。你不可不去看他。并且我們希望你不要離開了十九路軍。」第二天，那個法國人又來了。遂帶了他出東門去看看。東洋人見了西洋人，也不客氣起來開了許多槍。法參贊駭得面白如紙，真是個白色人種！他跪在地上，好像祈禱上帝一般。我們動也不動。回城之後，他反說，這槍好像是中國兵開的，專為來駭他的！

三月二十四日，我離了太倉，去唯亭看翁旅長。過崑山，路上行的，都是軍人。聽說四十七師來時搶，八十七

師八十八師退時也搶。我在浴堂，得識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百二十一旅的旅長張勵安徽人。

第二天，我見了翁旅長。他駐在距離唯亭北六里許的肖涇村。他的旅部，藏在竹林深處。我到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和人謙禮。他不肯收慰勞品。你去我來，那巨人的長影，逛來逛去，這就是崧口英雄翁旅長麼？

翁旅長名照垣，是一個怪傑。他見了我的時候，也不會說話，他說：「好了，你就住在此地吧。」我們分頭進行：「你有沒有決心？」我就住下了。他不說話，我也不說話。你研究我，我研究你。

軍中的生活就起頭了。我住在一間村屋裏。一早即起身，八時早餐。下午四時晚餐，一天吃兩頓飯。在這個期間，我曾請假幾天，回家葬我的慈母。四月十日，我又回前方。翁旅長給我三十塊錢叫我到蘇州去做軍衣。一天就做好了。我於是乎武裝起來。翁旅長給我一根武裝袋子。我出進的時候，衛兵也向我行起禮來了。

當時，有許多我勇軍，附屬於一百五十六旅，翁旅長同我討論訓練義勇軍的方法。他的意思，想叫我做政治部主任。並且說政治部的權限，在軍事之上。義勇軍好比憲兵，能管軍隊的。有一天晚上，我同副官長，騎馬到唯亭

上海各大學義勇軍去訓話。大家非常歡迎！後來我又到鐵血軍去訓話，結果都不錯。

翁旅長因想恢復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令我到南京巡練總監部去備案。四月十六日晚間，他與我在月下竹林中比肩閒步，談了一夕話。十八日早，到京見陳真如。我那次見他行軍禮。他狠發怪。他上次見我之後，曾有信給我說：「茲擬具介紹函，并派陳德光送先生，往十九路軍見名將領。敬希先生盡情指導。如軍中未便展懷抱，請回京，俾得承教為幸！」他的介紹函，我不曾用着，陳德光先生，我不曾見着，十九路軍的名將領，我不要見；我狠願同下級軍官與士兵在一處，請他們盡情來指導我，這次回京，却拿來一張早文，要請他幫忙恢復軍政部所取消的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訓練處。我藉了這個機會，向李任潮行了幾個軍禮。請他將訓練處快快批准了。可是款子無着，我又見了朱子橋將軍。那時他正在南京。

四月二十四早起，辭別了朱將軍，回唯亭。在車站遇着了翁旅長，報告一切經過，同回旅部。旅部已由肖涇村遷入鎮內區公所。政治部在旅部隔壁民房中成立。上海各大學義勇軍駐唯亭鎮中心小學，上海市義勇軍，駐城隍廟。南京鐵血義勇軍，駐下塘米棧。醫務處在民衆教育館

。每日五時起身，五時半上操，日間工作。在各隊部調出同志來，作政治工作。政治部，分：教育，設計，社會，編纂，四科。政治部工作，注重在識字運動。并擬請陶知行湯茂如俞慶棠高踐四諸先生來，主持此項運動。社會科分宣傳與組織兩股。其目的在使軍民一致團結起來。五月一日下午四時，在唯亭中心小學，開識字運動籌備委員會。出席者有翁旅長唯亭王區長公安局長，農會長，商會長，維持會，民衆教育館，各團體代表，及無錫民衆教育學院俞慶棠先生。

五月四日，開唯亭民衆大會。情勢極其緊張！因明日即中日協定在上海公布簽字之期。當時全場大聲疾呼「打倒某某某！」打倒賣國賊之聲浪，大半從農民與市民口中吐出來。而這個大會的影響，使我們一切政治工作，立時停止，七十八師調往後方的消息傳到了。政治部因改爲組織科。

可是軍民合作的唯亭公共體育場以及唯亭公園，皆落成了。蘇崑路也在那裏繼續的築下去。還有那些軍民合作而成的戰壕，也可以說是現代新民族合力同心的大建築！

五月十七日，我病了。張醫官來代我打注射針。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偕同翁旅長及丘參謀長來看我的病。同時

談了許多關於義大利的莫梭利尼以及土耳其的凱馬爾。第二天調防無錫。我以爲我的任務，已告一段落，向翁旅長求去，仍回北大教書。翁旅長說：「不好，義勇軍結束了，你再回去不遲」。軍中是不能隨便進退的。軍隊開拔之前，翁旅長即招呼大家，將老百姓的東西交還了，再走。駐的地方，洒掃乾淨了再走。一齊整隊到車站。唯亭民衆全來送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九路軍萬歲！」我帶領了武裝同志，回答他們道：「軍民一致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唯亭民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十八日下午一五六旅，到無錫。旅部，駐惠山楊公祠。第六團團部駐第二泉。義勇軍駐至德祠，廉祠，張祠，鄒宗祠，黃家祠。二十日下午，偕翁旅長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去參觀。高踐四院長翁旅長向學生演講閩北與吳淞二役的當時情景。翁旅長說：「我們十九路軍，自從江西出來以後，就抱定了宗旨，不參加軍閥混爭的內戰。當時的口號，是將槍口向外。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全路軍官，莫不以抗日爲職志。當時七十八師警備松廬。一五五旅駐龍華南市北新涇和真茹一帶。敵旅（一五六）擔任閩北與吳淞一帶的警戒。當時倭寇猖獗異常！上海市政府已經

接受日牒，限本軍當晚撤退。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來要求抵抗，并對我說守土有責，不能撤退的一番話。我答復了他們：『軍人的天職我是知道的！』晚六時中央派憲兵第六團來接防的時候，我說：『今天晚了，明天再來吧！』他們走後我召集軍官訓話，激勵了他們一番。到了夜十點鐘，忽然聽見日本兵吹集合前進的信號。那時張團長吳營長丘參謀長一齊都在旅部裡。我們在日本很久，所以深知這信號的意義。我立刻就下命令叫各隊去目的地。同時報告師長當時情形。十一時三十分，日軍陸戰隊六千餘人，在野軍人三千餘人，由鹽澤指揮，以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向我第六團防線猛衝。右自虬江路口沿寶山路寶源路橫濱路，左至青雲路等處。放火燒商店，手榴彈從屋頂落下，同時鐵甲車裝甲車，掩護步兵向我進攻。我軍沉着應戰，毀鐵甲車六輛。然後肉搏衝鋒，將敵完全擊退！倭奴不支大敗。要求停戰。我軍氣極盛！誰願意和他停戰！廿九日又打他一個痛快！這是第一次閘北之役。二月四日，吳淞方面吃緊。敵軍集中海陸空軍猛烈的炮火，多量的轟炸，掩護步兵渡河，想佔領我吳淞炮台。台上官兵逃走了！那時我奉了總指揮部的命令，率第四團兵死力抵抗。七日，敵又來攻。鐵甲車十四架掩護步兵千餘人，由軍工路

向吳淞前進，被我第四團第三營迎頭痛擊，敵不支退了。二月八日蘆藻濱之役，是非常奇怪的戰事。五六旅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趙金聲以一連之兵，抗敵一營之衆，血戰經日，倭寇大敗而逃。奪獲戰利品很多。可惜趙連長於二十一日陣亡於吳淞，他是你們貴省泰興縣人，曾畢業於南洋中學。二十一日，那天，敵機多架來炸吳淞。同時放火。敵聲徹夜不絕，對面談話都聽不到。敵人一見煙火即開炮轟擊，陣地隨築隨毀，敵艦五艘會同飛機，轟炸炮台。我們不能還擊，因為看不見描不準目標，被敵人煙幕彈迷蔽住了。而且我們發去一炮，要受回來十炮。我們的炮，是李鴻章時代的炮，人家的炮是歐戰後的炮。我們遂停止用炮還擊。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上游來敵艦四艘，南來五艘；又向我炮台射擊。歷三小時，炮台完全被毀。敵人以為我軍盡沒，大舉前進，被我忠勇將士，從轟不毀的戰壕中衝出反攻。一當百，百當萬；槍彈完了用刀，刀折了用手，手斷了用牙，打得倭奴血花流水，奪獲戰利品極多。俘獲敵八師團營長一名，軍旗數面，機關槍，步槍極多！極多！此次我軍戰略，非常奇異，陣地成蜂巢式，以備死守。敵人前進的時候，就被我忠勇戰士撲滅。後來，我奉令由吳淞退出。這是三月三日，我們孤軍由吳淞繞道嘉定，

直迫瀏河，與敵激戰。敵人驚奇，不可言狀。至此敵軍不敢越雷池一步。』翁旅長最後的結論說，『我們所有的是氣，我們所沒有的是器，假如這次我們與敵人換了武器，再來交手，那最後之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後來我問他何以抵抗的。他說：『當我到土耳其新京安柯納的時候，我想這麼個土耳其，尚且能抵抗！將來我們中國的希望，一定是無窮的！這次在閩北，我回想到安柯納。』丘參謀長對我談到游擊戰術。什麼叫做化零爲整，什麼叫做化整爲零。十九路軍的兵士，至少要能爬山跑路。集合令下的時候，一個，十個，百個，千個，一齊集合起來。處處都看見來的是人。巷戰的時候，房子裡，屋頂上，窗洞口，地道間，處處出來的都是人。解散令下了之後，一個人也不見了。蔡軍長招新兵的時候。問話：『你會跑嗎？你會摔手溜彈嗎？你會描準嗎？』合了他這三個條件：不問他操法好不好，就是一個好弟兄。

有一天，我同一位弟兄，談起這次戰事。並且談到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以及王賡的獨立旅。他說：『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到前線後，擔任左翼軍，王賡獨立旅隨七十八師於十二日即參加作戰。第五軍綽號『御林軍』，鎗械服裝非常燦爛。同我們『花子軍』真是比不得。他們可惜沒有作

戰的經驗。作戰的時候，老兵帶新兵，一鼓愛國的勇氣，向前與炮火交戰。三月二十二日那天，廟行鎮之役，八十八師右翼，被敵人衝破。八十八師自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一直到二十三日，陣地破壞得不堪，官兵死亡又極多，旅長受傷，營長陣亡，傷殘太甚，敵人探知我軍的弱點，在小場廟與廟行鎮間，施行極劇烈的猛攻。王賡獨立旅陣地動搖，傷亡甚大。由十九軍六十一師七十八師，先後往援。敵受大創而退，敵死傷近萬人。遂增加四個師團作戰。（第十一，十四，第一，十六）第四個司令白川來了。復行向我左翼軍，施行極猛烈之轟擊。三月一日十二時左右，八十八師正面，被敵攻破，敵人乘隙而入。又瀏河以西，楊林口七了口一帶，有敵軍十一師團登陸，八十七師抵抗不住。正面作戰部隊，又不得不抽調趕赴瀏河迎擊。敵人死力突擊正面。支持至晚，八十八師正面，又被敵突破。援軍四十七師，在後方不肯前進，反而搶起來了。爲避免全線被敵包圍起見，所以退到第二道防線」。

因此我做了一付輓聯，輓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雖說勝而敗，終嘗敗而勝！與其生中死，不若死中生！』五月二十日，蘇州追悼大會，可說極一時之慷慨。此次十九路軍陣亡將士之統計：（根據追悼會刊）六十師官佐二十九員。

(內營長一員) 士兵三百五十名。六十一師官佐四十四員。(內營長一員) 士兵七百六十四名。又生死不明失蹤士兵一百三十一名。七十八師官佐四十六員。黃旅三十三員。(內營長一員) 翁旅十三員。兵士一千一百七十人。黃翁各半數。又十九路軍補充團官佐一人。士兵十七名。及隨營義勇軍死難烈士十六人。第五軍未詳。十九軍方面，共死兩千五百多人。

另外受傷的六千多人，根據上海管理傷兵委員會的統計：受傷一處者，百分之四十一。受傷二處者，百分之三十。受傷三處者，百分之十七。受傷三處以上者，百分之十二。又傷頭部者，百分之二十。傷手部者，百分之三十。傷脚部者，百分之二十。傷軀部者，百分之三十。又子彈從正面射入者，百分之八十五。從側面射入者，百分之十。從後面射入者，百分之五。又中達姆達姆彈死者，百分之六十三。——這個數目，不可不記得，這是國際公法的統計。——中炸彈死者，百分之十一。中普通彈死者，百分之九。

十九路軍奉調入閩，義勇軍之訓練團經費無出，提前

辦結束。三月來的經費，完全由賺五元一月的士兵，捐了三元，來維持的。我偕翁旅長到京，見陳部長真如，又獨往滬，見朱子橋將軍。似辦得具體辦法。六月十日義勇軍在無錫教育學院行畢業典禮。蔡軍長沈師長區師長均親蒞會，儀式極其隆重。同時舉行閱兵。還有一部決心到東北去的義勇軍，仍留在十九路軍。一部決心去學飛機及製造槍炮，——女同志很多——隨翁旅長到福建去！

這次，我去前方，共時三個月。這三個月之中，是我進了社會研究院去讀書。我現在能不能畢業，就看新的環境能不能讓我畢業。然而中國的希望是無窮的。何以故呢？救國必先起信。凱馬爾有達爾達賴爾及西瓦斯之起信，遂有東路毗南兒之偉功。翁照垣有安柯納之起信，遂有北吳淞之抵抗。黃帝子孫今日當有十九路軍之起信，中國前途必有無窮之希望！因為「信」這個東西，是原動力的原動力！沒有信，地大不大，物博不博，人多不多，萬人萬義，無共同之單位，有希望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的結論說：「救國起信！中國民族，在一切其他民族之上，它的希望是無窮盡的！」

北平 六月二十三日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當楊端六先生在國難會議提議，『如期結束訓政，』並於憲政實施以前先設『中央民意機關』的時候，凡連署他的提案，或在會場中贊成通過他的提案的人們，對於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都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當他們考慮這問題的時候，並沒有把自己認作『政府派，』就糊亂地贊成此案；更不敢因自己不在政府裏任事，便對於實施憲政的主要條件一概不問，主張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我們不能認贊成此案的人都是『政府派。』老實說，政府中人未必都贊成此案，也未必人人都認清此案重大的意義。現在把他們贊成如期結束訓政的理由，約略述在下面。

(一)什麼叫做『如期結束訓政？』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聲明：『過去十七年間，本黨經歷軍政時期，負建國大責，其主要工作為掃除政治上之軍閥官僚及社會上之一切障礙；今後本黨入於訓政時期，受治國之重託：……實行治法於全國……培養政權所賴以行使之國民。』根

據這個決議案，訓政時期實於民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又同年六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通過訓政時期之規定案，內稱『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廿七日以前完成訓政工作。有人說，建國大綱規定訓政六年，國民政府已成立五年，所以訓政應於明年結束；有人說，訓政時期尚有四年，都是意揣之辭，沒有查過案卷的。建國大綱只規定：(一)『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該省憲政開始時期；(二)全國有過半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三)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依憲法舉行大選舉，國民政府於選舉完畢後三個月解職，授政於民選之政府。在建國大綱裏找不出六年的期限來。

(二)我們所希望的憲政究竟怎樣？現在大家雖希望早日實施憲政，但對於憲政的內容，大家並沒有詳加討論。所以憲政實施的準備，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也沒有細細計算。我們暫且把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憲政，借來作我們

的標準。他說：世界各國最近百餘年來爭民權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權和被選權。我們所主張的民權和歐美不同。吾們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民權主義第四講）根本辦法，要把『權與能分開。』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使政權，政府行使治權。在人民方面，要有四個大權，就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方面要有五個權，就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如果我們接受中山先生的主張，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憲政是一種『全民政治，』真是『主權在民』或『由人民行使政權來管理政府的治權，』那末在實施憲政以前，必得使人民受行使政權的相當訓練。這種訓練的最低限度，應該包括（一）實施鄉村自治，給人民以實地練習行使四權的機會；（二）普及民衆教育，使人民個個識字，並略具公民常識。這兩件事體舉辦起來，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我們應該加以考慮。

（三）爲什麼不立即取消或提前結束訓政？因爲實施憲政以前，人民須受行使四權的訓練，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期間，從事準備。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先生，根據

他在無錫黃巷實施民衆教育所得經驗，明白告訴我們，要使一個鄉村的民衆，了解公民應盡的義務並不漠視自身應享的權利，至少非有三年以上的訓練不可。同時據教育界普通的估計，中國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尙不識字者不下二萬萬人。此二萬萬人既不識字，不但無法行使創制，複決諸權，就是選舉票也寫不來，怎能和憲政發生真切的關係。如果大多數民衆與憲政不發生關係，所有政權只從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裡，轉移到另一部分少數人的手裏，那裏算得真的全民政治！

有人說，中國十六歲以上的人雖然尙有二萬萬不識字。但國內已有八千萬識字的人。假若每個識字的人負責教三個不識字的，在最短時期內，就可使全國人民人人識字。這個意思，自然不差。不過識字的人多半住在城市裏，不識字的又多半住在鄉下。城裏的人不能天天下鄉去教學；鄉下的人也不能天天上城來求學。所以雖用全副力量，推行識字運動，從城市逐漸達到鄉村，三年之內至多使全國民衆百分之六七十識字。照蘇俄的經驗，一九二〇年全國有百分之三十一識字，至一九三〇年識字者增至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今後三年之內能否使全國人人識字尙屬問題。我國實行憲政，至少也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能够行

使政權才行。要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如何加工，非有三年以上的時間不可。我們限政府如期結束訓政，所定的期限已經非常的短促了。

(四)政府在今後三年內應負的責任如何？在過去的三年中間，循環不息的內戰，加上西北的旱災，南方的水患，弄得羣盜如毛，把農村經濟的基礎，破壞淨盡。政府的力量依然集中於用兵平內亂，對於訓政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好成績。此文的目的不在非難已往，而在督責將來。今後三年之內政府所負完成訓政的責任，不宜再行忽視。內政部對於促成鄉村自治，俾人民有實習行使政權的機會；教育部對於實施成年補習教育，使人民明瞭公民的權利義務，不再放棄應盡的責任；都應該規定日程，逐步進行。換一句話說，內政部的責任，在督促各省民政廳及縣長使全國鄉村都有精密的組織。教育部的責任在聯合各省教育廳及市縣教育局，努力推行識字運動及公民教育。最應注意的一點，就是專有組織，而無訓練，則一切組織，皆將官僚化，設些村長，區長不過等於增加幾個小官，轉使人民多一層隔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供給人民一種原動力，使他們自動地組織起來，共謀村的改進。前兩年訓政不見成效，就因專在紙上做工夫。上面只發通令，下面只

做工作報告，雖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於大多數民衆毫無影響。

現在國內大多數的人民，知識實在不夠，切實的訓政工作實在少不得。日前偶然與梁漱溟先生談到現在北方鄉間的婦女依然人人纏足，假若不訓練他們，使他們得到相當的知識，便給予投票之權，他們一定投票反對禁止纏足。纏足不過是一個例子，此外民衆應受訓練的地方正多着呢。民國十二年以前中國憲政的失敗，根本原因就是民衆缺乏訓練。今後真正的憲政能否實現，全看大多數民衆有無受訓練的機會。政府對於結束訓政，如有誠意，此時就該切實做些工作。人民如果真正希望憲政實現，也應該容許政府再有一些訓練民衆的時間。不過從前訓練民衆的方法不很切實，專從利害着想，不從教育入手；在民間樹怨極多，而積極的建設工作甚少；以後必須改絃更張，始能收效。此後三年的訓政成績，政府再不能不負責任了。

現在國內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對於民衆的態度可分三種。第一種是高談憲政，而對於訓練民衆的工作漠不關心。第二種對於民衆只知利誘威迫，驅使他們作消極的和破壞的工作，而不注重知識的培養和積極的建設。第三種則認明全民政治的基礎必須建築人民之知識上。若不從教

育下手作一些切實的預備工作，而空談民志，則其結果不成爲一種滑稽劇即成爲一種悲劇。『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中華民國成立已二十一年，而國基終於飄搖不定，憲政終於大多數人民不發生關係，徒見政權在少數人手裡轉移，弄到國力日益凋敝，到

處都像『積薪厝火』岌岌不可終日的樣子。其根本原因，都爲了民智不開，所以民權不能鞏固，我們覺得這不滿三年的真正訓政，是斷斷少不得的。大家督責政府切實做些訓練民衆的工作，替憲政立個比較可靠的基礎罷。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四號有濤鳴先生的「定縣見聞雜錄」一文，其中有幾點錯誤。

一，原文說：『城內有一條馬路，是平教會提倡修築的。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據車夫說，這馬路當初是很好的。不過近二三年來，定縣駐了許多的兵，他們用大車來運軍需，都是不走大車路而偏要走馬路，所以現在這一條路已經壞的不堪了。』按：定縣城內的馬路，原不止一條，不過有的因爲「路旁另外沒有大車路」，所以壞得更早，更不堪了。這馬路是否平教會所「提倡」的，我不知道其詳；我只知是去年春夏之交，吳縣長家駒任內，由縣政府用某項罰款「修築」的。修築的動機，據說是因爲那時

張副司令要想到定州去參觀平教會，所以加緊興工以便交通。這馬路修好以後，好事者會改總理遺教以贊之曰：『修治道路，以便交通；便交通，以妨碍民行。』因爲定縣的「民行」多用大車，而馬路是禁止大車通行的。其後大車解禁，馬路乃壞。自石友三戰敗後，定縣方面駐了許多的兵，於是連這條「路旁另外有一條大車路」的，也壞的不堪了。屈指算來，這馬路的壽命不過一年有零，那有「二三年來」？車夫「途說」，濤鳴先生「道聽」，自不免有此錯誤。

二，原文說：『農民用油極省。用油的法子，是用鐵絲穿過一個制錢的方孔，把牠鉤住，然後把錢放在油裏。用油的時候把錢拿出來，放在菜裏。』這段話頗似小說中

的描寫，而不像社會實況的記載。固然，『他們絕不肯把油從油瓶直接倒出來』；然而他們會用一個小小的油杓兒，把油間接的從油罐兒裡舀出來。以錢汲油的古怪法子，在街上挑挑兒賣老豆腐的還許用牠；當此制錢將絕跡的時代，牠絕不會普遍于一般農民的。

三，原文說：『南方人養豬，有的用廚房的廢物，沒有聽過用糞的。定縣人以糞養豬，無他，窮而已矣。』按：定縣人（同南方人一樣）養豬平時也是用廚房的廢物，而拌上些穀糠；到要殺牠的時候還給牠棒子或高粱碎兒粥吃。『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不算是以糞養豬；狗的食料，一部分也是人的糞，也不算是以糞養狗。至于『豬欄（應該說豬圈 412）和廁所往往是在一塊兒的』，

乃是因為豬圈是糞類匯集之所，而養豬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牠糞，以使諸糞調和；並不是為的『農民出恭的時候，他的豬就在旁邊等吃！』清季，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者見北方人的食料，一部分是麥，便大書特書的：『南人食米，北人食麥。』二十年後，濤鳴先生見北方豬的食料，一部分是人的糞，又好像要說『南豬食穀，北豬食糞。』（豈真是：『南方豬強於北方豬：』）

這些錯誤都無關國家大事；不過因為獨立評論是出版界有地位的刊物，深恐地理學家、民俗學家、生物學家，把它引入著作；尤恐數百年後的歷史學，考據家，據為典要，故書此以辯之。 何容敬上 六月二十三日

注意：本刊第一號再版，現已印成。

時代公論

第十三號 六月廿四日出版

| | |
|---------|-------------------------|
| 時事 | 教師節之日期………(昉) |
| 述評 | 教育經費獨立運動………(琇) |
| | 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達) |
| | 陳紹寬之辭職與海軍………(達) |
| 法政與救國 | 阮毅成……… |
| 憲政與救國 | 陳如玄……… |
| 論改革教育方案 | 傅築夫……… |
| | 柳詒徵……… |
| | 對陳委員果夫提『改革教育初步方案』的討論……… |
| | 中央大學經費獨立運動……… |
| | 從無錫到南京……… |
| | 白娘娘(五幕劇)……… |
| 通訊 | 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 |
| | 孫佐齊 平凡 楊公達……… |
| | 顧一樵 羅廷光 繆鳳林 雷震 楊公達……… |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昶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售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法德問題一勾

再論黨化教育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論鴉片公賣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漫游散記(三)

孟眞

叔永

適之

衡哲

蔣廷黻

丁文江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瓊州 |
| 北平圖書局 | 南開大學(代定) | 亞東圖書館(代定) | 時代公報社 | 花牌樓書店 | 甘肅書報社 | 新生報社 | 華新報社 | 秋水書店 | 安徽省立圖書館 | 千鍾書店 | 中華書局 | 東方書局 | 神州國光社 |
| 琉璃廠東亞 | 天津書局 | 大生書局 | 現代書局 | 中央書局 | 西北文化書 | 正中央書局 | 統一派報所 | 和平報社 | 各大學書 | 各大學書 | 各大學書 | 各大學書 | 各大學書 |

獨立評論

第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日出版

法德問題一勾

孟真

這個世界真正太不成事了，若干民族正在努力自掘墳墓！我們大中華民國一面拚命着自掘墳墓，一面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中準備着做倭人自掘墳墓的殉葬品，並且將間接的做歐洲若干國家自掘墳墓的殉葬品。法德問題恰是世界最大的墓地，「美的法蘭西」用其數百年來優越的兵力，經營世界的山陵，而遠在九重海外的我們，恐亦不免以我們之生趣像個藝術的作品，有陪葬昭陵之幸事。然則我們前星期看到洛桑會議之開門，本星期聽到胡佛總統之壯議，理當看做自己的事。

法德問題之擾攘，因此而生無數問題，以致世界蕭條，萬方多難者，原是古往今來的歷史中最大事件之一，不可徒以為是歐戰前數十年歐戰後數十年的一件大事或第一大事。我們放遠一看，歐洲歷史在若干意義之下，猶之中華歷史。中國歷史在甚早的時期中已有南北相爭之趨向，所謂五胡亂華，所謂突厥，回鶻，沙陀，所謂宋，遼，金，元，明，清的故事，一句話說來，即是黃河流域之政治重心，挾其文化及文化所付給之組織，與漠南北的牧族，

挾其風煉冰熔的原力，比比這世界到底是文勝武勝。所謂歐洲歷史，自羅馬拓土以來，無論是羅馬帝國時代，或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即日耳曼帝國），或拿破崙傳斯麥時代，雖若干封建的戰事，或民族的移動，使得我們覺得亂七八糟，而大意是在決鬥着，以求到底是南勝北勝。對法蘭西誠然不能一句話說她是南，因為她的民族最本一層是凱爾提，是西，而政治的組織反是承襲日耳曼之一的，或者竟可說是日耳曼之正支的。德意志又不是北，因為牠又有不可忽略的北人斯拉夫在後，而普魯士並非純粹的日耳曼。然若從政治的意義以看民族，則法承羅馬之統，德接日耳曼帝國之緒，是皎然明白的。然則我們若這麼一看豈不覺得一朝之開會與壯議，焉能解決兩千年的歷史趨勢呢？

不過，事實並不若此悲觀。近代的新經濟局勢一面予民族主義之發達一個最大的助力，同時予民族主義過分的發達一個最大的打擊。所謂「胡越一家」者，在近代經濟狀況下是平實的事實，不是感情的詩句。誠然，在古世中

世與近世的初年也有很大的國際貿易，也因貿易屢起戰爭，也因貿易權之消長成民族的廢興。不過當時的貿易究竟大多數是次要品的貿易，歷史的民族總是以農業或者牧立國的，且當時的平民地位大多比近世爲低，故平民生活所需，雖取自外國，而因統治者之不高興，也可取消。近代的國民經濟全然另是一個樣子，全世界成一個大分工，這一個分工雖因殖民地制成最不人道的現象，又因資本制本身之缺陷使得這分工未能全合理性的發展，然而大部分已全然成就了列國相依的經濟制度，所謂農業立國的國家，如澳洲，如加拿大，他們的農業正是他們的商品，所謂商業立國的國家，如英如德，他們商品正是他們的農產物，因爲他們吃這個爲生。這個現象，以後更要深刻化的，因爲十九世紀的工業佔國際上最重要位置者，還是所謂基本工業，例如英國之煤，布，機器，最近則若干次等工業都成國際的貿易重心，例如德國美國之若干科學作品，日本之賤貨。專靠基本工業之英國尚且一落千丈（看 Siegfried: England's Crisis）而自食其穀之農業國家尤無閉關之可能。照這形勢，國際分工是必然的事實，而更科學更經濟的分工尤爲「範疇的命令」。在此義支配之下，我們的富由於別人的富，別人的窮造成了我們的窮。一有國際戰爭

，只有敗者，沒有勝者，只有敗得較不顯著者，沒有不敗者。法國正是所謂戰勝之國。大戰後我在戰區外的法國旅行，看見一切退步的樣子，和法郎的落價，爲之心驚。當時龐加賽不會被法國人看做民族英雄，他的政黨和與黨遭一大失敗。（龐加賽後來的復興，另是一種反潮流，非歐戰後之直接現象。）上次的大戰已如此，以後的大戰將更甚。大戰前諾曼安琪兒做了一本書，叫做「大錯覺」（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以爲依國際經濟的關係，大戰是不可能的。大戰竟來了，似乎安琪兒自己成了一個「大錯覺」，然而試看戰後的結局，他的論斷何事不然？假如戰前的執政者，有安氏之見解，焉有今日之「大困境」。進一步說，二十世紀開頭以來，愈演愈深刻的困難，大體可由於一點看去，就是社會組織的文明之進步遠趕不上科學成就的文明之進步。因科學的成就，傳說的生活技術掃蕩落地，而社會組織的文明仍是史前時代，古代，羅馬法皇時代，封建時代，開殖民地以集資本時代，層層疊疊的混合。於是好比孺子持刀，猛虎傅翼，其技術的聰明賽過上帝，其政治的蠢笨等於豬狗。然則今日世界的大摩擦，只是傳統的部族主義，與新興的經濟觀點之不並立。如從傳統的部族主義，則世界的摩擦亦只有變本加厲的幹下去，而法

德鬥爭其一，如認清經濟的立點，則歷史劇大可只在劇場中演演而已。

法德問題正是此一意義下之最深切的例子！法德在歷史的意義上已是世仇，在經濟的意義上應是兄弟。法德的若干工業品是相依相成的，入耳之煤和阿爾撒斯之鐵更是相依爲命的，法德的合作尤是歐洲平康的基礎，歐洲平康更是法德富盛的基礎。清清楚楚的數目字指示兩國國人，奈何兩國的政治家盲然不看！凡爾塞以後的各種會議，都是這兩個趨勢的鬥爭，其結果都是經濟的觀點不能戰勝對敵的立場。不過，現在的世界真不得了，英國也不得了了，美國都不得了了，遠東更不得了了，這極其嚴重的形勢，或者使歐洲之執政者清醒些。我們熱烈希望洛桑會議之結果，是經濟立點的戰勝！

洛桑會議是討論賠款的，自然德國人的話是「賠完了」或「賠不了了」，「道德上不能更負賠款之責任」。法國人的話是「能賠，非賠不可，延期也要有限度」，「非賠款歐洲不能興復」。誠然，一個不要出錢，結果有賴債的嫌疑；一個坐索款項，表面擁借老克的徽號；其誠心不要出錢，和誠心非要不可，都是至誠無欺的。不過，這究

竟還不是最深的文章，最深的文章另是一回事。若不直接了解這最深的文章，恐怕賠款問題是解決不了罷。

最深的文章，在法國一面者是安全的問題（Security）這是法國人心中最大的糾結，也正是德法關係最大的病源。這問題確不是簡單的，我們先說：這問題的無聊的一面。法國人想着，德國是一個有大力氣的民族，有超於法國人本部的人口，有比法國大的富源，有同種的與國，有超於法國的地形，有不甘失敗的心理，尤其可慮的是前進的猛力。國際之風雲變化莫測，而對俄之明爭，對英之暗鬥，正在眼前，一有山高水低，可怎麼辦？於是越想越殆哉，彷彿買誼治安之策，「措火於積薪之下，而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然則最好是滅了他，辦不到是佔着來因河，使他四分五裂，辦不到是四方八面設置些國家和他擾着，更擠他的油，使他最好不喘氣。於是法國非行霸業於歐洲不可，雖社會黨出身的白里安，確有愛好和平之誠心，與建設國聯之偉功者，晚節竟談起歐洲聯盟來了。賠款問題有這樣一個根子，焉能痛快解決呢？不過，這想頭真正是不可爲訓的！立國在己之強，不在人之弱，在己之能隨時應付，不在消滅假想的患害，假想的患害是永遠有的。「唐太宗爲何不殺武則天」一類的想頭，只有患

狂鬱症的婦人才可以有的。推這樣的「安全」心理而廣之，每一大國要「安全」，非盡滅其他大國不可，不然，一步一步總是不「安全」的。日本人也高唱滿蒙與他的安全，誠不免使人齒冷。我們再說：這問題的有賴的一面。第一，法國確在若干立國重要條件下，不如德國，一旦德國振起，法國難免又在歐洲居第二位。第二，德國人確曾嚴重的表示其對現狀不滿，不談西部界線（即是不回阿薩二州），雖是德國政府的表示，而不忘東部界線（即是不滿所謂「波蘭過道」與賽爾西邊界），確是德國政府所一再言之的。第三，雖今日之經濟困局為德國政府所不願，然當年紙幣跌價中固明白表示有賴債的意思，此外如以體育代徵兵，建設可以立變為兵工廠的工廠於蘇俄，在最艱苦中造牠那與現在國防毫無意義的袖珍戰艦等等，都使法國人更深刻的想「安全」。然則「安全」一說，固不當如法國之放量的想入非非，其具體的事實，亦有未可抹殺者。此事如不能得一滿意解決，德法關係總要七上八下。

最深刻的文章在德國一面者，是東邊的問題。這裏頭藏着忿怒與報復的炸彈。中歐與東歐接連的一堆地，本來在民族上是一團亂糟糟，極端的以語言分國界是很困難的。自凡爾塞條約決定德波疆界，歷次所謂「大使會議」者

又決定上賽里西之邊界，及「丹次希自由城」之機用以來，德國人誠有不少陷在文化較落後的異族中，而為其「少數國民。」這個現象之適用於奧匈帝國分崩後之形勢者猶多，奧國人在民族語言文化的意義上，固是德意志人也。又，東普魯士與普魯士本土不聯，而中間有了一個波蘭過道，丹次希真純正是德國的，而強迫其為「自由城」。凡這些困難糾紛，而處分不盡妥當的事，皆是埋伏的地雷。加以波蘭人復國後之瘋狂的部族主義，一變而為一種侵略的帝國主義，捷克人之不妥協的辦法，都正對着本來自大的德意志人的，而此形勢又有法國的背景，其結果也，在一個最需要民族間合作的場所上，只見民族的互恨與互防。德國人最痛心的是他們的東疆外同胞受制于異族，且受制于實際上文化落後心理上看不起異族。波蘭之耀武揚威，儼然是法國的爪牙，尤其使人難堪而不安，法國的「環抱德意志」的政策，實在是歐洲今日最大的病源之一，亦即是「歐羅巴之巴爾幹化」之一個主因。

如上文所說不誤，則賠款問題自身固已極難解決，而自身以外更有困難的關鍵，此個關鍵，在法國的「安全」一面，非嚴整的執行凡爾塞條約不可，在德國的東邊一面，非推翻凡爾塞條約不可，如此豈不是僵局呢？不過，

困難也不是簡單乾脆的，今日之局似乎法國有進于理智的可能，而德國猶有不失其理智之可能，現分叙如下。

○ ○ ○ ○ ○

德國人戰敗之後，雖然懊喪與懷恨，然其初步反應轉在對內，左派大起，舊帝與其徒黨為大多數國人所痛恨。

協約國不於此時安慰之，而再接再厲的擠壓，法國尤其行使其所謂條約特許權（Sanctions），明顯的為拆散德意志聯邦的圖謀。自然的，左派頗難自解，右派漸漸恢復。

然歐戰後十三年多之間，只最近兩年中所謂極右派者才得勢，也是因為國族的運命水盡山窮，然後折而右傾。

最近希特勒派大擴張以前，將及十年中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貫的以司脫累斯曼為聯邦外交部長，其國會中最大黨為社會民主黨，其與之對抗之右派最大黨，所謂德意志國民黨者，對國事並不走極端。德國十年之不變初衷，皆足證明德國國民深有大戰為教訓之認識。現在簡略的說明希特勒派猛進前之德國國會中政黨形勢，以自右至左為序。最右之黨為民族黨，以前以路登道夫為魁，今變化為希特勒派。其次為德意志國民黨，右派之最大黨，地主與農民多在其中。其次為德意志人民黨，雖是右派而較溫和，大城市中人家之不右傾者每在其中，前外長司脫累斯曼

即其首領之一。其次為中央黨，即天主教黨，以南部諸邦為基本，左傾右傾隨時不定，故專收政治上舉足重輕之利。因其是一宗教的黨，故能穩固，否則其無定見的政治必為國人所棄的。其次則是最溫和的左派之民主黨，此黨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猶太人多在其中。此黨中很有些財政專家，又有不少的大實業家，然而其語調有些氣味，令人肉麻。其次為社會民主黨，這本是社會黨，歐戰起時贊成戰爭，遂與後來之共產黨分裂，這是左派中的最大黨。此黨與共產黨之不同者，社會民主黨以謀工人利益為前提，共產黨號召世界革命。其次為共產黨，這是屬於第三國際的。此外的小組織，如所謂經濟黨，巴延（南德最大之王國）人民黨者，或無政見，或偏地方，故無多大關係，可以不論。至于各黨之人數，則社會民主黨最多，稍次為德意志國民黨，雖不及社會民主黨，然所差不到十分之一。第二等的黨是中央黨，人民黨，共產黨。民主黨更比這些較小些。所謂民族黨者，以前大家頗拿他當笑話看，以為路登多夫與希特勒皆是妙不可言的幻想人物，右派之國民黨員每如此想。這是在聯邦國會中的分野，在普魯士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尤佔優勢，故共和宣布以後，直到最近的改換以前，普魯士未嘗換社會黨的政府。照這樣的形勢看來，

——這形勢是最近兩年內德國人民大困以前之十年中政治的分野，經過七災八難而大體不變的分野，——德意志人民實不會走到那「反動」的路上，實在願意內安外和，故左右兩極端黨不得優勢。誠然，最近三二年中這形勢是漸變了，而今春之兩個選舉，一，總統競選，二，普魯士國會改選，希特勒派得到世界吃驚的進步。不過，這改變是誰造成的？是不是法國負最大的責任呢？逼得德國的國民經濟水盡山窮，忍苦負重者十年而國命的危機更甚，則趨于極端是必然的！我們一看十年的舊事，與其怪希特勒派得勢之猛，毋寧怪希特勒派得勢何其遲遲，而共產黨猶不能代社會民主黨也。且希特勒派並非單純的右傾，乃是一個以歷史為感情，以經濟為對像之民族主義的社會黨。希特勒本人和他的黨綱都是很有趣味的，其混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尤使我們有很多的同情。希特勒派對外當然要硬，然決不是一登台就對法開戰的。恰恰相反，恐怕他一登台便要與法國得一諒解而後東向努他以為然的力，遠則蘇俄，近則波蘭。果然，他在數月前自己到巴黎一次。他目下最對之奮鬥的敵人是共產黨而非法國，所以他同法國有成立諒解之可能。然則自法國人之立點言，雖希特勒派出來，亦不至即刻陷于鬥爭之局，不過賠款是穩穩當

當不付的了。總而言之，看看十幾年的德國政情，可以相信，她是正在忍苦負重中的，雖希特勒得勢，不致陷德法關係于不可收拾，而有老英雄興登堡在位，政局是走不到軌道外的——除非經濟情形更紊亂下去。

再就法國一面看，現在新選的國會中左派佔多數，這是最可喜的。左派的大部分雖也有所謂「安全」問題在心中，究不如龐加賽一派以困難德國為「安全」，且左派深知求所謂安全，自己拿出的代價也太不得了，而德國負重十多年，現在大有變面孔的樣子。如果希特勒上臺，停付了賠款，今日還能再行佔據萊茵河入耳河一類的「特許權」麼？法國今日外交的孤立，已甚可觀，日本在歐洲的舞台上，是幫不了她的忙的，而英美意德若一致，她大是難辦。與其終於下不了台，何如領導一個小康之局？自戰後龐加賽復任總理以後，法國政局似無今日之比較可以樂觀者。法國人欲在歐洲居領導的地位，我們自然也很同情，大革命的法蘭西，即人道主義的法蘭西，本居領導的地位，若舍人道而行霸道，拿破崙的事業，今天那能再見呢？

且法國雖屢屢陷于所謂戴文主義的姿勢（Chauvinism），其為大革命領導民族之意義終不以武功與霸業而全然消失，世界上沒有一國，對平等自由之遺訓深固保持在思想

中如法蘭西的。大革命之餘響，並未沉淪，所有左派，在政綱上頗有國際合作的理想主義。即如現在的國務總理阿日歐氏，雖在法國的國會中不能不今日與左聯，明日與右聯，然却曾在歐戰後歷次想與德國得到一個合作之局面，只是機會總不巧罷了。阿氏在龐加賚的復任總理時，曾擔任了教育部長，是左派對之大失信賴的，然而事過境遷，我們也覺得當時法國為救濟內部之經濟崩潰，有組織全國政府之必要。此次再起，適值世界的大凋敝，有急于救濟之必要，而遠東形勢，有使得雖在溫室談風涼話的人亦不得不戒懼的。我們熱烈希望阿氏能報答世界上不「反動」的人們對他的清望。

十餘年來，歐洲大陸上之不得基本解決，英國的態度頗有關係。英國的外交政策向來是一件怪事，既靠天，又隨人，雖努力，而鬼混。其經濟的組織，使她有一個世界的眼光，而其島國的形勢，使她持一種自了的態度。別處的光明的趨勢，若與她無目前的明顯利益，她的態度是半就半推的；別處的不了之局，若與她無目前的切膚危險，她的態度是半推半就的；於是危機當前，不能挽救，大道當前，不能奔赴。英國一部分有遠識的人，以為他們國家在一九一四夏無斷然的表示，是造成大戰的直接原因，此

論事實或不盡然，然若持以觀察英國的外交政策，頗得理解。歐戰後大陸上的困局，英國雖極其不贊成，然並未積極抵抗。不過現在情形有些不同了，一九二九年以來，英國之經濟危機，使她不能再鬼混（Muddling through）了。

所以我以為雖在無限的困難之下，洛桑會議的成功——至少是一部分的——甚可能，因為各國皆有「燃眉之急」。大家若認清世界關係中之經濟的觀點，則應知全世界是共存共榮的。誠然，歐洲若干基本問題，如上文所舉者，不可一蹴而就，然而洛桑會議如作一個初步的成功，以經濟的觀點為國際合作的形勢，以後更可逐漸解決其他問題了。

胡佛總統的提議若果實行，或其稍有變更的計劃之實行，大可使各國皆無侵略報復之可能。德國此時兵力已全無進攻的力量，若再縮三分之一，而一切進攻的武器皆在廢止之列，德國焉能更報復？義大利焉能打法國？這不是法國「安全」問題之基本解決嗎？

我們希望洛桑會議能作世人走到經濟立點上的第一步，我們深信胡佛的辦法是列國安全與國際合作的基本辦法。

再略談幾句法德關係在遠東之影響。自倭人暴佔遼寧省城時起，法國的態度頗曖昧。最初，法國的報紙是攻擊日本的，以後忽然沉寂，且有的變論調了。人們說——有道理的人們說——這是日本的錢有效用，參看蘇俄及其他地方能發布帝俄時代在法國所用的報館津貼費（皆是駭人的數目），使我們不能擱棄這種話。然而這究竟是第二因，必更有其他的主因。以日本的地位論，關於歐陸的事，日本的話是不值錢的，若就遠東說，除非日英開戰，英法又開戰，所謂日本保障法國利益，及安南領土者，全是空話。那麼法國何故與日本有了解呢？這一定是對俄問題了。法國對俄有幾層不結之局，一，帝俄時代之法國大債，特別投資在西伯利亞的；二，東歐各小國之位置，法國最怕俄德夾擊他們。再加以法國兵器工業資本家的活動——這在法國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團體——法國的右派對俄很作攻擊的準備。於是日本國才有市場之價值：果然日本在東方鬧起來，法國——至少其指使之波蘭等——可在西方鬧起來，或者西方有變時，日本響應于東方。因為有這個形勢，所以日本

能以對俄的立場向歐洲宣傳，尤其是向法國宣傳。不過，法國右派的對俄政策不是全國的政策，左派並不這樣顛狂。幾個月前，法國對東三省問題之態度忽轉曖昧，當是法國的兵工實業資本家為日本運動的有效了。本年五月初法國大選揭曉，左派大得勢，日本外部對俄的態度，忽然語調平和，這是很可注意的。法國不走拿破崙對俄的一條路，日本是拍賣不出去了。

附記

一，我有五年不大看歐洲的日報了，這篇文章所以只能討論其歷史的背景，談不出洛桑會議的詳細問題來，這是很抱歉的。

二，本文中顯然反對歐洲列國民族主義之過量發達，因為我們明白看到，過量民族主義是使歐洲成巴爾幹的原因。不過，天地間的道理都有他的時代性，十九世紀歐洲之大進步，正靠其民族主義，中國此時尤非民族主義不足以鍛鍊國民，這是要聲明的。

再論黨化教育

叔永

——答范雲龍先生——

在本週刊的第三期，我曾發表了一篇關於黨化教育的文字。許多朋友看見了這篇文章之後，都向我說：『你真大膽。這樣的問題，豈是可以隨便討論的？』我回答說：

『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我們要提出談話，喚起國人的注意。況且現在不是言論自由的時代嗎？我們若是多所顧忌，而不敢討論眼前的重要問題，便是放棄國民的權利。』

果然，我這篇文章發表了不久，便引起了相當的注意。前天早上，我接到一位范雲龍先生由南京寄來的一封信，他的內容如下：

『在國民黨遭受到歷史所遺傳的封建和宗法的勢力之培植而坍台而崩潰而瓦解的時候，先生還有閒情來討論已經糊塗失敗的『黨化教育』，這樣科學家的精神，良用欽佩。……我對於『黨化教育』的問題，很想和先生討論一些。雖然事實上國民黨是失敗了，『三民主義教育』也失敗了，不過真

理的探討，有時是不管時間性的。究竟是怎麼失敗的，我們也當求其失敗的明處。有科學家愛真理的精神如先生者，想是『非常歡迎』的。

『以先生的全文——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看來，我們在沒有討論，『黨化教育』本身問題的時候，有將『教育價值觀』的問題先行解決的必要。因為先生的教育思想，有幾處還是舊的，又似乎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同時自然有『教育價值自身論』的言論，倘若先生以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舊的好，又承認『教育價值自身觀』是對的，那我們就不必來討論什麼『黨化教育』，因為這是一個哲學上的矛盾問題。否則我們要是承認『教育價值工具觀』的話，那自然可以進一步來討論。善意的去改造也可，惡意的來反對也可。

『先生的結語是這樣的：（一）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黨化，便沒有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這一句我的答案是這樣的：黨化教育是必須的。有了黨化然後才有教育。反過來說，沒有黨化，便沒有教育。』

『先生的第二結語是這樣的：（二）國民政府是應該對於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他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

『但是我不了解先生這句話的真意何在，所以無從答覆』

以上是范雲龍先生所提出作為『開始討論』的幾個要點，范先生又附寄了他的『七年來研究』的中國國民黨化教育綱要一份，因其篇幅太長，此處恕不徵引了。

在開始討論以前，我們有一點要請范先生注意，那就是，凡討論一個問題，須認明討論的範圍和根據。我在『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文章裏，指出黨化教育的有兩件：（一）是在學校裏面宣傳黨義，（二）是由黨的人才來主持教育機關。從這兩方面事實的觀察，我們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并立的云云』。（詳細理由，已見前文，茲不復引。）范先生的『答案』，把我們的結論完全由反面翻成正面了。但他始終未曾提出一個翻案的

理由，實在使我們莫名其妙。

我們的第二個結論說：『國民政府是應該對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他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范先生說他不了解這句話的真意所在，所以無從答覆。范先生所以不能了解這句話的命意，正是因為我們討論的範圍不同的原故。范先生的意思，以為黨化教育，包涵得有『完成兒童的基本教育』，『改革一切行政制度』，『改革一切學校制度』，『獎進學術專門研究』，以及『以革命手段掃除現有教育的一切積弊』等等。這樣說來，似乎教育一實行黨化，國家的教育，就自然而然的發展了。我們的意思，以為黨化教育，事實上只是宣傳黨義及位置黨的人才的工作，這樣一來，便不免把教育上的根本建設，都丟在腦後了。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們的第二個結論，似乎也狠明白清楚，沒有甚麼不可解的地方。

說到此處，自然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問題是：黨化教育，究竟以甚麼為代表。換一句話說，我們要照范先生的看法，把一切理想中教育上的設施，都作為黨化教育的成績呢？還是照我們的看法，把目前黨化教育的事實，作為論斷的根據？關於這一層，我們的主張，不幸還是後者。我們的理由是：第一，我們討論的是實際問題，與任何人

的理想中的烏託邦，本來沒有甚麼關係。第二，任何政府，對於許多教育上的根本建設（如上文所說的完成義務教育，改良教育制度，獎進學術研究等等），都有不能旁貸的責任，不能以為黨化則應該辦，不黨化則不應該辦。因此，這些建設，即使辦了出來，亦不能指為黨化的表現。

『黨化教育，已經完全失敗了』，是范先生同我們得到的一個共同結論。不過范先生以為失敗的原因，是由於黨化未能實行，我們以為失敗的原因，是由於黨化的根本錯誤，這是我們觀點不同的原故。我所不解的，范先生既承認黨化教育失敗了，又主張『先有黨化，才有教育』，這是不是自相矛盾？至於我們討論黨化教育，完全屬於實際問題，似乎沒有涉及教育價值論的必要。不過范先生的信裏，既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妨討論一下。

據范先生所說，教育的價值觀，有所謂『教育價值自身觀』與『教育價值工具觀』的兩種，而我的教育思想，有時『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同時也有『教育價值自身論的言論』。因為這些教育思想是舊的，所以也就不對的。反面說來，教育的工具觀，總是對的，同時若能帶些『唯物的教育理論的色彩』，則尤大對而特對。

在我們看來，教育只是一個社會裏面，老成人們對於少年人們的一種訓練。這種訓練，自然是以老成人們要形成少年人們的理想為標準。人在少年時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很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響受教者的思想行為。因為這個原故，社會中的領袖或『先覺』，往往能用教育的力量，把他們的理想，在受教者的身上表現出來。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發達，組織完備的國家，教育力量的表現，更為明顯而重要。教育的工具觀，在現代的社會裏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因此。不過這樣的教育工具觀在教育理想上，究竟有甚麼新的價值和貢獻？我們不要忘記，教育的主體，是一個未發展的人，而其餘的利用，都是由這個人生出來的。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來，教育的工具觀，非常重要；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來，教育的自身的價值，自然有他的相當地位。而且就廣義說來，教育的自身價值觀，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觀。因為教育必定有一個目的，教育的工具觀，不過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罷了。

其實上面所談的，還不是根本問題。我們認為根本問題，而有討論價值的，是教育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換一句話說，教育家要承認個人的目的比社會的目的重要呢

？還是社會的目的比個人的目的重要呢？從歷史上看來，野蠻社會，可以說只有社會的目的，沒有個人的目的，因為在野蠻社會裏，凡與社會習慣不相合的，都不能存在。歐洲中世紀，宗教勢力盛大的時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還是這樣。一直到文藝復興以後，經過盧梭，康德，柏斯台洛慈，福祿貝爾諸人的主張和研究，個人的重要，始漸漸為一般教育家所注意。十九世紀以後，科學進步，世界各國的政治勢力，愈益膨脹，社會的領袖們，不能不利用教育的勢力，以實現政治的理想，於是又有重視社會目的，輕視個人目的的新趨勢。這種趨勢，在特殊情形下的國家，尤為明顯，如蘇俄，意大利，日本，都是好例。在危急存亡情形的國家，希望藉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末，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一個社會，是由個人的分子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分子，不怕沒有健全的社會。一個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須社會與個人有完全的和諧；要使社會的發展，助成個人的自達，不要犧牲個人的自達，來助成社會的發展。羅素在他的『教育論』書中，對於日本的教育，有這

樣的一段評論，我們引來做此文的結束：

「近代日本，是以國家的強大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個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製造愛國的國民和灌輸有益於國家的智識。我不能過讚他們的成功。自從勃爾提督的艦隊叩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幾乎不能自存；除非我們說自存是有罪的，他們的成功，足以表白他們方法的不錯。但是只有在絕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種方法，沒有立刻的危險而用這樣的方法，是大錯的。他們的神道宗教，和舊約創世紀一樣荒唐，但是大學教授們不容加以懷疑；所謂代頓審判，（譯者按即美國有名的因反對教授進化論而告到法庭的審判案件）比起日本的宗教專制來，不算甚麼了。他的倫理專制，也是同樣的厲害；愛國主義，忠孝觀念，皇室崇拜，一樣也不容懷疑，因此，許多進步便不可能了。這種鐵鑄的制度的最大危險，便是只有革命是進步的方法。這個危險，雖然不必立刻出現，但是真的，也是這個教育制度造成的。」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適之

中國人是最會用名詞來變戲法的。戲法人人會變，各

有巧妙不同。最巧妙的一手是用的名詞，喊起來滿嘴響，

聽起來新鮮好聽，而其意義誰都不能了解。最新的例可舉

近日北平學潮中產生的「法西斯蒂化的教育」一個新名詞

。這個名詞，喊起來真是滿嘴響，聽起來真是新鮮好聽，

自是有耳共賞的了。牠的意義的難懂，也正是牠的特別巧

妙的用處。因為不可懂，所以可以隨處亂用，無所不包。

可是北平的編輯先生們都不免有點掉在迷霧中叫苦了。老

實的北平晨報記者下了這樣的解釋：

法西斯之內容，吾人媿無深切之研究，吾人能力所

及，僅知其為意大利之新興思想，大傑莫索里尼會

以之中興祖國。今日此種思想已與共產思想對峙而

為兩種引人入勝之重要主義。……北大教育誠未足

當法西斯之榮銜也。（六月十三日社論）

更老實的鞭策週刊記者（第十六期）有這樣的揣測：

所謂法西斯化者，大概是指獨裁，高壓的意思。實

則今日之大學教育，在我們看來，已嫌放任太過，

自由太甚，那裏還有獨裁高壓之可言？

我們也是墮入迷霧中的幾個人，只好向北平學生刊物

中去尋這個名詞的解釋。果然，在北大幾個學生辦的北大

新聞第十一二期合刊上尋着這樣的考據：

法西斯蒂是什麼，我們不必去旁証博引，祇要查查

改造社的社會科學辭典上是怎麼說的：

「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用產業合理化托辣斯化等

在勞動階級的犧牲之下使企業的收入增加，同時

更在政治方面實行破壞勞動階級直接的組織（政

黨，組合，工廠委員會等），並廢止社會立法

。這種政治方面的運動就是法西斯運動，而這種

運動在現今資產階級國家幾乎有全部存在的傾

向。」

引用這個定義的人，似乎也明白此中所敘述的運動是不容

易應用到今日北平教育界的情形上去的，所以他還得使牠

再搖身一變，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新定義：

但是我們知道，「法西斯蒂」一語雖原于意大利的

棒喝團，在目前牠已變成代表一切右傾勢力以暴力與恐怖政策鎮壓左傾革命勢力的運動。

這個新定義雖然出現在北大幾個學生辦的刊物上，我們很可以猜想：在一般參加北平學潮的學生心目中，這個名詞的意義大概不過如此；所謂「法西斯蒂化的教育」大概只是說今日中國教育機關有右傾勢力用暴力與恐怖政策來鎮壓左傾「革命」勢力的傾向。然而我們即使承認了這個新定義，我們還是掉在迷霧裡。即以師範大學的風潮而論，送出去了一位真肯熱心做學術事業的徐炳昶，回頭來擁戴幾位辦學校最無成績的政客，「左傾」在那裡？「革命」又在那裡？更奇怪的是在這種學生刊物裡，竟有人把「陳果夫的整頓學制計畫，和北大整頓成績考查法案」都列

論鴉片公賣

近日報紙傳言，中央政府頗有公賣鴉片之意。又載汪精衛先生云，但恐不得其人，未便輕于實行。我們對此殊有共不勝危疑之處。我們以為救國當從大處遠處着眼。財政破產固然當救，人才破產不更當救嗎？喪權失地固是亡國之兆，民族衰弱不更是亡國之兆嗎？土匪蔓延當剿，毒

為「很毒的法西斯蒂化政策」！整頓成績考查也是「右傾」嗎？也是「用暴力與恐怖來鎮壓左傾革命勢力」嗎？如此看來，所謂「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只不過是一班無心求學有意搗亂的學生信口編造出來的一種名詞新戲法而已。本來是無意義的，我們也不必追求牠的意義。

二十一，六，二十四。

這一篇短評是十日前寫的，因為第七期缺乏篇幅，不曾登出。今天我到北大，看見牆上有一些紅綠紙的無名標語，其中有一條果然是「反對成績考查案」。北京大學的牆上有這樣的標語，可算是北京大學歷史上莫大的恥辱。七月四日。

衡哲

藥蔓延不更當剿嗎？最根本者，宜莫如教育的破產，然尚不若全民族之身體與道德的大崩潰之更為根本。總而言之，無論外禍內患，天災民窮，較之民族生活力的破產與衰亡，尚有標本之不同。使中華民族能保持其生活力，則誠如俗語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日國家一

切困難，遲早總有解決之時，而暫時的艱難困苦，決不能使一個偉大民族永不翻身。中國歷史所示的教訓，所給的鼓勵，此為最重要的一事。然此樂觀乃有一個條件——一個健全偉大的民族。假使此條件驟然消滅，則一切希望將同水泡。不幸中國因鴉片及其他較鴉片更為酷毒藥品之故，現正將此條件日侵月蝕，漸至于消滅。我曾親眼看見整個有天才的家庭，為鴉片所毀滅，至于不留一人。亦有不全毀滅者，但形體消羸，精神衰弱，無遠大的志氣，無剛強的生活力，萎靡庸懦，與死無異。此外奇才異能之士，因染此癖終身殘廢者，更不可計數。且所謂殘廢者，並非專指身體，乃是指整個人生的崩潰。請問此非亡國，何為亡國？此非滅種，何為滅種？

故我們以為鴉片該不該公賣，是一個問題，鴉片及其他毒品該不該無條件的禁止，又是一個問題。關於前者，自有許多專家的高見，我不欲妄貢其愚，（但在一個萬不應令其存在的情形之上，加一個法律上的承認，似乎亦非上策遠策。）我所欲言者，乃是鴉片及其他毒品，應該無條件的禁絕——禁種，禁吸，不但禁賣——蓋鴉片及其他毒品毀滅人種的力量，較之其他一切尤為深刻，尤為澈底。比如一人做了匪，做了

賣國奴，其子孫未必一定做匪，做賣國奴。但吸鴉片者之子孫，則未有不為廢人者。故若為禦侮之故而種賣鴉片，則不如不禦侮，若為剿匪救災之故而種賣鴉片，則不如不剿匪救災。蓋此等行為乃是飲鴆止渴，即能將渴止住——實際上還做不到——而鴆毒大發，渴雖止了，又有何用？換言之，即使日本歸還了我們的東三省，俄國歸還了我們的外蒙，美國以他的工業文化全部奉送，意大利以他的藝術文獻全部相借……同時，國內的匪患也清了，天災也消了，真是四海昇平，萬民樂業。不過承受此廣土博物偉美文化之萬民者，乃是一羣吸食鴉片，白麵，以及其他毒品的行尸走肉，以及他們的鬼子鬼孫。請問到此還成何景象？成何世界？遑論文化。

這個意思，國府諸公，豈不知之。特不知政府諸公有去惡務盡之決心否？對於這些從根本上毀滅我中華民族的毒品，有無條件禁絕的決心否？有犧牲眼前一切——即使被犧牲者，為軍事，為財政，為人情——而為我民族的生活力留一點餘地的決心否？語曰『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國府諸公不趁此時斷腕，還待何時？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黻

俄人雅康恩達夫(Victor A. Yakhotoff)近著

了一部書，名爲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2)。

書末附錄有帝俄及蘇俄關於遠東所訂的條約。其中大半是公開的，久已出版的；但有四個日俄密約是曾未出版的。學者雖從他項史料推知了密約內容的大概，但全文的發表實以雅氏此書爲最先。雅氏得自俄外部的檔冊，條文之可靠，殆無可疑。茲特爲譯成中文，略加解釋，以供研究東北外交史者的參攷。

(一)日俄戰爭以前，日本方面雖與英國聯盟，但亦有主聯俄者；俄國方面雖終以積極派得勝，但主張對日妥協者亦頗有人。戰後雙方都不免有兩敗俱傷之感。加之美國資本家如黑利滿(Harriman)、外交家如斯處賴登(Straiton)，和中國政界要人如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想聯絡起來，以俾美國得投資於東三省。同時世界大局正在變化之中。昔者英以防俄爲外交最要目的；日俄戰後，英國

轉而以防德爲第一要政。昔者法之外交專靠聯俄；戰後，法國大感聯俄之不足，於是在一九〇七年，法日，英俄，日俄都妥協了。在遠東方面，英日向與法俄對敵，是後則四國合作了。歐戰前，中國外交的困難就在乎此。日俄在一九〇七年訂立了兩個條約，一是公開的，一是秘密的。公約分兩款，一申明互不侵犯兩國在中國之已得權利，一宣布兩國都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及門戶開放主義。密約則分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以北滿對南滿，以外蒙古對高麗。密約全文如下：

大俄國大皇帝及大日本大皇帝，有要關於滿洲，蒙古及高麗諸問題，避免將來一切衝突及誤會的根由，同意了下列的辦法：

第一條：斟酌在滿洲的權利及政治的與經濟的活動之自然趨勢，並想要避免競爭所產生的曲折，日本擔任不在本約補續條款所定之界線以北，爲日本國家，或爲日本臣民的，或他國臣民的利益，尋求任何鐵路或電線建築權，並且擔任不阻撓俄國政

府在這區域內尋求同類建築權的行動；俄國在她那方面，爲同樣和平的慾望所感，也擔任不爲國家或本國或他國臣民的利益，在上文所說之界線之南，尋求任何鐵路或電線的建築權，並且擔任不阻撓日本政府在這區域內尋求同類建築權的行動。

中東鐵路根據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俄曆十六日）及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俄曆十三日）的建築合同所得的權利，就是關於本約補續條款所定之界線以南的一段，仍舊是有效的。

第二條：俄國既承認日本與高麗的共同政治關係——該關係是根據日高之間現有的條約及協定的，並且這些條約及協定的稿本已由日本政府致送俄國政府。擔保不加以干涉，且不阻撓這些關係的繼續發展；日本在她那方面，擔任給與俄國政府，領事，臣民，商業，工業，及航業在高麗最惠國的一切權利，直到最後條約訂立之時爲止。

第三條：日本帝國政府既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權利，擔任遏制一切可危害這些權利的干涉。

第四條：兩訂約國務須嚴守本約的秘密。
本約以下列簽字者，得了各該政府全權以後，

在本約上的簽名和蓋章爲証。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

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

在聖彼得堡

（簽字）易斯瓦爾斯奇 (L'ovtchik) (簽字) 本野
補續條款

本約第一條，所說的北滿與南滿的界線議定如下：

從俄國與高麗邊界極西北端起，畫一直線到邱春；從邱春畫一直線到必爾騰的極北端；再由此畫直線到舒水甸子 (a.) (Hsushuichan)；從此地起，沿着松花江到嫩江口止；於是沿着嫩江到嫩江與洮兒河交流之點止；再沿着洮兒河到此河橫過東經一百二十二度止。

（簽字）易斯瓦爾斯奇

（簽字）本野

這個秘密的條約和同日簽訂的公開的條約是完全相反的。公約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密約則起始中國東北的瓜分。公約承認門戶開放主義；密約則規定利益範圍。公約是粉飾太平的；密約是實際的。這種雙簧的外交，雖是使人驚訝，但在國際間確是很平常。

(二)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〇年美國在東北的外交又形活動。最初有錦州到環鐵路建築草約的簽訂。美國外交部長於是就以錦愛鐵路為憑依向列強提議滿洲鐵路的中立化，這就是所謂「洛克司計畫」(Knox Plan)。日俄兩國同起驚慌，以為一九〇七年的條約尚不够；除劃分勢力範圍不相競爭外，尚須彼此合作以防第三者——美國——的抽入。於是產生了一九一〇年的日俄條約。

這年日俄所訂的條約也是一個公開的，一個秘密的。公約分三條。第一條，日俄合作以求鐵路營業的改良。第二條，日俄擔任維持滿洲的現狀，換句話說，維持已得的權利。

第三條：如有任何事件發生足以危害上文所說之現狀，兩訂約國務須交換意見以俾協定雙方所認為必須的辦法，以期維持上文所說的現狀。

這約比一九〇七年的公約露骨多了。所以要露骨的原故就是要給美一個警告。一九一〇年的密約可說是一九〇七年的密約和一九一〇年的公約參合而成的。公約的目的在合作以維持現狀；密約則指特殊權利。

(三)辛亥革命一發生，列強覺得在中國進取的機會到了！其中尤以俄日為最急，英國也不甚落後。英俄此年

有西藏與外蒙古相交換的諒解；日俄則成立民國元年的密約。其主旨在劃分在蒙古的勢力範圍，也可說是以往兩個密約的補充。

第一條：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線應延着Ononchourh及Moushsha河直到Moushsha與Haldaitai河的分水界；從此又延着黑龍江省與內蒙古的邊界直到內外蒙古的邊疆。

第二條：內蒙古分為兩部：北京經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帝俄政府担允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以東之部的特殊權利；日本帝國政府對俄國在以西之部的特殊權利擔允同樣的義務。

第三條：兩訂約國務須嚴守本約的秘密。

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五日)

(簽字)沙查諾夫(Sazonov) (簽字)本野

(四)大戰發生以後，協約國之間訂立了許多戰後分贓及保贓的條約。日俄兩國，一方面覺得戰前那種有利與己的國際形勢或將不能維持，一方面更覺得戰後美國的侵犯之可怕，於是在一九一六年訂立了一個密約和一個公約。這公約分二條。第一條，日俄兩國相對聲明不加入與與國

相抗的政治聯合。第二條，日俄兩國在遠東的土地權力或特殊利益危害的時候，兩國協商共同禦防的辦法。這已够露骨了。但密約在目的方面及方法方面則更嚴重。全文如下：

帝俄政府及日本帝國政府，為鞏固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及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各密約所締結的忠誠友誼關係起見，協定下列各條以完成上面所引的條約：

第一條：兩訂約國既承認雙方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s）須要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的政治勢力之下——這第三國或將敵視俄國或日本——以後遇有需要的時候，務須開誠的，忠實的交流意見並協定辦法以阻這種形勢的發生。

第二條：倘若上條所說之協定辦法引起訂約國之一與上條所指之第三國間的戰爭，第二訂約國，一經請求，必給與協助，並且兩訂立國，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單獨媾和。

第三條：上條所規定的軍事協助之條件及方法應由兩訂約國的相當人員制定。

第四條：但是兩訂約國之一——這是已有諒解的——若不能確保其同盟國（多數）之必給以與形勢嚴重性相等的軍事協助，無須給第二訂約國第二條所規定之軍事協助。

第五條：本約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並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俄曆七月一日）繼續有效。如果訂約國之一方，在本約滿期前之十二個月，未通知對方不願續約的意志，則本約繼續有效，直到一方通知不願續約以後滿足一年。

第六條。兩訂約國務必嚴守本約的秘密。本約以下列簽字者，得了各該政府全權以後，在本約上的簽名和蓋章為証。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大正五年七月三日

在聖彼得堡

（簽字）沙查諾夫 （簽字）本野

此約可說把日俄兩帝國的野心完全暴露了。假使此約成立的次年未發生蘇俄革命，現在的中國不知又將何如了。

漫遊散記(三)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續)

●貴州的土著民族

我讀了戴維士 Davis 的「雲南」，就知道雲南有很多
的土著民族，語言，風俗，人種都不一樣。但是在雲南境
內大路附近並沒有機會遇見他們。只有從昆明去游西山，
看見措行李上山的都是女人，同我同游的一位項先生告訴
我這都是裸體。但是她們穿的是青布褲褂，與漢人的男子
裝束一樣，我當時也沒有十分注意。

到了貴州境內，走的是雍正七年所改的新驛道。沿路
上極其荒涼從平彝縣到郎岱，整整的七天，方纔遇見城池
。除去驛站以外，只看見十幾家的小村落，而且都是漢人
。一直等到我從郎岱經過坡貢到黃菓樹，新驛道與老驛道
會合向安順，方纔看見貴州的土著。

西南幾省鄉村裏買賣東西都狠不容易：一個比較大點
的地方都有一定的日期，把四圍的農民聚在一齊，交換必
需的用品。在雲南叫做「趕街子」，在貴州叫做「趕場子」
。在廣西叫做「趕墟」。這種日期都是一個月裏的一，四

七；二，五，八；三，六，九等日。但是普通都是用干支
計算，某地方是逢龍日趕場；相距不遠的地方或是逢猪，
逢狗，逢馬，逢羊等日趕場，以免得衝突。許多村子，都
是以牠趕場那一天的干支命名，所以雲南有許多龍街，馬
街，羊街，雞街，貴州有許多龍場，馬場，羊場，雞場。
王守仁做驛丞的龍場，就是從貴州到四川大路上逢龍趕場
的一個村子（現在的修文縣）。

這種風氣恐怕是西南土著民族所原有的，因為至今他
們計算日子，還是完全用干支。我到黃菓樹的那一天，恰
巧逢著趕場子。我趕緊叫人去賣肉，因為不趕場子，當然
不能宰豬的。我自己也到場上去玩玩，當時就看見許多奇
裝異服的女人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種是穿百摺長裙子的，
頭上戴一頂涼帽，上身穿一件大袖子的短襖，束在裙子裏
面，但是也用紐扣扣着。衣料是一種藍底白花的棉布，腳
下都赤着腳穿草鞋。飯店的人告訴我這是狆家子。我看她
們衣服雖然多半是舊的，但是洗得狠乾淨，皮膚也生得狠
白，身材在一百五十二三公分左右，行動狠活潑，狠給我

一種好的印像。第二種是穿長領襖子的。衣服沒有扣子，用一根帶子束在腰間。裙子很短，腿上束得有裹腿布，頭上盤有纏頭。腳底下都是光腳，不穿草鞋。所有的衣服，裙子，纏頭，裹腿一律都是青的。有的是棉布，有的是一種粗麻。衣服都是舊的，而且狠不乾淨。身材比狛家子要低二寸多，皮膚也比較的黑些。相形之下，遠不及狛家的入眼。這是所謂青苗。第三種人的裝束格式與第二種大致相同。身材皮膚也差不多，但是渾身上下，穿着的都是紅白二色相間的花布，連裹腿都是如此。這是所謂花苗。他們買賣交易，都用漢話，對自己人則仍各說各的土話。

當日我只帶得有一付一鎊錢買來的舊照相機，隨便照了幾張照相。但是這第一次與西南土著民的接觸，狠引起了對於人種學的興起。

從安順到貴陽，偶然還看見狛家，苗子却沒有再遇見。從貴陽向東，一過貴定，又差不多天天遇見苗家，尤其是青苗。在黃平附近幾乎全是青苗的世界。他們的裝束，與我在黃菓樹所見的一樣，不過衣服比較的整齊，而且往

往帶上許多銀的首飾；鐲子環子之外還有一種八兩到十兩的大銀圈，帶在頸項上。據我的觀察，苗家的老巢在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部。從貴陽向西，雖然一直到雲南的西南，四川的東南，都有苗家的踪跡，似乎都是近代的移民。從昆明到貴陽的大路，又是狛家和裸裸的分界線。大路以南都是狛家的勢力——東連到廣西的僮人，西連到雲南的擺夷，都是一種。大路以北都是裸裸的勢力。大定一府原是明朝水西安氏的土地，所以沿路的地名，如普安，安平，安順，安南都有「安」字。至今安氏還是裸裸的大族。

在黃菓樹的場上我看見每人左邊腰間都插着一個一尺多長的木殼子。我初起以為這一定是野蠻人帶的刀，但是又沒有刀把子。向他們拿出來一看，原來都是秤銀子的小天秤。我很奇怪在「人無三兩銀」的地方，何以人人都要帶着這件東西。等了一會，看見他們拿出來用，所秤的原來不是銀子，是銅的制錢！在貴州西部一帶，用制錢都不用數而論幾斤幾兩，給用銀子一樣！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眞

中國的學堂教育自滿清末年創辦的時候起到現在，從不會上過軌道，而近來愈鬧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總崩潰的形勢。中國現在正在全部社會的總崩潰狀態中積極進行，教育不過是一事，所以若論教育的崩潰，不能不看做這是中國社會整個崩潰的狀態中之一面，而與其他面分不開。不過，這樣說去，牽涉太多，現在且先專說教育崩潰的一事。

欲知教育崩潰的範圍，不應僅僅將眼光注射在中央大學師範大學等，且並不應注射在高等教育，一看小學中學，其糟糕的狀態更遠甚于中央大學，師範大學。就學的兒童及幼年人，全在「受教育」的標識下，學習一切紊亂的習慣，作惡的經驗，不學不自知的意識，真正不堪設想呢！

教育崩潰的主要原因，據我看來，大致可分為五事：

一，學校教育仍不脫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中國在封建時代，「士」一個階級不過是有統治權者之貴族階級之工具，為他們辦辦命令下來的事。試看孔二先生所教出來的

那些門徒，還不是專找季氏孟氏尋出路？戰國末年士人的地位高得多，然而士人用事者，終不如世卿貴門之數，自李斯相秦始皇，叔孫通相漢武帝封平津侯，挾古射策之人自然揚眉吐氣，不過這些人才都不是考試得來的，而考試得來的董巫師，幾乎以亂說陰陽送了老命。而漢魏晉南北朝總是一個門閥社會，門閥中人能讀書，自然更有令譽，而專是讀書的人不能組織統治階級。自隋唐以來，考試的力量漸大，故士人的地位漸高，至宋朝而統治階級的除皇帝外，皆是士人了。明朝野化承元朝，故官官用事，文化承宋朝，故士人得意。明朝雖官官每執大權，而士人總是統治階級之組織者。清朝的統治階級在滿洲世族，而士人也頗有相當的地位，曾左以後士人之力量更大。有這麼樣的兩千年歷史，故演成了下列一個公式：「讀書為登科，登科為做官」。一看中國的通俗文學，如傳奇彈詞之類，更要覺得這個國民心理之根深蒂固。

而且中國社會有一點與歐洲近代社會之根本不同處，即中國社會之中堅分子是士人；歐洲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是

各種職業(Trades)中人，故中國的中等階級好比「師爺」，西洋的中等階級是技術階級(Professional class)。誠然，歐洲自中世紀以來也有一種知識階級，這個階級便是僧侶

(Clerical)，不過這個階級自成一個最有組織的社會，雖也久與貴族連合來剝削平民，不過他不專是統治階級之伺候者。中世紀的歐洲有些大城市，這些大城市中有不少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種社會。以商業之發達，及新地的發現，這些自由人很得些富力，於是在貴族之無常權力(Temporal Power)，僧侶之精神權力(Spiritual Power)之外增了一種第三權力：這是中國歷史上所絕無的。西洋科學之發達，大體上是這個階級的貢獻，因為這個階級一面用技術的能力，一面有相當的自立，故既能動手，又有閑情。希臘的社會不如此，故希臘的思想都是些講文講道的，而動手的事是奴隸的事。我們不得不幻想，希臘的奴隸中，不知道埋沒了多少的科學家呢！中國的士人不能動手，中國的百工沒有閑情，或者這就是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的原因罷？士人之只有舞文弄墨的把戲，沒有動手動腳的本領，在中國是自古如此，考工記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士大夫是辦

事的，不是做工的。古代尚且把「智者創物，巧者手之」，謂之聖人，自漢以來，都放在儒林文苑之下，而列在方技之中了。

然而近代的需要是百工，近代教育的作用大體上在乎訓練出各種技術(廣義的)人才，所以近代教育是歐洲的第三權力之創造品，以代替當年的精神權力之創造品者，一朝拿來，培植在「讀書—登科—作官」的土田上，是不能不略形發育的。自然的趨勢既如此，不幸清末辦學的人更把新教育與舊科舉聯上，於是學校畢業皆「賜」出身。我幸而不曾在滿清時中學畢業，不然硬派一個拔貢，做了二民呢！(當時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因滿清政府要取消這個獎勵，他的家長便把他從學堂裏叫回家。)所以子弟到學校讀書，為父兄者，大多數不抱着使他成就職業的心理，而希望他畢業後得到一官半職。我記得我當學生時，每次回家，總有鄉黨鄰里來問，「你幾時出官，官有多大？」我自然憤憤的罵一頓，不過，這個引誘勢力是如何大呢！看得出這道理最明白者，是吳稚暉老先生，他是士人出身，而在麗景街的多工學校做過工，深知此中奧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於是紙上的科學是洋八股，胡適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舊學者，也叫做洋八股，而胡先生是「戴着紅頂子演說革命」者

。大約胡先生很欣賞他這句話，遂把說空話的黨義文叫做黨八股。我今天這篇文章也是八股，胡先生逼着做出的每週課卷，其價值焉得過於王韜馮桂芬之政論乎？惟其一切學問文章經濟皆是八股，所以一切職業是做官，教書的是教官，辦黨的是黨官，辦工會的是工官。於是乎認字的人越多，失業者越多，學校辦的越多，社會上寄生虫越多。

若想中國成一個近代國家，非以職工階級代替士人階級不可；若想中國教育近代化，非以動手動腳為訓練，焚書坑儒為政綱不可。

第二，政治之不安定，是教育紊亂一個大主因。誠然，政治果永遠安定，社會是只能在浮層增進的，不能在基本上改絃更張。不過，社會永不安定，一切事皆辦不去。袁世凱的陰賊政治激出來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本不通，今姑從俗。）北洋軍人與盜閥之橫行激出來國民革命，假如中國政治變動只是這幾個大綱，教育事業可以因時建設的，不幸大潮流之下，分成無數下潮流，來來往往，反反覆覆，事事皆成朝不保夕之局面，人人乃懷五日京兆之用心，上台是趁火打劫，下台是醞釀待時。校長不做上二年，辦不出事業，教書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學問。試以山東安徽兩省論，自國民革命軍到後，安徽換了好幾十廳

長，山東從未會換過，故山東的教育比較差有秩序，而安徽是一團糟。革命的事業，不是革別人的命便成自己的事業，總要有相當時間的，試看蘇俄。

第三，一切的封建勢力，部落思想，工具主義，都乘機充分發揮。亂世造姦雄，姦雄造亂世。自袁賊世凱專用下等的走卒做封疆武臣，無聊的書辦做地方大吏，以便自用，於是人人學他，現在的當局，其用人處有沒有像袁世凱的呢？這個風氣，影響到一切社會上，教育焉能成例外？清末辦學者，尚且多存些公益事業的心，至不濟，「門牆桃李」之觀念是虛榮心作用，也不足害人的。而今呢？私立大學除辦兩開大學的張伯苓先生幾個少數以外，有幾個真正存心在教育事業呢？若是把辦學當做買賣做，尙不是最壞的，若當做走狗製造場，乃真是亂國害政的大源。直弄到有政治野心者，非辦大學不可，欲登門投靠者，非進大學不可，所以大學學生選舉校長，每舉些權要與政客。因此我們真不能佩服清華與中央大學的學生，他們選舉校長——這誠然不是——還是幾個讀書人。

在這個辦學的與從學的相互利用，以申張封建勢力，發揮部落思想，充實工具作用之下，教育豈不是紊亂社會的根源？這樣的事實可以寫成一部一千頁的大書，讀者人

人心總有幾個例子，我不用舉了。

第四，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員學院畢業生給中國教育界一個最不好的貢獻。我沒有留學或行走美國之榮幸，所以我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員學院誠然莫測高深。不過，看看這學校的中國畢業生，在中國所行所爲，真正糊塗加三級。因此我曾問過胡適之先生，「何以這些人這樣不見得不低能？」他說「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小學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希有了，我們却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這樣說來，是所學非所用了，誠不能不爲這些「專家」歎息！這些先生們多如鯽，到處高談教育，什麼朝三暮四的中學學制，竇二墩的教學法，說得五花八門，弄得亂七八糟。我現在有幾句話敬告這些與前清速成法政學生比肩的先生們：第一，小學，至多中學，是適用所謂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是學術教育，與普通所謂教育者，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教育學家如不於文理各科之中有一專門，做起教師來，是下等的教帥，談起教育！即幼年或青年之訓練！是沒有着落，于是辦起學校自然流爲政客。第三，青年的人腦筋單純，與其給他些雜碎吃，不如給他幾碗大魚大肉，這些教育家們奈何把中學小學的課程弄得五花八門，其結果也，畢業後於

國文英算物理等等基本科目一律不通。尤其其荒謬者，大學校裏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謂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教育學不是一個補充的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後的研究，英國有好些大學以大學文理科畢業者習教育，未習文理科者不得習教育，德國的教育訓練是把大學的哲學科（文理經濟政治皆在內）學生於高年級時放在特設的一種教育學修習所中，以便教師之養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做校長的要從教員出身，做教育行政的也要從教員出身，若不從教員出身，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爲當每近于政客。然而要做教師，非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不可，所謂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則拿來當做補充的講義，或則拿來當作畢業後的研究，自是應該，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訓練，豈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謂學問？于是不學無術之空氣充盈于中國的所謂「教育專家」之中，造就些不能教書的教育畢業生，真是替中國社會造廢物罷！

第五，青年人之要求，因社會之矛盾而愈不得滿足。今日中國的社會，是個最大的矛盾集團，時代的，地域的，階級的，主義的，一切矛盾，畢集于中國之一身。在這個狀態之下，國家無所謂「國是」，民衆無所謂「共信」，

人人不知向那裏去，三十多歲的人尙且不能「而立」，更何所責于青年？在這樣情形之下，青年學生自然不能得安定——身體的，心理的，意志的。於是乎最基本的衝動，向最薄弱的抵抗處發動，于是乎青年學生的事不是風潮便是戀愛。共產黨大開方便之門，故大有力量，老頑固無知識的作防川工作，是沒有效果的，且或者驅人向共產黨之人生觀走。所以青年的「安心丸」是極不容易製造的。然而

論學潮

臧暉

若想教育辦好，這個「安心丸」又非造出不可。

以上的第五件中，第一第二兩項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兩項是目下紊亂之直接原因；第五是一種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澈底改革，非對這些原因作有效的處置不可，否則改一回學制即增一回紊亂，作一次處分即種一次惡因。

至於改革的具體方案，下次再談。

六月二十七日平津國立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了一個

解決學潮的提案，其中列舉學潮的十種原因，並且提出六項消弭學潮的辦法。這提案是教育界中人談教育界自身的狀況，所以頗有親切中肯的話。他們提出的消弭學潮的辦法是：

(6) 禁止學生作政治活動。

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所舉學潮的十種原因，可以歸併作這幾種：

- (1) 用人應由考試。
 - (2) 寬籌經費以充實學校內容。
 - (3) 慎選校長。
 - (4) 保持師道之尊嚴。
 - (5) 實行校章以整飭學校之風紀。
- (1) 經費不足，又不按期撥付，故學校不能安定。
- (2) 校長與教職員不啻領導學生，故學校風紀不能整頓。

- (3) 國家政治不能滿人意，故青年傾向政治活動。
 - (4) 國家用人不由考試，故青年不看重學業成績。
- 第一項原因，是大家公認的。消弭的辦法，今日還談不到「寬籌經費」，只要政府能依預算按期發足，已可以使學

校安定了。經費不能按期發足，甚至于拖欠至半年以上；在這種狀況之下，校長簡直不能責成教職員上課辦公，那裏還談得上執行紀律和嚴格考查成績？經費最困難的學校，如北平的師大，如南京的中大，校長一席幾乎無人敢就。師大與中大近來的校長問題，其實背後都是一個經費問題。（師大徐炳昶先生辭職由于經費領不到；中大任鴻雋先生不就，由于經費無辦法；青大楊振聲先生月前辭職，也由于經費問題。）所以我們說：政府如有誠意收拾學潮，整頓學風，第一件任務應該做到不拖欠教育經費。全國國立學校的經費每月約一百萬元，全年一千二百萬元，在政府全年收入六萬餘萬元之中不過百分之二。政府無論如何窘迫，不應該連這寥寥之數都不能籌畫指定。

學潮的第二個原因是校長不得人，這也是政府的責任。去年一月六日行政院下了一道整飭學風令，其中曾說：「校長經政府慎重選擇而後任命，反對校長即無異反對政府！」這道命令頒布以後，各大學反對校長的風潮仍舊繼續不絕，所以者何？豈不還是因為校長往往不是「慎重選擇而後任命」的嗎？政府應該慎重選擇官吏。人民反對官吏即無異反對政府。然而政府若任命了一些貪官污吏，難道人民不應該反對嗎？政府應該覺悟：一個吳南軒可以造成學

潮，而一個翁文灝可以收拾學潮。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于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此一原則不但限于國立大學，凡用政治勢力來搶私立學校的地盤，或搶各省市教育廳長局長的地盤，都是製造風潮，自墮政府的威信而已。

學潮的第三個原因是學生不用功做工課。為什麼不用功呢？因為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裏，學業成績遠不如一紙八行薦書的有用。學業最優的學生，拿着分數單子，差不多全無用處；各種職業裡能容納的人很少，在這個百業蕭條的年頭更沒有安插人的機會；即有機會，也得先用親眷，次用朋友，最後才得到成績資格。至於各種黨部，衙門，機關，局所，用人的標準也大概是同樣的先情而後學業。即使有留心人才的人，學識資格的標準也只限于幾項需用專門人才的職務，那些低薪職務——所謂人人能做的——幾乎全是靠荐引來的。學業成績本不全是為吃飯的；然而有了學業成績而仍尋不着飯碗，這就難叫一般人看重學問工課了。所以平津教職員會提出「用人應由考試」的辦法，自然是不錯的。不過考試不是指戴院長所辦的考試，應該是考試原則的普遍實行。約略舉例，可以說有這幾點：

(一) 凡政府機關，除專門人才可由學術機關推荐酌量

免試之外，一切人人可做之普通職務（從工友門房到科員書記）必須經過考試，並且要把考試成績和各人在學校的成績合併平均計算。

(2) 凡公家機關的職員必須實行迴避親屬之法，有犯者應去職。合資的公司也應該適用迴避法。

(3) 嚴格的保持海關郵務等處已有的考試用人制度。

(4) 凡考試任用的人，除非有溺職的行為，不得隨長官的喜怒而更動；其升遷皆應該有常法。

學潮的第四個原因，誠如平津教職員會所提示，是由於國家政治不能滿人意。凡能掀動全國的學潮，都起於外交或政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現象：凡一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又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那麼，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總落在青年智識份子的肩膀上。漢宋的太學生危言讖議，明末的東林復社，清末的公車上書和革命運動，都是最明顯的例。外國也是如此的：歐洲中古的學生活動，一八四八年的全歐革命潮，土耳其，俄羅斯，波蘭，以至印度朝鮮，那一次不是上述公式的例子？所以有人責備某黨某派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那還是皮相的觀察。即使無人利用，青年學生的政治活動也是免不了的。因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沒有

家眷兒女的顧慮，敢于跟着個人的信仰去冒險奮鬥，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是由于很純潔的衝動，至少我們可以說是由于很自然的衝動。這種衝動既是很自然的，救濟的方法決不能依靠平津教職員提議的「禁止學生作政治活動」的方案。禁止是無用的；前清末年禁止革命，有何效果？近年禁止共產黨，又何有效果？平津教職員會還是主張由政府禁止呢？還是由學校禁止呢？在我們看來，這兩方面都沒有禁止學生政治活動的有效方法。我們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只有因勢利導的一條路還不失為教育事業中人值得一試的一條路。所謂因勢利導，只是要引導這很自然的政治興趣，使牠走向有教育訓練的方向，好養成真能擔負政治責任的能力與習慣。說的具體一點，我們提議這幾點：

(1) 學校對於一切政治派別，應該有同一的公道待遇，不應該特許某一黨派公然掛招牌設區分部，而不許別的黨派作政治活動；但同時學校也應該教導學生彼此互相尊重異己的主張。彼此尊重異己的主張是政治生活的首要條件，但在一黨一派特別受特殊優待之下，這種態度和習慣是不會發生的。

(2) 學校應該提倡負責任的言論自由：凡用真姓名負

責發表言論文字，無論如何激烈，都應該受學校的保障，但不負責任的匿名刊物是應該取締的。負責任是自由的代價。肯負責論責任的人，方才配爭自由，方才配做政治活動。

(3) 學校應該研究學生團體的組織法，指出他們的缺陷，引導他們改善組織，使多數學生能參加有組織有訓練的團體生活，養成政治生活必需的組織能力。這種能力的養成，應該從小學中學時代訓練起。孫中山先生認會議規則為民權初步，真是

英庚款的管理

七月六日上海英國人出版的金融商業報(Finance and Commerce, Vol. 20, No. 5) 有一篇短評，題為『英庚款的用途』，其中說：

一兩日前，倫敦路透電說：有一位議員在國會裏發表意見，說他恐怕英國退還庚款的錢在中國支用的方法並沒有完全依照兩國政府訂定的手續。這個消息並不足使我們驚訝。上海這邊的流言多著咧。最近有一大批馬口鐵(tin plates)在上海市面上

有見地的話。平日沒有團體組織的訓練，組織又素不健全，一日有非常事故，自然極少數的小組織可以操縱全學校的命運。徐旭生先生有一天對我說：「看了中央大學等處的學潮，使我們對於中國民治的前途很懷疑。」我對他說：「此等風潮都不足民治之過，全都是沒有民治之過。」凡有真正民治精神的學生組織，我敢保牠不會鬧風潮；即有風潮，也決不會是無意識的胡鬧。

廿一，七，十。

胡適

出賣，價錢比市價低的多多；有人傳說這一批馬口鐵是原來用英國退還的庚款買的。我們不知道這種疑心有什麼充分的證據，然而在商業場中一般人頗相信庚款的支用會有不規則之處(irregularities)，一種嚴密的調查是我們最歡迎的。……

這個消息也不足使我們驚訝，因為南方來的朋友也會對我們說起：近來有某個政府機關領到英庚款的錢買了英國的機器，本來是做什麼建設事業的，後來因為那機關沒有錢

發薪俸，就把買來的機器賤價賣了，既可以發薪，還有人可以賺錢！

這種傳說引起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官吏的新弊問題，一是英庚款本身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應該引起政府和國人的注意。

前一個問題是很明白簡單的。如果一個政府機關把用庚款買的機器或材料拿在市場上賤價變賣了來發薪水，或者竟因此營私利，這種事是政府的一個大污點。我們希望政府要澈底調查此事的真相，要把調查的結果詳細公布出來，使國內外的人明瞭這事究竟是謠傳還是事實。如果上文所述的馬口鐵案和機器案是確鑿有據的，我們要求政府要依法懲罰這種舞弊辱國的官吏。

但這種流言又使我們注意到英庚款的處理方法的本身問題。本來英庚款的處理是很苟且的。當時英國正鬧着失業救濟的大問題，短見的政客要把這筆大款子（本利合計一千一百餘萬金鎊，依當時的金價，約合二萬二千萬銀元）留在英國購買英國的機器材料。中國方面的短見政客也就迎合英國人的心理，答應「將該項庚款……整理及建築中國鐵路，並投諸其他中國生產事業」；並且聲明「如以該款在國外購買需用材料時，當向英國訂購之。」雙方

這樣湊拍，這攤件了十年的交涉就成功了。

當時中國政府方面提出的理由是：這樣投資於鐵路及其他生利事業，即是為教育事業設立基金的「最有利益之計畫」。所以兩國政府換文中都明白規定「在英國用去之款，當作為中國董事會借給各鐵路或其他生產事業的借款，應支付利息及擔任最後清償。凡清償該項借款本利之款項，均應交付該董事會，由該董事會即行用諸教育事業。」所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所定「借用英庚款保息辦法」中，有下列的規定：

(一) 凡向董事會借用庚款，應照中央之規定，按週週息五厘計算利息。

(二) 中國到期款項，各機關借用時，應先扣利息一年。其第二第三兩年利息亦應預付。至第四年起之利息，到期再付。在倫敦款項，各機關借撥後，其每次到期之年息不能清付時，應即停付繼續借撥在中國及倫敦部分之款項。

(三) 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能生利者，該借款利息應由該機關在其收入項下按期提付。遇不敷時，應由主管機關負責籌還。

(四) 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暫時不能生利者，該借

款利息應由借用之主管機關指定他項的確收入，清付到期應付利息。或由該主管機關商妥財政部指定的款按期墊付之。

(五)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非係生利者，該項借款利息，應由借用之主管機關商請財政部指定的款按期清付之。……

我們看了這些規定，應該可以明白：英庚款的管理是很不容易上軌道的。英庚款退還的目的是辦教育事業，而這種教育事業要全靠基金的利息。基金在那兒呢？基金是借給在中國鐵路和其他生產事業去了；絕大部份是用在英國購買機器及材料去了。兩國換文上明明說着借款的本和利都是基金，然而至今沒有人注意到這種借款應該怎樣還本，還本應該如何擔保。這是第一個漏洞，我們真不解這筆大借款的本錢將來怎樣還到基金裡去。其次是付息。付息的辦法，雖有上文所引的保息辦法，然而我們聽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會起息，財政部的擔保自然是一句空話，借款機關自身的收入按期提付也是不可靠的居多。如果上海的傳說是真的，那麼，買來的機器材料只是借款機關發薪水的一個方法，那有生利的收入？又那能提取收入來付利息？倫敦路透電說，那位在英國國會中提出質問的議

員所以懷疑的理由是因為管理英庚款董事會請求中國政府發給正式文件保障借款的利息，而中國政府至今不理這種請求。其實中國政府就發給了正式文件，庚款基金的利息還未必是靠得住的。借款利息之全無保障，是第二個大漏洞。

英庚款以借款為基金，而借款的還本與付息都至今全沒有保障，基金可說是沒有下落的了。我們推想這種危機，不能不歸咎於當日解決庚款的苟且，也不能不歸咎於管理庚款機關之組織上的不完備。管理英庚款的機關有兩個：一是在倫敦的購料委員會，一是在中國的董事會。購料委員會有主席一人，委員五人，主席為中國駐英外交代表，委員之一為中國鐵道部代表。其他四人由英國外交部長推荐股實而富有商業經驗之人，由中國政府與董事會商定後任命。

購料委員會的任務是專管訂立購料的契約並監督其實行；有餘款時，由該委員會設立儲金，留為將來購料之用。庚款解決以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積存之庚款全歸此會管理；以後逐年的退款，一半交此會，一半交在中國之董事會。在中國之管理英庚款董事會有董事十五人（十個中國人，五個英國人），皆由中國政府

任命。其中之中國董事，多是政府機關之代表，如外交部

、教育部，財政部，鐵道部，建設委員會，導准委員會，

各有代表。這兩個管理庚款的機關，職權上是不相統轄的

。購料委員會掌管鉅款，遠在外國，委員任期幾乎是終身

的，只有辭職而無滿任，他們自以爲是與董事會同時依據

中英換文產生的，故不受董事會的統轄。董事會根據中英

換文裡所載「其他四個購料委員，由英國外交部長開一名

單推荐於董事，由中國政府與董事會商議後，隨時派充」

一節，以爲「董事會在事實上當然爲購料委員會之上級機

關」。董事會訂定了購料委員會的章程，規定該會爲「隸

屬於董事會」。但委員會向外交部聲稱，「與英方委員討

論，均云中英換文規定，即係委員會章程，自可勿須再訂

」。這是明白否認董事會訂的章程了。董事會在去年十一月

十七日曾呈行政院抗爭統轄權，至今沒有結果。購料委員

會所持理由是不充分的，他們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然而董

事會本身的政治臭味太濃厚，根基不穩固，組織不健全，

也是不能叫人敬重的大原因。依現在的情形看來，購料委

員會竟是一個獨立的機關，董事會完全管不着。董事會所

管的款項只有借款的利息和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的一半。

今年三月以後，英庚款停付一年，於是董事會所管只有那

渺茫不可靠的利息了。

董事會的董事是由政府任命的，有缺額時仍由政府任

命補充。董事是不免受政治影響的，如去年秋間，董事黃

漢樑因政治上的關係脫離鐵道部，即被政府免去董事職，

另任顏德慶補充。這種政治上的牽動是很不好的現象，因

爲黃漢樑可以因政局變遷而被免職，其他董事也都可以隨

時因政局而被更換了。這是董事會組織上的一大缺點。其

次，董事所代表的機關，如建設委員會，鐵道部，導准委

員會等，都是借用庚款的機關。他們所注意的是幫助他們

代表的機關向庚款借錢，至於借的錢如何還本，如何付息

，那是關係將來教育事業的事，他們似乎很不關心。至於

借去的錢是否全用在生產事業，是否用的得當，這也似乎

是他們不很關心的。這又是董事會組織上的一大缺點。

總結以上所說，我們要指出英庚款的管理有下列的幾

項大危險：

(一)庚款全數用在官辦的生產事業上，還本無辦法，

付息無可靠之擔保，這決不是「設立基金最有益

之計劃」。

(二)董事會不能脫離政治勢力的支配，自身基礎不能

穩固，所以名爲「管理英國退還庚款」，其實沒有

管理的實權。

(三)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的代表，其流弊也許可以單顧到借款機關的利益，而不顧到基金的前途。

救濟的方法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的希望是要從根本上變更庚款換文所規定用投資借款作基金的原則。去年三月以前所積存的庚款，有四百萬鎊之多，不妨依原案作鐵路及其他生產事業之用，但亦須嚴格規定起息日期及還本付息的擔保。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應該變更辦法，完全交董事

漫 游 散 記 (四)

丁文江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續)

●一千五百里的小路

——從鎮遠到常德——

——瀘水與沅江——

我于宣統三年六月廿九日到了鎮遠。從昆明到湖南，

湖北的旅客從此改坐民船，順沅江向東到常德。我的旅費原是我的朋友李祖鴻俱給我的，數目本來不多。走到鎮遠，所餘已經無幾。自己僱船費用太大，預算恐怕不能到家。幸虧我有一個同鄉的前輩，在雲南做普洱府知府，也走

會管理，以一半存儲作基金，以一半隨時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業上。根本原則若能變更，董事會的組織法也應該澈底修正，總要一面使董事會完全脫離政治的波動，一面增加牠的實權與永久性。如此辦法，也許還可以救得庚款的一部分。若由今之道，不變今之法，我們對庚款的前途是免不了很大的悲觀的。

二十一，七，十二。

這條路回籍。他帶得有家眷，本來要僱船。在昆明約定我到鎮遠等他，搭他的船同走。所以一直到七月六日方纔由鎮遠動身。

鎮遠是沅江上游瀘水的航路終點。貴州東部的商業集中于此。號稱有四千戶，實際不足二千。街市分佈在瀘水的兩岸，北岸是縣城，南岸是衛城。所謂『城』並無連接的城牆，因為縣治的北面緊接着石屏山的南坡，衛城又在五老山的北麓。向東兩山合攏來，把瀘水夾在中間，所以南，北，東三面都用不着城牆。惟有西邊向文德關的

路有一道短牆，從石屏山到江邊；東南角五老山中斷的地方，有個關隘，通清溪縣。城的東面，無水之上，有一道很大的石橋；長九十多公尺，寬七公尺，高出水面十幾公尺。橋有五個大孔，橋中間有一個十幾公尺高的寶塔，是貴州很少見的建築。

無水又名鎮陽江，是沅江的支流。從貴州下湖南的水路，從鎮遠向東北經過清溪玉屏兩縣，入湖南境內的大魚塘。由此向東，經過晃州到沅州。過了沅州，江先向東北，再向東到榆樹灣，轉而向南到黔陽縣，與沅江的正流會合，繞了一個極大的灣子。過了黔陽，沅江先向東到洪江，再轉向東北，正北經江口向西北到辰谿縣，再向北到瀘溪。過了瀘溪，江有時向東北，有時向東，曲折的經過桃源到常德。沿途重要地點的距離如下：

| 地名 | 距鎮遠 里數 | 各地間 里數 | 地名 | 距鎮遠 里數 | 各地間 里數 |
|-----|-----------|-----------|----|-----------|-----------|
| 清溪 | 九〇 | 九〇 | 洪江 | 六五〇 | 九〇 |
| 玉屏 | 一四〇 | 五〇 | 辰谿 | 九一〇 | 二六〇 |
| 大魚塘 | 一八五 | 四五 | 瀘溪 | 一〇〇〇 | 九〇 |
| 晃州 | 二三〇 | 四五 | 辰州 | 一〇八〇 | 八〇 |
| 沅州 | 三八〇 | 一五〇 | 桃源 | 一四三〇 | 三五〇 |

黔陽 五六〇 一八〇 常德 一五二〇 九〇

從鎮遠到常德一共一千五百多里路，我八天就走到了。這是因為一來宣統三年夏天湘沅一帶大水，二來因為河身的坡度很陡，所以河流很急。我當日從鎮遠到洪江所測的高度（以出海面公尺計算）如下：

| | | | | | |
|----|-----|----|-----|----|-----|
| 鎮遠 | 五〇七 | 清溪 | 四五五 | 玉屏 | 三六五 |
| 晃州 | 二七〇 | 沅州 | 二四〇 | 黔陽 | 二〇〇 |
| 洪江 | 一八〇 | | | | |

看上列的表，從鎮遠到洪江，六百五十里路，水面低下三百二十七公尺，平均約每二里低一公尺。揚子江從重慶到宜昌一千里路，重慶出海面二三八公尺，宜昌出海面九十二公尺，平均每七里纔低一公尺。所以沅江的坡度比揚子江上游要陡三倍有餘。不過因為水小，江流反不若揚子江的急。據我的估計，沅江夏天的水流速度平均在每小時十里左右。下水的船每天要走一百七八十里。若是上水，所需的時間在三倍以上，從常德到鎮遠至少要走二十四天。

無水，沅江都是急流淺水而且多灘的山溪。從鎮遠到常德，可以就水的深淺，灘的性質，和山谷的形勢，分做三段，第一是從鎮遠到黔陽的五百四十里，這是無水的本

身；第二是從黔陽到桃源的八百七十里，這是沅江；第三是桃源到常德的九十里，名雖仍爲沅江實際上桃源以下，已經到了洞庭湖的淤地。

第一段在貴州境內的一部分，河身都在石山裏面；江面最寬的地方不到四十公尺，狹的地方不過十七、八公尺；水深的地方不到三公尺（如清溪附近），淺的不過一公尺（如鎮遠）。沿路灘很多；從鎮遠到大魚塘，我數得有大小十八個灘；其中如鎮遠大橋以下的高花灘，蕉溪與鎮遠之間的三門灘，枚灘，都是比較大的。清溪以西，兩岸的山比較的高。如鎮遠東邊的高花灘，清溪以西的銅鼓浪，鷄鳴關，都是絕壁。如蕉溪，如田鋪都是比較的大村子，附近江邊稍有水田。從清溪向玉屏，水田更多一點，但是在玉屏城西三四里仍然有一段石岩絕壁。從玉屏東向北入湖南境內，山谷漸漸開展，一直到晃州，兩岸大部分是土山，山上往往有樹木，灘也比較的少，江面之寬窄，水的深淺，與在貴州境內差不多。

一過了晃州，江右岸是一百公尺以上的山，左岸的山較低，山中間都有水田。江面在三五十公尺之間，水深在一公尺半以上。如是一直到晃州以下廿八里的曹家溪。都沒有灘。一過了曹家溪，一直到便水村，三十六里，兩

岸都是高山，中間有兩個大灘，刺灘和黃后灘，尤其是刺灘有危險的名；江的右岸有許多石礁，把江水束狹到十五公尺，灘長不過十六公尺，而水平差一公尺有餘，所以極其難走。從便水到白馬鋪，兩岸山漸低，水田較多，但是仍然有灘。從白馬鋪到沅州有好幾個大灘：如沈家灘，山鵝灘，大關東灘都是上下行船危險的地點。

沅州是無水邊一塊比較大的平地，縣城在江左岸，江上架了有一座十五孔的石橋。城的東關都是水田。從此江向東北，兩岸都是小山，河谷開展，水田很多。離公坪村不遠的地方，江轉向東，一直到榆樹灣，左岸離大山較遠，江邊仍有水田。從榆樹灣起，江轉向正南到黔陽，沿途只有在鴨嘴岩附近，江左岸有高山，此外，兩岸都是低邱。江面在沅州約五十米突，到榆樹灣只有三十米突。沅州與黔陽之間，灘比較的少，水流也不很急。在黔陽城西，沅水的正源從西面來會。無水的顏色是紅黃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兩條水會合的地方，清水與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纔完全混合。

第二段是沅江的正流。無，沅二水在黔陽會合，向東南九十里到洪江。兩岸都是高山，水流很急。我一點四十

分從黔陽開船，四點十分就到了洪江——兩點半鐘走了九十里路！漁水在黔陽江面不過一百二十公尺，合流後的沅水，江面在二百公尺以上。漁水深過二公尺以上的地方狠不多，淺的地方只有一公尺，所以只能通吃水二尺的小船。黔陽以下，吃水三尺以上的船可以暢行。江面既然加寬，江中常常有沙洲，附近有灘。黔陽，洪江闊大小有二十多個灘，其中有名的是鷺鷥灘，蓮洲灘和獅子灘。

洪江是湖南有名的鎮市。街道從沅江右岸向東，再沿巫水（又名竹舟江）的左岸向南，長不下十里。所有湘西的商業都在此地集中。巫水從南來，與沅江合。江面在四百公尺以上。從此向東北，兩岸山都不很高，一直到洪江以下六十里的黃絲洞，江轉向北流，纔又遇見高山。黃絲洞在江的右岸，對岸山上有一個廟，過了廟，江流入峽谷，四十多里路，一直向北到銅灣市，方纔出峽。銅灣市以下到江口，兩岸仍然是高山，但是山谷較寬，兩岸有水田，江口在沅江的右岸，小江從淑浦縣來會。從此轉向西北到辰谿，江面放寬，兩岸依舊是高山，將到辰谿，地形忽然一變，江兩岸都是很低的邱陵，中間都是水田。從洪江到辰谿二百六十里大部分在高山中走，是沅江風景最好的地方。沿途有許多沙洲，洲邊往往有灘。最有名是岩門，

淇灘，斜灘，橫灘，龍虎灘。

辰溪縣在沅江的右岸，辰水從南來會。沅江轉向正北。從辰溪二十里到浦市，江面寬二百至四百公尺，左岸差不多是平地，右岸都有斷續的低山。浦市在江的左岸，是一個極大的鎮市；居民在一萬左右，比辰溪縣城還大。從此向北再二十里，江又入山，江面也漸狹。從麻溪到瀘溪縣四十九里中，如小曲灣，紅岩，岩角都是峭壁，江面以三百多公尺，縮為六十公尺。紅岩附近出錫礦。從辰溪到瀘溪的九十里路，中間很少有灘，但是沙洲頗多。如浦市上流的康公洲長在五里左右，瀘溪上流的武口洲也有二里多長。

瀘溪在沅江的左岸，武水從西來會。江面在四百公尺以上。從此沅江折而向東，兩岸都有山，左岸約在三百公尺以上。離瀘溪五里的大龍溪附近，江邊都是峭壁。江面寬不過一百多公尺，再向東北，山漸漸低，江面開展到三百公尺。過離瀘溪四十里的荔溪口，兩岸只有二、三十公尺的小山。一直到辰州，地形沒有變動。

辰州在沅江的北岸。酉水從西北來，在城西與沅江會。酉水可以小船，所以辰州的市面總算繁盛，人口在一萬以上從此曲折或向東或自北，經過橫石，北谿，朱紅溪，

大宴溪，麻衣汛到柳林汛，二百多里路，都是峽谷；江面寬一百五十公尺到二百多公尺，水深平均三公尺。從柳林汛十八里到界首，山勢漸低。從界首向東北，再折向東南，經過夷望溪到新湘溪，沅江漸漸脫離山地；從新鄉溪經白馬渡到桃源，六十里路，完全在紅砂岩的盆地裏面，江面展寬到四百公尺左右，這是洞庭湖地與湘西山地的過渡地形。

從瀘溪到桃源，沿路的灘很多，如清溪以下二十里的丑溪灘，辰州以上二十里的酒杯灘，辰州以下五里的柏葉灘，橫石以下的楊家灘，朱紅溪以下的鴛灘，以及界首以上的甕子灘，夷望溪與白馬渡之間的沙夢灘，毛藥寺灘，沈灘，都是航路的障礙。以上所舉的灘，都是沙洲所成。沙洲大的有四五里長，小的也有幾十公尺。這種沙洲不但使河身忽然增高，水要經過高地，再向低處下流，而且洲與岸之間，江面較狹。水流更急。這種灘的性質，根本與黔陽以上的石礁所成的灘不同。但是沅江正流中也有幾處石礁，而且所成的灘，比任何灘都要危險。這種石礁都在大宴溪以下，到轎子灣的十幾里之中。這一段江，中間有許多長的石礁，順着江岸排列，船往往須在兩條石礁之間穿過，所以比普通橫的石礁尤其困難。從大宴溪向東，

有清浪灘洞庭溪，雷迴，五汶等灘，都是這種長石礁所成。

這種灘的危險，是我親眼看見的。從鎮遠向東，我總是在船頭上觀察。每逢過灘，也是如此。起初船一到灘裏，兩邊都是浪花，也覺有點可怕，以後看得慣了，也就不以為奇。船過了大宴溪，沒有幾里，就是清良灘。有一隻船在我們前面走，相距不過幾丈，牠快要過完灘的時候，我們剛進灘。忽然看見前面的船回右一側船頂上放的一隻烏籠子先掉下水去，跟着就是一頂轎子，船頭兩個船夫，在右邊的一個也摔了下去。只聽見船艙裏的婦女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共不過幾秒鐘的功夫。幸虧旱舵的死亡的把船一掣，船沒有完全翻過來，先冲到淺水的沙灘上。掉下水的船夫也沒有死，只不見了烏籠子和轎子。當前面船要翻的時候，我只看見我們的船夫，臉都嚇青了，手只是抖。尋常過灘，前後的船夫，往往唱和相應，壯自己的膽，到這時候，一切喊叫都停了，鴉雀無聲。一等我們自己的船也出了灘，船老板到艙裏面，向我的那位同鄉大叩其頭，口裏只是說，「大人！恭喜！托大人的福，大家都有了命！」我問他道，「前邊的船要是翻了，我們有甚麼危險？」他說，「老爺！你真正不明白！灘中間船可以走的路沒有

多寬。前面的船若是翻了，把我們的路塞住，我們的船也得要翻。不幾分鐘到了伏波廟。船夫買了許多爆竹在船頭上放，又帶了香燭，上左岸山頂上廟裏去叩頭謝神。

第三段是從桃源到常德。桃源城在沅江的左岸，人口大約在二萬以上。沅江的左岸到此完全是平地，右岸則還有二三十公尺的小邱。這大概是古雲夢澤的西南角。

桃源出海面的高度我當時沒有測。不過長沙出海面不過六十多公尺，常德大概不過七十幾，桃源想起來總在八十與九十之間。所以桃源城比洞庭湖水面高不了好多，一發大水，就要被淹沒。我走過的那一年（宣統三年）是空前的大水，全城都在水裏，城外的寶塔只有三級在水上面！從桃源向北到陝市要經過鱉洲、鷺洲等幾個大洲。我經過的時候，大部分淹在水中。

陝市離桃源五十里，也被水淹了。由此向下，兩岸沒有山。沅江成一個四十里長S形的大灣子到常德。江面寬四百多公尺，邊上有隄岸，有好幾度被水冲破。許多災民逃在沒有冲壞的隄岸上住着。沿路只見見蓆蓬子，和用繩子掛着晒的衣服。常德上游十里左右，還有一個娘娘灘，也是沙洲所成的。這是沅江最後的一個灘。

常德在沅江的北岸，是湘西第一個大城；人口有五六萬。城是東西長而南北短，所以東，西，下南，上南四個城門都靠着江邊。那一年所遭的水患，沒有桃源那們利害。但是從江邊進城沿途都鋪得一尺多高的木板，城門口有好幾寸的水。聽說上游有個石隄，還沒有冲破，不然全城也都要淹在水裏面了。

時代公論 第四十號 第七月一日出版

時事述評三則
方向轉變和我們的任務
經濟破產與政治危機
江浙各縣財政的瓜分制度
甘地主義是不抵抗的嗎？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怎樣提倡工程教育？
為青年出路問題與教育當局商榷
何謂詩？
零售每份八分，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
元八角，郵票代銀九五折。
通信：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國立中央大學 社會科學季刊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中國最近之民族復興運動
社會之貢獻
合作社之定義及其分類
公務行政之強化
現代行政權之四則
中國問題研究四則
德國唯心論的政治思想
聯邦政治之比較的研究(二)
國際問題研究三則
美國一百五十個城市稅率的比較
發行：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
定價：各埠各大書店，每份三角五分，全年一元四角。

朱伯康 孫本文 樓桐孫 梅思平 莊心在 杜巖雙 蔡可成 曹毅成 阮壽譯 周壽譯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答覆幾位青年的來信

近來一二月間接到好幾封素未謀面青年人的來信，內容小異大同，都是訴說他們的心裡的悲痛與煩悶，並且詢問或討論做人或求學的方針。其中有一封還說因為我是向無黨派的所以更要聽聽我的意見。這可把我難住了，因為我向來專心做我的大部份而且很特別的事，對於指導青年的重責實在是不敢當。因此我對於這類的信或是沒有復，或時很潦草的答復了。但子細想來，這樣辦法是對不起人的。而且現在有同樣疑問的青年恐怕很多，既有問題自然應該討論討論。所以不揣愚昧想了一想，憑我的良心，寫幾段送在獨立評論發表。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迫的時期，悲痛與煩悶是當然的。青年的固然如此，成年的老年的難道不如此？我自問也還有三分血心，所以人家向我訴苦，我說也許比你感覺的更苦。你沒有辦法，我又何嘗有辦法？有一次我在感慨很深的時候，寫信給一個外國科學朋友，禁不住也寫了幾句煩悶的調子，並且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你看我怎麼好呢。

那位朋友回答我說，『在這樣苦境中，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更應該拚命做你的工作。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工作能够造成人類的幸福』。初看起來，這也許是隔岸觀火不關痛癢的話罷。回頭想想，這種觀念至少可以做一大部份人的南針。我說此話只可適用於一部份人，因為此外還有人能够去當義勇軍，或做其他直接救國的事業的，他們力盡心安，當然得到一種安慰。至於因能力，責任，或其他環境的關係，不能這樣做的，與其在家歎氣，何如努力工作？

一國的國力是全國國民努力的總和。我們做的事業雖然不同，終究直接或間接都與我們的國家有關。我們看看大家不得了，我們最低的責任當然是要問自己曾否盡力做了我們份內的事。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直接可以救國，當然應該奮勇的去。萬一沒有這個機會和力量，至少更應盡力做我們份內的工作。不管成敗利鈍，我們將我們的工作做完了，總算盡了我們的心力。好像當義勇軍的，把他的子彈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場，也算盡了國民的責任。光榮雖有大小，意義差不多一樣。

一個工程師去造一條鐵路，鑿穿了山，打開了洞，築好路基，鋪上鐵軌，把一星期的路縮成半天，把窮苦的地方化成繁盛。這個工程師也許不能成爲報紙上所稱的名流，但是他的工作真能造福於人，他的一生便不虛了。一個醫生在鄉僻地方，開了一個小醫院，醫好了許多病人，消除了若干傳染病，雖然不會發大財，但終身有事可做，也可算無負於社會了。再如一個小學教師，盡心去教，能够培植國民的根基，挽回社會的風氣，他的影響正是不小。所以無論何種工作，都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都值得盡心盡力去做。

說到工作，我很知道許多青年感覺煩悶的一個原因正在沒有工作。大多數青年也很知道做人應該有一種正經工作，他們正因爲找不到正當而有興趣的工作去努力，所以感覺生活的空虛。他們找不到一個目的物，去施用他們的心思才力，所以徬徨的追求人生的意義。冥想的追求往往不得結果，所以愈想愈空，愈想愈煩悶。因此我以爲「求工作」確是許多青年公共的呼聲。「求工作」並不一定是「找飯碗」，儘有許多找到了飯碗而並不能感覺滿足的。求工作是要盡做人的責任，是要實現人生的意義。

現在許多青年都感覺沒有工作的煩悶，這固然可以歸

罪於社會環境不良等等。但也要怪他們缺乏自求工作的精神。往往有人以爲拿得了畢業文憑，便應該有人來「安車蒲輪」迎接他去，不然便說灰心。其實這是事實上不能常有的。即使在外國各種事業發達的地方，近年來因世界經濟困難的結果，各國都有許多很好的專門家沒有正當工作。我都時常收到這種「懷才求售」的信，我以爲這是很當然而不可菲薄的。很有許多人能如此找到而做成重大事業。所以我勸一般大學畢業生一時找不到事的，千萬不要灰心。他們應該更加努力去找求工作。並且應該儘力找他們本行的工作。固然有若干工作是必須由別人聘請或僱用，初畢業的青年如果沒有介紹，往往無路可入。正當方法是自謀表現，或是寫信或發表文字，毛遂自荐也並不是爲恥。最好是自動的作些個義務的工作，給人家看。古人說「雖處於囊必能脫穎而出」，只要自己努力到真有能力真有成績，絕不會長久埋沒的。「中國社會沒有公道」這是有爲而發的感慨話，不可盡信。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究竟人才還少。同等的人才在中國找事恐怕比外國還容易的多。你不見各大學的教授麼，只要稍肯努力畧有成績的學者，各大學幾乎東拖西拉，加薪抬價，爭之惟恐不得。甚至事理精明文字略順的官僚，各機關都非極力拉上幾位不能辦事

。其實這樣能力並非甚難。現在的青年正應該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只要努力，決不會白費的。

此外也有許多工作不必等人來請，儘可自己去做的。

例如學醫的人，如果大家擠在北平天津等大都市，病人有限，醫生日加，當然總有一天許多人無事可做。但是中國內地正還缺乏幾萬個科學醫生。我嘗在四川鄉下旅行，看見瞎眼的人路上幾乎陸續不絕。這當然是彼此傳染，無人醫治的現象。西洋人傳教的或是做學術考察的，到中國內地旅行，只要略懂醫術，便是最好的敲門磚，最有效的介紹信，到處有人歡迎。我有一個朋友，略懂醫術，到甘肅被匪擄去，適遇土匪首領有病，給他治好，便很客氣的送他出來了。這都證明做醫生的只要肯到內地去，決不愁沒有工作。同樣的中學或小學教師在內地是如何缺乏，雖然在大都市中往往重重疊疊的分成好幾批，環繞少數地盤，借政治的力量來你爭我奪，前仆後繼。固然名利之求人難免，爭名于朝爭利於市，此亦人情之常。但是名利都是比較的分別，實在的工作却真是可以做精神上的安慰。爲有志的青年講，你們不是要工作麼，你們只要自己去找。你們不願學而無用，只要你們自己能用其所學。人固然要靠事業來養，但事業也全靠人去做。中國目前現成的事業

尙少，更需要有創造事業的精神。所以學生選定學科，一定要問某科已有什麼已成的事業容易加入，更應該問中國還有什麼缺少的事業等我去辦。社會上做事有時好像科學家研究問題，越是研究已多的事物越不易得新結果，越是未經研究的處女地越容易有新發見。

中國有句老話叫『學以致用』，從前觀念往往把『致用』作爲做官或發財的意思，這當然是太卑鄙了。如果解作『用其所學』，便是一句很好的格言。我常可惜大多數學生缺少這種致用的精神。教科書裏或講堂上所說的話，他們往往抱一種『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不肯實地應用，這真是最可惜的。只要看外國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他們所有的專家學問往往是很平常的，但是他們住的地方把經緯度也測定了，很長久的雨量紀錄也有了，有許多物產等等都發見了。中國人雖然會做，但往往不屑做，不高興做，所以便學而無用。外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愈做得多愈高興，並不要等人家去催他。中國人往往以爲工作愈少愈是幸福，除非有不能不做的原因去壓迫他，這便是學而無用。因此許多工作我們並非不會，却是往往不做。例如有許多大學都有測量功課，教經緯度測量的方法，但是有幾處地方中國人自己把經緯度測定過呢？說到此地我們自己

更覺慚愧，北京城裏地質學和考古學的興味總算濃厚的了，但是周口店的猿人牙和景教碑，還都是先經外國人發見，告訴我們纔知道的。現在我要說的是，我們必須振起我們致用的精神。只要有一技一藝，甚至於一知半解，我們便要隨時隨地去應用他，到處求問題，隨時求解決。如此做去，則能力因應用而漸高，經驗因歷練而愈富。學得其用，日有進境，在本身已是一種安慰，一種快樂，可以打破生活的空虛，而且如此做去，總有若干成績不致完全埋沒，就是爲求名求利的方面講，也是一種比較最好的方法。

我也認識若干青年都很贊成我的意見，但是他們又有一個難題，就是感覺學校功課太不充實，學了之後即使要用其所學，實在是無學可用。這真是太可傷心的事。學了四年，戴方巾，拿文憑，而自己承認一點沒有得到什麼。同時爲生活所迫，却不能不在社會上找一個位置，胡亂擔任一個職務。要解決這個困難，一方面只好希望教育當局把教育真當作一回事，拿出良心來好好的幹。教授先生們也要度德量力，專心教他們能教的功課格外努力。另一方面

面，如果學生們大家學求必得，求徹底的瞭解，求事實的證驗，求實地的練習，強聒不舍，也可以逼得冒充的教授改行，偷懶的先生格外用些功。只要大家覺悟，努力工作，這種精神會像傳染病一般自然的普及。這種精神普及了，我想國事總要好些。

再爲已得工作的人講，不論事之大小必須好好的幹。對於自己成績的志願不妨提高，對於比較他人的野心不可太大。社會上偶然的不平等恐怕是不容易消滅的，如果，爲美慕『同學少年多不賤』，便拋棄自己的工作去蠅營，去狗苟，結果裘馬未必輕肥，反而失了本業。究竟公道自在人心，壞人終也不能叫成好人。現在最危險的一種現象，是個人的慾望格外猛進，對國家對社會之觀念過於灰心。有若干青年平時歎歎太息，痛恨別人不好。一朝自己做事，却一樣的腐化作孽。所以能有更高的目標固然更好，即使不能也要立志始終做一個好人，并一個有用的好人。我狠慚愧我沒有多大人生哲學可以貢獻，我更不願說過於高遠難行的話。但是以上的感想至少可爲若干普通人說法，也是我對寫信給我的人誠意的答復。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真

關於教育改革之具體問題，原則上我們可以有些意見，其施行的詳細方案乃是教育當局的事，我們局外人既無材料在手，自然無從懸推。

教育改革具體方案之原則，一時想來有下列數事。

(一) 全國的教育，自國民教育至學術教育，要以職業之訓練為中心的。這話不是江蘇省教育會一系人之老調頭，他們的辦法是把學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職業的「藝徒學堂」，幼年人進學堂，如進工場一般，這是極其不通的。我們乃是主張學校中的訓練要養成幼年人將來在社會服務的能力，養成一種心思切實，態度誠實，手脚動得來，基本知識堅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學雖有化學，然而如竟專心製起胰子來，雖有物理，然而專心做起電燈匠來，都是大可不必的。不過，化學雖不造鹼，而必使中學畢業生在化學工廠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化學知識，在農場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動植物知識，然後這教育不是失敗的。

在這「職業訓練」的要求之下，我以為中小學的課程

應注意下列數事：

甲，將中小學課程之門類減少至最底限度，僅僅保留國文，英文，算學，物理，化學，自然知識，史地知識，體育等，而把一切不關痛癢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將寬義的工課堅實的改良，使其能容納些可靠的人文知識，不專是一年又一年的叫口號。當年黃炎培等人擬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學，這個題目在歐洲尚不曾建設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訓練之意義。試問中國有誰配教這門工課？在高中又如何教法？這樣子做下去，又何怪乎今之學生專到些不三不四的書店中，買些唯物論社會書呢？

乙，每一科目寧缺勿濫。在城市的學校可除自然知識，在鄉村學校亦可酌量減除些科目，只有國文英文算學是絕對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設之後，必求有實效，國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錯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實用不可，算學非教得有算術，幾何，代數，最淺解析幾何，最淺微分之基礎知識，而能實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對於電燈，肥皂泡，天氣變化，熱力工

用，等等一切我們四圍環境中遇到的事件，能與書本上的指示連起來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們園中的植物拿來分類認識出來不可。一切功課都步步跟着實驗，教科書不過是一個參攷的手本，訓練的本身乃在動手動脚處。國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歷史要教到堅實而不盲目的民族主義深入心坎中，同時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義，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質的憑藉，及全國經濟生活之綱領，若專記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爲實現這樣的課程，教育部有設置幾個專科的課程編定委員會之必要。

照這樣做下去，然後以下列的標準考察一個學校辦的成功或失敗：一，學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課本上的知識的能力；二，學生能不能將日常環境中的事與課本上的知識聯貫起來。能，便是訓練的有效，不能，便是製造廢物了。這樣的訓練，不特可以充分發育一個人之用處，一個人將來在職業上的用處，並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習慣，思想不清的涵養，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 全國的教育要有一個系統的布置。民國以來的教育，真可謂「自由發展」了，其結果是再紊亂不過的。私立學校隨便開，大學隨便添，高中滿了全國。即令這

些學堂都好，也要爲社會造出無數失業的人來，而況幾乎都不成樣子。現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幾個當務之急。第一，作一個全國教育的統計，同時斟酌一下，中國到底需要些那樣人，然後制定各校各科目的人數，使與需要相差不過。第二，使公立學校在上下的系統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當的照應。第三，限制私立學校，使他不紊亂系統。第四，最要緊的——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職工教育，學術教育，中間之相接相配合處釐定清楚，務使各方面收互相照應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岔八錯之形態。

(三)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試以普魯士爲例，雖說大學教授講座之選補權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廳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實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無法以個人好惡更動之。以當年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革命後魯普士教育部長免了一個國立歌劇院院長的職，竟發生了大風波。如熟悉德國教育情形，當知高等教育權皆在所謂秘密參議手中，普通教育權皆在所謂學事參議手中，其用人行政，一乘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這樣子固然有時生出一種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總不至于大紊亂。中國的教育

廳長特別市教育局長可以隨便更換，這猶可說他們是政務官，然而廳長局長竟能隨便更變校長，一年數換，于是乎教員也是一年數換了。服務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們又焉得安心教書？又焉得不奔競，不結黨營私？

所以政府的責任第一是確定教育經費之獨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教員教授的資格，審定之後，保障他們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設置有力量的視學，教廳亦然，參以各種成績之考核，純然取用文明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辦法，定教育界服務人員之進退，及升級補缺。河南省的教育經費能獨立，山東省的教育不會換過長官，其結果便比江蘇安徽好得多，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國的教育是自上腐敗起，不是自下腐敗起。

民國二十年來的事實可以完全証實此說。教育部沒有道理了，然後學制紊亂，地方教育長官不得人，校長不成樣子。校長不成樣子，然後教員不成樣子，然後學生的風紀不堪問了。政府有時稍稍表示認真的決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國十五年國府在廣東時，把中山大學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學生須經甄別，當時的中山大學真可謂黨派鬥爭之大集合，亦是學潮風潮的博物館，然而政府一經

表示決心之後，竟全無問題，雖共產黨都不鬧，于是中山大學有了三年的讀書生活，以後仍是政府措施不當，然後風潮又起來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頓中央大學的意思，不特在中大辦下去了，即遠在北平的大學，也望風軟化，雖以劉哲一樣的人，尙能以決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況其他？可見中國的學潮正是沒有很多嚴重性，只等於頑童鬧學罷了！所有頑童鬧學都由於家主昏聩，教師無恥而起，一旦家主不昏聩，教師不便無恥了，則頑童不特可以不煩，或有成爲「吾家千里駒」的希望。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頓，學風之改善，其關鍵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學校長永遠任用非人，雖連着解散幾次又何益？然則今之政府之責任，在整頓自己責任內的事，此事辦到，學潮雖求之不得的了。所謂政府責任內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項：

甲，把教育部建設成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官廳，以法蘭西普魯士的教育部爲榜樣做去，不特參事司長不能用一無所能的人，即科長科員亦必用其專門之長。此外更設教育統計處，以便全國教育事項瞭如指掌，設教材編纂處，不再審定些亡國的教科書。

乙，廳長大學校長教育局長必須用得其人，其人若有

人品，有見識，有資望，自然沒有學潮，有也不至為大害。以我個人教書的經驗論，學生多數是好學生，我一向對學生極嚴厲，並未遇到反響，所見的學生搗蛋，皆自教員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當局要為有才學的窮學生籌安頓。中國的家庭是最腐敗的，中國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低等的，所以嚴格說去，中國無「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賢士幹才多出於貧寒人家，環境之嚴苦鍛鍊出人才來，不是居養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舉時代，窮人是比較有出路的，一來由於當年讀書本用不了許多錢，二來由於當年義學，宗塾，庠塾膏火，書院獎勵，試館，等制度，大可幫助有才無錢的人。今日之學校教育，用錢程度遠在當年之上，並無一切獎金助金。國家號稱民國，政治號稱民權，而貧富之不平更遠甚，成個什麼樣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場言，極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論，也是種下一

廢兩改元問題

個最大的危險種子。所以我來提議：

甲，把自大學至小學的經費抽出至少百分之五來作獎學金。

乙，把一切無成績的省立大學停止了，改成獎學金

(國外留學金在內。)

丙，把一切不成樣子的私立大學校停止了，改他們的底款為獎學金。

丁，一切私立學校不設獎學金者，不得立案。

戊，學費一面須收得重，獎學金額一面須設得多。

於是國家有國家的獎學金，省有省的獎學金，縣有縣的獎學金，學校有學校的獎學金，團體有團體的獎學金。於是學生用功了，窮學生尤其用功了，學校的風氣自然好，社會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關於學術教育的事項，後來再論。

最近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因洋釐慘落，有廢兩

改元計劃，據九日大公報載，廢兩原則已決定，實行期末

定；但三個月內可準備完成，最末易解決者銀元法價標準相去太多，難于劃一，滙造幣廠俟新模到即開鑄，並開始

自由鑄造云。消息傳出，當天上海洋釐猛漲，結果每萬較六日暴漲五十七兩五錢。次日，上海錢業公會召集臨時會員大會，討論廢兩問題，並拍致財政部一電，請事先詳密準備，然後公佈施行，于是申釐第二天又回跌到以前的水準了。

中國幣制的混亂，已爲人所周知；但對於銀洋並用的弊害，多有不甚了然者。我國滬漢津等通商大埠，日常用，雖爲銀元；而大宗貿易及計算單位則爲銀兩，上海謂之「規元」，天津則稱「行化」；但規元行化，並無實物（其實際貨幣爲寶銀），祇不過用爲計算及記賬之單位（虛銀兩本位）。凡華洋貿易，國際金融及大宗款項之支付，莫不以銀兩爲計算之標準；銀元雖爲實際授受所需，反變成一種貨物，每日將銀元折合爲銀兩之價格，是謂洋釐。銀緊洋鬆，則洋釐跌；洋緊銀鬆，則洋釐漲。銀元之價格時漲時落，而商民之危險負擔彌增。凡商家之營國際貿易者，向外洋定貨或運土貨出洋，均以金價計算；而國內則用銀，因金銀比價之起落，不免時受虧損，然此屬于國際本位之不同，猶可言也；乃國內貨幣單位，元兩並行，因二者比價之變動又有虧損，如絲茶上市，洋釐必漲，而購料者顯受操縱；當進口貨多時，外人喜用銀兩，洋

釐必落，商人胥受其損。夫金銀比價不同，識者尙以爲苦，今以銀對銀，而漲落乃若是其巨，明明同此總重七錢二分之銀元也，貯諸篋袋中一二月，時或豪數分之贏利，時或遭數分之損失。業國外貿易者，一方既須負擔金銀比價之危險，他方復須負擔兩元價格變動之損失，是其一。因兩元並用，投機者流利用市價漲落，以爲營利之方法，洋釐升降無定，正當貿易受意外之虧損，是其二。外國銀行進出用兩，而中國商業交易，通行銀元，故商人不得不有兩重之準備，在他國一種準備已足，而吾國必準備兩重，因之，通貨缺乏，所感特甚，金融緊急，亦較爲多。故當銀兩或銀元需用較繁時，均足致金融之緊急。是其三。最堪憐者，且有銀元押款之事，夫銀元非貨幣乎，何必向銀行抵押款項？蓋以所需用者爲銀兩，而不能以銀元相抵故也。且兩元並用，以兩易元，或以元易兩，兌匯之時，貼水受虧。況各埠既有各埠之銀兩本位，平色自各不同，計算困難，既費手續，又耗時日，狡滑者利其計算之複雜，以上下其手，而忠厚者蒙其害矣，是其四。他如物價之因洋釐跌而漲，房租水電等費之以銀兩計算而負擔增，猶其小焉者。故今日不圖改革幣制則已；欲改革幣制，廢兩改元，實爲急務，此殆爲經濟學者所公認。今值

宋子文氏又有廢兩之議，爰提出廢兩改元中之數問題以爲商榷：

(一)，實行之時間不可操之過切，然亦不可太緩，欲速則不達；緩則曠日持久，反致稽遲。政府應立將各種辦法妥擬完善，並與各關係方面，加以慎審之研究；但必須規定實行之時日，以期一鼓成功。吾人以爲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二)，關稅改兩爲元之比價及商業上銀兩往來之折合標準，必須確訂，否則糾紛立起，因難叢生。查我國銀元一枚之重量爲庫平七錢二分，成色爲銀89，銅11，依此推算則每壹元應合純銀庫平六錢四分零八毫，或23.9084608格蘭姆。擬以純銀成分加鑄費一分（一分之數從前滬幣廠銀團，亦有此主張），再按1.0525合規銀爲折算之標準，似稱公允。

(三)『匯劃銀』存廢問題。銀行界有主張廢兩爲元，當先自廢匯劃銀始者；其實，匯劃銀之『銀』固須廢除，匯劃銀之『匯劃』仍可保存。按『匯劃』乃爲銀行關於銀錢往來之一種帳方法，其作用相當于外國之票據交換所，而『銀』乃被匯劃之一種銀錢。夫『匯劃』既爲匯劃銀錢之一種方法，昨日以之匯劃『銀兩』，今日未始不可

以之匯劃『銀元』。

(四)，自由鑄造問題。廢兩用元，洋用必增，不自由鑄造，不足以使需供相應。況銀兩存在之唯一理由，無非由銀元價值之不確定，不若銀兩得按實值計算，有一定之標準。故如規定以銀易洋之法定標準，而銀元仍不自由鑄造，則銀元本身之價值，終將無法穩定，人民對銀元之信仰，亦難維持。影響所及，或使法定標準，名存實亡，或使物價無形上騰。即如此次釐價落至七兩關內，創六錢八九分元新紀錄，其原因固由于農村經濟破產，資金集中于都市，同時工商業衰落，金融季節失常有以致之，但銀元成色之低減，恐亦不無關係。據最近西商耿愛德（Edward Kann）之報告，亦謂目前釐價，已與鑄幣成本切近，所以尙未發見鎔鑄者，一以上海銀底已甚豐富；二由于某種銀幣（按指總押幣——筆者）成色不及法定數額故也。當局苟有統一幣制之決心，則首先當整頓鑄幣來源之造幣廠，使所鑄之幣，成色重量均歸一律，而不以圖利籌款爲目的，此實爲廢兩改元之實行條件也。

以上乃關於廢兩改元之幾個主要問題；此外，政府于實行廢兩改元如具決心，吾人以爲第一：應立即組織一『廢兩改元專門委員會』（名稱不妨改易，姑爲代擬），人選

擬定中國銀行公會人員，錢業公會人員，中國及上海總商會人員，海關人員，外國銀行公會人員及國內經濟專家若干人組織之，專門籌備廢除銀兩之事宜，其任務可得而言者：(A)主持滬甯杭造幣廠之化驗；(B)議訂廢兩改元之實行日期；(C)議訂外國匯兌改算銀元計算之標準；(D)議訂銀兩債務改按銀元償還之標準；(E)議訂關稅稅率改算銀元之標準；(F)代籌各地實行廢兩改元之困難；(G)計畫統一國幣之實行等項。第二，上海造幣廠應于最近期內立行開鑄新幣，並頒布國幣新條例，規定重量成色，共合純銀若干為法價，並明定鑄費。明令自某月某日起，無論中外銀行錢商及商民凡有大條銀或現元寶者均得按照國幣新條例之規定，照加鑄費，自由請求鑄造。第三，明令將洋釐行市取消。第四，各銀行錢莊以及其他金融機關自實施日起，不得再以銀兩為匯兌本位。

上述種種，乃為吾人一時思索所及，詳細辦法，自有待于專家會議之通籌。抑吾人尤有言者，廢兩呼聲不自今日始，民國六年上海總商會蘇筠尚，張知笙即有廢兩之議，民國九年又有英商之聯合議決要求，繼有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全國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等團體先後建議，而經濟學家馬寅初氏主張尤力，民十七年春，馬氏以『統一

國幣應先廢兩改元』之提案請浙江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核准，旋經國民政府于四月二十七日第五十八次會議正式通過，六月間召集之經濟會議，廢兩改元，且列為專題。乃所以迄今尚未實現者，一方面因由于政府無實行之魄力與決心，同時實緣上海錢業中人之反對有以致之也。觀于此次廢兩消息傳出後，次日即有錢業公會請暫緩實施之請求，此中癥結，不言可知。洋釐市價八日因廢兩空氣而高漲，九日即行回跌，蓋金融界中人明知其不易實行，故表面上均予以贊同，而暗中實加以阻撓。(錢業中人之所以反對廢兩者，一以銀兩為錢莊活動所憑藉，再則銀兩並有，可以操縱投機。)吾人固希望政府于廢兩改元有周密之計劃，有實行之決心，滬廠開鑄新幣，尤須嚴格依照法定之成色及重量鼓鑄，勿借此為牟利之工具；然後明定銀兩折合之標準，大刀闊斧，底于完成。錢商中人，允宜識見遠大，勿視目前之畸形幣制為獲取贏利之良機，而當着眼于幣制統一後正當營利之發展，以促成此項幣制初步改革計劃之實現，是吾人所厚望也。(七月十一)

(此文草竣，閱本月十二日報載，上海錢業公會招待報界，對廢兩問題，明白反對(雖原則上自稱贊同)，此中奧竅，不難洞悉矣)

七月十二日

作者附記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 及

上海戰爭之政治方面，外交方面，人道方面（或非人道方面）的種種問題，大概已經有人說得很詳盡了。關於兩方戰鬥者的心理態度，現在還待人闡明。作者當滬戰發生時，正在上海，其所處之地位在前線與後方之中間。關於滬戰，結論他不敢說有，而他所得之印象是：日本人有秩序，有紀律，而頗呈慌忙不安之態；中國人則反是；他們已預備抵抗到死，所以滿不在乎，不愧不怍，不愁不憂的作他們的工作。

上海這次戰爭，在日本方面可以說是爭一副面子。日本陸軍攫得東三省以後，日本的海軍將兵就吃醋，躍躍想立功。在上海的日本海軍中將心裏說：搶人土地的把戲，在東三省如此容易，在上海也不至於很難罷！但是在上海搶地，事實上非常的困難。日本的海軍頭一戰就自己證明自己無用，所以日本陸軍部不得已陸續派兵來華，派完一帥又一帥，務期日本的軍威，不至於在上海丟臉。所以在上海的日本兵覺得已經走錯了一步棋，不如將錯就錯，索性在上海打下去，又怕錯重難改，全盤收輸，故心中焦急

，慌忙不已，怕上海未勝以前，國內早起糾紛了。

中國兵的心理則反此。他的態度如西班牙鬥牛者一樣，手執着紅旗在牛的前面帶嬉帶笑的搖着。他知道那條牛不熟地印，但仍然用頭角去極牠的敵人。牠費盡力氣往前亂攻時，他則以逸待勞，鎮靜地坐在他的機關槍旁抽準。好比歐戰時法國兵在凡爾登叫着「誓不讓他們過去！」，中國兵則誓不肯讓日本人雷池一步，想盡種種法子把日本兵擋住一槍之距離。他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所以他雖以自己的生命爲兒戲，却毫不害怕，只有自然和歡容。

○ ○ ○ ○ ○

關於此次上海戰爭最不要忘記的事實就是十九路軍並不是被日本人從閘北「趕」走。十九路軍之退，很整齊而有秩序，並且是自願的，因爲他們並沒有打了敗仗，不過是在軍事上被人包圍罷了。當時瀏河離十九路軍的防線太遠，保衛不力，所以日本人在那兒登岸之後，立呈包圍現狀。十九路軍自揣勇敢固好，而謹慎爲上，故於三月二日退守第二道防線，免全軍覆滅。純粹從打仗的本領說起來

，中國的守土者未失寸土，未棄尺壕，未退一步。

所以中國兵的心理並不是敗者的心理。他如航海遇颶風的水手一樣，他的船被浪打壞了，他的帆被風撕破了，所以他不能不覓一避風的港。但這場颶風不過只是征服他的水路，而未有征服他的精神。他猶可在腦海中迴想得來。他踏的是無帶的橡皮軟鞋，他穿的是纏舊不堪的大綿襖，有時還有前一天晚上的雨濕。但他仍拿着槍桿，望着對方，微微含笑。在他的面上，不但毫無平常想像的戰爭兇惡樣子，而且充滿着慈祥與歡容；他的口是半開，他的微笑在他的高聳的額骨上或隱或現。他帶的帽子遮住他的眼睛，但是這副眼很有所思的遙看遠處。這個中國兵，看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誰也猜不着他是個兵；但是離他不到數百碼，最惡烈的戰事正在進展中，他時時刻刻預備參入前線。

我碰見許多這樣的中國兵。他們都很歡容，勇敢，毫不覺危難，就在目前——他們很願意生，因為他們是活着；但他們也很願意死，因為他們將因戰敵人而死。

有一天，我帶一車的軍用品到真茹，那時候十九路軍的大本營在那裏。我覺得很奇怪，真茹離閘北最多不過十二里路，但是那時真茹非常的平靜，彷彿無戰爭似的。在

到大本營那條路上，還有挑担子的賣東西，還有小孩子羣聚爲戲；中國兵則三三兩兩的慢慢的走他們的路。除了兩次被守夜兵盤問我們的行止外，我們到大本營的路是康衢大道，一往無阻。這些守夜兵也很相信我們，所以我們在車子上頭告訴我們的來意，他們便讓我們過去。從表面上看起來，在真茹那時像無戰事，像無防備。但是日本人就能打破真茹，如入無人之境嗎？事實上殊不然，日本人試了三十四天來擒炸真茹，究竟沒有成功。

十九路軍退了之後，我才在真茹看見他們靈巧的戰壕和地洞之構造。戰壕彎彎曲曲，如蛇一樣，其深藏可容一兵及其槍枝。戰壕之外不數碼地即有一周圍之鐵絲網的籬笆，中有一小門可通人及車。戰壕之上，往往有一種臨時湊起的橋梁早晨架起來，晚上六時後拆去。有一天晚上我們回租界太晚了，所以我們費了許多交涉，才應許我們自己把橋搭起。原來那橋不過是幾塊長木板，兩頭搭住戰壕之兩面。木板之上尚有幾塊鐵板蓋住，以爲行車之用。看起來不難；但是要抬那些木板還要些勁兒。至於那些地洞，多半藏於樹子裏面。在地洞裡可以找出些火燒過的磚和些用過的茶葉，由此可以知道有時有些疲倦的戰士，在炮火連天的時候，在那裡喝茶談天。

這些戰壕和地洞，決不是懶人可以掘成的。但是在真茹的中國兵彷彿是不大作事的樣子。由此可知他們的效率是一種不賣力氣而同時很利害的一種效率。

有一天下午我到真茹，正逢四個中國兵在那兒吃飯。

我從前聽說拿破崙行軍時吃飯不過兩分鐘，有時簡直不食，所以那天我很注意這些中國兵怎樣吃飯。他們到底是中國人，吃飯的興趣，絕未因從軍而減少。他們四人有四個碟子的菜，飯，還有「燒酒」。他們並不慌忙，吃飯的時還談吐風生。

有一個兵士嘴裏還喃喃不已，到我面前問我如何回到六十一師的陣地去。他說的一口的欽廉州話，我不很懂得，但是我揣其大意不外是想到那時守前方的六十一師去。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但如他願意，他可以坐我的貨車出去，等到他見到頭一個守夜的中國兵，他就可以下來問過明白。這點小小恩典，他報答的方法，殊出我意外。我們那時候站在一小攤子前面。我拿兩角小洋想買一包香烟。那攤子主人無零錢找回。但是我那時抽烟的癮很大，口袋裡剛剛有兩個銅子，我便買了一支香烟。那大兵順便把我那支香烟奪去，交還給攤子，同時從他的褲袋裡掏出兩張一角的大洋票，買了兩包香烟，一包他恭敬的給我。

他說：「不要抽一支香烟；抽一包罷！」於是他就把那包煙強塞入我口袋裡。我當然是不要；我與他理論，說他需要那包煙還比我緊要。但是他堅不肯讓我還他。後來他下車時，我才快快的把那包煙塞入他的口袋裡。

當敵火連天，人人莫知所向的時候，這些打仗的兵士還能有心作應酬雜事，這豈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嗎？

十九路軍退後，我又去真茹一次，這次是同一個法國人同去。那時真茹已被日本兵佔了，雲樹之中，常有紅帽黃衣小漢出現。我們是坐汽車去的。日本兵高喊我們打仗，詳細查驗我們從日本領事館領到的通行証，不下五次。有一個日本兵還和們說英文；他問了好幾聲「你們會講英文嗎？」後來我們細想他為甚麼問我們那句話？那法國人說，「他不過是要我們知道他會講英文罷了」。

這些日本兵，與我前一禮拜所見的中國兵，就大有分別了。中國兵個個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日本兵却慌慌忙忙如有所失。中國兵看起來像無憂無愁；日本兵則咬定牙根的依照規矩的做去。中國兵穿的是棉；日本兵穿的是羊毛。中國兵穿得拖泥帶水；日本兵則一律整齊。中國兵三兩成羣；日本兵則一大隊的開步走。日本兵的傢伙都很漂亮；他們的靴子都刷得很光。他們作甚麼事情都依照傳統

的方法作去，並且很留意細小枝節。他們無論是置一尊大礮或搭起一堵沙袋，無論是過河搭橋或過濕地而蓋木板，無論是在戰壕裡安電話線或輸送食品，日本兵彷彿人人都手執一本陸軍教科書，戰戰兢兢的依照第三章第四十八頁的第六條規則作去。

這種「教科書的作戰法」，在城市街道打仗不大適宜。中國兵的滿不在乎，敵來則拒的戰鬥法，反為合用，所

漫 游 散 記 (五)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續)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買辦打破頭，我混着一頓飽飯

凡有一件東西，我們自幼看慣的，或是用慣的，吃慣的，其實並不是真的好東西，只要隔了許多年不見牠，我們往往冥想牠的好處，忘却牠有甚麼缺點。給我同船的這位同鄉前輩是一個老進士。在刑部守了十幾年，纔放了雲南的普洱府知府。這是一個極苦的缺。做了三年，也沒有剩幾多錢。他年紀老了，就告老回家。他自奉極儉；只有一位亂頭粗服的如夫人伺候他，連好好的聽差都沒有用。一到了常德，他頭一件事是叫人買西瓜。他對我說道，

以在閩北能支持一個月以上之久。日本人攻之以剛，中國人應之以柔。十九路軍表面如不大作事，其實作的很多。表面上中國人像必無組織，但是中國人於無組織中表現一種力量。尋常人人以為都是中國人的弱點，也許是中國人的強處罷？

七月十六日於北大。

丁文江

「十四年沒有嘗着西瓜味了。一到湖南境內，我就想吃牠。無奈因為大水，沿途買不出瓜來。常德是個大碼頭，一定要多買幾個來吃一頓」。等到買了來，瓜又生又小，一股子淡水氣，但他一口氣吃了兩個，還覺得不過癮。後來到了漢口，買到了好瓜，他一天吃好幾個，路上就得了病。到家沒有幾天，就死了。

我當日對於小火輪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未出國以前，到江南幾次，都坐過小火輪。出國以後，八年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把牠的真相都忘記了。從雲南到常德三千里路，以五月廿九日起，一直到七月十三日方纔到常德。早

路雖然不很舒服，水路却很方便，而且一天走二百里，不能說不快。但是我心裏存了一個成見，以為到了常德，有小火輪坐了，當然不肯再坐民船。所以我的同鄉坐原船過洞庭湖到漢口，我却決定坐小火輪到長沙。

我向船家打聽買票的地方。他說在岸上「洋棚」裏買——「洋棚」是沿長江一帶普通的名詞。凡內地輪船碼頭辦事的地方，都叫做「洋棚」。我一上岸就看見戴生昌的招牌。我隱約記得，我們家鄉也有戴生昌的小火輪，高高興興的去買票。「我要買一張官艙票，一張統艙票到長沙。一共多少錢？」我向那一位年輕的管事。他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兩眼，一點不遲疑的答道，「官艙十塊，統艙三塊。」我有一點不信，再問他道，「沒有扣頭嗎？」「先生你不知道，我們戴生昌的船是有名的。官艙是一人一間，極其講究。飯食是一天三頓，每頓是兩葷，兩素，一個湯，大白米飯，所以比別家都貴點。」我狼滿意，當時就給了他十三塊錢，換了兩張船票。

我一面叫跟我的姓陳的護兵，早點押行李上船，一面自己進城到郵局發信。到了郵政局，看見櫃台上貼得有布告，出售上年的郵務報告。我就要買一本。櫃上的司事上樓去拿。好一會纔下來說「洋總辦請你上樓說話。」上樓

去一看，一個二十多歲黑頭髮，棕色眼睛的外國人坐在那裡，外衣脫了，領結都沒有穿。他用中國話問我道，「你會說外國話嗎？」我剛從歐洲回來，會說幾句，「我用法國話答他。他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緊緊握着我的手道，「你是我的鄉親！你是我的鄉親！我說常德那裏會有人要買郵務報告！」于是他拉我到他家裏吃午飯，強迫我把假辮子去了，長衫脫了，開了一瓶香檳，親手做了一壺咖啡，與我暢談了兩點鐘，告訴我獨身住在常德的痛苦：「這是活地獄！活地獄！」他不斷的對我說。

吃了飯以後，我的新朋友派了一個人領我上小火輪。我一面想今天要離開這「活地獄」了，一面想從此一路坐輪船到家，不必再愁下雨，或是過險灘，心裏十分的高興。一到了船上，我纔知道我仍舊進了活地獄！

所謂小火輪不過二十多噸。全船只有一個官艙。這是一個七尺長，六尺寬的小房，在買辦的帳房後面。房裡有兩張木板床，丁頭擱着。此外還有一張小木棹，一張高板櫈。靠右面有一個沒有玻璃的窗子。桌子板櫈上都有狼厚的油灰。許多蒼蠅從窗子裏飛了進來。七月天氣，溫度在九十以上，一進房衣服就汗透。我問那姓陳的護兵道「這怕不是官艙，你弄錯了罷？」「帳房說這就是官艙，而且

船上沒有第二間。」帳房裏坐的那位買辦也走了過來問道，「先生，你在那裏買的票？」「在你洋棚裏買的。他們告訴我官艙一個人一間房，十塊錢到長沙。怎麼如此不堪！」那位買辦哈哈的笑起來，「先生，他們拿你開心，你上了當了！官艙只有這一間，而且是兩個舖。到長沙尋常賣三塊錢，有交情還可以打八扣。」我大怒道，「豈有此理！我上去問他找錢去！」「先生，你去也沒有用。洋棚裏的把戲就是這樣，而且就要開船了。」正說着話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客人，要向我房裏擠。我老實對他說道，「朋友，你不用進來。這個官艙是我化十塊錢包下來了。」我又向那位買辦說，「請你不要再賣官艙票了。我兩個人已經化了十三塊錢，抵四張票還多。雖然票是在洋棚裏買的，究竟是你一家子。我不向你找錢已經是客氣的了。要再叫一個人來給我同房，我可決不答應。」那買辦看了我兩眼，就向那個新來的客人說，「不再賣官艙票了，請你別處找地方去罷」。我們主僕兩個就佔據了這一間惟一的官艙。

等到開了船，我到船板上看看，四邊堆的滿滿的貨，沒有地方走動，而且太陽晒的很利害，只好仍然鑽進房裏去。照地圖上看起來，一出常德，就應該進洞庭湖。那知

道船開了許久，也沒有看見湖的影子。兩邊不是高隄，就是蘆草。原來從常德到龍陽，雖說是入洞庭，其實在湖南面的小港裡，然後轉到資江，再經過臨澧口到湘江，上湖到長沙，四百三十里路，都是在內河裡走。于是我大失所望，懊悔沒有直接從常德到漢口。

太陽沒有落，茶房就來開飯，我纔知道每天是開兩頓飯不是三頓。開的飯是一碗白鹽水湯，裏面有幾片豆腐，一碟子生鹹菜，一碟子辣子，一大碗紅米飯，我纔知道洋棚裡人所謂兩帶兩素原來如此，菜我倒不注意，那一碗飯實在糙的不能下咽。我叫茶房給我換一碗白米飯來。他說，「先生，你不知道常德一帶只出紅米，船上就沒有第二種飯。」

等到天黑了，睡覺也發生了問題。我從昆明出發到常德，一路上都睡在我從歐洲帶來的帆布床上。這天晚上，因為從木板床到船的頂篷不過四尺多高，木板床又是釘死了的，帆布床沒法子支起來，只好睡在木板床上。我躺下沒在幾分鐘，渾身覺得奇癢。點起燈來一看，滿床都是臭虫。只好起來，坐在高板橙上看書。連我的那個到過西藏的護兵也咬得睡不着。停了一刻，板橙上也發現了臭虫。只好半坐半站，等到天明。

天大亮了，臭虫漸漸藏起來，我纔勉強睡下。不到一點鐘，正是迷迷糊糊的有一點睡着，忽然被嘈雜的人聲鬧醒了。只聽得幾百條嗓子，一齊喊着「慢慢的開！慢慢的開！開快了把隄沖壞了，我們要跟你拼命！」起來一看，隄岸上聚了無數農民，跟着輪船跑。那位買辦也起來了。他立刻下令開快輪衝了過去。但是一條長隄上，好幾里路都是聚的人，他如何衝得過。「：媽媽！：奶奶！打！打！」大小的石頭紛紛拋到船上來。我連忙退到我房裡，一看床上已經有一塊石頭，大概從窗子裏飛進來的。只好又走到買辦的房裡等着。同時兩個茶房扶着「二買辦」從船板上下到艙裏來了。這位先生額角打破了一塊，流得一臉的血。大買辦急了，自己跑出去跪在船板上，向岸上叩頭，一面說道，「諸位不要打，我叫他們開慢點就是了。」岸上的人喊道，「你不顧我們的命，我們就要你的命！」大買辦叩起響頭來，「諸位千萬不要再打，我下次再不敢開快輪了！」于是小火輪先完全停了輪，然後用一點鐘走五六里的速度，慢慢開去。

雖然那時候小火輪的速度還抵不上從鎮遠下來的民船的一半，我不知道爲甚麼心裏頭覺得異常的痛快。回頭來一看，那位二買辦躺在床上，哼聲不絕，頭上的血把上身的衣服都染紅了，却沒有一個人理會他。我覺心中老大的不忍。我走了過去，對他說道，「我帶有刀創藥，給你敷上點好不好？」他看了我一眼，回道，「我不要！」我再誠懇的對他說道，「我不是郎中，給你上藥，不要你的錢。」「阿！我不曉得先生肯做好事，請你快點給我上藥罷。」于是我拿出我的藥包來，先給他消毒，再敷上藥，用紗布棉花紮好，足足忙了半點多鐘。大買辦和茶房都在旁邊看着。

我上藥還沒在完，一個茶房已經來開早飯了。盤裡裝的仍然是一碗白鹽水湯，一碟生鹹菜，一碟辣子，一大碗紅米飯。大買辦看見了，連忙攔着他說，「快拿回去！另外開飯。」不多一會，居然拿了兩葷，兩素，一碗湯，一大碗白米飯來。我飽吃了一頓。覺得二買辦的頭打破是很不冤枉的！

中國文化的崩潰（新書介紹）

衡 哲

書名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著者 Nathaniel Peffer

出版者 John Day Co, New York 1930.

本書的作者曾在中國當過六年的報館記者，又曾做過兩年的研究專員，故他可以說是一位『中國通』，不過他所通的，是現代的中國文化，而不是古代的周鼎漢玉。

本書共分十四章。最初七章所講的，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即是，中國在一百年前是怎樣的自大，後來怎樣的屈伏于英法及日本的武力，後來又怎樣的受了西方文化的壓迫，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呈出分崩離析的景象，使一個整個的國家成爲一團糟。中間的三章，是述說中國文化怎樣走到了最惡的命運處。最後四章，是評述中國最近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建設的。全書的大意如此。

我以爲此書雖然亦自有他的缺點，實是研究中國近代問題的一本良好著作。第一，是因爲作者對於中國的近代歷史，有一個很明瞭的鳥瞰。第二，是因爲他對於中國的

社會情形，有很豐富的智識，故他能在那千頭萬緒之中，埋出一個經緯來。比如他說，中國立國之基，是一個臨而不治的政府，一個百業的行會，以及一個部落式的家庭，這個觀察大致是不錯的，雖然他對於行會的過分理想化及整齊化，不免犯了一點『三分顏色開染坊』的毛病。第三，是他對於現代中國能有充分的了解。他明白中國爲什麼要反對傳教事業，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貨物。他承認中國文化的混亂與破產，有許多罪惡是應由歐美人來擔負的，雖然他有時把這個罪惡責任看得太重了一點。第四，是他對於中國的痛苦，似乎很有從了解產生出來的同情。

『胡亂說說中國要有一個墨索里尼，是不中用的。……中國的墨索里尼，不但要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樣，并且他同時要做意大利的，法蘭西的，日耳曼的，匈牙利的，波蘭的……墨索里尼。現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能爲之嗎？……因爲中國是一個整個的歐洲，所以單單與歐洲的一國相比，是不對的。』

(八二頁——但譯大意)

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的特別不幸，是當西方之文化這樣侵迫她的時候，恰又正值她在歷史的途程上，走到一個下山的時期中。在又一處他又說

「外國的資本，能受中國為建設的社會管理而生的限制，如小小的一個工廠法的限制嗎？」(二五五頁)

這豈不真是中國工業化之後的一個大問題？又如在第十三章中，他申說帝國主義怎樣的在中國自掘坟墓，乃是全書最精采的一處。這樣的深切的了解，這樣的大胆的解剖與呈露，是值得我們的佩服的。

但我們對於這書也有不滿意之處。最大的，是作者對於中國舊文化的崩潰，似乎有一個普遍的悼惜，對於西方文化的進攻，似乎也有一個普遍的憾恨。但我們對於舊文化中的幾個分子，是表示極不滿意的。例如對於部落式的大家庭制度的毀滅，我們儘可以不必為之喪服號咷。對於西方文化的進攻，我們也以為是一件利害參雜的事。作者對於教會成績品的批評——「有許多到了十六歲的中國青年

，尚以為這個行星之上，只有三個大人物，即是，基督，華盛頓，林肯，」(一三五頁)——以及對於近代婦女的但知模仿西洋婦女的驕奢淫逸的譏刺，我們當然同意。但這樣的以局部概括全體，亦不能使人心服。他似乎不會明白，文化的需要交換，猶之水的需要下流，是阻止不得的。比如他說：

「中國人採用了若干的外國生活方式，他即毀滅了若干的中國人性質。他不即變為外國人，他在不知不覺中，漂流到了文化的冥濛處」(二四頁)

這是很胡塗的說話，作者豈至于此？這當然是由于飽喫了洋場上的江臭氣，忿激之極，而為此言的。我們對此雖然可以諒解，但亦決不容不更正。

作者說，現代的中國是一個真空(Vacuum)，這個比喻也是不很切確的。中國的毛病，是混雜，不是空虛，是太實了，是什麼太多了，——古老的土產品，西方的新產品，中西合璧的改造品，形形色式，滿坑滿谷，——不是空虛。故作者的填補式(Filling in the void)的標義，內容雖多不錯，措辭却是失當。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道鄰譯

通信

(一)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

邱枋 孟真

(二)「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勘誤

左律

獨立評論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廈門 | 重慶 | 漢口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封圖書局 | 開封圖書局 | 安慶圖書局 | 無錫圖書局 | 青島圖書局 | 濟南圖書局 | 廣州圖書局 | 廈門圖書局 | 重慶圖書局 | 漢口圖書局 |
| 東亞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凡改革政治無論在甚麼時代，在甚麼國家，不外乎兩條路：一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二是用和平的手段，經過長期的奮鬥，來取得政權。

民國成立以來，政權的紛爭，無論成敗，差不多都是取第一種手段。從二次革命起，所謂護國，護法等戰爭，以至于國民黨向北伐，內訌，共產黨的擾亂割據，主義雖然完全不同，手段却大抵是一樣。共產黨的活動，我希望將來另有詳細的討論，本文內暫且不提。此外一切的革命都發生了同樣的困難。分析起來，大概如左：

第一是自從洪楊之亂以後，中國政治的趨勢，已經變為外重內輕。民國以來，這種趨勢逐漸的變為事實。就是民國三四年袁世凱全盛的時代，中央對於地方，也是敷衍對付的多，指揮命令的少。袁世凱死了以後，完全成為割據的形勢。舊有的政治系統既然紊亂，中央政府已經失去了效能。凡要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的人單佔據了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對於地方不發生任何的效力。不比得蘇俄的革命，共產黨佔領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就可以命令全國。

第二是中國地方太大，物質交通的設備，太不完全。軍事和政治的改革，極不容易從一隅而推及于全國。例如蘇俄革命的時候，俄國已經有七萬公里的鐵路；鐵路到那裏，中央的政權就可以到那裏。中國的鐵路一共不過一萬公里，其中四千多公里在東三省。從莫斯科運兵到海參崴，一星期多可以到達，從南京運兵到成都，或是廣東，不但時間要一個月，而且物質上的困難極多。因此割據的局面極不容易打破。

第三是舊有政府的機關和組織，很少可以利用。普通其他國家的革命，政治雖然發生極大的變化，但是在革命剛成功的時候，總得利用舊有的行政機關和組織，來做統治的武器。例如蘇俄革命以後，軍隊和警察，雖然主義上有澈底的改革，而機關組織則完全承襲舊來的制度，所以可以立刻發生相當的效能。中國舊有的機關組織，不是極其單簡，就是極其腐敗，絕對的不適用於新式的國家。革命的人一方面要努力于政治上的工作，一方面要另行建設統治的武器。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常常有崩潰的危險。或

因爲不能不利用舊機關與舊制度，利用的人不久就爲舊環境所腐化。

第四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謂陸軍大學，軍官學校程度極其幼稚。教官不是出身于日本士官，就是保定軍官學校。專門的訓練，固不能與外國同等的學校相比，而且普通的常識異常的缺乏。例如翻譯教課的制度，在其他各大學已經廢棄了二十年，而現在陸軍大學的外國教官上課的時候，都用翻譯；學生沒有一個能直接聽講的。足見高等軍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要落後二十年。其結果是雖然因爲競爭的關係，軍事首領不少有指揮的天才，愛國的熱心，或具堅強的毅力，而因爲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鉅。多數的人則因爲毫無修養，極容易爲環境征服而陷落。在革命時代要使軍人不干政，是很不容易的。軍人干政在革命史上也有相當的前例，少數的成功，而在中國則軍人根本沒有干政的知識和訓練，又沒有不干政的修養和覺悟。這種現象可以說任何國家革命史上所沒有的。

第五因爲租界，內河航行權與領事裁判權的存在，行政權的行使早已不能完整，所以革命的企圖很容易在本國境內外國人勢力之下產生。革命失敗又很容易逃避失敗應

負的責任。近二十年來，內爭失敗的首領，幾乎沒有一個受失敗的懲罰。革命的發生如此的容易，而銷滅政敵又如此的困難，無怪人人都以革命爲兒戲了。

以上所說的五件事實，都是比較永久，一時不容易剷除的。此外還有兩個臨時的原因，使革命這一條路更不容易走得通。

列甯說得好，凡一個革命的成功，一定要有革命心理的成熟，不是可以單靠一時的機會。俄國革命的原動力有兩個：一是兵士厭惡大戰，二是農民希望均田。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利用這兩種原動力，所以能够取得政權。中國現在的農民一部分受了共產黨宣傳的影響，發生了均田的希望，然而我們敢說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希望和平。均田雖然是農民所希望的，但是因爲均田而要引起長期的內戰，重大的犧牲，則絕對與農民所希望的相反。此外的人民因爲歷年受內戰的痛苦，大概沒有再願意繼續革命的。在這種空氣之下，列甯所謂革命的心理，可以說完全沒有成熟。

第二就是目前的外患。不但是東三省的喪失，上海的戰爭，使得國民對於外患有真確的認識，而且因爲日本的宣傳，國際共管的空氣，又比九一八以前爲濃厚。所謂圓桌會議，所謂擴大國聯調查團調查的範圍，都是這種空氣

的作用。假如革命的內戰繼續發生——無論革命的目的和成績如何純潔優良——不但日本進一步的侵略，無法抵抗，而且國際上一定要發生很不利的變化。結果革命沒有成功，交通便利的都市和近海沿江的商埠，勢必淪于共管。

綜合以上所說的各種原因，在今日的中國，武力革命是極不容易走得通的一條狹路。所以我們只好用和平的手段，長期的奮鬥，來改革中國的政治。

我所謂奮鬥可以分做兩種：一是對於政府的，一是關於我們本身的。

國民黨是以一黨專政為號召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黨員，當然不能贊成牠「專政」。但是我們是主張「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沒有替代牠的方法和能力，當然不願意推翻牠。我們對於國民黨最低的要求是在牠執政之下，牠應該做到這幾個條件，使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漸實現的可能。

第一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絕對的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條件。這一層要做不到，縱然我們不贊成革命，革命是萬萬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異黨的人有對於人民宣傳他們信仰的機會，使他們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可能，使得人民覺得革命

不是必要的犧牲。我們的要求是絕對的，是普遍的。例如我們以為在不擾亂地方秩序或是違犯其他刑法規定範圍以內，共產黨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

第二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停止用國庫支出來供給國民黨省縣市各黨部的費用。不然則各黨的待遇地位完全不能平等，競爭的機會不能一律，革命也不能避免。

第三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這可以說包括實行憲政，設立民意機關種種提案在內。我們人不是絕對迷信民主主義的，但是濫用權力是人類普遍的根性；無論是獨裁的首領，或是少數的階級，包攬政權而不受任何的裁制監督，其結果一定把他們自己的利害，當做全國的利害，惹起政治上的暴動。中國現在是否有真正民意機關實現的可能，所謂「民」是包括全國人民幾分之幾，目前是否有實行憲政的方法，我不否認都有討論的餘地，但是最低的限度，是國民黨對於黨內黨外一定要先有明白的規定，握政權的人憑甚麼上台，經何種手續可以叫他下台，然後可以免除用武力爭政權的慣例。

從實際政治上講，我並不希望以上的要求，立時實用于全國，但是至少在南京政府權力所及到的地方，要努力的實現。我們應該在不用武力革命範圍以內，督促牠，勸

導軌，使這幾個最低限度的條件能早日實現。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盡力與國民黨合作，一致的擁護政府。

關於我們本身的努力，我認爲與對於政府的要求一樣的重要。單簡講起來，有下列各點：

第一組織小團體，公開的討論我們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張。中國今日社會的崩潰，完全由於大家喪失了舊的信仰，而沒有新的信仰來替代的原故。祖宗不尊敬了，尊敬甚麼？宗族不親睦了，親睦甚麼？英雄不崇拜了，崇拜甚麼？婦女解放了，男女之間，是否仍然要遵守相當的規律？天堂地獄都是假的，人生甚麼是真的？我們若是相信共產主義，用甚麼方法，使我們以最小的犧牲，得最大的結果？我們若不相信共產主義，用甚麼主張替代牠，來謀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這種新信仰和新主張決不是國民黨的黨綱所能代表的。我們只要看學校裏紀念週的岑寂，和黨義教課的無人過問，就知道建設新主義非另起爐灶不可的了。

第二我們要救濟青年。近幾年來，許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會的墮落，學校的腐化，歸咎于青年。我個人的經驗，現在青年的勇氣和常識，比十幾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錯，許多青年進了共產黨，許多青年在

學校裏鬧風潮。但是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要做共產黨，也要鬧風潮。因爲鬧風潮而不能讀書，固然是很不好的；然而若不是當局怕學生鬧風潮，恐怕護兵馬弁都要當校長，舅爺「舅爺」都要當教員了！少數的墮落與浮薄，都是校長教員或是父兄教出來的。教員只知道要錢，到處兼差告假，怎能怪學生怕考或是曠課呢？父兄任意的狂嫖濫賭，怎能怪子弟不讀書講戀愛呢？至于社會的不公道，無是非，更足以使青年失望消極。到了今天，中年的人還不知道責備自己努力的懺悔，中國真正要沒有路跑了！我不敢說指導青年，我至少想救濟青年。救濟的具體方法是要督促政府不欠教育經費，慎選校長，實行政試用人制度，多設獎學年金。是要與我同輩的人相約；多工作，少享用，不兼事，不缺課；縱不能爲青年的模範，至少不要做他們的惡榜樣。尤其是要清理我們自己的思想，認識我們的立場，實行我們的信仰。然後青年的煩悶纔能消除，興趣纔會轉變，我們也纔有指導他們的能力和機會。

第三要研究具體問題，擬議建設新國家的方案。這幾年來，國民政府天天講建設，而成績幾等于零。推究起來，原因固然是很複雜，至少研究不科學，方案不切實，也

是一個原因。滿口開發西北，連西北的土地面積，雨量多少都沒有弄清楚；計畫許多新鐵路，連主要的山脈，天然的交通，都完全不理會。無怪建設的機關越多，建設的成績越少了。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搜集事實，後提出計畫。所謂建設是廣義的：發展交通，水利，鑛業，農產固然是建設，改革財政，軍事和經濟制度，又何嘗不是建設。近世的行政是漸漸的技術化了。就技術方面研究行政問

題，纔可以有能實行的方案。

有了堅決的信仰，得了青年的同情，造成了具體的方案，然後聯絡各種信仰相同的小團體，來成功政治上的大組織。這種組織纔有生氣，纔有力量。這是我認爲我們政治上的出路。縱然我們的能力，知識，環境不能使我們有個人的成功，至少我們不至因欲爲善而反造孽；至少我們可以得到自己良心上的安慰。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去年夏季政府大舉對江西共產區域作戰的時候，當局一則曰，限三月肅清，再則曰，調某軍某帥。好像中國的共產黨問題完全是個軍事問題。今年此時的形勢就大不同了。三星期以前，日報載過蔣軍事委員長的談話，謂共產問題十分之七是政治問題，僅十分之三是軍事問題。最近報紙又載蔣氏的談話，謂共產區域的土地問題應以承認現狀，不恢復原狀爲解決的基本原則。據聞內政部的政策和計畫亦復相同。一年之內，政府態度有如此之大變更，不能不算大進步。原來中國鄉村的共產問題大部份是政治經濟的，而其中中心就是土地的分派。我們不是說，土地的分

派一平均了，中國的鄉村問題就解決了。幾年以前，我們還以爲中國的問題是個軍閥問題，是個工商業不發達的問題。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整個的鄉村經濟已到崩潰的程度。這是中國的致命之傷。我敢大膽的說，就是中國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都被日本的大砲飛機毀成一片焦土了，只要鄉村經濟不破壞，中國還只受皮膚之傷。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從今日起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挽救鄉村的經濟，就是日本不來攻，我們的都市全要變爲死城，而我們這個國家就自然而然的亡了。這個農村經濟的挽救包括水利的興發，農種的改良，肥料的供給，手工業的維持，借

貸的便易，而土地的平均分派不過是其中的一端。雖然，平均地權是必須的一端，且在共產區域是入手的一端。

政府所謂「承認現狀」就是承認共產黨在各縣各鄉土地的分派。共產區域內的實在情形，我們無從得知詳細。

不過打倒地主階級是共黨的要政，這是毫無疑問的。江西，湖北，安徽各鄉的地主也知道這點，所以在共黨將入一鄉的時候，大地主已逃走了。共黨佔了一鄉以後，於是焚燒田契，毀除產界，務使地主所有權的證據消滅殆盡。然後將土地從新分派給農民。至於分派的標準如何，是否十分平均，是否將土地完全分派，還是保留幾分之幾作為蘇維埃土地；分派以後，農民對蘇維埃有什麼負擔；這些問題，我們無從答覆。大約各鄉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共區的農民經濟上實受了利益，這是毫無問題的。政府若要恢復原狀，就得把地主都送回本鄉去，把他們原有的土地都替他們收回。是非如何，利害如何，暫置不論；政府對共區的土地問題，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承認現狀，或恢復原狀。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

我們以為現狀必須承認，原狀必不可恢復。第一，原狀無從恢復了。共黨佔據以前的土地所有權的證據完全沒有了。勉強來恢復必至引起鄉間的紛亂。第二：以往中國

蘇維埃與國民政府的戰爭，在共黨的宣傳中，完全是個階級戰爭，是工農階級和地主資本家的戰爭。國民政府以往勸共的政策就給了這種宣傳頂好的證據。以往官軍是與所謂鄉紳——就是地主——合作的。官軍依鄉紳為嚮導。官軍收復一區之後，鄉紳就假官軍的威風來圖報復，來收回土地。鄉紳舊日的私敵概成為共黨的巨魁；別人的土地也可指為鄉紳的舊產。白色恐怖反過於赤色恐怖。那末，怎樣可望農民不信共黨的宣傳，不為共黨効死力呢？現在對共政治策略的第一步非打破這個信仰不可。政府必須設法使農民知道政府的戰爭不是為地主而反農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認土地分派的現狀。

蘇俄革命之初，最要大政之一就是宣布土地是農民的。後來白黨的反攻不無成績；其中尤以德尼肯為最有希望。俄國的農民彼時對共黨並無絲毫的偏袒。等到德尼肯的軍事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農民都等着他發表他的土地政策。他最初不願決定，後來又說此問題須待國會的決定和經濟學家及法律學家的調查。農民當然不知道國會是什麼，也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法律學家是張三的親戚還是李四的朋友。因此他們覺得還是布爾雪維克黨為最可靠。這樣一來，農民都變成德尼肯的敵人了。中國的農民何嘗不足

樣。所以我們希望政府不但以承認現狀爲原則，且在實行這原則的時候，手續愈簡單愈好。政府只派代表往收復的區域去登記。倘若當地的農民公認甲段地最近是張三所耕種的，甲段就替張三登記。惟獨遇着當地的人不能公決的時候，政府方可負責分派，不然，政府僅僅登記。

但是有些區域只遭過共黨之劫，尙未成立蘇維埃的組織。在這些區域，地主雖然逃了或殺了，但土地的新分派尙未確定。這裡政府應負分派的責任。在這些地方，政府應定分派的標準，設立分派的機關。

我以爲承認現狀不但應作爲對共的政治策略，且當作爲全國鄉村改革的初步。耕者有其地是國民黨的黨綱，也是國家的安寧及人民的生計所必須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實在是土地公有，不是耕者有其地。在蘇維埃區域內，共黨不過替國民黨實行了國民黨的黨綱，而國民黨不過落了。在江西，湖北，安徽諸省國民黨既已落後，在他省就該挺身前進。論者多說承認現狀是很危險的，因爲共區以外的農民也要效尤。我承認這個危險是實在的，且是不

能避免的。惟一的問題是遲早和方法的問題。我們是否等着共產黨蔓延到了他省之後，等着地主遭了殺戮及驅逐之後，等到政府和蘇維埃打了兩年的仗，殺了幾十萬人，費了幾萬萬的軍費之後，始實行耕者有其地的原則？還是在火未燒上眉頭的時候，在政府有暇作縝密的計畫，一面顧到農民生計，一面又顧到地主的將來的時候，就不流血的實行這個大改革呢？我們還要記得，倘若我們能以平均地權得着鄉村的安寧，連地主也要感謝天地了。現在的地主不是爲土匪所危害，就是爲軍隊和政府的苛捐雜稅所累。平均地權問題的複雜和嚴重是我們所深知的，但是他國所行的先例甚多，很可供我們的參攷。政府應在共黨勢力未發展的省分趁早組織土地研究委員會，妥籌耕者有其地的實施方案。總而言之，農村問題不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是不能上軌道的；平均地權終久是要實行的。我所說的不過指出不流血的有計畫的改革勝過流血的，無計畫的改革。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何先生這篇文章，和本刊第十期「一之」先生的同題文章，可以互相印證。請讀者參看。（編者）

談中國貨幣問題者，常謂中國幣制太亂而提出種種改

革之方案。實則中國今日之貨幣，本無任何制度之可言。蓋一國之幣制，至少須有一主幣，例如美國之元，英國之鎊，法國之佛郎等是。中國之主幣，果在何處？或曰，民國三年之幣制條例，非曾規定銀元爲中國之主幣乎？但實際上我國銀元，尙無本位資格，因本位之要素有三：（一）自由鑄造，（二）實值與面值等，（三）無限法償。此三要素中之第一第二，銀元均無有也。且我國銀兩與銀元，同時存在，銀元之勢力，祇限於日常交易而已，海關稅收國際匯兌進出口貿易等等，其計算均以銀兩爲單位焉。

銀元與銀兩之同時存在已足使中國之幣制繁亂不堪，而銀元與銀兩之本身，又復異常紛歧。銀元之種類，有袁世凱洋，孫中山洋各種省名的龍洋以及各種外國銀洋等，各有其不同之成色與重量。銀兩則種類更繁，隨地而異。如江蘇浙江之元絲銀，陝西甘肅之元槽銀，廣西之北流銀，山西之水絲銀，上海之規元，天津之行化，北平之公砵，漢口之洋例等，名色不一，授受繁瑣，世界任何國恐無有中國如此複雜之「幣制」。

銀元與銀兩同時存在，且二者紛亂異常，已如上述，弊端叢生，無可諱言，茲就商業財政兩方面分論如下：

（一）商業——第一，交易計算時雖有銀兩，而實際收付

用銀元，以元易銀，以銀易兩，轉輾折合，虧耗甚大。從事國外貿易者，受累更大，買貨以金計，買金以銀計，賣貨又以元計，一方有金銀比價之變動，一方有兩元比價之變動，再加以商業市場之變動，其所負之危險，較普通多負一重。復次，若單用元，則商家祇有銀元準備已足，若單用銀，則商家祇有銀兩準備已足。今則銀元之外，須有銀兩準備，故商家有所謂銀元押款者，乃以需用銀兩時，銀元不能充任，不得不以銀元抵借銀兩，致有此現象。銀元既不能代銀兩，銀兩亦不能代銀元，二者缺一，均足致金融之恐慌。且同一銀元，其釐價時漲時落，有時固可獲意外之贏利，但有時亦可蒙意外之損失，貧得之往，視爲投機之具，正當商人，反致裹足不前，其爲害於商業，自不待言。

（二）財政——可分三方面言之：就徵稅之官吏言，兩元比價，既常變動，而各地銀兩，復不一致，於是胥吏有作弊之機，民衆蒙折耗之損。就國家之稅收言，全國貨幣不統一，則徵收之時，有折算之煩，市價既有上落，折算遂不一定。就人民之負擔言，公平爲財政學上之第一根本原則，今中國各省納稅之貨幣不同，折合之方法互異，在此情況之下，安足以言公平？

對於此事，自極贊成。惟錢業界——上海之錢莊，北方之銀號——對於此事，主張「攷慮」「慎重」「從緩」，其理由據七月十一日彼等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席上之報告為：「（一）銀元之法定成色及公差，能否絕對遵守，勿使劣幣發現於市面，擾亂社會金融；（二）銀幣之鑄造鎔化，必依社會之供求而定，不使銀幣供求不合，致影響法定價格；（三）我國造幣廠出產率不大，將來農村興旺，銀幣流通各地，造幣廠能否適量鑄造供給，不使市場缺乏；（四）大量之交易及硬幣不敷流通時，紙幣隨之發行，其銀準備，是否能依法辦到；（五）將來廢兩用元實行時，對於銀兩銀元之法定評價，是否合理，不使社會發生浮動；（六）造幣廠雖有統一之說，但恐有私鑄劣幣擾亂市場情事。」（七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

此等理由，吾人固不難解答之：（一）錢業界顧慮政府從中謀利，其實政府在銀兩存在時，視洋釐之漲落而鼓鑄，獲利更大；（二）錢業界謂因供求之關係而致影響銀元之法定價格，其實正因為有銀兩之存在，致銀元變成一種貨物，失去貨幣之性質；（三）錢業界顧慮銀元不敷流通，但最近津滬洋釐之跌落，乃表示銀元供給之充足，暫時斷不致感覺缺乏，至於將來銀元感覺缺乏時，造幣廠已經開工

，當可接濟；（四）紙幣之發行，政府規定甚嚴，即用洋不敷而致多發，亦當不致濫發；（五）當此洋釐下跌之際，銀元與銀兩法定平價之規定，比較容易，因平常銀元之價格，（對銀兩而言），常在其含銀實值之上，若銀元與銀兩之換算率，即照此價格，自屬難行，但當茲成色較高之良幣，已逐漸絕跡，市上流通之幣，其成色已漸趨接近，且際此銀元之實值，反略低於其含銀之實值，故吾人如即按照其含銀實值為法定換算率，則雖難免有一方面略受損失，但此係改制時難免之現象，且損失之程度與困難，當以現在為最小；（六）私造劣幣，政府自然可以嚴加禁止。

或云，錢業對於廢兩改元所以持觀望態度者，背後另有原因。蓋錢業向例，存銀有息而存洋無息。譬如以一萬銀元存入，錢莊須按當日洋厘減一毫二絲五忽折成銀兩，若當日洋厘為〇·七三四一二五，應合銀七千三百四十一兩二錢五分，但錢莊將一二五抹去，祇算七千三百四十兩；及至提取時，則按當日之洋釐加一毫二絲五忽折合，譬如提取日之洋釐仍為〇·七三四一二五，加一二五而為〇·七三四二五，是則昔日存入之七千三百四十兩，提取時祇付九千九百九十六元五角九分（外加利息），一出一入之間各有「一二五」的好處，所謂「進出二五」。錢莊每日

進出，動輒鉅萬，此中利益，自極可觀。此外因銀兩之勢力，深入工商兩界，大宗付款，均用銀兩以莊票劃付，又錢業公會有匯劃公單之制度，非會員不得加入，而銀行尙無票據交易所之組織，因此之故，銀行爲收解便利起見，須向錢莊存款，各銀行多則千餘萬，少亦五六百萬，錢莊即資此以爲週轉。廢兩改元之後，則此等利益，都無着落。

雖然，廢兩改元，有普遍之利益，錢業界應以遠大目光，犧牲目前小利，如錢莊於經濟界果有特殊之功能，則將來在銀元本位上，仍可以圖發展也。

大凡一種改革，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需要客觀的環境之適合；第二，需要主觀的改革之決心。廢兩改元，倡議已十餘年矣，其所以未能實現者，雖由於當局者之缺乏毅力，要亦客觀的條件不足之故。現在逢此千載一時之機會，當局者再不可畏首畏尾，必以果斷之決心赴之，以爲改革中國幣制之先聲。

「膽欲大而心欲細」，心細則計劃方能周詳，一種改革初行時，決不能免各種枝節的騷動，亦毋庸總總過慮。

是故吾人對於廢兩改元問題所希望於當局者：第一須下一決心，毅然實行；第二須計劃周詳，以防流弊。據吾人之管見，廢兩改元之須根本計劃，約有以下數端：

(一)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所有鑄造銀元主幣者，僅南京杭州兩廠，其他均已次第結束，政府決定廢兩用元時，應即設中央造幣廠——無論在上海南京或杭州——將造幣權完全集中，無論如何，不能任其他各地另設鑄幣廠，庶銀元成色重量一致，得有切實之保障；

(二)自由鑄造爲本位幣重要要素之一，在自由鑄造之下，銀洋重量成色，必與標準銀元重量成色相等，且可使銀元富有伸縮，俾得供求相應，政府決定廢兩用元，應即完成中央造幣廠之組織與設備，實行自由鑄造；

(三)爲維持所鑄貨幣之信用計，對於貨幣之重量成色，除造幣廠隨時檢驗之外，政府應設中央化驗局，公開化驗，負責定期公布成色重量。

二十一年七月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奧哈根 (Auhagen) 著
道鄰 譯

(見德國Königsberg出版之

「東歐」，一九三二年三月份)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最失望的事，要算是農業了。所有社會政策的缺點，到此都慢慢的發現了。雖然以前有那引入入勝之農田增加的預告，可是實際裏蘇俄在此點上不但沒有進步可說，實在只有退步。那統計中農田的增加，

多半是國家經營之所致，因為國家機關可以隨便開種空地。至于農人經營的田地，雖在統計中，亦無甚增加可言。

就以去年夏種而論，農人自種之田，在一九三零到一九三一，一年之中，僅由八六·六五六兆公頃 (Hectare) 一〇〇〇〇。平方公尺約合十六萬畝二分八釐) 增加到八八·二二八兆公頃。至于秋種，據他們十一月一日的統計，已下種的田地，是三四·〇七七兆公頃，而他們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前下種的田地，却是三五·四三八兆公頃。

國種和民種之田，合攪起來，以秋種計算，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為止，凡有三八·五九八兆公頃，而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却有三九·一八九兆公頃。以

春種計算，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有九七·〇二二兆公頃，比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八九·五九〇兆公頃，是有七，五兆公頃的增加了；可是這個增加，大半是草地的推闊。以蘇俄景況推算，獸畜雖大行減少，而飼養料依然不足，則今年草地的推廣，不是為補足草料，而是為增進農田無疑了。

不過這下種的統計，有一大靠不住的地方，就是因為一九三一年又有很多數下種過遲的。雖然政府有很嚴的訓令督種，然而仍不能使秋種于十月底完了，反比一九三〇年延拖五天。據一九二八年「統計周刊」的調查，蘇俄各處普通的播種，秋季最晚是在十月底，春季最晚在六月初完工。

雖然由此看來，那整個農田的增加，不是完全靠得什的，但是一半是為工業上，一半是為商業上的計畫，有很多分類農事，實在是大為推廣了。就如種糖蘿蔔說：

一九二九： 七七一，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 一·〇四三，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一，四九四，〇〇〇公頃

如種棉的地方

一九二九： 一，〇三二，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 一，五六六，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二，三五七，〇〇〇公頃

如種麻的地方：

一九二九： 一，九七七，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〇： 二，〇九〇，〇〇〇公頃

一九三一： 三，〇三〇，〇〇〇公頃

照這種猛然的增加看起來，那該不是天然的進步。而那耕種收穫和運輸的人，尤不是隨時齊備的。據今年蘇俄的官報說，又有很多糖蘿蔔糟蹋了。而棉花也是如此。可注意的是，聽說收聚棉花的計畫，到今年一月五日止，僅有百分之六三·五成功。

在黑海邊的Transkaukasien 盡力經營的種茶事業，大可改善商業決算；一九三一年所種的茶，大概有二三，〇〇〇公頃。

關於去年的收成，至今尚無報告出來，而蘇俄的統計，也漸漸秘密起來，那一向考察蘇俄經濟最有用的「監察數目」，在一九三一年已祇給他們自己人員用了。要之去

年的收成，絕對的不如一九三〇年。而他們對於在每公頃內可多收糧食的希望，亦日漸減少，也可以從他們一九三二年幾次發表的「監察數目」（止有主要東西）看出。照五年計畫的預算，最後一年的糧食收成，平均是每公頃一，〇三〇公斤（*ton*），而監察數目中僅有八五〇公斤，糖蘿蔔預算是一九，〇〇〇公斤，監察數目僅有一四，五〇〇公斤，棉花預算是一，三四〇公斤，僅有八七〇公斤，麻原計三九〇公斤，僅有二六〇公斤。監察數目預計一九三二年下種之地共有一四四兆公頃（夏季一〇二兆，秋季四十二兆），這是比去年的監察數目，增加了一百萬公頃，比一九三一年統計中實在下種之地，增加了八·四兆公頃。糖蘿蔔田預算是一·六七兆公頃，棉花二·四三兆公頃。

現在已有許多命令發出，預備提高今年的收成；又有許多計畫作成，預備成立一個有農事學識的大隊，又對於種子的預備，機械器具的修理，肥料的供給，都有計畫。不過這裏有很多不適于用的命令，就如農業部長Jakowlew十二月十三日的命令，教各種地方在春農未起以前，應以多少厩肥運到田地裏去，（如烏客蘭三千萬車，馬拉區域一千五百萬車，亞庫田一千五百萬車等）；各地方政府應

再細行分派，使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每村每落每人應工作多少，都詳細分定。然而他並沒想到這幾年日日凋零的畜產，已經減少到什麼地步。我們一想爲這一道無用的命令，消費了多少紙張，就無怪蘇俄這幾年缺紙用了。

蘇俄社會化的農業缺點，已漸漸地引起許多改良政策。我在去年十一月本誌上已說過，極力擴大國辦農產之風，現在已如何消滅了。自從將最大官產劃小之後，已生出三十九個新機關，而其平均大小，已由八五，七七〇降到六二，九〇〇公頃了。就是增加的速度現亦慢慢減少。就如一九三〇年預算是一九三二年國種糧食，應有十四兆公頃，而去年的會議已減到九·五兆公頃，一九三二年的耕地，去歲減到七·二兆公頃，而今年又減到四·六七兆公頃了。這是一九三一年預算中，應收之數（那是五兆公頃）更少了。這預算減少，固然是很有道理，然而以此可以知道他們是遇見以前未曾想到的困難了。

最重要的發現，是他們知道在國辦同農人合辦的農村裏，分贖及工作的規矩，都是很壞的；所以一九三一年聯邦會議上，已再三說明，在農業上亦有按工分餉的必要；斯達林在他六月的演說中，亦有按工分餉的話，那並不是創見，不過是代爲宣傳罷了。至于合辦農業中，組織的改

良，起首是用一聯邦農合會議上議定而經農合總機關承認的幾個法案，其後三月十七日委員會議，又有幾個很重要的法案。因此三月二十六日就有一條具法律效力的命令發出，將一向作爲模範的農業合辦機關組織法（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公布的），關於扣工錢及分收成的部份，大爲更改。就如以前合辦農業的分子，偏于太愛平分，其後雖然工錢按工作分配，然而每人起居飲食，仍是無別，如今可是要極力實行「不作工無飯吃」的政策了。工錢是要按工作的時間，工程的重要和困難，及工人的資格和工作的成績分配。而工作的代值不用錢算，而用「日工」算，每次收成之後，以其總數再分派各「日工」的總數。有不能作工的，人口太多的人家，可別領補助金，或者在分工的時候，給他們一些可能的工作，使他們也可略有進項。

然而工人們所得的「日工」，不是一次發全的，而是每次要預先扣留多少分的。照現行的律令，是以所得之值的百分之十至十五（舊夥人百分之十五，新夥人百分之十）扣入全夥的不動儲金，百分之一·五扣入勤勞夥人獎金，百分之一·五扣入就學夥人津貼儲金，百分之二備償還收歸同夥合用之器械或牲畜的代價。

農人每年所得的進項，大半是天然物產。七月十二日

有一道命令說，每年所收的糧食草料，應提出若干不許分派給農人作工資，一是政府預備收買，一是用作明年種子或預備急荒及給公用牲畜作食料。每年的分派，（或用天然物產或變作金錢）至晚在一月十五日以前辦完，在未完全分派以前，凡已實在作過工的可商量預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以前，（南部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應將備作分派的收成預算報告，拿其中的三分之二先行分派。

關於作工時的組織，工作的算法，工資的分派，除一道四月底發出的命令（見四月二十日 *Jsvestia*）上說的聯邦農合會議的幾個決案，都有很詳細的規定（見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 *Jsvestia*）。內中重要幾點，就是將合作的農人分配成「旅」，以便給他們一相當的工作，而使之能特負責任；此外每人給與工作本一冊，教他們的「旅」長，最少每星期一次，將他們所做過的「日工」寫入上面。

這些革新，當然是很可以改良合辦農業的，不過他們究竟是否適用，就頗可疑問了。就目前而論，他們的成績，是很不令人滿意的。這「按工分資」的辦法要需用很多能算能寫的人，而這二三〇，〇〇〇合辦農業之中，只有一很小部份人能夠應命。而這合夥工作的人，當然天性愛平等工作，而不肯稍多勞動的。所以報紙上常說，有很多

合辦農業，簡直不施行這「按工分資」的。可是也有向做模範的幾個合辦農業，以分資法的改良，工作因之大加進步。農合總會的新總理 *Tatajev* 報告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Soz. sendl.*），有一合辦農業，在一九三〇年，于五十八天內，用一萬八千工種三千公頃地；在一九三一年，以改用分資法，僅于十九天內，用四千七百工，就種三千七百公頃地了。在另一合辦農業。工資以搾牛乳多少分派，以前每一女子每天僅可搾八至十個母牛。現可搾十二至十四牛，而以前每牛得十一公升（*litre*），現今每牛可得十三公升了。不過流行的現象，太浪費工力，一九三〇年「農合研究所」曾說（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 *Jsvestia*），合辦農業的工人，僅有百分之四三・二實在作工，以此之故，所以他們要以二，六〇〇，〇〇〇合辦農業，改作工業。或他項的用途；可是這個計畫到今也未能十分實行。

合辦農業中管理及照顧人員所分的「日工」，每過分的多，就可知他們的人工太不經濟了。*Tatajev* 曾算過這些不直接生產的工作，要佔全部工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就是在「工作旅」中，也常有放空槍的。*Tatajev* 曾為「農合算過，所謂他們工作的時間。有百分之八，是用在預備入田工作上，百分之二十，用在早點同午飯上，百分之

十一，用在休息上。而在早工以前，成羣夥立，不肯動工，尤其是農合中常有的現象。

至于國家和農合公用機關的分派，及一農合中工人自己的分派，是尤不能令人滿意的。大凡只要講到吃飯，那個人的私心就無法消滅了。最近的律令，是使預備公用的一部份，先得相當的保障。不過很多農人恐怕如此實行以後，自己的糧食同性畜的食料就所餘無多了，一九三〇年內，就有很多農人實在上了此當；而一九三一年內，因為政府太將收成看得過好，恐怕此禍再行發生，所以有很多農合將應分派的數目大大的提高。至于按工預支的方法，也有很多處未能實行，所以關於將收成及糧食繳納國家一節，頗有弊病發生。各處黨部，因為他們也是農合份子，所以也同樣關心，因之也未能十分糾正。

到去年十月一日止，僅有百分之八·二的農合，已實行按工預支的分派，那其餘的就是不按章程亂將生產物分派了。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實行按章預支的農合增加到百分之四四·五；至于將收成按章分派完畢，照預算是應至今年一月十五日辦完，而至一月一日僅有百分之十二·五，到二月一日僅有百分之二五·九農合真辦完了。一月一日時候有百分之七十八農合將「工作冊」發出，而到

現在不過有百分之六四·一的冊子是有相當的登記的。按工分資的高低，僅有百分之七五·九是已訂定好的。

糧食的預支，要是應允過寬，那工作就要怠慢了。報上有一次記載 (Sov. Seml. 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一個農合到八月三十開付預支的日子，每天有一百八十七人來作工；開了預支以後，到了九月一日，就只有一百六十五人，七日有一百四十九人，十日一百十六人，到了十三日，僅來五十六人了。

就是在國營農業裏，已看得出國家經濟的需求，和農人工作興趣的相反。就是赤色的監督，第一步也是將他的工人和牲畜餵飽。然而每年的收成，因為政府希望如此，所以總是預算過高，所以每年預算應繳之數，不能如數照繳。因之也有很多監督，將他們收成的實數，秘藏不公布，于是刑案隨之而來，就是在那極有名的機關，像糖業及穀業兩局，也是免不了。

穀業總局今年繳入的糧食，使人大失所望了。依去年二月初的命令 (Sov. Seml. 2. 2 1931)，其後又迭次續令 (Prawda 23.6.31)，他是應繳二百六十六萬噸，然而聽說到今年二月三日，所繳的不過一百〇二萬九千噸 (Sov. Seml. 6. 2. 32) 這總算是大失敗了。雖然他的局面比一九二八

年初成立時，加大許多，而他所得的成績，比那時一九三一年，一百六十萬噸的數目，是睽乎其後了。

不過這個失敗，不是因為穀業局自費過多，實是為地皮上收成過少。他們大官地上，現在漸漸的由單純的穀物種植，進到「輪栽法」時期了，高加索北部早已發令實行。但是有很多農合地，因為要進用「輪栽法」，加增了很多組織上困難，所以有許多疏略。很好的一例，就是在烏客蘭有一農合場(見Soz.sem. 17. 12. 31)，在一九三一年中，雖是極好的黑土，收成却極不滿意(每公頃冬小麥七四〇公斤，春小麥三六〇公斤，大麥五〇〇公斤，燕麥二五七公斤)問他們管理人是否行過「輪栽法」，回答道，「是的，一個六田輪栽法。」其實這個連紙上都不曾見到，不過是兩年前此地有會行過「輪栽法」的，那輪栽的界線，現在已模糊不可識了。

通信

適之先生：

日前奉訪，蒙贈第九號的獨立評論，得讀孟真先生論「教育崩潰之原因」一文，名言議論，異常欽佩；但其中

雖然官辦，農辦，及農合有各種反抗，那政府預定的糧食收成，後來却是實在實行了。據一月八日 Pravda 說，政府的計畫，在一月一日，已有百分之九十。三成功了；再依他種報告計算，實際上已有二一·九三〇兆公斤繳入，雖是今年收成不如去年，而今年結果，却要遠過去年了。(去年僅有二一·五〇〇兆公斤)。這顯見的是將人民應得的糧食再力為榨下了。這事在一九三〇年，已行過了一次。那時全國的收成，官廳核計八七·三六〇兆公斤，村落留下的，是六四·六〇兆公斤。這是較一九二七及二八年照「糧草清單」村落應得六五，八三〇兆公斤，較少一點。不過這幾年地方百姓已增加五百多萬。這種現象，是與五年計畫中預算末年村落應得八三·七六〇公斤為數大不相符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

有一段文字，對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的中國畢業生，作最猛烈而最普遍的總攻擊，措詞稍欠平和，持論似屬偏激，頗有商酌的餘地。我是該院畢業生中一個最沒出息份子

，內省多疚，聽到這一番逆耳的忠言，自然感愧交集，那敢諱疾忌醫，強詞飾非呢？不過人是有自衛本能的，驟然受意外強烈的刺激，最初感覺羞愧，後來惱羞成怒，腔子裡堆積許多話又不能不借個機會傾吐出來。現在大膽地寫出許多爲自己解嘲的話來，敬請 先生刊入貴報，以求正於孟眞先生和國內的酷愛事實者。

孟眞先生以爲中國教育的崩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畢業生應負其責，這未免太看得起他們了。在我看起來，這種「恭維的話」眞使人受寵若驚。假若說他們應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那就已假定他們在過去或現在曾執教育界的牛耳。但一攷事實，就知道他們在教育界從未佔特殊優越的地位。比方民元以來，教育總長和部長好像有十餘人之多，其中只有一位是師範院的畢業生，就是蔣夢麟先生。試問有什麼事實足以證明蔣先生的政績劣於其他十餘教育總長的政績？試問在他的任期內有什麼特殊設施足以使教育崩潰？大學校長從前祇有一個郭秉文先生，其爲人如何姑置勿論，但東大農科和教育科的成績，至今仍爲一般人所讚美。假若要郭先生負教育破產的責任，他必不敢接受。

近五年來，教育學在中國遭遇空前的厄運，因此學教

育學者也大倒其霉。少數有權威的學者，不但不承認教育學爲一種「科學」，而且不承認教育學爲一種「學科」。大家都以爲教育學無研究的價值。清華大學的教育系取消了。武漢大學本是武昌師大的後身，但改大後不但無教育學系，並且文學院內也不設教育學講座。廣東中山大學亦是廣東高師所改，也不設教育學院。最近青島大學——山東大學——的教育學院停辦了，中央大學的教育學院的規模也被縮小了。於是學教育學而希望當教授者都有「繞樹三匝，何枝可棲」的感慨。師範院中國畢業生前後不下五六百人，得在大學濫竽教席者尚不滿二十人。在這二十人中，還有不少的人想「改行」，這總算大倒其霉了；而人家又硬要這些人微言輕的先生們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這是公平的說法嗎？

孟眞先生又引了 先生這樣一段話：『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小學教員，頂多做中學校長，已經希有了，我們却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假定這段引語是正確的，牠和事實亦不盡相符。該校畢業生做教育局長，中學校長，中學教員者最多，當小學教員者極少。若說「做中學校長者頂多」則頗近事實，若說「頂多做中學校長」則未免抹殺事實。畢業後即刻在本校

做副教授者亦有人：如桑戴克，蓋茲 Cates，克伯屈，施突來爾 Straker，華特生 Watson等。在其他大學做教授者更多。哈佛，芝加哥，加利弗尼亞大學的非教育科的畢業生在教育界之出路亦大抵相同；亦是多數做中學教員，極少數當教授。

留學生新回國即當大學教授本屬不妥，但在文化落後的中國，除掉這些人又找誰來做教授呢？拿西洋標準來說，新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者固未必有當大學教授的資格；但新畢業於其他大學的其他學院者又都有資格執鞭於大學嗎？孟真先生對於師範院畢業生又安上「速成」二字。但師範院和其他學院在畢業年限，科目分量，積點標準上完全一致，前者並不更速成。若說畢業於師範院者是速成的不配做教授，畢業於其他學院者亦是速成的亦不配做教授。並且在五六百人中只有二十餘人得為教授，其選擇亦不可謂不嚴——不過選擇缺乏客觀標準罷了。做大學校長的現只有蔣夢麟和李雲亭二先生是畢業於師範院者，試問他們的成績真不如其他校長的成績嗎？該校畢業生長教育部者始終只有蔣夢麟先生，試問他的政績真不如那些未曾學過教育學的部長們嗎？

孟真先生以為師範院畢業生介紹美國的六三三制和道

爾頓制，是一個最不好的貢獻。換一句話說，教育太美國化了。六三三制和道爾頓制本身的價值如何，姑置勿論，但至少牠們不是教育破產的原因。歐洲戰後的教育都逐漸美國化了，道爾頓制和設計教學法等在歐洲學校內也很風行。歐洲教育為什麼不會破產呢？「江南之橋，滄淮則為枳。」一切制度和主義在西洋大抵是好底，但一到中國人手中便弄壞了。我們不能責備制度和主義的介紹人，而應歸罪於整個社會組織和中國的國民性。譬如中國教育之美國化的運動實淵源於杜威的來華，那時先生也會極力介紹杜威的教育思想；許多學生——我便是其中的一個——決心學教育都直接間接受杜威和先生的影響。假若要杜威和先生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那不是大笑話嗎？模倣外國而不顧國情是三十年來中國教育的通病。中國新教育最初抄襲日本，這是師範院畢業生提倡的嗎？後來模倣法國，實行大學區制，這是師範院畢業生幹的嗎？近三四年來，他們都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而提倡中國化的教育，關於這類的文字已發表了許多，差不多成爲爛調了。如果認定抄襲爲教育破產的原因，日本留學生和法國留學生應分負其責。

孟真先生提出的三種敬告也有商酌的餘地。依他的意

思，只有中小學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教育和教育學毫無關係。換句話說，教育學上的原則不能應用於大學。

這是第一個敬告。但教育學上至少有一部分原則是可以應用於大學的。教育行政上的原則之應用並不限於中小學。

中學校施行的道爾頓制在大學及研究院也能應用。大學教育是社會現象之一種，既是社會現象即逃不出因果律，即可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由科學方法的研究所得之結果或原則即可應用於大學教育的實施之上。假若否認大學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即不啻置大學教育於超因果律的神秘世界之中。

第二，孟真先生以爲教育學家應略通文理各科中的一種學科，這是人經地義，人人共知的原則。美國各大學本科教育學院的學生都照例要在文理學院中選習一種或兩種副科或輔科。比方我在華盛頓大學肄業時，除以教育學爲主科外，還在文理學院選習一種主科，一種輔科。師範院是研究院，所以不規定在文理學院選習輔科。假若該院畢業生缺乏基本訓練，那是國內大學辦理不良善之故，怪不得師範院。國內各大學教育學院近來也注重基本訓練與輔科的選習。從前我滙萃師大教育系時，在基本訓練方面曾依照哥倫比亞大學的辦法，規定「現代文化」和「科學概論

」爲本一必修科；在專業訓練方面曾規定每生至少須在文理學院選習一種輔科。現在國內各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生固缺乏基本訓練，但其他學院畢業生亦未嘗不缺乏基本訓練。師範院中國畢業生容或有「不學無術」之人，但歐美各大學其他學院的中國畢業生亦非全是「有學有術」之人。試問我們有什麼標準足以判明教育專家全是不學無術之人，其他各種專家全是有學有術之人？孟真先生認識師範院畢業生不過十餘人，根據從極少數人所得之主觀的印象，而推論到全體的程度，這是合邏輯的嗎？並且所謂學術是什麼？是西洋的新學術呢，是中國的舊學術呢？若說新學術，師範院畢業生至少有相當了解，否則不能畢業。其中有少數人對於教育之科學的研究有頗顯著的貢獻，這是歐美教育學者所承認的。假若不懂「挖墳墓，嚼枯骨」的中國考古學便算不學無術，百分之九十九的師範院畢業生都會毫不遲疑地自認爲不學無術之人。

第三個敬告是師範院畢業生不應把中學小學的課程弄得五花八門。所謂五花八門大抵是太繁複的意思。中國小學中學科目實在太繁複，但這是直接抄襲日本，間接抄襲德國的。孟真先生把這種罪過加在師範院畢業生的肩膀上，似無史實的根據。現在德國教育家克欣斯泰尼 Kaschen

Steiner 已極力鼓吹削減中學的課程內的科目，但這亦是受美國教育的影響。從前東大附小的課程完全抄襲杜威的實驗小學的課程，所以非常簡單，只包含五種科目或活動。南方更進步的小學之課程因受東大附小的影響，也漸漸簡單了。我們只能說師範院畢業生使少數進步的中小學的課程比前更簡單，那從反過來說他們弄得五花八門呢？右說他們在高中介紹選科制頗有毛病，那是另一問題。但多數大規模的高中都採用有有限制有指導的選科制，並無五花八門的弊病。

最後，孟真先生以為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又分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是一種荒謬絕倫的制度。美國省立大學與著名私立大學的教育學院與文理學院都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在教育學院內除設立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外，還分教育哲學系，中等教育系，初等教育系等；但歐美教育學家，史學家，物理學家從未著文罵牠為荒謬絕倫的制度。英國著名大學都有教育科，德國著名的進步的大學之教育科也有與文理科平行的——如漢堡 Hamburg 大學。在歐洲舊式大學中，教育學系誠然隸屬於哲學科或文科之下，但這不足為訓的。比方德國的蒙欣 München 大學只分法醫神哲四科。在哲學科內設立文學系，化學系，物理系，

數學系，政治系，教育系，心理系等。若嚴格取法於該大學的制度，不但教育學院不能存在，文學院理學院也無成立的必要了。歐美學制，各有利弊；若武斷地認定美國制度為荒謬絕倫，那便是「有見於歐，而蔽於美」了。

總而言之，師範院畢業生在中國教育界是最可憐的 Chindalla。假若要這些可憐的「星得拉」負教育破產的責任，這未免太滑稽了。真值我們的不憐惜孟真先生一個人，我們和許友所談笑也不止這一次，但我們從未敢以言相報。「吁我為牛則應之為牛，呼我為低能則應之為低能」有什麼關係？因為處境如此窘困，所以學教育「朋友們時常以「敬畏」二字互相勉勵。「如居煖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這是我們的態度。「笑罵由人，學問我自為之」這是我們的「座右銘」。

好了，就此打住罷！希望 先生和孟真先生多多的指教！專此順祝

您的健康

邱椿 廿一，七，十八

答

孟 真

邱椿先生這封信指示我很多事實上之欠妥，及語調上之過分，我不勝感謝之至！這篇文章的來原如此：我想把此日教育大糟其糟的出來寫成一文，以視獨立評論的篇幅

，而匆匆忙忙寫不完了，故原擬八事，僅寫五條，文題及前一段引子寫時，都只有第一二幾項在心中，寫完時也不會想想文中各節是否皆對題，便送給編輯先生了。而適之先生忙着發稿子，也不及與我商榷。把我那篇文中第四項與第一二三項同列，而以為是崩潰之原因，實在過分，至於第五項，乃簡直不成原因，此點雖未承邱先生指正，我也很覺不妥。我對於這篇文字全部構造之不邏輯，及第四項有幾句話言之過分的地方，非常抱歉！

邱先生提出辯正及商榷此事之態度，我固十分佩服，不過我對教育的見解尚不能因此改換，因為我覺得邱先生所說各節，尙未能使我心中渙然冰釋。

一，教師學院的中國畢業生確曾在中國民七八以來的教育學界佔一個絕大的勢力，而其成績我們似乎不敢恭維。這不是說他們都不行，這只是取多數以為論。一二年來，各大學之教育學院或系，幾皆是他們主持。最初國人對他們的希望是很大，民七八年，一般人以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教育，而教育要教育專家發命令，我們望風服從而已。居然民九民十以後幾年中，我們見到教育學專家的若干設施與計畫，其中發動者幾全是留美學生，更以教師學院畢業者最有力量。邱先生的數目字當然不錯，不過若把

這些年來各大學教育學教授的人數之出身校別，及他們個人的地位與權能，分配着看一看，不能使我們不覺到這些年來的大學中所謂教育學操在他們手中，而以他們在大學主持教育科的地位，在普通學校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現在以為他們雖不能當「教育崩潰」之主因，却也未嘗不是一種大力量，這恐怕是邱先生也承認的罷。

二，這般教育學家高談測驗，教學，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梢的很，而於教科究竟應該怎麼樣，學生的知識如何取得，如何應用，很少聽到他們的議論，尤其少見他們的設施。以前我也曾托人物色到些國文歷史的測驗方式，說句不客氣的話，簡直沒有意識，不特沒有國文歷史等之常識而已。先有一種文理專科之素養，再談教育，方是實在的，否則教育學雖有原理，而空空如也，何所附麗？教師學院中國學生諸位，大多數是務根本或務文節，希望他們自己考量一下。我所謂「不學無術」者，其意如下：對於一種學問，有一根本的訓練(discipline)而得了解，謂之學，能把這了解施用在具體事實上，謂之術。所以一切洋八股，科學八股，黨八股，教育八股，都是不學無術。文章上輔綴經綸，事實上不得要領，皆不學無術也。

至于邱先生向我提出討論的三件事，及大學應否有教

育學院，煞是大題目，將來我當作一文，敬求指正。最後我再表明，我極其感謝邱先生指示我的幾件錯誤，並極其佩服他這見教與商榷之態度！

之誤！如屬實，請更正為荷。左律 七月十一日
編者接到左律先生來函後，即轉給何廉先生，現已得何先生回信，更正如下：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勘誤

主筆先生：

貴評論第六號何廉先生作「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文內第五頁上排第二行「：密度為三一」之「三」字，是否為「四」字之誤？其較日英倍數似應減少。又同頁下排第八行「每英畝已耕地：」之「畝」字是否係「里」字

| | | | |
|---|------|--------|--------|
| 真 | 行 | 誤 | 正 |
| 五 | 上排二行 | 密度為三一 | 密度為四二 |
| 五 | 三行 | 約小九倍 | 約小七倍 |
| 五 | 四行 | 約小七倍 | 約小五倍 |
| 五 | 下排行 | 每英畝已耕地 | 每英里已耕地 |

何先生和編者都十分感謝左律先生的教正。

| 尺寸地位 | 全頁 | 半頁 | 四分一 | 八分一 |
|-----------|-----|-----|-----|-----|
| 前封面 內頁 | 二五元 | 十三元 | 七元 | 四元 |
| 後封面 外頁 | 二五元 | 十三元 | 七元 | 四元 |
| 後封面 內頁 | 二十元 | 十元 | 五元 | 三元 |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領袖人才的來源

適之

論士大夫

孟森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汪敬熙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肇黃

國州中救災問題

章元善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汕頭 | 漢口 | 重慶 | 廈門 | 廣州 | 濟南 | 青島 | 無錫 | 安慶 | 開封 | 武昌 | 西安 | 南京 | 上海 | 天津 | 北平 |
| 新時代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 新時代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 新時代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獨立評論

第二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七日出版

領袖人才的來源

適之

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本刊本期。）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爲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爲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於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爲「領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伸他的意思，討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嘆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的「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羣的領袖。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

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們知道新約裏的幾種耶穌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i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歷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於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我們對於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軼事瑣聞。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够解釋爲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爲「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裡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顏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禮經」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顏氏家訓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

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已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顏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顏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終于被科舉制度和別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只消讀幾部刻板書，念幾百篇制舉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鬃戲文裡的巧頭女婿，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他從小學的是科舉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裡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 ○ ○ ○ ○

以上我說的話，並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復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歷史

事實。凡成爲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復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產兒。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意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歷史；巴黎，牛津，康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歷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歷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

風」。至于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爲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歷史陳迹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鈔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兩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刊第十一期）裡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爲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鉅」。其實他太恭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

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梟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真有點像「臨渴

論士大夫

孟 森

古時治國平天下分二級：蓋以全國爲天下，而國之中最高之區域則爲國。自封建廢而全國之中不再分國。自列國並存，吾人所自託處之國止占一國之位置，而不再名天下。於是有治理之責任者，以治國平天下二事合而一之。

治國既即平天下，其負治理之責之人古以君與臣分二級，而其實君處神聖之地，善則歸之，不善則責輔弼者，責任使者。朝有過舉，國民輒指斥某人當道有以致此。若

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我們在今日如果真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清只有咬定牙根來澈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條狹路可走。如果這條路上的荆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埋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只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

時君稍悔禍，舉民意之所斥者而置之法，一國頌君之聖明，不追以前之何以用人不當，不聽曲突徙薪之謀而待補於焦頭爛額之後也。然則君實不負全責，猶今所謂機關之爲法人。法人不負責，負責者爲機關中之自然人。君爲機關之性質；機關中之自然人，所謂「士大夫」者當之矣。

君治之本義原以君爲機關之法人。故奉之以神聖而無所惜。然爲之君者，究有一自然人在；往往用其自然人之

意識，以自褻其神聖。而國民則又爲其先已予以神聖，而其後不能不終受神聖之劫持，往往無如之何，而積憾蓄怒，至強力革除之而後已。近世乃有兩政體發生爲之補救。

一則立憲。憲法爲最高之法，專對君主而限制之。君主常保其機關法人之人格，即古之所謂聖明，亦即今之所謂神聖。至忽露其自然人之人格以破壞法人之人格，則明定法律以處自然人者處之。即自褻其神聖者，國民亦即有奪其神聖之定分也。於是負責於國者皆奉法之人，且皆受束縛于神聖之主權之人。所謂士大夫者，乃真負責於國之人。而所予以神聖之尊者，不復能奪士大夫之權而強與其事矣。是立憲之政體君主爲虛名，而士大夫爲實位也。

再則民主。民之爲主，即以民爲神聖。民之爲神聖，古義本然；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國君死社稷。」社稷者，土與穀，以其養民而尊之，加於君上。君有效死之義，尙止能效死於其次之社稷，對民則藐乎如在天上，非直接所敢以功罪相質証也。古之人有言曰，「子得罪於父，可因諸姑伯叔解之。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親近解之。桀紂得罪於百姓，至今未有能解之者也。」此民主之真諦也。民主之神聖，止能歸之於其合集

體之法人，而必不懼其各個之間濫用其自然人之人格以蹂躪於國。於是負國之責者惟有士大夫之自然人，更無有虛挾神聖之自然人旁撓而陰掣之。於是士大夫之責爲愈重。

「士大夫」三字合成一名詞，非前古士與大夫分職尊卑之官品之名，亦非近世士與大夫分占朝野之階級之名。「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爲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爲誅殛所可加者也。按之古義，其人格總分四級：「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最下之一級也。事君而專取容悅，今既無君，則據高位於民上，而口道福國民，實以爲固位之計者是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稍上之第二級也。其內行純駁不可知，凡歷代身任安危，自知中書爲政本，鏗而不舍，以求有濟；即下至不免倒行之霍光張居正，亦不失爲此級中人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更上之第三級也。以身率物，不令而行，闇主不能不積漸以推誠，愚氓不能不觀感而開化。伊周而下，諸葛武侯爲似之。「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最上之第四級也。大人爲國澤及數百年，而古未有加。若以爲治之法，立定可行於數千載，或且衍之於無窮；得位則必爲大人

；正惟不得位，而功且倍蓰於大人而無算。在持此定論之孟子，其意固以此歸所願學之孔子而無第二人可以當此者也。

凡此皆所謂「士大夫」者是矣。顧吾人之言士大夫，則據古義，當專屬第二級以上。所謂事君容悅之流，身居士大夫之位，而不爲士大夫之所爲，古卽有分別之名以名之。其名爲何？一則曰「鄙夫」，其言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再則曰，「小人」，其言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小人之中又分「盜臣」與「聚斂之臣」，其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不過竊國之財用以肥身，而聚斂之臣則務財用以禍國，皆於小人之中偏舉一義而比較其彼善於此者乎？此皆徒有士大夫之表，而可撥之士大夫之外者。至於不負全責，爲趙孟之所貴賤，其本身無特立之表見，一以最高有力之意旨爲俯仰，則亦有距士大夫之地者。古又謂之「斗筭之人」。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是故處士大夫之位而有分別之名詞，又可分爲三級：「斗筭之人」爲薄乎云爾之第一級，「小人」爲災害並至之第一級，「鄙夫」則罪大惡極。謂之無所不至者，其爲禍非止一狀：前賢釋之曰，「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患失之心，淺之則市儈可有之，深之則士大夫之自彌所患之失之缺憾者，卽成無所不至之罪惡。

胡適之先生一日過我縱談，遂及「士大夫」。適之慨然曰，此爲當今一大事。外國人不知中國有士大夫，遂使外人疑我居士大夫之地者卽士大夫也。中國人亦不知外國有士大夫。稍稍能讀旁行文者，除彼國二三小說文豪各觀其所知以致其愛慕，無與於士大夫之說。若其以事功爲徵驗而景仰彼國之人，則皆彼中盜賊之變相，而我以爲偉人而心儀之而口道之，而使後生小子傳誦頂禮之，若探險覓利者，若兼併致富者，若偵探式之治外交者，皆是也。吾在彼中，見其上流之有智識者述其國之先正名人，所舉事蹟，皆津津於其人純篤之內行，退讓之美德，未聞若吾國膜外搔癢而自以爲崇拜英雄也。集中國外國士大夫之事蹟而互譯之，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真諦，既不當自忘其國故而貶損人格以見輕於外人，又不當全昧於外國之故而評掩

外國之人格以取疑忌於國人。此今日吾輩之事矣。

適之既有此約言，吾乃創意有「士大夫集傳」之作。然吾言下不能無疑，又親適之質之。蓋吾疑外國之教化或根本與吾國有異同之處也。吾國爲士大夫立論始於有責任。而外國士大夫似分析權利義務二事爲最要。約言之，任近權利，責近義務。然吾國之責任爲不必分之一名詞。外國之權利義務乃兩兩對舉，似獨以義務爲責任之對象，權利則以可爭爲原則，而又以可讓爲例外。夫爭，獸性也；讓，人心也。爭與讓意識之消長，爲獸與人程度之近遠。若以權利之說導之，則雖士大夫有不必以爭爲諱者。使僅言爭利，人人知其非美名；若言所爭者權利，則人人諒其爲應得。諒其應得，而卽以可爭爲垂教之本旨，終非吾國士大夫舊說之所安。舊說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曰：「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今使明明一「利」字，冒以「權」字冠其上，而導人以爭，則豈外國之士大夫必有異於吾國之士大夫者在耶？適之曰：「不然。權利字之本義，乃是非之是字所發源。是者，得其當之謂也。西方人所謂『爭權利』，其精神所在，正是各爭其所謂是，各行其所謂是，而必不容非義之干奪。此與吾國之賢士大夫抗爭正義於廟堂之上，死而無悔，正同一負責任之態度，爭非必爲惡德，而讓不必爲美行也。權利之譯，乃日本人之字典，而中國人沿之，非其字之本源也。」吾不學，不通旁行文，聞適之之說而無然。然則關於人格之字義且至今未得真解，又何足以進一步而竟思體會人格也？沿用日本字典所定之字義，其應更定者究有幾何？偶舉權利一譯文，即覺中有歧異。取各種範圍人格之字義，細意求之，若有若干應更動者，此又吾理想中之一大事也。因序士大夫集傳而姑妄言之，適之必立有以教我矣。（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汪敬熙

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

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在研究機關一方面說，中國所

有的研究生物學的機關幾乎全是研究分類學和形態學的。

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南京科學社所設的生物研究所

是專門注重這兩方面的。近年廈門的海洋生物學會的夏

令會是聲明專門研究那地方海濱生物的分類的。中央研

究院的天然歷史博物館也是專門分類的研究的。注重實

驗生物學的研究機關，中國現在還是沒有。至於各大學

的生物學系中所做的研究也是屬於分類學和形態學的多。

在學會一方面說，科學社，一個在中國有相當勢力的組

織，在生物學方面，是專門提倡分類和形態的研究。自

然歷史研究會也是偏重這兩方面。在實驗生物學一方面

，除了一個中國生理學會之外，尚無他種學會。在經費

一方面說，國內用在生物學上的錢，也是費在分類和形態

的研究的多。近十多年，政府所發的教育經費永遠是發

的不足數不按期，我們可以不論。以庚款為財源的各種

基金是比較可靠的。但是除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

年年有報告外，其他基金的報告是看不到的。即以中華

教育文化基金會而言而論，他們分配到生物學的款子超過

大半是用在提倡分類和形態的研究。科學社的生物研究

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農林植物研究

所，廈門海洋生物研究會夏令會，都是受他們的幫助的。

他們所請來到中國講學的外國生物學者，也多是研究分類

或形態的人。他們給生物學的科學研究補助金大半是給

研究分類或形態的人。

這種情形是恰與世界生物學界近四十年的趨勢相反

。生物學自從十九世紀末是一日一日變為一種實驗科學

。遺傳學，實驗胎生學，等等，都是這四五十年內新長

成的學問。生理學受了物理學，化學，物理化學發達的

影響，也是趨重以實驗方法去求種種生活現象底物理化學

的基礎。甚而至於形態學也利用實驗方法了。分類學

則大見衰頹。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歎。

我國生物學界的情形與這種趨勢相反，是我國學術落

後底一種表現。我們不能以此來指摘我國現在的生物學

者。不過我們總覺得這種太偏重分類和形態的研究不

是一種健全的發展。無論在純粹學理的研究方面，或在純

粹實用的研究方面，現在我們都是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

至少應該用一大部分的財力和人力致力於實驗生物學。

今日這種幾乎將所有的人力財力完全注入分類和形態方面

，實是一種眼光短淺的策略。這種策略似乎是一種不自

知的發展，定於幾個人底研究興趣的偏向。惟其如此，

更是危險，我們更應該指明此種策略之不善，更應該努力

去求補救的方法。

在理論研究的方面，生物學中最有興趣的問題是：生

物怎樣生活？怎樣生長？遺傳怎樣來的？生物與環境怎樣互相影響？——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須用實驗方法在活的生物身上去研究的。反之，分類學家和形態學家非生物死了製成標本之後，是不發生研究的興趣的。他們所用的研究方法只是觀察，不是實驗。形態學家所得的結果只告訴我們各種生物的構造及他們長成的次第。分類學家所得的結果只是一本分項的生物總賬。生物學中這兩部分只是為實驗生物學的預備。若是只注重這兩部分，就是只注重死的生物，而忽略了那些更有趣的活生物的問題了。

在應用一方面，也是由實驗生物學所得的訓練和智識有用的多多。知道生理，想培養生物的方法容易；知道病理，想治生物的病的方法容易；有遺傳的智識，想改良物種的方法容易。並且想得的法子，非經實驗過之後，不能確定其究竟有用與否。只知道生物的學名和種類，只知道生物的構造，在應用上能有幾多幫助，是一疑問。實驗生物所得的智識在應用上是十分重要；實驗生物學所給的方法上的訓練在應用上更是萬分重要！

在求理論研究的發達上，在求應用研究的發達上，我們都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尤其是在應用一方面。中

國在醫學，衛生，農林，園藝，漁業上，有種種生物學的問題等待解決。這些問題大多數是需要實驗生物學家來研究，方有解決的希望。只受過形態學和分類學訓練的生物學家，如想研究應用問題，往往須重受一番實驗的訓練。由這一點看來，我們應該深覺提倡實驗生物學的重要了。現在生物學界只注重分類學和形態學——這種偏枯的病象是極須快快的改正。

在形態學和分類學之中，據近來所見國內生物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報告看來，是研究分類學的比研究形態學的多。在中國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一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類的總賬簿。如以此為目的，分類學家是應該合作，並且應該歡迎合作。但是據我們看來，我們的分類學家似乎不以此為目的，而是以改正他人的錯誤和發現新種為目的。兩樣之中，尤其重視新種的發現。改正他人的錯誤而出之以卑視他人的態度是易啓爭端的。中國的動植物分類的研究是一未經大發掘的金山；礦中金塊雖多，但不是無限的。並且新種的發現先後，在重視此點的人眼光裏，是非常重要的。誰先發現，誰便可以把自已的名字附在此新種學名的尾上，同此新種，永垂不朽。因這些緣故，分類學家中，有時不免有

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愈激烈，愈見得競爭的人底未成熟。至於因競爭而用卑劣的手段，就真是中國科學界一種可恥可悲的事了。

研究分類和形態的人往往說，認清了種類，知道了構造，方能進而研究生理遺傳等問題；並且在生物學發達史上，形態學和分類學的發達是早過生理學等實驗生物學的發達。這種話只有一半是對的。但是就是我們承認此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我們的國家弄到這田地，真是「百孔千瘡」。要說它患的到底是什麼病，好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但我們許多風俗習慣不適用於組織近代式國家，至少是許多類病根中之一類。這類病根中重要的有三件：一是儀文主義，二是貫通主義，三是親故主義。所以稱爲主義，與其說是因爲人人自己覺得，或宣傳應該這樣，無寧說是因爲無數年的漸漬，成爲人心風俗的偏傾，不知不覺地由行爲上表現出來。這種身上「長」的主義比口上說的主義，勢力大得許多。

儀文主義可以分爲三種趨勢。第一趨勢是儀式主義。

獨立評論 第十二號 今日中國生物學界

話完全不錯，我們也不能因此主張中國應當像現在這樣的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這兩種學問輸入我國已有十年以上了。分一大部分人力財力去提倡實驗生物學的時機到了。如果照現在這樣的做下去，不但是中國難於追上歐美生物學的進步；而且甚難使生物學和民生經濟發生關係。這一點是我們希望今日學術界和教育界注意的！

一九三二，七，二十六，於北大。

肇黃

我們做事情，往往把儀式鋪張得堂皇富麗，而人們實際的福利反非所重。如大做壽，大出喪之類，豈不是「勞民傷財」；然而現在這是很流行。政治界教育界的許多歡迎會歡送會紀念會慶祝會等等，例皆費力點綴，應有盡有；而實際設施，很少看見有人如此興高采烈，努力從事。結果，許多事情都是妝點門面，而於實際很少補益。第二趨勢是文詞主義。我們許多事情只要文章做得好，言語說得漂亮，就算了事；觀念之當不當，事實之對不對反視爲無足重輕。某先生作文辯護相術，自己說道理雖未必對而文字却佳；正是代表這種態度。科舉時代的八股文，固不必說

；民國紀元以後，每一次內戰，都有許多文電，篇篇「講道德，說仁義」。西洋人只看這項電文的，往往驚嘆我們爲最有理性的民族。他們那里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許多機關的組織法，章程，則例，看起來都是煞有條理，而實際辦事往往却另是一套把戲。貼標語并不是外國學來的，乃是貼格言式的春聯的變相。有些人說「大學亡格致

一章，周禮缺冬官一部，」所以中國不能發達物質科學：

這句話可以代表我們民族之重視文字。似乎古今中外沒有另一個民族趕得上我們這樣迷信文字的。第三個趨勢是文

雅主義。我們傳統的教育以養成雅人爲極致。雅人者長日

以飲酒賦詩作字畫玩金石爲事者也。從前的教育哲學以爲但使這個人的性靈受過風雅的陶冶，簡直就無施不可；換

言之，能平章風月，即能平章天下事。更進一步，但使能平章風月，天下事一切付諸俗吏，也無不可。至於國計民

生，雅人都不必過問。乃至百工技藝，更是形器之末；軍旅，錢穀，也不是士君子的正務，所以文雅者不久就變爲

文弱耆。俗語說：「舉人沒腳，進士沒手，」正是文弱現象的好描寫。現在青年人當然有不受文雅文弱的影響的；

但是受影響的還是不少。最注意的是實際左右政治教育等等的人大多數還是文雅主義的出產品。這種平章風月的

訓練，不特萬不能與歐美，日本「功利的，」「效率的」訓練爭一日的短長；就是與本國武人比較有紀律的訓練的也相形見绌。年來內政之不清明，固然一部份由于武人之跋扈；然而士君子之雅而弱實爲軍人開許多方便之門。這是一件萬不可忽視的事實。（文雅主義當然不是全壞的，但我在這裡無意談它的不壞處。）

貫通主義也可以分爲兩面。第一是玄通主義。玄通主義者以爲宇宙間有最高的抽象的原理爲一切事物所遵依——一切事物都是這個原理的例子。讀書人所謂「易」，所謂「道」就是指這麼一類的原理。易傳的序卦篇，就是想把天下一切事變包納在卦序裏，如「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好像能解釋一切事，其實不能解釋一事。我們的「士大夫」隱隱都相信有這麼一種「道」；悟得此道，什麼事都好辦。得此道的人不特可以事父事君，幾乎可以說連吃喝嫖賭經也全通了。因爲這種迷信，所以對一切事喜歡作空空洞洞大而無當的考語，而對於實際事情的條理節目毫不在意。許多作事的手續之不妥，方法之不對，結果之不佳，都是從節目上看出來。只講玄理講通則的人必定不能有所改進，更無論能有什麼創造發見。這種人到了弊病日積月累

、終至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有再用一句玄理——「盛極

而衰」——了之。幾千年來天災循環，束手無策，未始不

是爲玄通主義所誤。貫通主義的第二方面可以叫做概通主

義。概通主義的意思是萬事萬物的道理都小異大同，所以

知道一事一物的道理，就知道萬事萬物的道理（這與玄通

主義大有關係，但不完全相同）。因此，能作一事，即能

作許多事。八股通就可以致君澤民作聖賢。再說寬一點，

文章通則人情世事都通。從前所謂通往往混同地指文字

的通和事理的通，正是概通主義的真精神，是有意義的。

現在還有些老輩以爲中文通的人，英文一定也通；英文通

的人，各科學一定也通。在一件事上得了資格名望的人，

就有人把件件事向他請教。這都是根據概通主義的。因爲

有這麼一個概通主義，所以到了此刻，政治界以及他界還

有許多人——尤其上了年紀而握有實權的人——不大相信

有專門技術的訓練的人，覺得這般人不過有一技之長，不

是『通人』，不能當大任。因之許多委員主任還是無專長

而有『通長』的人。他們自己以爲『常識』豐富，或竟以

爲具有『通識』；而實際上往往所謂常識乃是妄識，所謂

通識乃是渾識。這種凡事不求專精的態度，近來雖然漸漸

改變，但是事實上依然有很大的勢力。這個偏見不根本推

陷廓清，什麼事都不容易有改進的希望。

親故主義可以說是家族主義之擴張，因爲故舊朋侶可

以看作親屬的推廣。這個主義是宗法社會的遺習，從前得

天下者多大封同姓就是一個例子。親故主義，在它的實際

運用方面又可以叫做情面主義。我們許多機關的用人不是

量材力之大小而定地位之高低，是按面子之大小而分待遇

之厚薄。內舉不避子，古人引爲美談；親故當然不是一定

不可用的；但總當以才稱其職爲基本條件。這句話說起來

實在是平平無奇；所以我們的不能實行愈加奇怪了。我們

不特用人論親故，講情面；辦事也是如此。許多事情，本

可以用法律拒絕，而因爲情面就姑且敷衍；有些事情本可

以照公事辦理，但必定先託熟人聯絡疏通，否則對方以爲

不給他以相當面子，往往故意爲難。所以許多所謂事務竟

不是對事處理而是對人應付。我們大部份的精力消耗於應

付私人的上面，結果只有弄得對實際事務因循延宕，尙且

塞責。近年來機關中許多人坐着，船車上許多人奔走着，

好像大家都在那裡努力作事；然而事實上很少事業有進步

。這大部份是因爲大家不是爲事忙，乃是爲人忙。這種『

無事忙』的習慣，忙得愈厲害，國事只有愈糟的。

上文所說的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以及其所

附帶的各方面，別個民族當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但程度淺得多了。惟其淺得多，所以不好說他們有這些主義。我們這些主義至少間接地是出于儒家的薰陶，這是不用諱言的——雖是有些人以爲儒學是我們民族的特色，只有說它好，不應說它壞，我們可以不要強地說這些主義可以算做我們民族的特色，可是這些特色是當然應該加以分量上和時間上的限制的。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生活，禁慾主義何曾沒有它的貢獻——只說一件，歐洲新進民族那些獷悍貪掠的氣習受了它的影響而消殺不少；這至少是幫助歐洲近代文化發達的一個因素。但是，我們若是現在請歐洲人再提倡修道院生活，禁慾主義，豈不成了大大的笑話。所以我大膽奉勸我們不要聽一部份西洋人的瞎恭維的話，說什麼我們應該保存我們的特色，不應該學他們重事實貴專精，求效率。照他們的話，簡直要叫我們永久從事于兒童期的嬉戲青年期的浪漫而始終不要長大去作成年人的認真奮鬥

國難中救災問題

章元善

一，國難中的災國

在我國現在內亂外患交相逼迫的時候，研究救災，好

。我疑心這些西洋人若不是好作奇論，必是存心騙我們，要我們永遠不會和他們奮鬥，競爭。我們千萬不要上了他們的老當。

依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這三個中，一個國家只要隨便有了一個，充類至盡，在現代這樣劇烈的國家爭鬥中，都可以弄到亡國；而況三個全備，危險自不必說。這三個主義，若是在從前閉關的中國，或只在幾萬萬年後或者有的大同世界，也許不特沒有害處，而且反有點好處。但是，閉關時代無從追得回來，大同世界又管不及；在現代的環境之下，除了排除這三種主義，再沒有別的路可走。假如不能設排除，或至少大大減少它的分量，要想打倒帝國主義，或實現其他好的主義，恐怕都不是二十世紀內會有的事。

廿一，七，廿八，

像一所大房子，根基早已不固，加上屋子裡起了大火；床上睡着快要嚙氣的病人；屋子外頭還有狂風暴雨激烈的吹

打着，這所房子都快要倒了，屋子裏住的人，方始大夢初醒，要想起來補救維持，門窗都破壞不堪了，還要手忙腳亂的來擇要修補。這是什麼景象！青年人們，對這情形，我想沒有一個不悲憤交集，想要加入工作來挽救這垂危大勢的。所以我今天要討論這個含有重大嚴重性的題目。

我們中國是一個「災國」。西方人提起中國，立刻就要聯想到匪禍天災二事。吾們在報紙上常常可以看見災的新聞，不過一般讀者不甚注意罷了。多數看報的人，喜歡看有趣的文字，拿報紙當小說看。報館記者，明瞭這種讀者心理，自然把讀者喜歡的新聞，用大字標題，登得淋漓盡致；報災的文電，相形見拙，只得佔些不重要的地位，甚至絕對登不上。依我個人的揣度，一般人見了災情新聞，以為這是偶然的事，一方的事，過些時候自然就會好的。還有些人見了災情新聞，以為我既無法幫忙，與我無涉。誰知災是民窮財盡的主因；是驅策一個民族到絕境去的原動力。不種地的人，似乎受不着天災。豈知災的波浪，却能傳蔓得狠遠，一定要傳到城市裏來的。結果是誰亦逃不了。只要一時一地有災，他的影響所及，就可以使得你我多變成間接被災的災民。

一，災的二因

天災的成因，依我看來，只有二項：一是天然勢力的失調：一是不良政治的結果。翻開各朝歷史來看，再回到近幾十年來我們身歷其境的經過，就可知道；我國的災，大多數是鬧水，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水多了是水災；少了是旱災。其他種種——蟲吧，風吧，地震吧，——比較的不甚重要。我們驟然一看，好像天不做美，偏偏要同老百姓作對，常常的給他們一個不太平，一年一年的拿水來害他們，似乎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其實只要低頭一想，成災的責任，不能完全推到老天爺身上去的。在相當限度以內，人力的確可以勝天的。水的忽多忽少，使得人民受災是果。他的因是人不去造林，修堤防，河道溝洫聽他淤塞；積水湖泊由人去強佔水地。已有的尚且由他們自然荒廢，應修未修的，更是談不到了。我們人在這近百年來，非但不拿人力來調濟他，利用他，駕馭天然勢力來為人類造幸福；非但不用相當的方法去改善農人的生活，幫助他們生產，並且還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惡稅來剝削人民；盈千累萬的官兵土匪來魚肉鄉里；弄得人民筋疲力盡，蓋藏空虛，顧全目前還是萬難，如何再有餘力來培養將來的生機呢？因之養子不教，教育落後，人民永久沉淪在愚昧昏迷之境域，天然勢力遇不着科

學這個勁敵，自然是爲所欲爲，造成種種的浩災了！

三，災程三期——成災十一級

拿旱災來講：災的過程，同人身生病似的，會一層一層的加重。在「成災時期」最先的病徵——可以說是災徵——是糧食的缺乏。因之（1）糧價騰貴。漸漸的出了重價亦買不出米來，只得拿（2）草根，樹皮，「觀音粉」等代用品來充飢。同時（3）犧牲牲畜既省喂料，還可拿禽獸的肉來充飢，耕牛亦要被宰，顧全目前人的生命，顧不得將來的農事了。同時因爲農產無收，燃料缺乏，只得（4）拆毀傢具，以及農具車輛等物，當作柴燒。農具燒完，輪到（5）房屋，大的木材，還可變價得錢。（6）災時的地，本不值錢，典當無人要，遇着買主，就此出手，從此田園屬他人，地主變了佃戶，（7）流離逃亡，災民離開了家鄉。飢寒繼續的逼迫着，人性變成獸性。（8）賣妻，殺子，（9）吃人等種種慘劇，就會開演。災情如果再不減輕，（10）自殺的，吃人的，還要加多。（11）餓死的人，天天加多，弄到埋人的人自己亦要人埋的時候！水災的成熟是急性的，一開幕就是流離逃亡，所以格外的可怕。

災的成熟的過程，大致如此。等到人亦死得差不多，地上已生新草，樹上已有新葉，或者什麼地方已經放上賑

了，新的經濟鈞衡已經成立了，災情或者達到了一個「中和時期」，不減輕，亦不見加重。再過些時候，或者因地裏收了一次麥子，或者那個慈善團體辦了些規模宏大的工賑，生機比較寬裕些，土匪亦給天災駭跑了，人民就漸漸的「倦游思歸」回到本鄉去，重振他們的旗鼓，經營他們的生活了，這個時期我叫他「恢復時期」。

四，災的十四害

在這慘酷的災的過程中，災區內的人民感受的苦楚可想而知，不必細說了。但是在災區以外的你我感受着什麼？災是因，他的果是什麼？災使得民窮財盡，他驅使人們到絕境去，誰亦逃不了，你我不在例外。成災之後，顯而易見的結果，是（1）人口的減少，（2）生活程度的降低，（3）農業荒廢，你我要買洋米吃，（4）農產減少，原料缺乏，工業要停頓，（5）人民購買力緊縮，（6）商業就要衰微，（7）國產不夠用，就得買洋貨來供給消費，國際貿易年年入超。（8）農工商都不景氣，生產事業減少活動，稅收減少，政治費用不得不「另闢途徑」。（9）國庫不充實，大家鬧窮，搶飯碗，引起糾紛，由小而大，由中央而地方，由輕微而嚴重，政治出軌，內亂跟着起來。（10）政費不裕，教育只得偏廢，社會道德破產。（11）國內盜賊充斥

，剿匪要兵，養兵無錢，只得就地籌餉，結果兵匪打成一片，弄得閭里不寧。(12)災後不講衛生，更無閑錢來講人民健康，疾病因之叢生。(13)人民健康破壞，自弱其種，就是自招(14)滅亡之禍。所以災的苦處，一步一步的演進，他的波浪蔓延的狠遠，急趨直追的來驅使民族到絕境去。他的惡勢力從農業牽動到工商，從社會牽動到政治，從政治牽動到國家，最後就要危害民族的生存。到那時候——就是這時候——你還說「天災不與我相干」，行嗎？現在的你我是不是都是間接被災的災民嗎？

五，救災

災區中的災民，無論不幸到如何地步，至少還可以引起一些消磨垂盡的人類同情。可是災區外的你我，非但不能享受這個安慰，苟其你是一個有志青年，還要擔起些責任來，補救這個危局，來扶持這所將倒未倒，風雨飄搖中的破大房子。這就是國難中的你我。

我們對於災的本身，既然有了些認識，就應講究救災的方法。我想一般人對於「救災」或「賑賑」這類名詞的觀念，是有些粥讓災民們來吃就是了。這個觀念不能算大錯。因為「給災民飯吃」，是辦賑的共同的目的，不過方式有大不同罷了。

用普通的方法來辦賑，充其量不過是維持災民生活於一時，不是一種澈底的辦法。有多少錢，吃多少天，吃完事；賑款用完，結果災民還是餓死。這樣辦法，與其說是救災活命，不如說是苟延災民的殘喘；與其說是散財舒難，不如說是虛擲公款。

災民們一時的苦楚，或可因為得賑減少到若何程度，但是災前的損失，是永遠不能恢復的，完全是無代價的。辦賑是把成災以後的損失，從個人移轉到政府或社會身上去。成災以前的損失，還是要災民獨力承當的。所以等到成災之後再講救濟，是賊出關門——況且這扇門，往往還是關不上——的設施，最為浪費的事業。

六，上策，中策，下策

災既要救，不如不讓他成災。要想災象不成，就要平時努力。用人的智慧來利用天然勢力，非但使他不為害於人，並且還要他為人類增加幸福。要達這個目的，就得興辦種種建設事業。山河阻碍人類的交通，造出路來去抵抗他；水多的地方，挖條溝來宣洩他；水少的地方，開條渠來灌溉他；民智不開，民力不充，應用教育經濟的方法來糾正他。不過建設事業不是今天一說明天就辦得起來的；不是今天去辦明天就可「少息」的；不是因為明天要用今

天方始去做的。等到災象已成，方始去做，已是晚了。應該在平時注意興辦，並且辦成了一事，更得好好的去經營他。

建設的目的是要駕馭天然，是要改善生活。目的既然放在積極的一面，天災就可不防自免的了。平時能講建設，利用天然勢力來幫我們人類生產，天然勢力受了人類的駕馭，就不會成災，就無須講救災辦賑。成災前的一筆大損失，無形之中，可以省去，救災用的一筆賑款，又可無須開支。所以建設多辦，天災減少，財力充足，財力愈充足，建設事業愈發達。種下善因，結出美果，這是上策。

平時不知建設，天然勢力就要支配人生，災況就要發生。等到成災之後，再想補救，本已覺太晚。但是亡羊補牢，總比不補好些。成災之後，利用賑款來辦建設事業，以工代賑，大興土木，召用災民做工，使他們可以得到工資，以之養家活口。完成「賑」的目的。做出來的工程，可以幫助他們將來的生產。一錢兩用，還算上算。這樣放賑，受賑的人拿勞力換來工資，並非不勞而食。沒有使得人民道德墮落的危險。

用賑款來建設，當時災民可以得到工資餬口，同時又替他們興辦建設事業來，改善他們的設備，開拓他們災後

的生機。他們的生產力得到這種新設備的助力，自然可以漸漸加增。災前的損失，就有恢復的可能。過些時候，他們或有餘力，把從前工賑時候用來做建設事業的賑款，分期攤還出來，再做其他的應興未興的工作。如此一欸數用，周而復始，好好經營，同是一筆賑款，可以運用好幾次，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用。這樣等到成災之後方始建設，無論如何，終是「臨時抱佛脚」，只可算中策。

至於向來的辦賑方法，如設收容所、安粥鍋，等等老文章，是姑息目前，不澈底而且浪費的。人們等到成災之後，還不想法補救，還不想建設，只曉得死守陳法來做挖肉補瘡的工作。放粥之後，跟着就要施棺抬埋。像這樣的施賑，是下策。

七、近年賑務的教訓

我國近年來，繼續不斷的辦賑，除了這次長江水災的賑務之外，要算民國九年北五省的旱災為規模最大了。單就華洋義賑會說，那年的賑款，總額將近二千萬元。可惜那時辦賑的人，個個多是生手，只曉得抄襲老文章，採取我方纔說過的「下策」，拿了錢來去買米，充量的散給災民吃。當時各條鐵路，專門運輸賑糧，運來多少，吃完多少。天天運，天天不夠。這次賑糧消費量之浩大，我說出

一個比仿來，諸君或者可以明白理會。

譬如說：人的口平均有一寸寬，十個人的口就是一尺。那時吃糧的災民，至少有五十萬。這張大口，合起來就是五萬尺，差不多是一個毛三十里長的大口子。每天要拿糧食來供給這張大口吃二次，每次十餘分鐘，大家閉眼想想，這得多少糧食纔能供給得上。像這樣的施賑，施了七八個月，這是多麼浪費！

民九這次的工作，給了許多人一個教訓。試想像這樣的辦賑，枉費財力，結果除了一部分得賑的災民沒有餓死之外，還有什麼意義？災民的窮困一些不改，他們前途的希望同災前一樣的黑暗。況且萬一再有大災，能否再得大宗賑款來大放特放，還是疑問。所以當時有了好幾次集會，整理已做的工作，計畫未來的事業。大多數的意見，主張工賑防災，就是我所說的中策。

採取中策，是不得已的。當時不取上策去做平時建設的緣故，因為平時工作不在賑務範圍以內，尤非社會服務機關力所能辦的。建設事業是要國家去提倡擔任的。況且沒有災況，那裡能募賑？捐錢的人不肯捐出錢來防未成之災。所以處在賑務團體的地位，只得立定宗旨，凡到力所能及的時候，一定要做建設事業，補救於萬一罷了。

可是自從民國十年決定了這個方針，實施之後，頗能引起國內外社會的讚揚及同情。別的團體，以及官府方面，非但不加非難，並且還有仿照去做的。現在一般人的辦賑常識確已進了一步。

這個「中策」行了已有十年，在各省都有些成績了。最近的徵例，就是新近落成的陝西涇惠渠。造這條渠用款百餘萬，當時因工得賑的人，不在少數。渠成之後，至少五十萬畝可以得水灌溉。假設一畝地上生出來的糧食足夠供給一個人一年的消費，五十萬畝地就可永久供給五十萬人民所需的食糧。所以賑款照這「中策」去運用，結果還算不錯。

八、情感的慈善事業

我已經說過，給災民飯吃是辦賑的共同目的，不過方法則大大不同。大凡辦賑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認救災為慈善事業，純粹是情感的作用。還有一種是拿救災為社會服務事業，認災為一種社會病態，用理智來解決問題，來診斷治療。

基於情感的慈善事業，從人類同情心或他種情感心理為起點，站在這個立場上，辦出些救人的事工來。這一類的事業，往往不能應用科學方法去計畫實行，辦出來的事

工因之亦無澈底解決一個問題的可能性。普濟衆生的宏願，力不從心，不能貫徹的時候，是很多的。——實際永遠沒有貫徹過！

因為要普濟衆生，所以不必定出得賑的條件來，限制領賑的人。結果應賑的人，未必得賑；不必賑的人，倒反得賑。方法不科學，組織不完備，是不容諱言的弱點。並且因為是當慈善事業來辦，所以老弱處於優越地位，得賑多；少壯的人——就是可以生利的分子——得賑少，甚至絕對得不着。站在人道的立場上看，果然是應當憐恤老幼。但是從國家經濟的眼光去看，這種救弱遺壯的辦法，是否不加變更可以無限制施行的，似乎應當細細研究一下。

九，理智的社會服務

如果拿救災當作一種社會服務的工作去做，情形就大不同了。在起手辦事以前，先得研究問題的各方面，下一番診斷工夫之後，方始可以處方，行手術，拿科學的精神來處理一切。管理組織，力求完善，向積極方面去努力。除了能達「給災民飯吃」這個共同目的之外，還要希望能達比較更有效用的目的。這種事業的方式，決計不是放粥施棺這樣簡單。大都是要利用現成的金錢——賑款——和閑散的人民——災民——做些建設事業，希望在把賑放完之後，還給

災民留下一份生財器具——一口井吧，一條路吧，一段渠吧，——幫他們恢復損失，增加生產，防止將來的天災。這樣去做，少壯的災民，變為工人，他們得到工資，自己不致餓死，將來復興之時，不致有人工缺乏的恐慌。各家的老弱殘廢也有人養活。賑款一樣放出，共同目的——一樣達到，可是真正災民，機會均等，不致遺留偏枯；不必賑的人，不來做工；冒領濫發等弊，不防自無。

這樣的辦賑，所採雖是中策，然而有深遠的意義。拿理智來解決問題，結果是具體的，是比較澈底的。不過因為管理要用錢，有一部分賑款，不能直接放到災民身上去，這是缺點。但是管理要好，這種不可避免的費用，可以限制到最低限度，比着沒有組織抱定開放主義去放賑，實際上還可經濟些，亦未可知。況且賑的「副產」——就是修成的道路等等——能為一地生利，犧牲少數人——時的賑，去為多數人謀永久的福利。兩相比較下來，科學方法，確有長處。

十，三種賑：急賑，工賑，農賑

開粥廠，設收容所，放米，這一類的辦法，通常稱為「急賑」，成災以後，防止災民流離逃亡，或餓死的時候，應辦這些事。召集災民做工，築堤修渠等，總稱「工賑」，

應在急賑後快快組織，拿來替代急賑。這二種之外，還有一種工作，災前（即平時）災後都可做的，這種工作沒有確當名詞，姑且叫他「農賑」。

農賑的目的，是要便利農民，幫助農民，解除他們的困難，使得他們好去種地，生產出糧食來，供大家的消費。

農人們最感缺乏的是資本。鄉間借錢是最難的一樁大事，利息極高，即便借到，擔負太重，借的人無益，放的人得利。所以改良農村中資金的流通，就是一件有效的農工作。在平時做這些事，無所謂賑。在災後去做，就是農賑。

華洋義賑會近八年來辦的信用合作事業，就是這一類的事。農人需要資本，按照現時金融界的習慣，無人供給。他們信用很好，就是沒有組織，所以得不到經濟的便利。要解決這層困難，所以幫助農民組織合作社，現在已有顯著的成效了。

若在災後辦農賑，最相宜在恢復時期去做。新近華洋義賑會替國民政府在江西安徽辦了一次，拿恢復農事爲目標，把錢借給農民，附帶輕微利息，分期收回。收回來的錢，就要辦合作。中國有史以來，像這次辦的農賑，還是

第一次。從前雖然有牛當，因利局等辦法，比不上這次農賑辦得普遍而有條理。

凡是可以幫助農人的種種設施，幫他們排水，幫他們灌溉，替他們修路，給他們辦合作，引用外資等，各種工作，都有振興農業的效用。興農就是防災，防災是解決民生，排除國難的根本要圖。社會服務團體，雖然沒有力量去實施我說的「上策」，——平時的建設，——最低限度亦應力行「中策」，努力辦防災的事業。

辦賑的時候，應先調查災情，認清目標，製成方案，一件一件的去做。有如作戰一樣，有了好的策略，還要陣伍整齊，供給充足，呼應靈便，紀律嚴明，方始可望勝利。如果見災就救，沒有計畫，隨時應付，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結果是一定不會好的。

辦賑是一事，募款又是一事。這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起做的，捐得到錢的地方，不會有災；有災的地方，無錢可捐。辦賑的人，不可令他募款；募款的人不可叫他辦賑。二事性質差異，不能混在一起的。

十一，賑員

災的性質既然如此嚴重，他的勢力，可以影響到社會的安寧，國家的存亡，甚至民族的盛衰。救災的工作，既

是如此的複雜細微，所以辦賑的人，必須具有相當智識與能力，方始可以勝任愉快。

一般人以為辦賑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只要有了錢，賑是誰都會放的，至多請上了二三位年高德劭閑看沒事做的「公正士紳」，雇上些小工苦力，打着大旗子，把錢散給災民，一時至今日，真有向人叢中，散大洋錢的——就完了。這種觀念極是普遍，但是大大的錯誤。募賑難，放賑亦甚不易。放賑的人經手大宗款項，負着出死入生的責任，同修牙補眼一樣是一種專門技術員。他們有他們的特殊資格。

為救災工作服務的人，除了應有的普通常識，專門學問，處世經驗，跑到那一界去都有的資格之外，最要緊的還是人格。當然，他要有熱心，但是不肯無謂犧牲。對

事主及災民要有同情心，但是他不肯做「濫好人」，遇事不問青黃皂白，「有求必應」。他應有鑑別的能力同堅強的決斷，要能顧全大局，貫徹主張，達到目的，拿客觀的態度，來解決問題，在大處落墨，別讓枝節來擾亂他的視線。他要廉潔，自然不應圖利，並且他如果真能拿出服務精神去辦事，亦不應好名。他要耐苦，不怕麻煩；能任怨，不怕挨罵。他要拿救災的工作，不當他一種職業去做，要當他一生的事業去做。他應該用科學的方法，宗教的信仰，往前推進。

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但並不是不可能的標準。救災是一件嚴重的工作，對於服務人的希望，是應該格外嚴格的。

二一，七，一九—二三，北平

本刊廣告價目

| 尺寸 | 地位 | 前封面 | 後封面 | 內頁 |
|-----|----|-----|-----|-----|
| 全頁 | 內頁 | 二五元 | 二五元 | 二十元 |
| 半頁 | 內頁 | 十三元 | 十三元 | 十元 |
| 四分一 | 內頁 | 七元 | 七元 | 五元 |
| 八分一 | 內頁 | 四元 | 四元 | 三元 |

上表價目均以一期計算。連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七五折，十期以上六五折，全年五折。

商務印書館

總館復業啓事

謹啓者 敝館總廠慘遭國難被炸一空不得已宣佈將總館各機關暫時停業補苴
 糜積迄今將遠半年國內人士同深惋惜函電紛馳於殷懃慰問之外備加積極奮
 勉之詞 敝館自維三十六年來對於吾國文化之促進教育之發展不無相當之貢
 獻若因此頓挫則不特無以副全國人士屬望之殷亦且貽我華民族一蹶不振之
 誦 敝館既感國人策勵之誠又覺自身負責之重爰於創巨痛深之下決定於八月
 一日先恢復上海發行所之業務一面在上海籌設小規模之製版印刷工廠以繼
 續其三十六年來貢獻我國文化教育之使命此半年中并極力在 敝館北平香港
 印刷分局先行起印秋季中小學校教科教授用書及各種重要參考書本屆秋季開學準備充足各校採
 用無虞缺乏敬以忝聞

商務印書館謹啓

秋季各級學校教科用書

教育部
 前及
 大學
 審定

▽小學校用

▽高級中學用

- 基本小學教科書
- 新時代小學教科書
- 新學制小學教科書
- ▽初級中學用
-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 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
- 新著教科書
- 民國新教科書
- ▽師範學校用
- 現代師範教科書
- ▽職業學校用
- 新學制高級工業教科書
- 新學制高級商業教科書
- 新學制高級農業教科書
- 新學制初級農業教科書

詳細書名價目另印傳單贈閱

爲文而奮
 化而鬥

爲國而難
 犧牲

準備充足照常供給

第六號

所謂剿匪問題 丁文江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廉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黻
 漫遊散記(二) 丁文江

第七號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 周炳林
 從軍記 盛成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

第八號

法德問題一勾 孟真
 再論黨化教育 孟真
 所謂教育內法西斯化 孟真
 論鴉片公賣 孟真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合約 孟真
 漫遊散記(三) 孟真

第九號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真
 論學潮 臧暉
 英庚款的管理 胡適
 漫遊散記(四) 丁文江

第十號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翁文灝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真
 廢兩改元問題 尹及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
 漫遊散記(五) 尹及
 中國文化的崩潰 衡

第十一號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蔣廷黻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道鄰
 通信 邱恪 孟真 左律

時代公論

第十七號

時事 中俄互不侵犯條約
 述評 馬凱報務合同與陳次
 長談話 楊公達
 牛蘭案與外籍律師及陪審制度 阮毅成
 外交只是方法嗎？ 楊公達
 方向的轉換和我們的任務四薩孟武
 對於方向轉換的幾個提議(二)

第十八號

法治國家的真諦 傅樂
 解決中日糾紛應注意事項 雷震
 國手(三幕劇) 雷震
 讀者 讀任鴻高先生「
 論壇」的幾個疑問 雷震
 中大學潮的幾句話 雷震

時代公論

學術界會議與專家政治
 時事 日軍進攻熱河
 述評 人道主義與牛蘭
 由北方危急說到革命與外戰的關係
 勉沒有出路的青年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楊公達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雷震 孟真 蔣廷黻 何廉 翁文灝 尹及 楊公達 阮毅成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注意)本社叢刊之一張其昀先生著人地學論叢現發行預約(價一元二角)定七月十日出版(出版後代價一元六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汪精衛與張學良

胡適

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文江

日寇與熱河平津

傅斯年

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

葉叔衡

漫遊散記(六)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

答一位少年女朋友(通信)

衡哲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五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廈門 | 重慶 | 漢口 | 汕頭 | 興寧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封圖書局 | 開封圖書局 | 安慶圖書局 | 無錫圖書局 | 青島圖書局 | 濟南圖書局 | 廣州圖書局 | 廈門圖書局 | 重慶圖書局 | 漢口圖書局 | 汕頭圖書局 | 興寧圖書局 |
| 現代書局 | 文藝書局 | 新華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開明書店 | 民權書局 | 華新書局 | 新華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華新書局 |

獨立評論

第三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出版

汪精衛與張學良

胡適

八月六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突然從上海發表了五個辭職的通電，其中他給行政院各部會的一電說他辭職的理由「具詳於致張主任學良電」，並且說「此實為弟個人引退之原因」。他給張學良主任的電文如下：

「北平張主任漢卿兄勳鑒：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奮死抵禦，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海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後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路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敵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

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抗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道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中央財政竭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實行抵抗以前弟亦斷不忍為此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銘魚（六日）」

汪先生已於發電的前一日到了上海，六日招待報館記者發表辭職電文之後，他就謝病不見客了。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先生和內政部長黃紹雄先生都似乎避嫌不肯代理院務，而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先生（八日）又通電辭職與汪先生同去了。青天白日裏的一聲霹靂，中央政局就立刻陷入了無政府的危險狀態。

汪精衛先生在本年一月中南京與上海都在最危險的時

治軌道了。

候，慨然出來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大任，那種不怕犧牲的態度，使我們很佩服，所以我們對於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對於他這回突然辭職的舉動，我們頗感覺失望。第一，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時期，負中央重責的行政院長不應該

我們很盼望汪先生能覺悟他的責任的重次，能早日打消辭意，重新鼓起七個月以前的犧牲精神來支撐當前的危局。那其他補過的唯一途徑。若因一時的感情衝動，就不顧國家的危機以一走了事，那是我們不希望於汪先生的。

因對一個疆吏的不滿意就驟然拋棄他的重大責任，「以謝一人」。他的憤慨，我們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們不能原諒。第二，政府對於「致三十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于敵手」的大罪，如有決心追咎負責之人，應該明下懲罰處分的命令。政府對於熱河事件，若已決定抵抗，應該明令負守土責任的人竭力抵抗；不遵命令的，可以明令免職懲辦。但行政院長用自己辭職的手續來勸一個疆吏辭職，是很失政府體統的。第三，汪先生電文中表示他大不滿意於張學良主任之催索補助軍費，而電文中的措詞却指為「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又說「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贖兄一人之欲」。這種措詞是很失體的。政府如認為某項軍費有浮濫不實的數目，儘可交主管機關核實宣示，但很不應該在未審核以前即坐實某人所要求的軍費為贖足某一人的私欲。這種攻訐的口吻，用於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的訴訟，用在一國行政首領的電文裡更是暴露一個政府的沒有上政

張學良先生對於這事的態度自然是最足引起全國注意

的。昨天（七日）他發表談話，聲明「自今以後，立當部署所屬，準備交代」。今日大公報發表他的談話，說他已決意辭職，又說他表示「無論如何，總不使以個人之進退貽地方以不安。」今日平津各報都記載昨日北平政務委員會開談話會時，張學良主任辭職的態度極堅決，並已決定電汪院長，大致說：「東北淪陷，本人應負責任，理應辭職以謝國人，此後政務交北平政務委員會，軍事交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分別辦理。惟當此國難期間，汪院長擔負全國行政重任，不宜以個人細故突然求去，請即打銷辭意，繼續負責。」

張先生這種表示，我們認為是能顧全大體的态度。我們很贊成張先生的辭職。理由有三點：

第一，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的，然

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的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九一八以後，他還可以說有整理殘餘軍隊和軍實以謀恢復失地的機會和責任，但錦州退兵以後，社會上對他的責難就很不容易答辯了。他在這個時候，若能決心引咎自劾辭職，還可以使一般人覺悟凡不能禦侮守土的軍人必不能保持其權位；即使政府的威權不能立即執行其應施的懲罰，個人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的潛勢力終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

第二，張先生不能早日自劾辭職，政府又無力免他的職，以致汪精衛院長鬧出自己辭職「以謝一人」的怪舉，這是最可痛心的事，其暴露國家賞罰的不行，政治組織的病態，貽笑於敵人，貽譏於全世界，已無可諱飾了。在此時機，張學良先生一人的進退，可以有絕大的意義。他若還不肯自劾引去，或自劾而無求去的決心，那麼，中央政府真是無法可以去一個疆吏了，那就是明白宣示世界我們這個國家真不成統一的國家了！反過來說，如果張先生在這個時機能毅然決然引咎辭職，那麼，他的一去還可以挽救中國再分裂的危機，還可以使世人憬然明白「中國的謎」自有中國的奇巧解決法：一個無拳無勇的書生院長的一

封電報居然能使一個兩世獨霸一方的軍閥翻然下野。這也可說是給陳調元何成濟一班人「樹之先聲」，而替國家打開一個新局面，——使人知道「杯酒釋兵權」不完全是歷史家欺人之談。

第三，張學良先生是個少年軍人，經過了這五年來奇慘大辱的經驗，他應該明白今日國家的重要責任不是可以輕易擔當得起的。他如果還有替國家做大事的野心，他應該撇開他的過去，擺脫一切障礙，努力向前途去創造他的將來。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麼，將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儘有他可以服勞効力的機會。如果他到了今日還不能有這種覺悟，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台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我們本「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很誠懇的勸告張學良先生決心辭職。

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文江

自從日本人有侵略熱河的消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天天計畫抵抗的辦法，但是抵抗沒有實現，中央與地方先發生了衝突：本月七日汪精衛辭職，同時通電責備張學良。據八日的大公報，張學良也有辭職的消息。大難當前，軍政首領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們覺得中華民國的末日到了！

試問汪精衛和張學良都辭了職，熱河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嗎？負軍政責任的當局一辭職就可以告無罪于國人了嗎？不錯，假如張學良覺得抵抗日本，事實上是不可可能，或是抵抗所必需的條件，中央的力量可以做的到而不肯容納，那麼他除去辭職，當然沒有第二條路走。但是我以為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我先講抵抗日本的具體辦法。我們先要覺悟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平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單就陸軍方面看起來，我們的第一道防禦線在山海關，第二道在灤河。但是秦王島在山海關的後方，天津在灤河的後方。日本人隨時可以在這兩處上陸，上陸要比在劉河容易十倍。在這

種狀況之下，無論軍隊如河精多，武器如河優良，因為地理的關係，沒有法子可以長期的防守。何況從山海關到天津都是平原曠野，日本的飛機，坦克，重砲，都可以使用，還不比得閘北江灣處處有小河，小溝和水田，使得日本人無法利用他們的坦克。

但是我們要抵抗日本，我們決不希望軍事當局在山海關到天津之間，作大規模的戰爭，或是長期的守禦。我們只希望他犧牲一部分的實力，為國家爭點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須出相當的代價。我們要明白日本的目的不在平津，而在熱河，所以我們的真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也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因為日本人要取得了熱河，熱河就永久不能恢復；日本人縱然佔領了平津，平津總有日子收回。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北寧路的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只留一部分的軍隊在山海關秦王島灤州天津等處。在這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峯口，古北口，分別退到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

軍隊應該從速的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砲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峯，古北，和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進攻。只要能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畫，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爲甚麼我說司令部應該在張家口呢？因爲平津放棄以後，在熱河察哈爾的軍隊與中央失去了聯絡；一切的接濟都要仰給于山西。大同到張家口不過幾點鐘的火車，大同到太原有現成的汽車路，一天可以達到，太原有比較新式的兵工廠，可以源源接濟前方，所以張家口做司令部最爲適宜。

第二是軍費問題。這一次中央與地方的裂痕，這問題是導火線。我不知張學良所轄的軍隊究竟有多少人，打起仗來究竟要用多少錢。據日本報紙所發表，不連熱河，一共還有十五萬支鎗。據我所聞，目前北平所發的軍費，每月是四百一十萬。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共三萬人（八十八，八十七帥在外），中央每月發五十萬。要拿這

個數目做標準，則每月四百一十萬，養十五萬兵，已經很多。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最近的報告，中央勦共產黨的軍隊，夫子不算，一共是六十萬人。因爲作戰，每月要多用三百萬。要以這個數目做比例，則十五萬人每月應增加七十五萬。似乎用不着汪精衛電報裏所說的那樣的多。不過我們沒有看見過官方的正式報告，以上數目是否與事實相符，我們無從知道。若是我是張學良，我一定請中央一面派人點驗我的軍隊的鎗支人數軍實，一面把所有華北的稅收機關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戰時候的軍費，子彈，以及其他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國軍隊最優的待遇供給——照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樣。張學良要真正有抵抗的決心，這種辦法事實上一點不會吃虧，因爲抵抗的事實一發生，平津與河北地盤萬無可以保存的道理。將來退到熱河察哈爾，軍費一定要中央供給的。落得從現在起，先爲其他軍隊做一個模範。他不要怕中央不能按期發餉，他只要有抗日犧牲的決心，全國人都會做他的後盾。任何人是中央政府，都不敢不接濟他的。

若是肯如此，張學良可以不必辭職，汪精衛也決不可辭職，中華民國也許還有一線的希望！

日寇與熱河平津

傅斯年

在倭人宣傳熱河邊界事態緊張之聲浪中，日本東京及中國瀋陽的日本軍閥揚言吞併熱河，脅迫平津。國人既遲疑並憂慮政府及地方當局有沒有抵抗之決心及辦法，而倭軍閥又把張學良畫成一個愛國志士一般，說他如何將軍隊改作義勇軍，向東北輸送。我們在這個憤慨與憂疑之心緒中，不能不認清幾件根本的事。我以為有下列幾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日問題決無和平解決之望，而在今日希望與日本和平解決者，直是做夢。「理性的」先生們說，日本的行爲是日本軍閥的行爲，並非日本國民如此。這是全無意義的話。一個民族之行爲，全以其如何組織而定，現在日本軍閥既統治了日本，而日本之行爲由其軍閥指揮之，則日本軍閥之行爲即日本民族之行爲，猶之專制時代帝王之行爲即其民族之行爲，一般老百姓對他們執政者之所爲，雖莫明其妙，然既自動的或被動的助成一個事業，則對此事業不能說是沒有分的。日本人既不能站起來以糾正其軍閥，而反跳起來喊着向滿蒙去，則日本今日之狂謬絕倫

之舉動，焉能用「日本軍閥」一句話把日本國人開脫出去？惟其如此，這事是斷不能看輕的。若要中日和平，非日本人能滿意不可，而日本軍閥之滿意，其最大限度是中華民國取消其獨立，而爲所謂「大日本帝國」之順民，其最小限度也是要，（一）承認偽滿國之「獨立」並奉送熱河及灤東，（二）在北方弄出一個政府來，這個政府對日本能受指揮的，（三）全國不得有任何公私排貨之舉，並須力助其推銷倭貨，以便壓倒西洋各國，（四）取消愛國主義的教育。這個最小限度也還是奉送中華民國，只是手續上有簡繁，時日上有遲速而已。試問我們能做到這一步嗎？試問最喪心病狂的政府能這樣辦嗎？不這樣辦，日本決不滿意，日本必向中國不斷的鬧。這不是我們懸揣之談，這是這十個月來事實上使我們不能不如此信的。這話本來不像近代史，然而日本並非一個近代國家，其民族亦非一個近代民族，所以若干受些近代教育的中國人，最初是不能了解日本的。這幾個月的事，可使我們恍然覺悟了罷！中國今日對此倭寇，只有降戰兩策，所謂承認日本合法利益云云

，在東北事變未起瀋口內閣時代，或者可以延緩東北之變局三五年，在東北事變既起若槻內閣時代，還可同幣原談談，總也無濟于事的，因為倭軍閥是非要消滅中國在東北的統治不可的。倭軍閥幾箇月中，在東北行動的一時成功，更使他的氣燄高漲，於是高談起東亞門羅政策。這樣不倫不類的名詞，倭人做出，真正毫無廉恥！門羅主義者，乃美國使歐洲列強在南美中美的野心策略斷跡的政策，此政策實行後，果然若拿破崙第三立一個墨西哥皇帝的事不再有了，而日本的「門羅政策」，乃是向世界要求吞併中國西伯利亞之自由權而已。日本軍人的行動，及其外交口號，既已如此明明白白表示對中國取宰制的政策，中國人還要做「和平解決」的甜夢嗎？

第二，倭人必不放鬆熱河，而平津是必不能免的。倭人之不放鬆熱河，是和太陽一樣明白的事實，只是抓去用何手段，不無考量而已。若必出于用兵之一途，則熱河地形殊不便于用兵，非搗平津之後背不易速收軍事之效。且熱河一失，長城爲界，平津必不能保，則雖不愛全國江山而愛平津地盤者，也不得不出于一戰。故熱河問題勢必擾到平津，這是決無幸免的。日本擾平津，在其政府自也有些小顧慮，但其軍人是決不管的，東京的倭軍部大唱脅迫

張學良的語調，瀋陽的倭軍人更明言要擾亂平津，這話雖也有恫嚇的作用，但熱河軍事積極時，是必然實現的。熱河最便于義勇軍的戰法，倭軍豈肯舍輕而易舉之平津，徒然在熱河山中比武呢？且倭軍部爲改變中國北局政局計，擾平津也有意義，平津是斷免不了一場擾亂的。

第三，平津擾亂，比起東北失地來，實在是一件小事。天津至多不過是個上海，上海既可犧牲，何以天津不可以？至於北平，有些斯文先生們，以所謂文化事業及國寶爲慮。然而國寶也者，在太平盛世固然是寶，在這年頭兒，直是石獸子的扇子，亂時能拿着走，仿佛像「抱祭器而去之」固然很好，有管理國寶之責任者，固也應早準備，若不得不蒙損失，則亦只好付之無可奈何，比起東北失地來，真不值得甚麼。好在這些國寶皆是人造的，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更爲世界供獻文化的憑藉，這即是國民的人格。至於北平的所謂「文化」與社會，若倭人真來放幾個炸彈，小試則有警鐘之用，大試則「傾者覆之」，後來的歷史學家或者以爲是「替天行道」的呢。這話不是我快意之談，我們且看看所謂北平社會：一羣羣軍閥官僚，學閥學棍，土棍地痞，無賴青年男女摩登，花他們搶來摸來要來的錢住着。一個個的根本沒有辦法徒耗國

家錢財的大學設着。一排排的開紮綽主義的學術機關放着。一戶戶的與掘墳的土匪外國的奸商合作的古董鋪子開着。一隊隊的醉生夢死的人們在享樂着，無限的窮苦人在大雜院中坐地待死着。試看自北海公園到先農壇，那裏有國難的氣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那裏有愛國的聲息？聽聽人們的談吐，那一個想到東北的失地？自上至下，在領袖地位者，離不了燈紅酒綠的生活，脫不了醉生夢死的人生。青年人只有一事，便是「愛」，老年人只有一事，便是錢，學生照樣弄他那開學式的學潮，教員照樣防範他自身地位的利益，商人照樣買賣他的日貨，時髦的少爺小姐姨太太乃至大人們還是非日貨不用，土貨看不上眼。（以上一些話，自然不是全北平皆如此，然而不如此者，分數上顯不出來，代表北平者正是上文的人們。）更有一般摩登女士，以與在北平的外國人交際爲榮，若能「交」上一個使館武官，尤其非常榮幸。這真使我們想到顏之推批評「琵琶辭卑語」的話，不過當北平的時代尚不過以子弟取容，今則以少女獻媚而已。這樣的「文化中心點」，比起東北來，真正九牛之一毛。所謂投鼠忌器之談，第一須所投者是鼠，今則是虎，第二須持之以投者是器，今則是破瓦釜而已。爲中華民國的整個前途計，北平的存毀是不值

半秒鐘猶疑的！我也是一個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來，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處？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第四，中國的軍人，特別是北方的軍人，若無抵抗而放棄江山之後，在中國，在外國，在租界，都沒有立足之地。先說他們在中國何以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軍人人各有其地盤，因爲地盤主義，勢不容許他人來佔地盤分地盤。其不抵抗而求入境者，被欺騙之人更理直氣壯不許他入境。敗軍之將，俯仰之間，無以爲人，又焉有奪人地盤而有之之勇氣。試如平津不抵抗，退山西，雁門賊子開關嗎？青濟不抵抗，退汴鄭，汴鄭許他停留嗎？怨怒所集，非解散其軍隊，即須自己取三十六計之上計，而走此上計之後，中國雖大，何處人容他安居？至於外國，如歐美者，其風土去封建時代不遠，一般社會崇尚勇敢，賤視怕死，聽說有了不抵抗的軍人，真要毛骨悚然，各個神經顫動。所以不死在職守的中國軍人，逃到西洋，不特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歡樂場中無現身之餘地，即大街上也走不來，一見人面，噓之以氣，投之以石，滿路童叟男女，皆敵國也。到一城則一城之報紙刊他的相片，如我們之標榜秦檜一樣，到一地則一地之新聞訪員來伺候起居，如

我們之好看報上所載花案官司一樣。而且歐美各國，皆有中國學生與工人，外國政府是沒有機槍手礮來保護中國軍閥的。到那時節，一死已晚。讀者若不信我這話，請問問他人之久住歐美者。至於租界，更兼中國兩地之劣點，雖然多數的中外人多不是東西，然外人之賤看此等，中國人之欲得而甘心焉，並無二致。若當今之局，一死報國，過去縱有愆尤，國人每能相諒。所謂「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者，今日軍人當前之問題也。

如以上四節所說，今日爲北方大局，對倭只有一條路，即一切都無顧忌，人人當求必死。若是後邊有退路，尙有可以商量之處，若是前面不止一條路，也還有選擇之餘地，今則後面是大海，兩邊有高牆，前面縱是猛虎，也只有拚上去。人生百年，總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軍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不過對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國雖不能打勝日本，却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與我們越有利。十九路軍

及第五軍在上海之戰績所以能得世界同情者，非以一月廿八日放了幾槍，乃以支持了一個多月，東北義勇軍之所以能得國人同情者，非以一朝之勇氣，乃以多半年中再接再厲也。因此，中國上下現在有將華北的軍財情形澈底布置一下子之必要，以便成立長久的有效的抵抗，北方居民有澈底覺悟之必要，在大事臨頭時，自己如何服務，如何將自己的餘財捐給死在戰場上的軍人。

且這話不僅是「鹿死不擇陰」的腔調，中華民族之復興實繫於此。以今日中國上下一切社會之腐敗，不經一番澈底的締造，是沒有辦法的。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運命，在死裏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歷史告我們，中華不是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事實告我們，倭人不是一個能成大器的國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殺之天公以自傷其身耳。反正瘋狗咬渾蛋，是無不可的。我們一旦被咬得不渾沌了，然後是中華民族的復興。

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

葉叔衡

廢兩用元到現在還是問題，這真是可以表示二三十年

來中國的政治情形了。一個國家裡的各種現象都是互相關連的，所以往往可以由一件事窺測全國的狀態。但是比幣制情形更能表現近年中國的政治的，恐怕很少——如果是有。本來幣制問題就是錢的問題，與二三十年來中國政治有關係的，當然沒有比錢更密切的了。

差不多三十年以前即前清光緒二十八年的中英商約已訂了統一幣制條文；次年又有「劃一銀式」的諭旨，并設立財政處專議整理財政及幣制問題，又次年即有精琦氏（Jenks）的金匯兌本位條陳。從此金銀本位的辯論起來了，但歷次辯論總歸宿到先整理銀幣再做到金匯兌本位的主張。最近甘末爾博士（Kammerer）的實行金匯兌本位建議，因為金銀比價的大變化，亦不能不擱起。民國十九年二月一日起雖然添了一種海關金單位，銀本位的地位並未變更。我們看了歷來整理銀幣的失敗情形，敢說金匯兌本位的沒有採用，實是幸事。因為施行金匯兌本位制比整理銀本位更須具備些必要的條件，如果當時採用了，必定遭

更大的失敗。

在銀本位之下單位問題也經爭論了許多次。最初爭論的就是用兩用圓問題。四十二年以前，即光緒十六年，廣東初次做鑄「洋元」。十四年以後，即光緒三十年，張之洞在湖北試鑄一兩銀幣，但並不能通行。次年，即光緒三十一年，財政處奏准幣制單位定為庫平一兩。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又奏准仍改用七錢二分的銀圓。但次年光緒三十四年政務處又奏准以一兩銀幣為單位了。主張用一兩者以沿用舊習為理由。其實所謂一兩銀幣並不是一兩銀子。因為九八五以上的純銀太軟，若參加了銅質，重量就不止一兩。光緒三十一年財政處擬用純銀九錢六分，配淨銅一錢，定為庫平足色銀一兩。實則這個「一兩」是重一兩零六分，又比足色銀少二分多的純銀，所以無論如何，總不是庫平足色銀一兩。到了宣統二年，一兩銀幣又改回到成色九成重量庫平七錢二分的銀圓了，并頒布了第一次的幣制則例。這六七年的用兩用元爭執可以表示當時舊習慣的不容易打破。一班主張用兩的朝臣疆吏，並不知道民間誰亦

不願意使用笨重的一兩銀幣來替代『洋錢』，却將衡法圖法混在一起，爭論了多少年，全是說些空話。這很可以表示那時候八股式的政治。

問題上看出來。

宣統二年即二十二年以前的幣制則例規定各種官款出入及民間債務計算須照各地平色，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以改換計算之名稱。這就是廢兩用元的第一次規定。當時天津造幣總廠開鑄『大清銀幣』，其成色重量頗為準確，幣制的整理實已著手進行。革命起後一切都又停頓。民國三年頒布的國幣條例與宣統二年的幣制則例大同小異，這是廢兩用元的第二次規定。實則袁世凱對於幣制還是在光緒三十年主張用兩的思想。民三國幣條例已經頒布以後他還將用兩的主張交民國三年的幣制局考慮。有一次他還將一個鑄造鐵幣的條陳鄭重的交與幣制局。所謂鐵幣者即是上條陳的人在青島看見的德國鎳幣，因為青島的中國人叫鎳幣為銅板，所以他就發生了造鐵幣的思想。這也可以表示袁世凱以馬弁走卒為重心的政治情形。袁世凱既沒有真心去整理幣制，所以民國三年底幣制局就取消了，而整理幣制的計畫遂受了第二次的頓挫。前清末年的政治，頗有一部份的振作，民國初年還有朝氣，也有些作為，到民國五年以後便日趨於勢亂腐敗了。這些情形也可從幣制

民國三年的國幣條例雖然規定一圓銀幣的成色為九成，但以後幣制局接受了天津造幣總廠的主張，改成色為百分之八九，以免改鑄舊幣的損失。袁頭銀幣即按八九成色鑄造，民國六年曾將國幣條例照此修改。八九成色含純銀六錢四分零八毫，比九成的所含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少七釐二毫，所以不過幾年工夫，九成的鷹洋大清銀幣等幾乎全被改鑄為袁頭銀幣，而銀圓在表面上遂統一了。民國三年幣制局計算各處官局所鑄銀圓約合二萬萬圓。從此鑄數大增，到現在大約在十萬萬圓以上了。民國六七年以前，如天津南京武昌等各廠所鑄銀圓，雖然亦有不合格的，大致都不超過百分之三的公差。以後各省又紛紛設立造幣廠，中央無權檢查，成色重量就有較差的。如杭州造幣廠初歸商辦時曾鑄幾批成色甚低的，又如安慶造幣廠鑄過七成上的銀圓。不過這些成色太低的到底不能通用，現在流通的十餘萬萬圓，除四川等省所造者不可考外，大約合格者居其大多數。惟成色重量既沒有十分的保障，信用自受影響，所以鑄出了如此其多的銀圓，比民三幣制局所希望鑄成的四萬萬元差不多三倍了，而廢兩用元還是不能辦到。

到民國八年，因為上海英國商會決議請中國政府設立

上海造幣廠，并提出許多苛刻的條件，中國銀行界恐怕造幣權剝落在外國銀行手裡，遂亦有在上海設立造幣廠的議論。民國十年，上海銀行團借款二百五十萬元與財政部開辦上海造幣廠，并擬具意見書七條請財政部同意，以便實行廢兩改元。上海規元占銀兩的最大勢力，所以大家以為那時造幣廠成立後，廢兩一定可以辦到了。但銀團雖說廠長的選派須得其同意，派後亦不可時有更動，而實則兩年之中，廠長四易。銀團雖主張稽核借款用途，而預計可以數用的二百五十萬元用光以後，工程未完，機器多數未到，還欠了將近二百萬元的債。照以後財政部員的查核，該廠向各商購機器，同是一樣牌號，却檢標價最貴的才買。即此一端可概其餘。於是工程停止，機器由代辦洋行押在外國銀行，封在貨棧裡，債權人隨時向財政部討債，財政部隨時向他們推諉，廠基廠屋及財產由銀行公會派人看管，而第三次的廢兩用元準備又告壽終了。銀團借與財政部的二百五十萬元本息是由鹽餘分三十八個月償還，與造幣廠的成敗無大關係。這一段事情可以表示那幾年政治腐敗的情形，又可以表示商界參政的熱心與能力的程度。

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結束了上海造幣廠的債務，并完成了廠的設備，但過了兩年之久，到現在方有開

工日期。這個廠經過十年的工夫總算是造成了。又因為洋釐跌到六錢九分以下，銀元被熔燬的日多，所以現在廢兩用元又舊事重提了。廢兩用元本是整理幣制的第一步。這第一步在二十二年以前提起來了又放下，以後又提起放下幾次，十年以前更儼然的提起又悄然的放下，現在又要提起來去走，却還有人說：「且慢，還有問題！」現在反對廢兩的，實祇有錢業。這事與錢業固然有切身利害，一二八事變後，上海市面枯窘，錢業的地位自亦不可不顧。但對於錢業，亦祇能預定若干時日以後實行廢兩，以便錢業在這個猶豫時間自己去整理補救。至於折合問題，祇要有專家去計算，自然可以解決。若說到了現在，整理幣制的第一步還是行不得，那真好比「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只好什麼事都不辦了。但是由過去的廢兩用元問題的背景看來，此次如真要永久的廢兩，也須具備些條件。

這些條件就是關於政府的信用與權力問題。關於信用，第一自然在成色重量的精確。新幣最好仍照八九成色，庫平七錢二分重量鑄造以便與舊幣不分軒輊同時風行。耿愛德先生以為或可將新幣的成色重量減低以免鑄造的損失。但鑄幣可取鑄費。據以前天津造幣廠的計算，每元鑄費約合「行化」一分。又據南京造幣廠的計算，每元純銀庫

平六錢四分零八毫，按八九升合庫平銀六錢五分零五五八三八，加鑄費庫平一分零五三四七九，每元成本計庫平六錢六分一釐零九三一七，折合規銀七錢二分四釐五五八七。這都是造幣廠自己開列的數目，當然有盈無絀。民國三年國幣條例規定鑄費六釐，但民國十年上海銀行界關於上海造幣廠的鑄幣，曾有取鑄費一分的主張。現在亦可規定鑄費一分以資取償。

本年七月十二日第七五七號銀行週報所載俞遺生先生的『兩元平價如何計算』，最爲精確。照他的計算，每元應合規元七錢一分一釐三毫有奇。若加鑄費規元一分強，可以規元七錢二分。釐爲銀兩對於銀元的換算價格。現在洋釐雖則不到六錢九分，但洋釐本是隨時漲落的。今年二月初日本攻擊閩北時，上海洋釐的漲到七錢四分固然不可爲例，但七錢二分幾的洋釐是平時所常見的。如鑄費核實計算可稍減少，使每元合規元七錢二分，自然更好。惟將來新幣大部須由舊幣改鑄。據以前南京造幣的計算，鑄幣十萬枚，若用生銀，火耗一五六兩一錢三分四釐，若鎔舊鑄新，火耗祇五七兩六錢七分二釐，但須加重量磨損耗二〇八兩二錢六分。照此計算，鎔舊鑄新，損耗較多。況且舊幣成色有不足八九的，改鑄時亦是一重損失。即使銀兩

與新幣換算的價格，因此須加到規元七錢二分五釐，似亦未嘗不可行。

成色重量最好不要低減者，還有一個重大理由。如減低了，鎔舊鑄新有利可圖，難免各處造幣廠不紛紛做造，有如從前的改九成爲八九，以至信用發生問題。固然，新幣模型可以不發與他廠。但在政治未上軌道時候，如有大力者替一個造幣廠保鐵，來要新模，結果到底如何？如成色重量不減，鑄造新幣無甚利益，他廠就犯不著做造了。本來鑄造主幣不應獲利，造幣利益是在輔幣裡。

防止他廠做造新幣，還有一個根本辦法，即是將他廠完全裁撤。關於這個問題，三十年來的經過情形尤足以表示中國政治不定的狀況。中國有兩件事在世界可考第一；一即是常備軍隊的數目，二是造幣廠的數目。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各省競造銅元，開鑄的十七省，設局多到二十處。光緒三十二年，除戶部總廠外，將各省局廠裁併爲九處，宣統二年又將總廠外各廠裁併爲武昌南京廣州成都雲南奉天六個分廠，革命起後，各省已裁的局廠又紛紛的開鑄起來了。民國三年財政部再將各廠裁併爲天津南京武昌廣州奉天成都雲南七廠，但重慶長沙兩銅元局並未實行裁撤。民國七年以後，政局日亂，於是各省又陸續的將停閉的廠

開起來，或設立新廠，或即在兵工廠機器局裡附鑄貨幣。如杭州安慶南昌張家口山東陝西河南吉林山西福建都在競爭開設造幣廠。有幾處如山東陝西口北南昌等處，雖未開成，但多花了不少造屋購機的公款。那時情形儼然已恢復光緒三十年設局二十處的壯觀。但到現在即四川一省的造幣廠恐已突破光緒三十年的紀錄了。四川各廠是跟軍隊走的，聽說差不多每一旅有一個造幣廠！四川真是『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的模範省。民國二三年間，川廠已經鑄造當二百的大銅元了。

現在上海造幣廠既可以開工，他廠自須盡力裁併。但此處就發生政府的權力問題了。如天津廣州雲南成都各廠以及四川的雜牌各廠現在能裁撤嗎？實則中國是否祇要一個上海造幣廠本是問題。現在祇好盡政府的權力去裁併，將裁撤的造幣機器一律毀為廢鐵以免如從前的死灰復燃。天津廣州成都等處各廠應該改為上海總廠的分廠，但非到政局真正統一，總廠能完全節制分廠的時候，不可叫他們開工。上海一廠每日能鑄銀元五十萬枚，另有造輔幣機器，也可勉強一時的需要了。不過就以上海一廠而論，也須有政府與商家雙方的嚴密監督，方可以鞏固信用。重量成色以及鑄數固須檢查，其他財政方面亦得考核，因為在一

個機關裏，不拘何方面倘有腐敗情形，即可蔓延傳染到別方面去。這是根據過去二十餘年整理幣制失敗的背景得來的結論，並不是對於一時的情形而說的。一時儘可有一個認真辦事的當局，但政局隨時可更變，更變後如何，誰也不能擔保。所以上海造幣廠應由財政部與銀行界共同維持，方可使幣制有個穩固的基礎。

就這個背景看來，我們應該有更為廣泛的結論，因為二三十年來整理幣制的失敗並不由於幣制方面的局部關係，而由於全國政治之狀態。這個政治狀態可以政局紛亂，財政腐敗，官吏敷衍三句話概括之。這個狀態若根本不改變，我們對於中國的前途不能不特別憂慮。日本維新三十年變為強國，在中國有三十年的光陰不够去走整理幣制的第一步。俄國大破壞以後，五年計畫有了偉大的具體成績。中國經過二十餘年尤其是近年的破壞以後，非有大規模的建設不能恢復元氣，不能立國。但在這個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狀態之下，大規模的建設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要建設事業成功，必須忠實的履行下列的三個條件：即是

- 一，必須脫離紛亂而不固定的政治關係；
- 二，必須完全由專門家來主持管理；
- 三，必須受極嚴密而有效的財政監督。

漫游散記(六)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

●太行山的東坡——所謂太行「八

陁」之一的井陘

我于民國二年的二月到北京，做了工商部鑛政司的地質科科長。我這一科裏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

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行，部裏都說沒有旅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請求人供給旅費，曾做過短期的調查。幸虧那時候北京大學因為地質門招不到學生，把京師大學原有的地質科停辦。我就向北京大學把地質門原有的書籍儀器借了過來，由工商部開辦了一個地質研究所，所以還不至於無事可做。同時我又把北京大學原有一位教授，德國人梭爾格，請了過來幫忙。民國二年的秋天，南通張季直先生來做工商部總長，要實行他的棉鐵政策，我纔有機會同了梭爾格和鑛政司的一個科員王錫賓先生同到山西調查正太鐵路附近的煤鐵礦。

梭爾格原是柏林大學的助教，在京師大學的地質科教了三年書。所有他的中國同事都說他脾氣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國人。我和他談了幾次，看見他在西山的工作，覺得他是一位很可敬愛的學者，力排衆議，請了他來。這一次和他旅行了四十多天，我很虛心的請教他，他也極熱心的指導我，我們變成極好的朋友。可見得外國的專門家不能與中國人合作，不一定是外國人的過失。

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井陘，因為這是正太鐵路附近太行山東坡很重要的煤田。中國舊書上所謂太行山原沒有一定的定義。據述征記太行有八陁——兩山之間的狹路謂之陁：一是軹關陁，在河南濟源，二是太行陁，在河南沁陽，三是白陁，在河北磁縣，四是滏口陁，在河北磁縣，五是井陘，在河北獲鹿，六是飛狐陁，在河北蔚縣，七是蒲陰陁，在河北易縣，八是軍都陁，在河北昌平。由此看來，從黃河北岸起，一直到河北的昌平，都是太行山。但是實際上講，太行山的範圍似乎不應如是的廣大，因為從河南的濟源，沁陽，到河北的阜平，山脈是南北行的，這

是所謂真正的太行山。從阜平起，山脉轉向了東北，所以

繞到北平的北面，再向東連到榆關，這一段地質的構造極其複雜，與太行本身不同。我的朋友翁詠寬先生把牠叫做

燕山。如是則八陁裏面的軍都陁（就是居庸關），飛狐陁，和蒲陰陁（就是紫荆關）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其實

所謂八陁，根本就沒有道理。「八」這個數目，是中國地理上的一種迷信，起源于東，南，西，北和東北，西北，

東南，西南，八個方向。所以說「大將軍八面威風」。無論那一縣的縣志，都有本縣的「八景」。只要臭水溝上有

幾塊木板，就叫牠為「板橋秋月」；一所破廟，就成就了「古寺鐘聲」。無論如何，四個字一景，總要湊成刻板式的「八景」。「八陁」的來歷大概也不過如此。例如飛狐

陁和蒲陰陁原只能算一陁；飛狐口是從蔚縣入山的口子，蒲陰陁就是紫荆關，是出山到易州的口子；正如過居庸關

的山，北面的山口在康庄，南面的口子在南口一樣。現在却硬把牠們分為兩陁，來湊成八數。其他各陁除去軍都陁

是居庸關通宣化的大路，井陁是河北通山西的大路，太行

陁是從山西上党經天井關通沁陽的大路之外，都不重要。太行山裏與軹關，白陁，逢口同等的小路不止十數，而從

阜平向五台的龍泉關，向恆山的倒馬關却反不在八陁之列

，可見得八陁是根本沒有意義的了。

若是我們把軍都陁割在燕山裏面，則穿過太行山的路沒有那條有井陁重要，因為牠是太行山裏惟一可以走大車

的路；此外各陁只通馱馬。普通北方的馬，走山路只能駝二百多斤；一個大車總可以裝一千幾百斤，所以能通車的路，在運輸上的價值，決非不能通車的路所能比擬。井陁

能通車道，在漢初已經有記錄。韓信出兵井陁，酈食其說他「車不能方軌」。足見車是可以通的，不過不能「方軌」而已。山道的重要全看牠能通車與否，不但太行山裏如此

，燕山裏也是如此。橫貫燕山的路不止十數（如民國十三年奉直戰爭出名的九門口，冷口都是例），然而大家所知的，只有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居庸關四條道，因為只有這四條道是可通大車的。這種路上的口子，中國地理書上叫做「險要」。其實既然能走車，當然是各路中最

不險的地方，所以所謂險要，要則有之，險則未也。

井陁通山西的大路有兩條，都經過井陁縣城。一條路是走娘子關到陽泉，就是正太鐵路的路線。從井陁縣起向

西，在乏驢嶺有一個山洞。一條是走固關，石門，到平定，就是從前走大車的驛道。井陁縣以東則只有一條路，都經過頭泉到獲鹿。從頭泉到陽泉，或是從頭泉到石門，都

是太行山，距離差不多整整一百公里，娘子關和固關都正在山的中間。井陘縣在頭泉西三十五公里，離娘子關只有十七公里，與獲鹿的平原已經隔了頭泉以西岩峯附近的山。井陘煤田是太行山裡而陷下去的一個盆地。南北長十五公里，東西寬二公里至五公里。盆地的中段最窄，地形也最高。這叫做鳳凰嶺，把煤田分作兩部；北部大部分為德國人漢納根所辦的井陘礦務局所佔領，總機關在岡頭村，有十公里長的小鐵路，與正太路的南河頭車站聯絡。南部面積不到北部的三分之二。井陘縣城就在牠的中間。城西二里有中國人自己辦的半新式的正豐公司。

梭爾格是十一月十日離開北平的。我因為生病，一直到十一月十三日纔到岡頭。當時梭爾格已經到微水去調查。在礦上代理礦工程師的是一位學化學的戈爾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爾格，說「若是我們在中國的德國人都像他那樣肯工作，那就為我們爭氣了！」他又問我，還有一個德國人，在北京大學教礦物，認識不認識。我告訴他，這位先生聽說我請了梭爾格，就來自薦。說剛從井陘工作回來。但是我看他拿來的一張井陘煤田地質圖，好像是用李希荷芬的舊圖放大的，所以沒有理他。戈爾登堡先生拍着桌子叫道：「丁先生！你的眼力不差！我們因為北京大學地

質科停辦，這位同鄉失了業，請他到這裏來工作，預備給他找一個位置，那知道他到礦三個星期，一天也不肯出去。末後又偷偷的找了土娼到這裏來胡鬧。我沒有法子，只好請他走了。臨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把李希荷芬的舊圖放大，正不知道他有何用處，原來他是拿去騙你。」我于是又知道所謂外國的專家，不是可以隨便亂請的。

我在關頭住了三天，天天同梭爾格出去研究，得了許多新知識，然後決定調查的方法和計畫：梭爾格擔任調查鳳凰嶺以北，我調查鳳凰嶺以南。我從十一月十七日起，到二十五日止，費了九天工夫，從把南部的地形和地質調查明白，于二十六日會同梭爾格由井陘步行到娘子關。井陘城附近的山最有登臨的價值的是距城西南二里的雪花山。山比縣城高不過一百公尺，但是因為四面是平地，望的很遠；西北全是石灰岩的大山，緊逼煤田盆地的西邊。東南大山較遠，但是煤田的東邊離山根也不過二三公里。西南煤田到長生口就不見了，但是因為盆地向西南延長，一直到固關，地勢都很低。東北是鳳凰嶺一道低山，把煤田隔做兩段。煤田全是在平地，地上滿是黃土。這平地之中，只有兩個小山：一個就是雪花山，一個是縣城東二公里半的東定山，與雪花山東西相對。棉水從乏驢嶺東來，到

縣城成一個大灣子，環繞着縣城東，西，南三面然後向北繞到東定山的北面向東北去。鐵路在棉水的南岸，西向乏驢嶺進山洞，東由東定山的南面向南洪口。城西南二里，鐵路的南面，有一個寶塔，是一個很好的測量的目標。井陘的城不過一里半見方。從山頂下望，房屋街市，看得清清楚楚。雖然隔了二十年，這一幅絕好的地圖，還沒有忘却！

這是我第一次在北方內地旅行。在崗頭與與爾格分手的時候，向他打聽住宿問題。他說，「北方的『店』很方便；有店就行。」我到了井陘，因為要知道東面太行山裏的情形，決定由井陘東南向南障城，再向北到南洪口向西到井陘。聽說南障城是大地方，原來預備到那裏過夜。但是一早上雪花山測量，下來已經過了十二點。再因為我沒有經驗，沿途工作很慢，走到離城十幾里路的高家坡天已經黑了。沿路逢人打聽，都說高家坡有店。到了村子裏，好容易找到所謂惟一的店，門已經關上。打了半天門，纔有人出來。他看見我的奇裝異服，立刻說，「我這裡沒有地方。再走三里就有大店。」說着就要關門。我知道從高家坡到南障城十多里路，中間沒有村子。一面把一隻腳跨進門裏，不准他關門，一面拿一塊錢給他說，「我是好人，

我先給錢。你不用怕。你不看我還有兩頭牲口嗎？」店主
人看見了現錢，口就軟了。「錢不錢是小事。我這裏實在
沒有地方。你不信，你自己進來看。」我進門一看，是一
個一丈見方的小院子，朝南一個門，開了進去，一個通長
的屋子，兩邊兩排的長坑，西面一排坑的中間，有一個灶
頭。坑上面坐着睡着滿滿的人，地下滿放着挑油的担子，
絕對沒有下腳的空隙。我只好請店主人去找村長。等了一
會，回來說村長出門去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看
見院子西面有一間矮屋。推開門一看，滿地都是草，屋頂
上瓦也沒有了。我叫人把東西搬了進去，纔算有了住處。
高家坡出海面一千多尺，十一月底，已經很冷。我十二點
多鐘的時候吃過一張半斤的餅。以後就沒有喝過一口熱水
。到那時候真是飢寒交迫。只好把舖蓋打開，鑽進被窩裏
面等晚飯吃。趕牲口的走了進來說，「老爺！你倒睡了。
沒有草，沒有料，連剗草的刀都沒有一把，我的牲口怎麼
好？」我只好請了店主人來，說了許多好話，先給了錢，
請他買點草料，再借了一把剗牛草的刀來，喂了牲口。到
了第二天上了路，我只看見趕牲口的一面走，一面打盹。
我問他道，「你昨天晚上難道沒有睡覺嗎？」他回我道，「我
的老爺！那一間屋子，已經睡了三十二個人。坑邊上坐都

坐不了。那裏還能睡！我只好油篋子中間蹲着過了一夜。我纔知道這種「望門投止」的辦法，是不可為訓的。

答一位少年女朋友（通信）

衡哲

十餘日前，我接到一位少年朋友的來信，和我商量兩件事。其一，是她想加入義勇隊，與日本作戰去。其二，是她想努力練習體育，預備到下次歐林壁 Olympic 大會中去奪錦標。她是一位不到二十歲的有志青年，身體很強壯，智識也很不錯。她要我告訴她，在此兩條路中，該走那一條。我的回答是，她有許多比這兩條更好，更有益于國家的路可走。我很慚愧，要潑給她這一盆冷水，但我的良心却不讓我不這樣說。現在我把我覆信中的一段，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為的是這位朋友的熱心與彷徨，很可以代表現在有志的青年女子的一個人生問題。

（上略）你說，你「瞻顧彷徨，不知做什麼方好。有時想，假如一死可以救國，即亦不惜粉身碎骨，以盡一己的天責。」這真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氣的青年所應有的感想。我不但十分欽佩，并且十分表同情，因為我也是此中的過來人。但你所提出的兩條路，我却不甚贊成，為什麼

呢？

其一，你所說的「激烈的路」，是走不通的。關於這一層，請容我告訴你，我的一位朋友的一個經驗。那是辛亥年的秋天，正當武漢革命開始之後。那時我的朋友正在上海，不用說，她的同情心是完全在革命軍的一方面。而同時，有許多青年女子們，組織了什麼女子北伐隊，以及其他團體。我朋友的尊長與朋友，知道她的性情的，都說，「她當然是第一個加入的人了。」後來她又接到了好幾位朋友的來信，說，「救國報國，此其時矣。」她當時雖然血氣正盛，但也很有思想。她想，殺人是不是一件好事，此其一。女子是不是應該樣樣都仿效男子，在生理及心理方面，男女之間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此其二。加入北伐隊，是不是我們對於國家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此其三。她正在這樣彷徨的時候，一位「愛惜」她的朋友，又來了一封信了。她罵她無毅力決心，罵她是冷血動物，罵她怕死，罵她不愛國，罵她是滿奴，罵得她身無完膚。于是她

氣得哭了，但她的難題也就從此得到了決解。聽說那些北伐的女青年，也有許多因為拿不動長槍，走不得遠路，吃不起辛苦，急得哭的。并且她們的難題，和我的朋友的一樣，也是靠了這一哭而得到了解決。你道怎麼？原來她們一哭之後，便不「北」了，更不用說「伐」！這事過了二十年了，但在她們這一羣人中，除了我的那位朋友之外，誰也不曾再在社會上露過面，更說不到什麼事業。所以你，單單靠了一時血氣之勇，于已于國都有什麼用？

我很不願意給你澆這一盆冷水，但我的良心却不許我對你說敷衍的話。大凡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最難的是仍舊專心一志的做一個人原來所做的工作。我們總以為那是沒有價值的，總須換做一件事，方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記得在十數年前，美國方加入歐戰的時候，那時也有許多人，以為不改行不足以救國。于是有些教員們便去捲綑帶，有些學生們便去做餐館中的侍者，而有些侍者們便去做電車上的剪票員，電車上的剪票員又有去做侍者的。結果是人人改行，改得團團轉。他們的良心算是得到安慰了，只可惜薩姆老伯伯，（美國人常叫自己的國家為Uncle Sam）對著這一羣改行的外行人，真不知道怎樣辦理。我又記得讀過一篇敘述意大利維蘇維亞火山爆裂的小說，中間有一

段說，「當火焰正猛烈的時候，全市人民，彷彿驚懼，不知所為。但見海邊的人向山上跑，山上的人往海邊逃」這足多好的形容！「山上的人往海邊逃，海邊的人向山上跑」，結果是仍舊逃不了，徒然加增了不少的紛亂與煩惱。

你今年不過還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小姑娘——請你恕我賣老的態度——正是應該培植你自己實力的時候。你在身體上，人格上，智慧上，都尙不會成熟。你對於國家的多難，雖然不容漠視，但比如救溺，總要自己能游水，方能說到救人。自己還不能游水，就要跳下水去救一個垂溺的人，恐怕那人還沒有死，你自己先就死了。這叫做愚忠，是很可以不必的。不但如此，中國的真患，是內部的潰爛，外患不過是許多病徵之一。單單驅除外患，而不去清除內部的腐爛，是沒有用的。所以即使戰爭也是女子的天職，即使義勇軍可以趕去倭寇（請注意，這兩個「即使」是很大很大的讓步）中國也未必就能因此有救。中國的根本病症是鴉片等毒藥，他們能使我們的人種整個的墮落；是農民和貧民的沒有生路，這能使土匪遍全國；是人民的愚頑，這能使他們做任何國的順民。這些都是下層的病症，他們還不過是太倉的一粟。我不說上層的病症——貴大人貴太太們的驕奢淫逸，貪狠無耻——因為他們的作惡，是

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外的。但上面所說的下層病症，却是我們人人所能致力的。等到下層社會康健了，毒血掃清了，那些上層的寄生蟲，自然不滅自滅。你說，『假如子國有益，即粉身碎骨』也不辭，你有這樣的無我的志氣與毅力，又有那樣的才智與康健，你不要輕輕的去做敵灰吧，善自珍重，善自培養，預備將來做一個中華民族的清血劑，去醫治醫治上面所舉的病症吧。雖然那些都是在窮鄉僻壤做的，無名無利的事業，但救國報國，真是沒有比他們再切實，再有效率的了。

○ ○ ○ ○ ○

其二，你說，『即使不走，「激烈的路」至少也當名揚海外，在國際運動場上，奪一個錦標，為病夫的中國吐吐氣』。你該知道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運動本是為強身的，不是為奪錦標的。現在全世界似乎都有些『打破記錄』迷，不論運動，乘飛機，開汽車，無一件不想打破記錄。我常默思靜觀，覺得這個情形是十分可笑的，也是很可惜的。你是聰明人，何必把你的聰明才智消耗在這一刹那的

虛榮上面呢？這些勾當，且讓那些體力勝于腦筋的人去幹吧。你是應該智體兩方並修，為將來中國担当重任的，何必去走那條狹窄的路呢？請你不要誤會，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病萎萎的人，所以不贊成你去奪錦標。我十分愧恨，我在幼小的時候，不曾得到相當的運動，致使我的身體與腦力不能得到平均的發育。但我的憾恨止于此。我不會為着我生平不曾得到一個銀盾而發生一點的不滿意，我將永不後悔我不會成爲一個體育專家，雖然我身體的不強健，是我生平的一件大憾事。這分明是兩件事，請你不要把他們誤以爲一。（下略）

● 本社通信

王善政先生鑒：先生的信早收到了。我有一篇講貴州出路的文章，是已印行的，我想送你一冊，因為失去先生的住址，無從郵寄。請你把住址寄給我。

丁文江啓（芳嘉園三五）

定閱處：南京國立編譯館轉圖書評論社

定價：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每期零售二角五分

劉英士主編

圖書評論

創刊號要目預告
(九月一日出版)

- 羅家倫：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
- 吳景超：蕭克利佛對於犯罪學的新貢獻
- 吳文藻：馮維色的系統社會學
- 孫本文：社會學及社會問題
- 吳澤霖：余天休的社會學大綱
- 凌夢痕：柏格森的最近著作
- 梁實秋：周越然註的伊爾文見文雜記
- 謝循初：陸志韋的心理學教科書
- 樓桐孫：李瑛譯的經濟學要旨
- 孫復工：王森然的中學國文教學概要
- 王瑞嫻：蕭友梅著的音樂教行書
- 劉英士：新書鳥瞰
- 董任堅：雜誌論文分類摘要
- 舒新城：中華書局編輯所

注意：凡在九月一日前定閱獨立評論全年者皆得贈閱一期

平明雜誌

第一卷第七期要目

- 洛桑會議與歐洲和平
- 最近世界經濟恐慌與美國
- 蘇聯對外貿易政策
- 列強在中國之支配機構
- 德意志視查記
- 世界論壇(三則)
- 大事述評
- 病燕(短篇小說)
-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 許孝炎 李作藩 克林 向波 鄭林莊 楚人等 編者 熊式

價目：每期二角。
 預訂三月一元一角
 ；半年二元；全年
 三元八角。郵費每
 期二分。發行：
 北平西長安街安福
 胡同三二號平明雜
 誌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孟真

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高夢旦

舊戲改革討論

一、改革舊戲問題 盧述曾

二、白話小戲劇 余上沅

漫遊散記(七)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獨立評論

第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廈門 | 重慶 | 漢口 | 汕頭 | 興寧 | 梅縣 | 成都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封圖書局 | 開封圖書局 | 安慶圖書局 | 無錫圖書局 | 青島圖書局 | 濟南圖書局 | 廣州圖書局 | 廈門圖書局 | 重慶圖書局 | 漢口圖書局 | 汕頭圖書局 | 興寧圖書局 | 梅縣圖書局 | 成都圖書局 |
| 東亞書局 | 新華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開明書店 | 文化書店 | 全明書社 | 民權書社 | 新時代書店 | 現代文化社 | 新華書店 | 商務印書館 | 開明書店 | 文化書店 | 全明書社 | 民權書社 | 新時代書店 | 現代文化社 | 新華書店 | 商務印書館 | 開明書店 |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孟眞

本文中所謂高等教育者，大體指學術教育而言，即大學與其同列機關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關學術的事，例如大學學生人品之培養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學術之取得，發展，與應用的。

在清末未改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國之學術多靠個人及皇帝老爺一時的高興，其國家與社會之高等教育機關，只有國子監及各地書院，因為州縣學還近于普通教育。國子監只是一個官僚養成所，在宋朝裏邊頗有些學術，在近代則全是人的製造，不關學術了。書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講學的機會，有作些專門學問的可能，其設置之制尤其與歐洲當年的書院相似，今牛津橋各學院尙是當年此項書院之遺留，其形跡猶可見于習俗及制度中也。不過，中國的書院每每興廢太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繫于山長一人，無講座之設置，故很難有專科之學問。且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爲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經學及史學正在有個專門的趨勢時，桐城派遂用其村學究之腦袋叫道，「義理詞章考據缺一不可！」學術既不專

門，自不能發達。因此我們不能不想到，假如劉宋文帝時何承天等，及趙宋神宗時王安石等的分科辦法，若竟永遠實行了，中國學術或不至如今日之簡陋。

清末改革教育，凡舊制皆去之，於是書院一齊關門，而一切書院之基金及地皮多爲劣紳用一花樣吞沒了。今日看來，書院可存，而書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當時竟移書院中之科目，即舊新各式八股，於學堂，而廢了書院，這不能說不是當時的失策。現在我們論高等教育，這個帽子可以不管，因爲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習氣以外，沒有一條是紹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爲如此，我們不能不說說歐洲近代大學的演成。歐洲的近代大學可以說有三種含素。一是中世紀學院的質素，這個質素給他這樣的建置，給他不少的遺訓，給他一種自成風氣的習慣，給他自負。第二層是所謂開明時代的學術，這些學術中，算學醫學等多在大學中出，而哲學政治雖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蕩於其中，經此影響，歐洲的大學才成「學府」。第三層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大學學術化，此

一風氣始于德國，漸及于歐洲大陸，英國的逐漸採用是較後的；于是大學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隸于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獎金。當清末辦新教育的時代，這一葉歐洲歷史是不知道的，以爲大學不過是教育之一階級。

當時的教育既要「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更以富強之目前功利主義爲主宰，對于西洋學術全無自身之興趣，更不了解他的如何由來，培養，與發展。試看張之洞張百熙的奏摺，或更前一期王韜馮桂芬的政論，都是這樣子。他們本不知道西洋在發財造鐵以外有根本的學術，則間接仿造西洋的學術建置，自然要不倫不類的。我們現在正也不能怪他們，以他們當時的環境做出那些事來，比其現在的教育界領袖以今之環境做出這些事來，則今之人十倍不如他們。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個大的學堂。民國五六年以後，北京大學修談新學問，眼高手低，能噓氣，不能交貨，只掛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來當時的情景着實可笑，然而昏睡初覺，開始知道有這一條路，也或者是一個可紀的事。從那時到現在，中國也有兩三種科學發達，一般對大學及學術制度之觀念進步得多了，不過，今之大學仍然不是一個歐洲的大學，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即如以先覺自負之北大論，

牠在今日之渾沌，猶是十多年前的老樣子哩！現在似乎政府及社會都感覺着大學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寫下幾件一時感覺到的事。

第一大學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統中，而應有其獨立之意義。大學也是教育青年的場所，自然不能說他不是個教育機關，不過，這裏邊的教育與中小學之教育意義不同。中小學之教育在知識之輸進，技能之養成，這個輸進及養成皆自外來已成之格型而入，大學教育則是培養一人入於學術的法門中的。誠然，中小學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這教授法可以用來使學生自動接受訓練，而大學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識之輸進技能之養成者，不過，中學教師對學生是訓練者，大學教師對學生是引路者，中學學生對教師是接受者，（無論接受的態度是自動的或被動的，）大學學生對教師是預備參與者。雖大學各科不可一概而論，工農醫等訓練之步驟要比文理法商爲謹嚴，然而大體上說去，大學各科雖不同，皆是培植學生入于專科學術之空氣中，而以指導者給予之工具，自試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學生實無分年的全班課程之可言，今之大學多數以年級排功課，乃將大學化爲中學，不特浪費無限，且不能培植攻鑽學術之風氣。如大學不成爲中學，下列辦法似宜採

用：

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之人員，不以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爲大學課程。

二、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餘多採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

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這種基本檢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證，得此項及格證之後，然後可以參與畢業考試。此項及格證在國文系者試作一例如下：

甲、中國語言文字學，

乙、中國文學史，

丙、中國通史，

丁、中國詩學（詞曲在內）或詞章學，

戊、一種西洋文學，

己、若干部書之讀習。

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選擇二三種最基本之科目考試之。

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

中無所謂年級。

六、凡可有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爲限。

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

第二，大學之構造，要以講座爲小細胞，研究室（或研究所）爲大細胞，而不應請上些教員，一無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學中的講課，如不副以圖書之參用，或實驗之訓練，乃全無意義，而在教授一方面說，如他自己一個，孤伶仃的，無助手，無工作室，乃全無用武之地，雖有善者，無以顯其長，致其用。故大學中現在實在尙多不用着高于大學本身一級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質上有關連若干系必須設一研究所。大學學生本身之訓練，即在其中，大學教授之日進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學畢業繼續受訓練的，自然是好事，有時也很需要，不過，研究非專是大學畢業後事，而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舍如此之組織而談大學教育，只是空話。今之大學，各個都是職員很多，教員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學教授一到校，非講堂及休息室則無立足之地，此等組織，誠不知如何論學問。

大學本身之研究所，與大學外之研究院，也不應是沒

如下：

有分別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機關，近年皆能努力。若憑理想論去，研究院與大學中之研究所應有下列之分別。凡集衆工作 (Collective Work)，需要大宗設備，多人作工，多時成就，與施教之職務，在工夫及時季上衝突者，應在研究院，例如大規模之考古發掘，大組織之自然採集，等。凡一種國家的職任，須作爲專業，不能以有教書責任之人同時行之者，應在研究院，例如電磁測量，材料試驗，等。至于一切不需大規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學中儘可優爲之，研究院不必與之重複，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學中有學生爲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勢之不便。如此說來，研究院之研究，與大學中之研究，本非兩截，不過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爲興亡所繫，故大學教授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今之大學，請教授全不以資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這真是古今萬國未有之奇談。只是所謂「留學生」，便可爲教授，只是不合學生或同事或校長的私意，便可去之，學績既非所論，大學中又焉有力學之風氣？教育當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決心，則教授問題應該求得一個精切的解決。我一時提議

一，由教育部會同有成績之學術機關組織一個大學教授學績審查會。

二，凡一學人有一種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對某一種學問有若干心得者，由此會審定具有大學教師資格。

三，經上列第二項手續之後，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爲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

四，凡有大學教師或教授資格者，任何一大學請其爲教師或教授時，受大學教員保障條例之保護，即大學當局如不能據實指明其不盡職，不能免其職。

五，既得有上列兩項資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會有新貢獻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權利。

六，凡無上列資格，在此時情況之下，不得不試用者，試用期限不得過二年。

七，凡不遵守上列辦法之大學，教育部得停其經費，或暫不給予畢業證書之用印。

既澄清了大學教員界，然後學術獨立，學院自由，乃至大

學自治，皆可付給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付此項權利於大學教授，無異委國家學術機關於學出學棍之手，只是一團糟，看他們爲自身的利益而奮鬥，而混亂而已。

此文寫至此處，急須付印，尙有餘義，且待後來再寫

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高夢旦

廢兩爲元，已至實現時代。現在最急問題，爲如何處理舊有紛亂之輔幣。法治國幣制必須統一。元與兩爲橫的關係，不能不統一。主幣與輔幣，爲縱的關係，尤不能不統一。

當五銅元 一·〇〇
當二銅元 〇·四〇
制 錢 一·〇〇
一 二 五

我國幣制自古以銅幣爲單位。每枚重一錢，故稱曰錢，亦曰制錢。清末始用銀元爲主幣，銀角銅元爲輔幣。其質地重量價值，均有規定。

以上完全採用十進制，整齊劃一，統系分明，無可疵議。惟是有法無政，弊端百出。銀角成色較次，鑄造稍有餘利。銅元成本尤輕，餘利尤大。濫製粗造，競爭劇烈。其流毒較元兩并用，且又甚焉。

每枚重量(庫平) 每枚值制錢數
一元銀幣 七·二〇錢 一〇〇〇文
五角銀幣 三·六〇 五〇〇
二角銀幣 一·四四 二〇〇
一角銀幣 〇·七二 一〇〇
五分銀幣 〇·三六 五〇
當二十銅元 四·〇〇 二〇
當十銅元 二·〇〇 一〇

我國幅員廣大，省自爲政。輔幣紛亂，調查不易，先以上海及北平爲例。

上海銀元與輔幣換算價值

銀元一元 〓 銀角一一·七五角 〓 當十銅元二九六·二枚
銀角一角 〓 銀元 八·五分 〓 當十銅元二五·二枚

(根據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上海各報)

北平銀元與銅元換算價值

銀元一元 〓 當二十銅元二〇〇枚

銀角一角 \parallel 當二十銅元 一六枚(約數)

(北平銀元與銅元，兌換價頗為固定。且市上通行銅元票，故銀角之行用較少。)

按銀元一枚之法價，為當十銅元百枚，今上海市價乃至二百九十六枚，幾為三與一之比。銀元一枚之法價，為當二十銅元五十枚，今北平市價乃至二百枚，為四與一之比。較之法定，相差至巨。重量方面，當十銅元法定二錢，今最輕者一錢五分，為一〇〇與七五之比。當二十銅元，法定四錢，今最輕者二錢二分，為一〇〇與五五之比。至於質地之低劣，鑄造之粗糙，更難究詰。積弊至此，雖不廢兩改元，而輔幣本身亦有不可不加整頓之勢。況當改革方始，為幣制新紀元之時，豈容不謀解決。解決之道無他，不整齊者使之整齊，無統系者使成統系是已。

欲使幣制整齊而有統系，惟一方法，則廢棄舊幣，重鑄新幣。以快刀斬亂麻，為最痛快最乾脆的辦法。惟是輔幣之數量甚多，行使之區域尤廣，與平民關係，甚為密切。一旦廢棄，非特時間所不許，且勞費實甚，國家及社會均受無謂之損失。竊意宜於改鑄新輔幣之外，並將各種舊輔幣加以整理，以供過渡時代之用。但整理舊幣，務使能切合下列兩原則。

(一) 舊幣之定價，與新幣之法價，須有簡單之比例，以便行用時之記憶。

(二) 新幣之法價，與舊幣之時價，須有接近之比例，以免私鑄私燬之弊。

欲規定舊幣與新幣之關係，必先規定新幣之制度，以為根據。假定新幣制度，採用甘末爾氏建議為基礎，其規定如下。

一元 \parallel 一〇角 \parallel 一〇〇分 \parallel 一〇〇〇釐

一角 \parallel 一〇分 \parallel 一〇〇釐

一分 \parallel 一〇釐

銀幣三種 一元 五角 二角

鎳幣三種 一角 五分

銅幣三種 一分 五釐 二釐

上項假定，如無變更，則新舊幣之換算，當如甲乙兩表。

(甲) 舊幣兌換新幣

當十銅元 \parallel [1.3分] \parallel [三.三三釐] 即當十銅元三

枚 \parallel 新幣一分

當二十銅元 \parallel [1.2分] \parallel [五.釐] 即當二十銅

元二枚 \parallel 新幣一分

單角 \parallel 八.二三三分 \parallel 二五當十銅元 \parallel 一六.六當二

十銅元
 雙角 一六·六六分 五〇當十銅元 三三·三當二
 十銅元

(乙) 新幣兌換舊幣

| 新幣 | 舊幣 | |
|------|------|-------|
| | 當十銅元 | 當二十銅元 |
| [一元] | 三〇〇 | 二〇〇枚 |
| [五角] | 一五〇 | 一〇〇 |
| [二角] | 六〇 | 四〇 |
| [一角] | 三〇 | 二〇 |
| [五分] | 一五 | 一〇 |
| [一分] | 三 | 二 |
| [五釐] | 一·五 | 一 |
| [二釐] | 〇·六 | 〇·四 |

(甲乙表中「」為新幣)

上列新舊幣互相兌換，共計三十項。惟舊銀角兌換新幣及當二十銅元四項，不甚整齊，其他二十六項，均無參差之弊，是第一原則所謂新舊幣價值有簡單之比例，已得十之八，九矣。茲更將新幣兌換舊幣作一簡表。

新幣一元 舊幣 一二銀角 二〇〇當二十銅元 三〇〇當十銅元

用分以下，依此類推，簡單明瞭，毫不難記。至於兌換價與市價接近問題，亦可舉例為証。

| 新幣一元 | 舊幣 | 市價 | 兌換價 | 百分差 |
|------|-------|-------|-----|-----|
| 銀 | 當十銅元 | 二六·二枚 | 三〇枚 | 一·三 |
| | 當二十銅元 | 一〇〇·枚 | 三〇枚 | 二·一 |

據右表觀之，兌換價與市價之差數，僅及百分之一，二。是第二原則所謂新舊幣價值有接近之比例，已達百分之九十八，九矣。

上述新舊幣兌換辦法，但就上海北平兩地而言，比例簡單，折算便利。其價值果能長期維持，則新輔幣之鑄造，儘可從緩，或先鑄二三種以為補助。其他各地輔幣情形，甚為複雜，宜從速調查，分別整理，截長補短，以舊輔幣之時價，遷就新幣之法價，使稍近整齊，亦非不可能之事。即使偶有少數地方，紛亂太甚，無從整理。則一面仍依舊輔幣之時價，以供暫用。一面速鑄新輔幣，以為替代。地域較小，數量較少，施行當然較易。總之，我國地方廣大，幣制紛亂，歷時又久。改革之始，必有許多困難，補救之法必須有許多曲折，此事實所無可如何者也。

此外尚有較重要問題，則輔幣之單位，不能太大。價值之距離，不能太遠。我國幣制，自來專用制錢，計算遲

緩，取携笨重，當時交通未廣，人事簡單，即已甚感其不便。清末改革幣制，銀幣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種。

銅幣有當二十當十當五當二四種。合舊有之制錢，其計十種。大小相維，計算取携，均甚便利。立法周密，可謂盡善盡美。惟主持者，以造幣為手段，以籌款為目的。五角成色較優，一角五分及當五當二，造費較鉅，餘利無幾，故鑄造甚少，幾至絕跡。于是行用于市上者，銀幣只有一元及二角計兩種，銅幣只有當十或當二十計一種。（當十與當二十無相互關係，故同時并用之處甚少）併十種為三種，其行使之不便自不待言。上海二角銀幣兌換當十銅元五十枚，重量在半斤以上，計算取携甚為費事，為人人所感覺。又最小單位為當十或當二十之銅元，尤嫌太大。就上海北平銅元之時價，當十者值銀元三釐以上，（即銀元三百分之一）當二十者值銀元五釐。（即銀元二百分之一）較之舊有制錢為銀元千分之一，所增甚多。于平民生計，影響頗巨。（單位大小，心理上事實上，甚有關係，容別為文論之。）甘末爾氏之幣制，最低單位，為銀元二釐

，亦在當十銅元時值以下。故區區以為制錢即不能恢復，而最小單位必不可在當十銅元時值以上也。

再鄙人于十九年十月間，曾有「規定新貨幣之重量直徑推行度量衡」一文，登載拙作「十三月新歷法

」附錄中，茲摘取大意如下：

甘末爾氏幣制，規定新銀幣一元重二十公分。是二十元重五百公分，等於一市斤。五十元重一千公分，等於一公斤。（以上依甘氏規定為例，如重量增減，但使數目整齊，仍可以為推算之基礎。）錢幣之重量，既可為度量衡標準。長度體積亦同一例。假定銀幣一元之直徑為三分之一公分，等於一市寸，三元等於一公分，十元等於一市尺，三十元等於一公尺，且公升之方邊，等於一公分，則銀幣三元之直徑，即等於公升之方邊。（並將重量直徑注于幣面）簡單明瞭，以為推行及校正度量衡之用，所裨非淺。文長不及備錄。

二一，七，二四。

改革舊戲問題

盧逮會

大公報在前幾天（七月九，十一，十二日）刊登了胡適之先生和張聊止先生討論改良舊劇的兩封信。這十五年前的舊話重提，已經够使我們感慨的了，尤其是在這舊劇復興的時代。

十五年前，正是胡先生剛回國不久，抱着滿腔熱誠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在他寫給張聊止的那封信裡，有兩種主張：一是提倡白話文；一是提倡把舊劇改爲白話劇。他的最大理由，是舊劇不易使人聽懂；所以感動人的力量，遠不如白話劇。而張聊止的復信裏說，聽舊戲不是爲受感動，而是爲欣賞音樂和腔調。在他的信末還說『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將來一定感受莫大痛苦。』他是既反對改良舊劇，又反對白話文；雖然他的復信也是用白話寫的。那兩封信的意思大體就是這樣。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仔細看看這件歷史上的公案，實在有無限的悵惘。

胡先生當時的兩種主張——白話文和白話劇，第一種主張是完全成功了。到現在不但沒有人討論文言白話的問題，而且白話文成了社會上最通用的文體。張聊止所說他

『將來一定感受莫大痛苦』的預言，總算完全沒有應驗。

第二種主張却完全失敗了。到現在不但白話劇沒能通行，舊劇反呈現復興的盛狀。有些名人除大辦共戲劇學校，組織科班來提倡牠之外；還有人自行粉墨登場，以娛軍閥。就是胡先生自己，近年也不免有替梅蘭芳捧場的嫌疑。幾年以來，舊劇簡直走了紅運；在上既有大官們不遺餘力的提倡，一般青年也都以會唱幾句京調爲時髦。無論那個學校的遊藝會，不能缺了這項節目。甚至於有的學校裏，公然聘請伶工或票友教授崑曲和京調。男女學生粉墨登台，大演其『蘇三起解』；插科打諢時，也順便開開院長大人的玩笑。坐在台下的教職員和家長們，反認爲『孺子可教也』而盡力的叫好鼓掌。要不是看清楚自己手裏拿的某學院畢業同樂會節目單幾個字時，總以爲自己是在天橋的戲棚裏了。這是十五年的教育的力量！我曾參與過這樣一次盛會，使我感到內心極深的悲哀，不能不趕快逃出來，跑到豐林茂草間，對着微雨初霽的夕陽，回顧那崇偉的校舍而暗自傷神。使我從此不敢再參加這類的遊藝會。

胡先生主張改良舊劇，使一般人能以聽得懂受感動，以幫助教育的不及。那知道却完全是書生之見，而今の舊劇是挾着牠的一切惡魔力量踏進學校來了。胡先生看着十五年前的舊信，再觀察現在的現象，不知道作什麼感想？

在十五年前的時候，提倡白話文和改良戲劇，兩種運動是同起的，却有不少的人在那兒努力；到了十五年後的今天，結果爲什麼這樣懸殊呢？

我以爲白話文能通行的緣故，是由於牠比較文言容易。寫文章時容易，而看文章的人也容易明了。白話文的表情達意，狀物寫景，都較文言來的方便，所以這個運動很快的就成功了。雖然在這個運動初起時，一般擁護古文的人，痛心疾首的斥罵爲「引車賣漿之言；」但終於擋不住這個新潮流的勢力。

白話劇爲什麼沒能代替了舊劇，而舊劇反到現着興盛的現象？這個我以爲不外以下的原因：（一）中國人對於戲劇的基本觀念就只認爲是一種娛樂的玩意。只要聽起來悅耳，看起來快目就夠了；至於劇本通不通都不在乎，能否感動人那更談不到了。胡先生想把舊劇改良，教牠感動人而補教育的不及，却是過分的期望；出乎中國的基本觀念太高了，結果那能不失望。（二）舊劇演唱比較白話劇的表

演容易。避難就易是人類的恆情，而中國人更甚。白話文所以成功是因爲容易；白話劇的失敗是因爲不容易。舊劇的劇本儘管不通，只要唱的人有嗓子，能唱出種種的腔調，就能受歡迎唱紅了。白話劇既要有好的劇本，又要有好的表演，才能動人；實在不是件容易事情。所以牠在我們這只圖娛樂的人群裏，只索迴避了，決不能和舊劇爭一席之地；除非社會上的基本觀念漸漸改變，以後牠才有掙扎成功的希望。（三）中國社會現在正處在總崩潰的環境裏，人們多是窮奢極頹的只圖享樂。所以這幾年來，反是可供享樂的玩意，無論東洋的也好，西洋的也好，都盡量地吸收。電影，跳舞，溜冰，高爾夫，色色俱全，都是風靡一世。那麼中國固有的，可供娛樂的國粹，爲什麼不應當提倡？於是自中委，名士以至於青年學子，都「趨之若鶩」。

既可以自己消遣，同時也能供別人娛樂，總算利己利人的勾當。這幾年來中國社會對於物質和精神兩方的享樂，總是盡力吸收古今中外的東西；學術道德，差不多可以說是鄙古今中外的一切而不屑爲。舊劇所以復興也只是這潮流裡的一個現象。雖然是在齷齪的戲院裏，佐以嘈雜粗野的音樂，一有名角出台也會有人滿之患。什麼國難嚴重，農村破產，共黨得勢，在坐在戲院裡欣賞舊劇的人們腦子裡

是不成問題的；你還同他們談什麼受感動不受感動嗎。

這是我看過『十五年前舊戲筆墨官司』的一點感想，拉雜寫出，不知道胡先生以爲何如？同時還希望胡先生重

白話與戲劇

余上沅

胡適之把盧逮曾先生的一篇『改革舊戲問題』送給我，並且問我有什麼意見。盧先生說白話文成功了，白話劇不但沒有成功，並且舊戲的勢力還一天一天的擴大。盧先生又舉出三個原因來說明話劇爲什麼沒有能够代替舊戲。我們讀了大公報重刊胡適之張聊止兩先生十五年前的通信和盧先生的文章，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却不知從何說起。現在姑且只就三位先生提到的範圍，概略的說說我個人的意見，希望大家因此繼續往下討論。

(一)廢唱問題 戲劇的情感到了語言文字不够表現的境界，便非抽象化不可，非用歌舞不可，這是很自然的。歌劇的成立，一方面雖是古代宗教歌舞的遺留，一方面也是話劇的演化。歌劇話劇却又各有領域不同，是不可偏廢的，雖然同一材料在兩種形式之下，有時也可以各盡其妙。不過張先生說『四郎探母』非唱坐宮那一大段就不能充分

建起舊劇改良運動的大旗，努力的指出舊劇的缺點而盡力改良，使牠能以有些有利於社會人民的效用。

表現思念母親的情感，這不知是何據而云然。何以見得話劇不能充分表現思念母親的情感？漢姆烈德要替父親報仇的情感，不是在話劇裏充分表現了嗎？現代劇裡的心理分析之精密深刻更不用說了。其實張先生不是賣瓜的說瓜甜，便是對於話劇沒有了解，那是不足爲怪的。胡先生主張廢唱用白，看上去似乎很籠統；歌劇跟話劇河水不犯井水，何必廢掉？我們要知道，胡先生的主要目的是要改良舊戲，廢劇用白只是改良的一格。他要廢掉的是舊戲的唱，因爲它在文字上不是像崑曲那樣艱澀，就是像皮簧那樣粗鄙。他決不是主張不要歌劇，不要唱，在他『改良的積極主張』裏面一定包括了唱。

(二)要唱問題 舊戲到了不能不改良的時候了，這是我們都承認的。唱是可以存在的，歌劇不妨與話劇同時並進。不過這兩種形式不同的戲劇，問題還是只有一個：

叫人怎樣讀了聽了容易懂，怎樣從艱澀的文言變成白話（不是白話文）。李笠翁說，「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崑曲改良到皮簧，從這一方面說，也是進步，因為白話的成分加多了。崑曲失敗了，但是粗鄙的皮簧却代表了舊戲在目前大走「紅運」，也就為此。那末再進一步，用純粹的白話寫歌劇，也一定可以成功。所以與其說改良舊戲要廢唱用白，不如痛痛快快的說另外創製白話歌劇。至於除了文字之外，舊戲在內容，結構，音樂，表演，顏色，線條，光影，各方面，應當怎樣改良，怎樣才可以適用於新的歌劇，將來再另外詳細討論。

（三）用白問題 舊戲的白，與普通話劇的白不同；一個是念白，一個是說話；一個是非現實的，一個是現實的。舊戲只有丑角插科打諢是說話，其餘角色的道白都得一用一種特殊的腔調。李笠翁說，「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這種鏗鏘鏘鏘的賓白，怎樣用純粹的白話去改良，怎樣利用到將來的白話詩劇裡去，那是需要劇本的創造和舞台實驗的，不能空談。不過，我相信，這個念白的技

術，連帶舞台上的表情方法，將來是值得拿新酒裝進去，叫它重新得到生命的。

（四）話劇的失敗 舊戲有它長久的歷史，又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那兒不斷的研究，並且像盧先生所說有大人先生們極力提倡，所以它能夠繼續維持。民主政體沒有堅固的基礎就可以代替專制政體嗎？白話話劇沒有堅固的基礎就可以代替舊戲嗎？娛樂是一般人不可少的要求，找不到新劇的時候只有找舊戲。我們提倡新劇研究新劇的人，應該先責備自己，再責備別人。舊戲雖有它的壞處，但是它唱得動，就是本來不贊成它的人，也禁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引誘；等到被它迷住了，自然就愛而不知其惡，並且也不知其善。我們有好的新歌劇去滿足愛聽唱的觀眾麼？白話話劇一年有幾次公演，幾本出版？習慣是養成的，養成以後，再想改革，就像挽救國運一樣困難。明瞭話劇價值的觀眾，到了要求滿足娛樂欲望的時候，不得已也難免要到舊戲戲園走走，走來走去，許多人就去不復返了，話劇也就扔到腦後了。話劇不能自身站穩，不能和舊戲去爭奪觀眾，這是它失敗的一個大理由。

（五）話劇的需要 李笠翁說，「詞曲一道，只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

着。」胡先生主張廢唱用白，我想他的理由正是爲此。我們雖然不反對歌劇的存在，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話劇是範圍最大，最自由，最能表現情感，尤其是最能發揮理智的形式。現代生活是多麼豐富而且重要的材料；舊戲的程式，能够容納這種材料麼？所以我們對於話劇的需要是非常的迫切。話劇在西洋是認爲合法的，正統的戲劇，日本也追上去了。十五年來，中國什麼事都不長進，話劇因爲歷史短，工作的人少，比較的更不長進。人是懶惰的，舊戲有現成的便宜可撿，說一聲捧場（自然口裏總說是改良），學校可以馬上開門，公演可以馬上上台，雖然受歡迎也並非真正的成功。話劇是剛起頭的，困難多得很，自然是勞而無功。但是，少數的話劇公演，那一次不得到許多人的贊賞，並且希望加多公演的次數？話劇在實際上已經有了需要，這就可以証明了。所以，在理論上說，在實際上說，話劇都是必須提倡的。

（六）提倡的方法 話劇是有了白話文運動以後才起頭的。當時一般新青年，都開口易卜生，閉口蕭伯納。不過空口提倡不能生效，所以便成立了幾件根本工作。大學裏西洋文學系添了戲劇的功課，隨後北平藝專又添辦了戲劇系，近來幾個大學的國文系也添了話劇作法一類的功課

。可惜戲劇系因爲學制和經濟的限制，將來還能否存在，尙不可知。西洋文學系讀戲劇，還無非是多學外國文，教員學生都注重的是語言，不是戲劇的本身。國文系加話劇功課是更新的試驗，成績不是一時看得見的。至於希望政府覺悟，不但對已成的戲劇學校給它確定的，充裕的經費，叫它能够發展，並且參考西洋各國對戲劇的努力，設立劇場，並用種種方法來增進戲劇的研究，那更是白日做夢了。所以，提倡白話話劇的人，一方面應當各就力量所及，努力或鼓勵劇本的製作，一方面更應當注重培植人材。大學校中學校裏在酌設各種戲劇功課，認清教學方法之外，還得鼓勵並用實力幫助學生組織劇團，聘請專員指導。學校以外有正當的職業劇團，大家也應該盡力去扶助。那末，經過幾年的訓練，自然可以希望得到好的結果。不然，空言提倡，空等政府垂注，空望大人先生出面主持，永遠還是個空的。

（附記）我要謝謝余先生代我答覆了盧先生提出的問題。對於余先生此文，我大體贊同；只有第一項「廢唱問題」裏，我要聲明兩點：（一）我不承認余先生說的原理：「戲劇的情感到了語言文字不够表現的境界，便非抽象化不可，非用歌舞不可。」我以爲語言文

字和歌舞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並非是歌舞獨高一級，能表現語言文字不够表現的情感。(二)我至今還主張舊戲的歌舞是歷史的遺蛻，音樂是粗陋的，歌詞是

粗陋的，所表現的情感也是粗陋的。如果中國戲有改良的可能，我還以為應該從廢唱廢武行下手。胡適

漫 游 散 記(七)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太行山以西——太原，平定，昔陽

我同梭爾格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離開井陘，步行向娘子關。我們是完全沿了鐵路線走，經過北谿有谿一直向上。因為路線是順棉水向西的，所以比較的很平；從井陘到娘子關十七公里，不過上高了一百公尺。這大概是鐵路走娘子關而不走固關的原故，因為固關雖是從前走大車的路，却比娘子關要高到一百多公尺，娘子關雖然不高，而從東邊看去，却的確是一個關。棉水到此變成很窄的峽谷，河兩邊都是很陡的石壁，不過石壁不很高，幾丈以上，又變為平台，慢慢的向兩邊的大山高了上去。離娘子關車站不遠，河兩邊有很奇異的水凌石，完全是石灰岩凝結成功的，但是中間有無數的小管子。因為管子的口徑很小，所

以石頭的下部放在水裏，水就能自己從小管子裏上昇。北平，保定人家常常把牠放在花盆裡；石頭上邊只有少許的土就能夠栽着小草或是小花。

二十六日夜間忽然下起大雪來，一直到二十七早上還沒有停。我們於是變更計畫，坐火車先到太原，向官廳接洽調查平定，昔陽一帶煤鐵礦的辦法。我第一次看見閻伯川先生。那時候山西還沒有模範省的名，但是他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太原住了兩天。二十九日騎着馬到西山去調查硫磺礦。礦是在煤層裡面的頁岩，沒有甚麼價值，但是我們跑上了比太原城高四百公尺的山，望得很遠，從太原到介休是一個很大的平原。太原已經到了這個大平原的北頭；再向北就是黃土所成的低山。城東十里，城西二十里，都是四五百公尺高的石山；石山邊上，都是黃土。但是我們看見東山邊上的黃土比西山又多又厚，足見黃土是西北

風吹得來的。

我在太原還得了一個教訓。我十幾歲在日本的時候，就到體育會去學騎馬。教授站在場子中間，拿一根長繩子拴住馬，再拿一根很長的鞭子，把馬打了轉圈子跑，初學的時，馬跑得慢。以後逐漸的加快。等到練習了許多時，馬跑快了也掉不下來，教授就叫你把腳踏去了騎。再等幾天，不但腳踏去了，韉繩也得放下，兩隻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後背，單靠着兩條腿夾住馬背，我起初的時候進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腳踏去了時候，就常常要摔下來。等到把韉繩放下，一兩分鐘之內一定蹣在地下。學來學去，一點進步沒有，一失望就不再學了。到了歐洲，七年不騎馬，從前所學的一點工夫，都忘記了。一直等到要回國來的那一年，爲預備旅行，又到馬術學校去上課。那裡教的法沒有日本的複雜：你騎上馬，教員在旁邊看住。先顛着小走，再顛着大走，再學奔馳。等到奔馳不至于容易摔下來，就教你打着馬跳過一根離地二三尺的木槓。我學的成績和從前一樣，起初學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馳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摔幾交。一到跳木槓子，沒有一回能够騎住！這一次調查完全是步行；只有在岡頭的時候同梭爾格騎過一回馬到北山去。中國馬身段很小比外國馬容易騎得多，

所以我放胆跑。梭爾格也很稱贊我的馬術。從太原到西山去的那一天，閻伯川叫人送了兩匹馬來，說是他衙門裏最快的，特地借給我們騎。兩匹之中有一匹更精神。梭爾格客氣，把牠讓給我騎。那知道剛跨上去，牠就飛奔起來。我趕緊把韉繩勒住，已經沒有用，因爲嚼口被馬啣着，隨你勒牠口不會痛。路上的沖雪結了很滑的冰，我身上搭着一千多塊的儀器，一面怕馬滑倒了，或是我摔了下來，一面怕牠撞傷了人；所以雖然溫度在零度以下十二度，我仍舊是渾身是汗。幸虧牠一直向將軍署的馬房裡奔；到了那裡，就不走了，這纔換了一匹老實點馬，再出城去。我受了這一次的教訓，從此不敢賣弄我的馬術，並且相信，一個人爲天材所限，縱然積極訓練，到了相當的程度以後，很難再向前進一步的。

我們于十一月三十日從太原到陽泉。這是正太鐵路附近煤鐵業的運輸中心點。我們在保晉公司住了八天，把附近的地層次序，煤鐵的價值，調查清楚，然後決定梭爾格擔任測繪鐵路以北的地質圖，東到太行山邊，西到壽陽，北到盂縣。我擔任測繪鐵路以南，東到太行山邊，西到煤系以上的地層，南到昔陽的南境。我于十二月九日離開陽泉，經過義井，南天門到平定。由平定西上冠山，經宋家

莊，鎖簧，谷頭，立壁，東上到浮山。從浮山西南坡下來，經安陽嶺，鋪溝到昔陽。從昔陽南順南河到柴嶺，東南到蒙山，東北到鳳凰山。然後北上風火嶺，到張莊；再經馬房，立壁，西郊，東溝，白羊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陽泉。一共工作了兩星期，我初次在北方過冬，禦寒的衣具本來不完備，而這兩星期中，早上出門的時候，溫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時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見大雪，上蒙山遇見大風——在蒙山頂上十二點的時候，溫度還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做測量地質圖的工作，興趣很好，回想起來，還是苦少樂多。

浮山和蒙山都是昔陽縣境的名山。浮山上面有個大廟，修得很整齊。全山都是火山噴出的岩漿灰土，最上層有浮石，浮在水面不沉，所以叫做浮山。山在昔陽城東北十五公里，高出縣城三百四十公尺。山雖不高，四面却望得很遠。蒙山則是完全石灰岩所成，是太行山裡的一個高峯。在昔陽城東南八公里，高出縣城五百公尺。從這兩個山測量，太行山西坡的地形和地質很容易明白。太行山全部雖是一條南北的山脈，山脈裡的長嶺却多是從北向南向西偏南的方向。浮山本身就是這種長嶺之一；從浮山向北偏

東延長，到固關中斷。從浮山向南，先看見的是建都河的峽谷，再過去就是蒙山的長嶺，方向也和浮山一樣。蒙山的東坡和南坡是鳳居河的峽谷。建都，鳳居這兩條河在蒙山的東北會合向東，穿過太行山到平原，就是舊圖上所謂沾水，在河北省平山縣城北入滹沱河。鳳居河以東，可以從蒙山看得見的還有兩條長嶺：一條叫鴉兒山，離蒙山不過十公里，高也與蒙山差不多；一條是文山；都與鳳居河平行，從東偏北向西偏南。文山在蒙山東南三十公里，高度至少在蒙山以上四五百公尺，出海面大約在二千公尺左右；是太行山裏有數的高峯。

浮山和蒙山都到了太行的西邊，但是距低地還有三公里至六公里。這一邊的坡度很小，所以從西向東，路並十分難走。坡脚就是出鐵礦的岩石。再向西是一條南北的低地。從平定以北的義井起，到昔陽以南的柴嶺止，長約四十餘公里，寬約七八公里。在昔陽以北最寬。向南到柴嶺，漸漸的變為南河的狹谷。所有重要的村落，城市和煤礦都在這低地之中。低地的面上大部分是黃土。因為有許多河溝，所以並不是個平原。不過河溝不深；嶺與谷的高度，相差最多不過幾十公尺。

從平定——昔陽的低地向西，是一個黃紅砂石的高原。

平均比低地高出二百公尺左右。高原上的山嶺，都是比較硬一點的石層所成。從東望去，大部分都是接連的長巖，與太行山裏有石灰岩高峯的長嶺完全不同。這種長巖全是自南向北。從浮山和蒙山所望得見最遠的一條，在低地中心以西十五六公里，高出低地四五百公尺，大概就是高原最高的部分。高原與低地的分界是一條極其彎曲的南北線，和太行與低地的界線大不相同。因為高原的西坡，有許多河溝，向東流入低地；兩條河溝之間，高原地伸一條東西長嶺插入低地；在平定西南，南川河北岸的是冠山，南川河南，馬房河北的是石鐘山，馬房河和北河之間的是藥嶺和風火嶺。高原上面，樹木極少，土地極瘠，差不多沒有甚麼大的村落。只有與低地接觸的東坡上，有很厚的黃土，被我們農民經營了幾千年，造成功一級一級的平台，可以耕種。

山西的鄉下人不但靠黃土吃飯，而且可以利用牠住房子。黃土是風吹來的，裏面沒有層次。被水沖開，往往成功陡壁。從這種陡壁邊上，向裏面挖一洞子。只要頂上挖成半圓形，如橋孔一樣，不用一根樑或是柱子，不會倒塌。洞口可以安上門，門旁邊還可以開窗子。黃土是不很傳熱的，所以屋子裏是冬暖夏涼。這種土洞子，在河南，山

西，陝西，甘肅黃土厚的地方，是很普遍的。通常叫做「密」——武家坡上薛仁貴所回的密，一定是指這種黃土洞子。北京的戲子不懶得，進密的時候灣着腰，裝着向地底下走的樣子，就把牠變成功煤密的密了。密也並不是一定是窮人住的。我從平定上了冠山下來，住在宋家莊的地保家裏，就是這種密。裡面牆壁刷得很乾淨，很大的一個暖炕，屋外空氣的溫度，在零度以下八度，屋裏只有零度以上十二度。炕旁邊放着一對磁縣來的大青花瓶——這是北方鄉下稍有資產的人結婚的時候必需的東西；瓶與平同聲；取牠平安的意思。住這種密的人，最怕的是地震：因為黃土是鬆的，一徑地震，整個兒會得塌下來。民國十三年甘肅大地震，死去的幾十萬人，大部分是葬在黃土密裏的。

太行山裏的水道很值得令人注意。中國的傳統地理學都把山脈當做大水的分水嶺。太行山就可以證明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唐河發源于渾源，經過倒馬關到唐縣；滹沱河發源于繁峙，經過榆棗關，臥石口到平山；漳河兩源，一發源于昔陽，一發源于榆社，出了太行，纔合流到磁縣。這幾條大水，都從山西穿過太行，流到河北。不但大水如此，就是小水，許多也是如此。在我所調查的區域以內，

有兩條比較大點的水：一是棉水，發源于壽陽，經過娘子關到井陘；一是沾水，發源于昔陽，經過楊莊口到平山；也都是穿過太行。從浮山和蒙山向西看，就知道這兩水支流的複雜。平定昔陽是一個南北的低地，而且南高于北；西面一個高原，東面一條太行山。我們以為最天然的水流，應該是一條從南向北流的水，吸受東西高處的支流。那知事實上完全不然。所有這區域內的水，除去昔陽城南的南河之外，都發源于高原，從西向東，橫穿過平定昔陽間的低地，直入太行山裏，成功峽谷。最奇怪的是在平定以南的棉水的兩條支流，南川河和馬房河，都不從很鬆的黃土地流入棉水正流，却都向東流入太行西坡邊上，在石岩上面，沖開一條南北的淺谷。可見得這些水道都與現在的地形有點衝突。研究這種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學上極有興味的問題。

我們把太行山的東坡和西坡比較，就知道因為地形構造不同，發生了極重要經濟的結果。太行山全體平均的高

度不過一千一二百公尺，比西邊的低地高不了四百公尺；所有煤層都保存在這低地中間。而且低地西面是個高原，地層很平，下面仍然有許多煤可採，煤層露在地面的區域，沿正太路是東西的：從榆次起，經過壽陽到陽泉，延長八十多公里；緊靠太行山西坡是南北的：從孟縣起，經過平定，昔陽，和順，遼縣，到襄垣的南部，延長二百多公里；煤層既多且厚，是全國最大的煤田。東坡逼近平原；獲鹿縣出海面一百二十七公尺，比太行山平均要低九百公尺，所以從東向西坡度很陡。除去陷在半坡的井陘，河北省中部，沒有煤田。直要到高邑，內邱纔有臨城煤田，又與河南的武安煤田不相連接。武安煤田因為種種關係，煤質煤量都不甚佳。南部的磁縣，安陽是河北，河南最好的煤礦，但是逼近平原，南北長而東西狹，煤量因之減少。不能與太行以西的煤田相比。一座太行山把牠以西的大煤田和用煤多的華北平原隔斷了，可算是中國地理上最不幸的事實。

獨立評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了日本，是否可以免去些災禍，那也只有天知道。不過日本人的這種心理，我們是應該了解的，然後我們方能籌一有效的政策。

其實荒木太恭維中國政府了。國民黨執政以來，在外交上有何政策可言？即使名目上有些外交口號事實，亦不如荒木所說的什麼遠交近攻。國民黨根本的立場，是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剩下一個蘇俄，還要與他絕交。日本所指為專靠歐美的政策，是九一八以後的策略；這個臨渴掘井的辦法又是日本逼出來的。它的效驗現在已經可以看出很顯然的趨勢了。

就日本的立場說，那共存共榮的口號要是有誠實的意義的話是很可以號招亞洲民族的。然而在日本心目中口號只是口號，日本所企圖的仍是一個獨存獨榮，成吉思汗式的大日本帝國。荒木的議論可以說把他們的這個主義又露骨的表现了一次。

要是日本可以令人親善，中國絕無獨厚歐美的道理。這不但是說『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只就自保的本能說也自然要走這條道路。

然而日本與中國相交，所採的手段，與所叫的口號，處處矛盾，結果就令人感覺到，要是中國有絲毫羞惡之心

的話，就不能認那共存共榮的口號有任何意義。現在姑且舉一個小小例子作証。好些年前，有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告訴我，日本的蠶桑學校收取中國學生，照例是收那投攷成績最壞的。愈考得好愈沒有機會進去。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我最初就不信它有存在的可能。現在我知道這話是對的了，並且是一個一貫的政策。試看以日本法學博士懸格之高，趙欣伯就能得到，其餘的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也有好些有學問的人得了日本學位，這種例外却只能證明那例的存在）。

日本現在在國際宣傳百說不厭的就是中國軍閥如何不能理治中國。從宣傳的技術說，這總算是得意之筆。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固然是中國人的不爭氣，大部份尙是日本參謀部的貢獻。要是沒有日本唱背後戲，好些中國軍閥根本上就不會產生及存在。

然而無論招致中國現狀的原因在那裏，領袖中國政治的先生們，應該知道他們這副擔子是不能輕易卸下去的。固然改造中國是一件極艱難困苦的事業，有平常人所看不見的阻碍，想不到的波折，料不到的危險。但這只是從事革命政治的人所豫期的。

過去的錯誤，是在忽略了自己所處的真正地位，沒有

想到一個成熟的外交政策。現在的危險不是字面的理論能遮蓋，也不是夢想的安慰所能免去的。好多人似乎尚迷信着兩個可能的進展可以減輕現在的危險：（一）以爲日本的經濟恐慌，要逼着它變轉現在所取的策略，或（二）日本的跋扈，若不略爲制止，將危害到歐美的經濟利益，歐美不能再忍耐下去。但事實上，這兩種進展，亦只能增加中國現在的危險。日本的經濟壓迫將更使日本的軍閥走絕路，毀壞中國的一切，與中國兩敗俱喪。感情頭上人是不講理的。日本軍人尤爲如此。至於能干涉這個局面的列強，縱有這個意思，也要等到中國沉淪到十八層地獄的煤窖底下，才肯着手。這不但是各國自謀當然如此，下手太早，又怕中國忘恩也。

爲張學良進一言

叔永

自八月六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發了辭職通電，要求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先生同時辭職以來，本來在驚濤駭浪中的中國時局，立刻加上了一層不安與恐懼。不安的是華北或將起一次無謂的紛擾，恐懼的是虎視眈眈，伺罅而動的強寇，更得到一個進攻的機會。猶幸近兩星期以來，南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所處的危險，只有自己來毅然決然的接受才能有一個轉變的方向。我們不自已關開新局面，別人更不能，我們自己不下決心，別人尤其不能替我們下決心。

現在的難關，絕不是在政策的選擇，因爲我們已經失去選擇的自由了。不停止內爭，還有什麼第二個辦法？不抵抗還有什麼可以代替的政策？

現在的難關也不是在沒有力量，是在力量沒有集中。不是在沒有政策，是在沒有決心執行任何政策。要是有決心的話，廢止內戰，抵抗到底，與俄復交，都可闢出新局面來。

北要人們奔走呼號的結果，這不可終日的局面，似乎得到了一部分的解決。那就是說：中央的政局，因爲汪精衛先生的不願復職，和行政院長繼任人選的困難，暫時仍由汪先生暫維院務。北方的局面，却裁去了一個綏靖公署，添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北方分會。但因蔣委員長一時不能北來

，結果或仍由張學良先生以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代蔣委員長主持一切。（見天津大公報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專電）所以這兩個星期，一場大風波的結果，恰恰和兩星期以前，風波未起的時候一樣，重要情形絲毫沒有變更，不過平白地苦了南方的元老們，北方軍界要人們，飛機火車，東奔西跑，談話聽訓，忙了個不亦樂乎？

這十幾天以來，因為中央無人負責，北方忙着『挽留』『交卸』，國事上受了若干損失，我們暫且不去管他。我們若是在這十幾天的擾攘中間，要勉強的尋出一個較為有意義的，較為可樂視的歸宿點，那嗎，我們可以說我們發見了，中央與地方，不但沒有意見的不同，而且政策原來是一致的。我們細讀汪先生致張先生的電報，雖然有強烈的刺激性，但他口口聲聲，只是責備張先生不該『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萬里土地陷於敵手』。又說『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的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這種希望張先生實行抵抗的心，不是昭然若揭嗎？反過來，我們看張先生答覆汪先生的話。他說：『自九一八以還，余雖公開辭職，屢蒙不准，私人表示辭職，亦非一次。余

不決然引去者，總想將此公案作一結束。否則東北由我失去，而不能由我收還，總覺余之責任仍為未盡，良心不安』。他那一種忍辱負重，力謀抵抗的心，不又是昭然若揭嗎？雖以標榜抵抗的中央，遇着誓死收復失地的邊將，宜若可以如魚得水，相得益彰，收身使指臂之效，成千載一時之功。但事實上却適得其反，這不是有一個大大的原故，值得張先生想一想嗎？

這個原故是甚麼？在以己度人的小人，或善於挑撥離間的政客們，自然要說，這是汪精衛借公報私，吐一吐前年的被驅的仇氣。這個話我們以為不對。這在兩個月以前，江先生等北來接洽，及在政變發生前，江先生與張先生往來的電報，可以證明的。那嗎，是因為張先生要的五百萬三百萬，數目太大，使汪先生無法應付，故不得不出於絕裂的一途嗎？我們以為這個話也不對。抵抗強日，本來是要用錢的事體。若是實行抵抗起來，一切充實軍備，運輸給養，我們以為三百萬五百萬未必就够。中央既然決心抵抗，當然必須竭力籌畫，所以我說這也不成問題。我們以為這個問題的中心，乃是張先生的本身，是不是能得到全國人的信任——信任他有收復失地，了結東北一樁公案的能力與決心。我們當然不說，今日的國中，沒有信任張先

生的人，例如北方將領，表示留張的，都可以說是信任張先生的有力人物。不過如中央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因爲張先生要錢而不抵抗，發出辭職的電報，就是不表示信任的一個。他的根據，是已往不抵抗的事實，這個根據，只有將來的事實可以打消，空言辯護是無用的。

我們說到信任一層，似乎近於避實際而就空論，其實，這一層也不容漠視，古今來成大事業的人，那一個不是要先得國人的信任的？所以我們若是不揣冒昧，要替張先生打算一個光明的出路，第一便是恢復他在國民心目中的信任。國民心中的信任恢復了，自然做事有人支持，再不

怕反對派或仇家的防害與詆毀。恢復信任的方法，看似艱

難，其實也很簡單。我們現在不妨舉一個例。汪先生的電報，責備張先生『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這一句話是汪先生電報的骨幹，也切實關係張先生的人格，張先生要用空言來辯護，是無法可以證明的。不過張先生此時若能做一個毀家紓難的義舉，自己拿出三五百萬來做抗日的軍費，那呵，一切『聚斂』，『要挾』，『搜括』，等等惡名，均不攻自破，而國人對於張先生的人格與決心，也最仰不及了。這是我們的一點芻蕘之見，不知張先生以爲何如？

二十一，八，二十二

討 論

(一) 讀了「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以後

汪振儒

讀了汪君的文章，很使我佩服他的批評與卓識。汪君文中主要的意思是說，中國生物學界的現狀是太注重了分類及形體的研究，忽略了實驗生物學方面的工作，而後者却正是現代潮流所趨，并且對於實際的應用上更爲切要，

所以中國現在頗有應當努力提倡實驗生物學的需要。汪君的提議是十分合理的，我個人頗表同意。不過有幾點我以爲稍嫌籠統，恐怕使人認識不清（對我自己是如此），所以想再加剖析一下，說出我個人的一點意思。

汪君說「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就這一點說，汪君之以爲「太偏重」者，在我個人的眼光看來，覺得非但未會「太偏」而還覺得不足。我們試就這方面所發表的論文來看：就形態學方面說，在動物方面似乎有了不少的論文，（我個人沒有統計，所以不能下肯定的斷語）就其所發表的大多數成績看，以我個人所知，無論在量上或質上，若與歐美第二三流的論文比，怕還嫌不夠。大多數的研究全是初步的試作。所以關於這方面研究的注意似還嫌不足，正應努力提倡，加緊訓練，以求不致去歐美的學術界太遠。若說太偏重的話，似乎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未免太樂觀了。這只是說的動物方面，在植物方面，則形態學的研究，更如鳳毛麟角，少的可憐，簡直可以不用與歐美比較了。若說提倡尙可，至於「太偏重」則似還提不到。

在分類學方面，在我國可以說是一點還沒有作研究。這句似與汪君所說的矛盾太甚，因爲依汪君的意思，在中國太偏重了形態與分類的研究空氣下，就「國內生物學家所發表的研究報告看來，是研究分類學的比研究形態學的多。」不過我們若翻開汪君所指的分類研究報告的論文來看，僅是些生物調查的報告，如某地植物或動物誌，中國

產某科或某屬或某類的植物誌，或動物誌，以及動植物的新種報告等等，全是屬於這一類調查報告的性質，實在沒有一篇是真正屬於分類研究的。真正的分類學的研究是要尋出生物間的血統關係，推求其天演的過程，這需要精深的形態與生理上研究的根據的，絕不是將一個植物或動物的名稱規定就算成功完事，我國目下的生物學界中對於這種研究，似未曾注意，所以也說不到太偏重了。

若汪君所指的分類研究的含義，與我所說的不同，而假使我不曾誤會汪君的意思，則汪君似乎應當說，中國現在生物學界的精力是大部分全集中在生物的調查上，因爲據我所知，中國大多數的生物學研究的機關，如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天然博物院植物研究所，南京的生物研究所，自然歷史博物院，廈門的海洋生物學暑假講習會（汪君稱爲夏令會）等，他們的宗旨，全是以爲研究中國的生物學，應先從調查入手，所以他們全都忙著生物的調查。這種主張是否是對，是另外的一個問題，容另討論，而現在的事實似乎是中國生物學界大部分的精力與注意是集中在生物的調查上。依我個人的意思，覺得這個結論還不十分錯誤。

若我對汪君所謂分類的含義揣測得不錯，就是說是指

這種生物的調查工作而言，則汪君所說的「今日幾乎將所有的人力財力完全注入分類和形態方面，實是一種眼光短淺的策略，這種策略似乎是一種不自知的發展，定於幾個人底研究興趣的偏向」，似乎尚有可商酌的餘地。我們應當問一問生物的調查在中國的現在是否重要的問題。生物調查工作乃是指登記一處地方或全國或全世界的「生物居民」的戶口，與紀錄他們在自然中生活的狀況等等而言，也就是汪君所說的「分類的總賬簿。」這種工作大概為每個生物學家所不能漠視的。無論是作形體分類研究的也好，是作生理實驗研究的也好，全不能不注意這種工作。不過範圍有廣有狹，程度有深有淺而已。中國現在之如此集中在這方面，實在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基礎太差。無論作何方面研究的生物學家遇到實際的問題時，似全感覺到這方面智識的缺陷，所以才努力於這方面。這似乎是一種實際需要的自然趨勢，與提倡研究人的興趣似不十分有關係。在這一點上，我不十分與汪君同意。

在批評中國現在生物學界的病象中，汪君曾提到歐美國家對於生物學研究的趨勢，來說明實驗方法對於生物學的日見重要。這話是對的，旁人也會如此主張，我自己也如此相信，就在平常讀生物學的論文時，也覺得以實驗為

題材的研究加多。不過這全是一種直覺主觀的印象，沒有什麼十分可依附的根據。因為要求明瞭實際現在世界上的生物學家是費了多少精力去作實驗的研究，有多少精力是費在分類與形體的研究，於是便作了以下很粗的一個統計：

我先在一九二七的生物學論文提要 (Biological Abstracts) 上，計算那一年中所發表各種論文的數目 (以一項 (entry) 作一篇計) 其所得結果如下：

| | |
|-----------------|-------|
| 植物生理，生物化學，生物物理 | 二六六篇 |
| 植物分類 | 九四一篇 |
| 植物形體(僅包括有維管束植物) | 一二八篇 |
| 動物生理 | 二二五八篇 |
| 動物分類 | 三三一二篇 |
| 動物形體(解剖組織) | 三一二篇 |
| 動物發生學 | 一九九篇 |

又據魏氏關於一九三〇年世界上所發表植物研究論文的統計(註)，錄其各種論文的數目及佔全年論文中的百分數如下：

| | |
|------|-----------------|
| 植物生理 | 一五〇七篇 (百分之二〇·九) |
|------|-----------------|

分類地理分佈及名稱……………二四一五篇 (百分之三·五)

形體與解剖……………二六八篇 (百分之三·七)

我又據一九三〇年卷的生物學論文提要統計那一年中各種動物學研究論文的數目如下：

動物生理……………五三三六篇
動物分類……………五六六四篇
解剖，組織學……………八八六篇
發生學……………七〇〇篇

以上的統計雖不十分精密，已可以約略看出現在世界生物學界中工作分配大概的狀況，生理研究方面確有點增進的現象，不過分類及形體的研究也還有相當的工作，若說是「分類學則大見衰頹。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嘆」似乎也不十分普遍地合乎事實。個人不會到歐美觀察過，不十分清楚他們工作的情形，不過若依上面的統計看來，生理方面研究固然是增加得很多，然在形體分類方面，雖然成分或者增加得較少，也不是沒有增加，所以以外的生物學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也還是努力不息，未加十分的輕視，至少還能佔個與生理研究「分庭抗禮」的地位。這一點是我對於汪君的意見的補充。

看了以上的話，或者有人會想到我是反對提倡實驗生物學的研究的。果真如此，那真是一個不幸的誤會。我上面的文字，只是想說明汪君觀察不十分合乎事實的幾點，對於汪君所主張的應提倡實驗的生物學還沒說到。以下我便乘機來表示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實驗生物研究的重要已由汪君所說，無論在理論上或應用上全是應該提倡的，其理由已由汪君說明的很詳細確切，此處可以不必多贅。不過我個人覺得，一門學問有種種方面的研究，其所以分爲許多項目去研究的緣故，不外是求對於人的便利。因爲自然界的現象太複雜，不如此分工，實難收效。在生物界也是如此，所以對於生物或生命的現象，因爲便利起見，也分工去探討。不過我們知道生物或生命現象却是一個整的

，是不可分的，要解決生物或生命的問題，無論在理論或實用上，全非從各方面一齊探討不可，決不是那一方面所能單獨解決的，所以各面的研究，只要有關於生物或生命現象的，全都重要，不應歧視。而且事實往往是這樣，有一方面若進步得太快，與其他方面的程度相差太遠，當其與他方面失人聯絡時，也每會就停止下來，須等有關係的方面進步到與他程度相似的地位，方能再繼續進步，換而言之，若一方面進步得太慢，也會連累得他方面不能進步

，因之便每感覺到這種研究的重要，而促成其特別的進步。總之，各方面的研究是要保持平衡的，其間是含有聯絡的。我們應當整個地以生物或生命現象作對象來提倡生物學的研究。所研究的在那一方面却似乎可以不必計較。假若論文的數目能代表一項研究的進步或退步，則由前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歐美的生物學研究是平均發展的，其間進步速率雖略有不同，然却是全線一致地向前進展。所以我的意思是，形態及分類固然要人研究，就是生理實驗也不應漠視。反之，生理實驗因近代情勢所趨，固日形重要，而形態分類的研究也未見得就可一筆抹殺。

中國學術界的落後是現在的一個普遍現象，生物學也不能說是例外。若是以中國的地域以及所須解決的問題作比例來講，對於生物學的研究現在所用的財力同人力實是太少了。因為工作範圍是如此大，而所有的人力和財力是如此少，以致研究的努力不得不限於一個很有限的範圍，而難於求普遍的發展，這實在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所產生的一個自然的結果。若想求我國生物學研究普遍地發展，則非得增加財力與人力不可。若說是現在的中國生物學界的情形，在研究上已有了畸形的發展，我個人以為多少

是有點觀察錯誤。就中國的全生物學界的研究說，雖已有十幾年以至於廿年的歷史，其實只是才萌芽，實在還談不到發達二字。若驟然推斷其已有了畸形，「偏枯病象」的發展，似嫌稍早。若要真說是有偏枯的病象，則其例當舉不勝舉。決不止大體上，就分爲形態分類的研究被偏重，而實驗生理的研究被忽視兩項所能包括的。舉個例說，現時所著手的動物調查方面，在脊椎動物方面，依研究範圍大小的比例說，則人才及財力似乎用得有一點；而在與農作物以及人生有關係的昆蟲方面，則在比例上似還應大大的增加人力和財力。這豈不也可說是一個偏枯的現象嗎？就植物方面說，現在調查研究的注意，似多集中在高等種子植物上，至於有關植物病害的菌類，或其他較下等的植物，則很少注意到。無論在純學理的研究或應用研究上說，這豈不也可算是偏重的發展嗎？所以說現在中國生物學界的現象，并不是那一項研究已發達，已被偏重的問題，而是全生物學界的工作人員及經濟不充分的問題。若工作人員增多，財力也擴充，則研究的範圍也自然向普遍發展，而其進步也自會突飛猛進。好比是成立工廠，若資本不厚工人不多，則那工廠絕不能有大批生產，來供給市場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中國的生物學家認清此點而作普遍的

努力，一方面努力普及生物學的智識，使國人普遍地認識其重要，庶可容易得到財力的補助，一方面要努力提倡生物學的研究，促起多數人的興趣，收入這集團來作生力軍。總之，中國現在的生物學，還太落後，中國的生物學家或提倡生物學的人，應以促進生物學的全線進步作目標來鼓舞提倡，而千萬不可存了門戶之見，限於小範圍的發展

二十一年，八月十日，於清華。

註：此統計採自

Wellensiek, B. — Statistical Data Regarding the

Botanical Literature of 1930,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見於 Recueil des travaux botanique

néerlandais, 28:281-296.

(二) 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胡先驕

汪敬熙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十二號『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文中以爲『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中最惹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太偏重分類學和形態學』；以爲如果照現在這樣的做下去，不但是難於追上歐美生物學的進步，而且甚難使生物學和民生經濟發生關係。汪君在北平科學界頗負時望，雖爲心理學家，對於生物學亦有相當之深造。其立論如此，不能不與之爲詳切之討論。

在學術落後之中國，幾可云無一種科學不重要；苟有適當之人才，即須設法使其所治之學發榮滋長；而不可以局外人之眼光，輕爲論列，孰爲首要，孰爲次要，孰宜獎

勵，孰須節制。蓋在今日之中國無論何種科學皆感人力與財力之缺乏，雖急起直追，猶不能追蹤歐美也。尤不可以功利主義以繩科學；中國之無科學，純爲數千年來功利主義與玄學所賜，汪君乃科學家，寧不知之？苟格於此兩種見解，則晚近十五年中國提倡之科學研究泰半可以中輟，如天文學海洋學古生物學人種學考古學語言學等等，與民生經濟有何關係？而所以不惜以人力財力提倡之者，無亦因其有適當之人才，即設法使其所治之學發榮滋長乎？

汪君謂在中國現在生物學界提倡分類學與形態學，『是恰恰與世界生物學界近四十年的趨勢相反』。今且就提

倡分類學而論，汪君亦知此爲在中國不可避免之途徑乎？

嘗謂中國生物學不能發達之原因有三：（一）研究理化者

輕視生物學。以爲治生物學不須繁雜精微之儀器，不須高

深之數學，隨時隨地採集壓製若干標本安一學名便爲分類

學，以切片機將動植物組織切成若干薄片，染以色料，繪

圖描寫，便爲形態學，不若電子，量子，放射舍屬，原素

改變，彎曲空間等學說之神奇，故不足貴。（二）生物學

Biology 一名詞之貽害。考生物學一名詞，不過以動植物

兩大系同爲生物，而以此名詞概括之，便於作概括之講說

。實則在歐美大學自來動植物學即係分立，與物理化學等

。此兩種龐大奧曠之科學，決非物理學或化學中之某分門

科學，如光學，電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可比。在中國

不但不治科學者常識不充，即科學家對於他人所治之科學

，亦無深切之認識，且因在學校各爲其本系爭預算計，遂

利用此生物學一名詞使動植物兩大科學，不能得適當之發

展。全國大學中動植物兩學科類皆併於生物學一系之中，

前作者與秉農山先生在東南大學，排萬難始得分立之動植

物兩學系，今在中央大學又歸併矣。至於國內有數之動植

物學研究機關，除中山大學之農林植物研究所外，此兩學

科皆係合治於一生物研究所之內者。實則在外國多屬分立

，略加調查即可知也。（三）研究分類學之困難。此尤爲

中等學校生物學課程不良之主因。蓋物理化學等學科係具

普遍性者，朝習之於外國，夕即可施教於本國不必須有專

門高深之研究也。至於分類學，則雖在外國學校修習，而

以種類不同，回國後非重起爐竈，加以研究不可。國內無

一本中國植物誌，以外刊布之書報，無論私人與學校均不

易購置，又無標本室可供比較鑑定之用，則其施教也，以

實地考察爲畏途，但就書本敷衍而已。分類學既被視爲畏

途，則生物學其他各門亦受連帶之影響而不能發達，此理

之所必然也。

中國地大物博，號爲天府，而農業爲中國立國之基礎

，此盡人所能言者也。惟其如是，則分類學在中國最爲重

要。吾人僉知森林事業之重要矣，而中國治森林學者雖多

，認識中國樹木者，就曾留學外國者而言，不過五六人，

其他則皆此五六人之學生也。吾人知菌病與昆蟲爲害於農

業者大矣，而對於病菌與昆蟲分類學之研究，較之植物分

類學（指種子植物而言），尤瞠乎其後。夫病內分類學不

發達，植物病理學爲空言；昆蟲分類學不發達，經濟昆蟲

學爲妄作；不知樹木分類學，而侈言造林，無怪中央與地

方政府年糜巨款而僅知種洋槐與馬尾松也！治工程學者，

不可不知木材性質與其產地，及其出產量之多寡。而欲作木材力學試驗，必須先知樹木之種類，對於其他森林利用學亦莫不皆然。而中國樹木學尚無詳盡之研究，無怪中國工程師幾於一律不用自國產之木材，而必購洋木；蓋洋木之物理性質，早經歐美科學家為詳盡之研究也。中國木材在工程上之需要不知，則造林亦惟有暗中摸索而已。至於中國園藝植物種類之豐富，在溫帶世無其匹，致中國有花之極樂園之稱。而中國最著稱於世之三百種杜鵑花三百種之報春花（*Prinrose*），在中國各處皆無栽種之者。

而中國最美麗而又最普通之藏報春（*Prinula Sinensis*）北平花園中所栽培者，種子且須來自外國！他如經濟動物學，如海產動物，有益與有害之鳥獸之調查，莫不以分類學為基礎。何可言治分類學與民生經濟難發生關係乎？

就分類學之本身立論，斯學為生物學之鼻祖。神農嘗百草之神話無論矣。孔子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之詔告，可謂為吾國分類學之萌芽；在歐西則亞里士多德奠斯學之基礎，相沿二千餘年，至今迄未衰落。在歐洲各國，斯學發達為期過久，全歐之動植物殆已調查罄盡；然尚糜無量之金錢，研究世界他處之動植物。就植物學而論，歐洲各國，

未有無一大規模之植物園與植物博物院者。以英倫三島而論，邱皇家植物園久推世界第一，有蜡葉標本四百萬張，為世界植物分類學之麥加。此外尚有英大博物院，與愛丁堡皇家植物園，皆規模宏大；再則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植物標本室，亦甚重要。而其屬地之植物分類學機關尤夥，雖以香港彈丸之地，尚有一植物園；其歷年搜集之標本，甚為豐富，今雖無專家主持其事，然適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之外府。且其屬地各植物園，皆隸屬於邱皇家植物園一行政系統之下，初不嫌其過多也。至於研究所及，就邱園一處而論，則各屬地皆編有植物誌，此外如邱園植物目錄，倫敦植物園目錄，邱園彙報，虎克植物圖譜，各重要刊物不下十餘種。其他分類學機關之刊物，當不計焉。

至於法國則巴黎博物院外，各大學各學會多研究分類學，近方極力研究安南與馬達加斯加之植物分類，本國及其屬地之植物園，為數亦不少。然在法國現在，分類學之研究，尚稱落後者也。在德國則植物分類之研究最為努力，柏林植物園以研究世界植物為宗旨。恩格勒主纂之世界植物誌為治斯學之鴻寶，其主纂之植物誌科亦然。至於柏林植物園雜誌，植物新種誌，植物分類學與植物地理學年報，各大刊物皆此機關所編纂，其他分類學刊物尤不勝枚舉。

即在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諸國，植物園與植物標本室皆一國有數處，其分類學刊物亦一國有數種。蘇俄最尚功利主義，而除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大植物園外，其他研究分類學機關亦有數十處之多。以美國而論紐約植物園規模最大。哈佛大學之格雷植物標本室歷史最久，且另有阿諾德森林植物園以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爲知名。而其華京國立博物院之植物標本室規模亦大。此外尚有密蘇里植物園，摩敦木本植物園，加州亦有建大規模植物園，而著名各大學多有植物標本室。即以日本而論東京小石川植物園最爲著稱。西京大學植物標本室在彼邦亦甚著名。植物分類學雜誌有三種之多，而臺灣植物圖誌，朝鮮森林植物圖編，北海道植物圖譜，皆爲偉大之刊物，而爲政府主持編纂者也。

反而觀諸吾國，一萬五千種之顯花植物，皆外人所發現，然即此前人已經發現者，雖費五十年之努力，未必能完全採得。以三五分類學者排萬難之奮鬥，至今日始有少量之圖書與標本可獨研究而有新貢獻。汪君所舉數研究所之經費，遠不及他國一大機關之百分之幾。以人材論柏林植物園一處有專家二十餘人，合吾國全國之分類學家尙不及此數。至今不但無全國植物誌，即一省之植物誌，亦無

一冊。而編纂植物誌之困難，又非內行人不知。北方植物號稱稀少，然編河北省植物誌已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舉。且必須赴國外標本室比較其模式標本，方不致魯魚亥豕，以訛傳訛，貽誤後人。抑外國專家鑑定之標本，尙不可恃，某大植物學家，以研究馬來植物，爲世所宗仰。而其鑑定中國植物，錯誤每至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國興辦之植物園只有廣州一處。外國每來函購買種子，皆無法以應之。試問爲中國植物學與農林園藝各學科，及中小學教師之指導及學術通俗化計，植物誌是否須編纂？是否中國之植物，始終須仗外人研究？今以三數分類學家之努力，外人漸覺中國植物可任中國人自行研究。然國內智識階級，已有人非議研究分類學機關過多，經費過多，爲一種偏枯的病象，何中國學者眼光如此其短，常識如此其缺乏也！

至於中國之隱花植物，只有蕨類植物，中國有一專家，曾爲極詳盡之研究外，其餘各支，皆茫無畔岸，較顯花植物之研究，落後最少五十年。而菌類之研究，關係於民生者最大，無論何大國，至少皆有二三十專家。在中國則能爲菌學研究者，不過二三人，圖書之簡陋，尤無論矣。至於關於藻類植物，在中國學業成就者只有一人。治苔蘚

學者則無人焉。

至於中國動物分類學之研究，又較植物分類學落後，而程功亦倍難。今日中國人研究鳥類學者只有二人，研究昆蟲學者四五人，研究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者無人，研究兩棲類者二三人，研究甲殼動物者二人，研究原蟲學者二人，研究昆蟲學者雖有十餘人，然此龐大之學科，雖三專家不能了之。故欲編纂中國動物誌，即使不包括昆蟲內，即以五十年之長期亦莫辦。反而觀之歐美各國，專濟濟，博物院林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規模之宏大，人皆知，無庸贅述。印度為英之屬邦，而其動物誌已刊布。在中國今日研究動物分類者，只有三機關，而無有充分之人力財力可組織一博物院者。此非偏枯之病象

汪君謂分類學家「非生物死了製成標本之後是不發生死的興趣的」，「分類學家所得的結果，只是一本分項生物總賬」。汪君為堂堂國立大學有名之科學教授，何以下斷語如此！余若對汪君有敵對之態度，則將如赫胥黎：「上帝！汝亦入吾掌中矣！」分類學家未有不喜在採集與觀察動植物在自然環境中生活狀況者，亦即未喜研究生態學者。外國著名之生物學家盡人皆推達爾

文，赫胥黎，與虎克，此三人者對於分類學皆有極大之貢獻，而皆行萬里路，實際觀察動植物之生態者也。汪君苟

曾將此三人之傳記讀過，則必不作此淺薄粗疏之論。達爾文之天演學說，亦即其研究分類學與分布學之結果。生物學理論上的問題，孰有過於天演論者？然分類學家未有不喜研究天演學說而追尋動植物之親緣血統者。若分類學僅為一本分項的生物總賬，則何必為親緣血統之討論？何以尚有恩格勒與邊沁虎克兩大系統之分野，而至今日討論益烈？汪君所認識之分類學殆為林奈氏之分類學，而非十九世紀之分類學，更無論二十世紀之分類學矣！汪君抑知今日正在以實驗方法研究分類學乎？德國之麥茨（Carl Mez）及其門徒以動物血清鑑別法追尋植物各科各屬之親緣；阿諾德森林植物園之怯士特（Kenneth Chester）以植物蛋白質沉澱鑑別法追尋植物之親緣；薩克士（Karl Sox）以細胞染色體之數目與形態追尋植物之親緣；其結果皆甚有價值。以後研究分類學，必以實驗方法與形態學方法相輔而行，殆無疑義。又有若干分項學問題，全賴野外之觀察，而不可盡賴死標本。另有若干問題，則非有植物園栽培之不能解決，如中國之柳即其一例；此余所以極力欲在北平創一植物園也。有植物園以栽培活植物，則上述之以實

乃法追尋植物親緣之工作方可進行，不但可以大批國產樹花木以福利中國園藝界也。至於研究動物亦莫不然。

尤鳥類非有野外長期之觀察，不但不能知其習性，抑且能解決分類問題。而此類工作要仗人力與財力。中國之艱學方在萌芽之候，百廢待舉，未能兼及，非僅注重死生物，而忽略更有興趣的活生物問題也。

至於謂『研究分類學最大的目的，似乎應該是求做出個中國所有的動植物的分類的總賬簿』『分類學家是應合作』。誰曰不然？所謂總賬簿者動植物誌是也。所謂該合作者，即此類動植物誌之編纂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任，而必須求助於人之謂也。以植物分類學而論，北平京廣東三研究所，各有分擔編纂北方東南西部南方四植誌及中國樹木誌之計畫。每一植物誌亦非一人所能擔任必須互相幫助，方克有成。此數研究所互相交換標本互切磋，關係極密。兩研究動物學機關亦然。此外尙與其大學生物研究室交換標本，互相討論，書札甚勤，汪君何知中國分類學家不合作耶？

至謂分類學家以改正前人之錯誤及發表新種為目的，亦隔靴搔癢之說。夫前人有錯誤，自不得不改正之，自有錯誤，亦莫不然。此為求真之精神，在分類學如此，

在其他科學亦莫不如此。邁克孫推翻以太說之光學試驗，愛恩斯坦推翻牛頓學說之相對論，與其昔日主張空間有限，今又主張空間無限，皆糾正他人或自己之錯誤也。在他種科學不以糾正前人錯誤為嫌，何獨以此批評分類學家？汪君抑知在中國治分類學，有不得不糾正前人錯誤之必要乎？此種錯誤可分為三類：（一）從前分類學無專門學者時，國人之定動植物名稱，咸鈔襲日本之書籍，以訛傳訛，由來已久。商務印書館刊行之大植物學辭典大動物學辭典，皆患此病。而北平某昆蟲學教授，其鑑定標本，全以日本千虫圖譜為枕中秘寶。此種之錯誤，斷不能不改正也。（二）國外專家鑑定標本之錯誤，上文所云某植物學者鑑定中國植物錯誤常至百分四十以上。其鑑定之標本分在各標本室者甚夥，亦常見諸刊物，此類錯誤一經發現，自不能不改正，或刊布或否，視情形而定，即其本人以不以為忤也。（三）專家所發表之錯誤新種。法國植物學家萊威葉研究貴州植物發表新種三千餘，其錯誤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近十年來，各國植物學家皆多少須從事於糾正彼一人之錯誤。他人之錯誤，雖不如是之甚，亦常有之。中國分類學家職責既在整理中國之分類學，則安能聽其謬種流傳，不加糾正？至於發表新種，苟誠為新種，安可不發

表？此爲研究分類學之職責，並非有意出風頭也。日本分類學者最喜發表新種。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分類學教授早田文藏發表臺灣植物之新種至夥，歐洲學者疑其泰半不可靠，至囑託秦君仁昌赴日，研究其蕨類新種標本以糾正其誤。居常與學生言，每引以爲戒。安肯自蹈其覆轍？蓋分類學家之職責與貢獻，不在發表新種之多寡，吾人寧不知之，而待汪君指點耶？

至於形態學之爲生物學之根本學科，亦難否認。以形態學之研究，天演之學說，益多証據。古生物學完全爲形態學與分類學，而所研究者，又皆爲死生物也。然則何以北京猿人之發現，響動全世界之觀聽？司密司教授遠涉重洋專來研究此顛骨，非以其爲研究人類天演之一良好材料乎？若非於形態學有甚深之研究，步達生何能憑一口齒，遂斷定其爲一種新猿人？他如馬象駱駝之遠祖之發現，皆與天演學說以鐵証，汪君當亦知之也。以植物學而論，苔蘚植物蕨類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間之過渡植物，近年皆在化石中發現，而植物界之天演歷史大明。此皆形態學研究之結果，寧以其爲研究死生物而貽譏乎？至於日本池野成一郎發明銀杏有能運動之精子爲植物學上最重要發明之一，凡治植物學者皆知之矣。汪君爲心理學家，當知神經

學之重要。而神經學者，形態學之一支也。當那得生發明人腦中各種功用之區域，其重要何可言喻。然此猶形態學與生理學相合之研究也。至於俄人爲列寧之腦專設一研究所請德國某大神經學家研究之，汪君其謂之何？在今日中國神經學家只有三人，而只有一人能將整個之人腦切片。甚至就大學教課言，中國亦必須有形態學之研究。蓋就地取材，非有研究，必感教課之困難。如教授動物學，則以中國之蚯蚓，鯊魚，蛙，與鼈，其內部器官之構造，與歐美所產者，皆有不同；苟非有精確之研究，必不能指示學生。又如蝸螭魚歐美所產者，以稀少之故，每枚價至美金一角五分。而廈門所產，乃以噸計。然其內部之構造亦與歐美產者不同也。植物形態學教材，亦莫不如是。

抑汪君知否中國數生物學研究機關，並不只研究分類學與形態學也。北平研究院之天然博物院，除動植物兩研究所外，尚有一生物研究所，其研究多爲關於生理方面者。靜生生物調查所與自然歷史博物館本爲調查機關，其偏重分類學自不待言。然靜生生物調查所亦頗注意植物生態學與分布學之研究。而尤以研究中國木材爲己任，以求與民生發生關係。此數年來念念不忘求在北平設一植物園，亦即此意。又於研究鳥類學時，尤知注重其生態，此亦研

究活的生物也。苟非爲性質所限，何難延聘專家爲生理學與遺傳學之研究？至於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汪君亦知在中國最先研究遺傳之論文，即在該所刊布乎？該所此外亦有與生理有關之形態學研究論文。其中研究員在國外研究生理學而成名者有三人。汪君之責言，寧非不察事實乎？然正有其他著名科學家以中國目前亟宜注重分類學，而責生物研究所不專從事於分類學研究也！汪君亦知主持此三所之人，皆曾習農林學，其一人且在美國刊布有植物生理學研究論文乎？曾習農林學與曾研究生理學之人，當然知

（三）答汪振儒先生和胡先驕先生

汪敬熙

這一週裡，獨立評論社先後送來汪振儒和胡先驕兩位

先生和我討論的兩篇文章。現在分別答覆於下。

先答汪振儒君。他這篇文章內有四點我有回答。

（一）我說現在生物學界太偏重分類和形態兩方面，我的意思是指的現在國內可以用在科學研究上的財力，其流入生物學中的是大部分用在這兩方面；並且專門這兩方面的人是比較容易找到可以安心研究的處所。至於國內

形態學家的研究在質在量均不佳，是由於研究者的資質及

實驗生物學之重要，與生物學與民生之關係，固不待汪君指點也。其必從事於分類學之研究，必有其故，即以在中國目下情形，決不可不從此類基本研究入手也。

總而論之，在中國無任何種科學皆當提倡。而某種科學之發達與否，全視治斯學者之努力。社會人士但當視其努力之結果如何，而與以獎掖與輔助，決不可有先入之見，妄爲軒輊，而有偏枯之說，而已非內行，不知甘苦，尤不宜輕加批評。汪君學者，或不以斯言爲河漢歟？

他們科學的訓練，並非由於提倡之不力。振儒君（我們

二人都姓汪，如寫姓，就易使讀者誤會，所以寫名；請汪振儒先生原諒！）說，現在國內生物學家所注重的是生物調查，不是真正的分類工作。誠然！誠然！這話說的比我更確切明白。不過生物調查也是一種粗淺的分類工作。

（二）振儒君說，國內生物學者這樣注重生物調查是由於這是一切研究的根基，「似乎是由實際需要的一種趨

勢，與提倡研究人的興趣不十分有關係。」現在國內這種永遠只平草地而不想蓋房子的態度，我總不以為然。況且實驗研究一方面，有些問題是用不着這種所謂根基的，而分類形態的工作，欲求精深，有時反非以實驗生物學為基礎為訓練不可。這種注重生物調查似乎不能說全是由於實際的需要。再者中國生物學發源的大本營是在從前的東南大學。當日東南大學主持動植物學兩方面的人，在他們在外國所受的訓練上看來，是偏重於分類和形態兩方面。他們的興趣的偏重這兩方面與現在生物學界的情形，似不能說是無重要的關係。

(三) 振儒君以論文數目的統計證明分類及形態方面的研究並未衰頹。不過我說，「分類學者往往有後起無人之歎」，是根據一九三〇年英國邱園主任 A. W. Hill 及英國大英博物院動物部主任 W. T. Calman 的演說（參看 *Nature*, 1930, Vol. 126, P.461）。

(四) 振儒君贊成我主張提倡實驗生物學之議，但是他以為不應廢棄分類和形態的研究。並且他主張應設法增加財力及人力，使生物學這幾方面同得適當之發展。

我的前一篇文章內並沒有主張抑制分類學和形態學的發達。在中國今日，可以用在科學研究的財力只有這一點兒。

，要想他增加頗不容易。肯走入科學研究的人也只有少數，也不容易使他增加。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應設法使這點財力有一部分是用在提倡實驗生物學，使學這門的人有個安心研究的地方，使他們能有機會吸收一部分願意致力於科學研究的青年，使他們的形態學及分類學也可以實驗而進步些。至於財力和人力的大量增加，恐須俟至「上帝」大發慈悲使政治入軌道之日了！

再答胡先驕君。胡君這篇文章內涉及個人的地方非常之多。這或者是用文言做辯論文章時不可避免的調子。我極不願意由學問上的討論，走入個人間的攻擊。

所以關於個人的話我是一概置之不理。例如胡君說中國神經學家有三人以我所知至少有四人（這話並不是把我自己算在內），若這樣一條條辨論下去，何處得要領？我只向胡君和讀者諸君聲明：（一）我不是一個狹義的功利主義者。我自己的工作一向是理論的研究，與實用毫無關係的。（二）我既是坐的心理學講座，我的工作完全是在心理學和生理學中間的地域中的；是從來以讀生物學史和科學史為一種業外遊戲的；並且對於國內生物學界的研究機關和知名之士的工作與歷史，不是毫無所知的。

胡君這篇文章，既是千言萬語，其中最重要的話總括

起來只有兩句：(甲)分類學是一種基本研究，應先提倡；和(乙)中國今日只患分類學家少，不患其多。關於甲點我已經在答振儒君的第二點內說過，不再贅。至於乙點我回答如下。中國地大物博，生物調查需要多人，誠然！誠然！但是「肚子不是一口吞的」。此事體大，當徐徐圖之！就是以現在所有這一點財力人力，全數注入此途，也不是五年十年可以做出個眉目來的。並且這種生物調查，振儒君已指出其非真正的分類工作。胡君自己也說，二十世紀的分類學須要生理的智識，實驗的方法。我敢說，只像現在這種樣兒傾全力辦生物調查，不給實驗生物學一發達的機會，生物調查所得的結果只是 Linne 時代的分類工作，斷不是二十世紀的分類工作！

我說分類學者只注意死的生物，胡君大不以為然。分類學家固有注意生物生態者，近今固有以生理反應為鑑定生物親緣之標準者。但是大多數的分類學家的態度似乎不是如此。英國動物分類學家 Oldfield Thomas 的一句話最可以表現此種態度。他晚年好仰觀天文，因而常對朋友說：「可惜我們不能採集星宿！」普通分類學家

似乎是重死標本，輕活生物吧。

我前一篇文內說：分類學家改正他人的錯誤而以輕蔑的態度出之，是易啓爭端的；分類學家以發現新種為目的而與人爭發現的先後，是表現自己的未成熟。我並未說錯誤不應改正，新種不應發現。

胡君論形態學的一大段無甚新義，可勿庸討論。只補充二句：(一)德國之某大神經學家，柏林之 Oskar Vogt 也；(二)人腦中各種功用之區域，非當那得生 Henry H. Donaldson 首先發明者也。

這兩篇文章已經答完了。我請讀者諸君注意：(一)國內無一專門研究實驗生物學的機關，及在現有的生物學研究機關內，實驗的工作甚少，都是不可掩蔽的事實；(二)實驗生物學之應提倡，振儒君與我十分同情，胡君也沒有舉出反對此說之理由。請讀者諸君想一想，現在是不是應當移一部分的財力人力去提倡實驗生物學？或者這樣然後在中國的生物學及形態學，也可以實驗方法發達之幫助而到「二十世紀」的田地？二十一，八，二十。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一「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一、國內郵費在內
日本及租界地
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
元九角
倫敦海峽南洋各
埠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胡適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

問題

葉叔衡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錢實甫

漫遊散記(八)

丁文江

山西鐵礦——新舊鑛冶業比較

討論英庚款的管理

杭立武

胡適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漢口 | 重慶 | 汕頭 | 梅縣 | 成都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封圖書局 | 開封圖書局 | 安慶圖書局 | 無錫圖書局 | 青島圖書局 | 濟南圖書局 | 廣州圖書局 | 漢口圖書局 | 重慶圖書局 | 汕頭圖書局 | 梅縣圖書局 | 成都圖書局 |
| 東亞書局 | 新華書局 | 開明書店 | 民智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中華書局 | 神州書局 | 海光書局 | 樂群書局 | 東方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 |
| 北平圖書局 | 天津圖書局 | 上海圖書局 | 南京圖書局 | 西安圖書局 | 蘭州圖書局 | 武封圖書局 | 開封圖書局 | 安慶圖書局 | 無錫圖書局 | 青島圖書局 | 濟南圖書局 | 廣州圖書局 | 漢口圖書局 | 重慶圖書局 | 汕頭圖書局 | 梅縣圖書局 | 成都圖書局 |

獨立評論

第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出版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胡適

月二十五日，日本外相內田在第六十三屆議會作長篇的外交演說，其全文見於次日的各報，其大意有幾點：

(1) 日本已決定從速承認「滿洲國」，並加以援助。

此為全文的主旨。

(2) 他說，遠東國際關係弱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的混亂狀態和排外的革命外交政策；九一八的事件是日本的自衛的行動。

(3) 他說，帝國此種行動並不違反「非戰公約」。

(4) 他說，「滿洲國」之成立是由於中國境內人民的分離運動與獨立運動的結果。

(5) 他說，日本承認「滿洲國」，並不違反「九國條約」。

(6) 他說，承認「滿洲國」為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唯一有效方法。

(7) 他說，某方面擬議要使中國本部的政權在某種方式之下得行使於滿洲，此種敷衍一時的方法，

日本國民決不能承認。

內田的演說雖然也有採取強辯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體上可說是直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強暴政策，毫不客氣的向世界的輿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公然對中國和世界喊着：「我們要這樣幹，就這樣幹了！你們其奈我們何！」

他並不倚靠什麼理論做強辯的根據；他的唯一根據是武力的強橫。例如他說日本的行動並不違反「非戰公約」，他只說「非戰公約並不禁止一個締約國便宜採取任何必要手續來防止本國領域及其任何利益的危害。況且，很明顯的，此種自衛權的行使可以推廣到本國的領域以外。」這是何等露骨的坦白！這種「自衛」的行動可以推行到東三省，可以推行到全中國，也可以推行到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假如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也肯不抵抗的話！

又如九國條約明說各締約國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而內田只須說：「九國條約並不禁止中國國內的種種分離運動，也並不阻止任何地的中國人以自由意志建立獨立國家。」至於中國和世界如何否認「滿

洲國」的自由意志，那是他滿不在乎的了！

這樣的露骨的蠻橫外交，在現代外交史上確是開一個新局面，所以歐美各國政府負責的人對於這一篇宣言，簡直沒有辦法。這幾天以來，各國重要的報紙對內田演說都有了很正直的批評，只有各國官方都保持一種很可怪的緘默。說者以爲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公布與國聯採取正式行動之前，各國政府也許不會發表什麼關於中日問題或「滿洲國」問題的聲明。其實，我們疑心，各國政府都落在這位日本外相的猛烈煙幕彈的迷霧之中，急切正不容易決定應付的方法。

我們不留心內田演說中提及的「某方面擬議的計畫，要想彌縫一時，使中國本部的政權在或種方式之下得行使於滿洲」嗎？（此一段，華字各報所譯不甚明白，不如路透社所傳英文本的清楚。）這個「某方面」是那一方面呢？我們猜想這是指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結論的一部分。內田大概微聞或是預料國聯調查團有這種解決方案的主張，所以在報告書未送達國聯之前，就採取這種先發制人的恐嚇手段，預先聲明這種辦法是日本國民所決不能承認的，預先向世界警告：日本已決心不肯回復中國在東三省的

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了！

如果我們的猜想不錯，那麼，國聯調查團的報告發表以後，國聯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如果含有否認「滿洲國」或回復中國在東三省的行政主權的主張，日本必仍舊採取反抗國聯的態度，這是無可疑的。半年的國聯調查，在日本人的眼裏，不過是添了一大堆廢紙！中國人民與政府對國聯的期待，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是難免絕大的失望的。

所以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羣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畫，咬定牙根做點有計畫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局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那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

廿一，八，廿九夜。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

葉叔衡

東北是疏解中國人口壓迫的惟一大出路，而日本的侵佔東北是他軍閥的傳統政策，所以除非日本的軍國主義根本變化，中日的大衝突本是難於倖免的。但五六年以前，還可藉國際的關係，用外交的方法，來緩和中日間的形勢，以待中日問題合理的解決。歐戰以後，國內有一種贊成國際新銀行團的主張，——著者就是極力主張的一個，——其著眼就在這一點。因為認清了中國的自衛能力太差，惟有利用國際的經濟勢力，或者可以阻擋日本的橫行，所以我們權衡利害之輕重，毅然的有此主張。在巴黎和會中，這個主張未能貫徹。但華府會議的決議否認利益範圍，並將遼河以西及其他未辦鐵路歸新銀行團承辦；那時如沒有日本人在中國方面暗中破壞，如沒有一班見解錯誤或私而忘公的人來阻撓，這個主張即可實現了。倘使這個主張果真實現了，九一八的事變——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決不至於發生。及至中國的外交形勢，推演到九一八事變要發生的時候，情形已是不同。但事變初起的時候，政府如有遠大的眼光，敢負責任的肩膀，或者還可用外交手段使

中日關係緩一口氣，以便我方的充實國力，為最後的準備。那時作者曾本此意思，寫了一篇對日計畫書。現在日本的冒險行爲已到了這個地步；外交解決的途徑已經閉塞了；若要日本軍閥自己回頭，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祇要看七月九日荒木對國聯調查團所說，「照日本軍部重大決議，絕對反對中國主權之及於滿洲國」的話，即可明白了。

日本軍閥的瘋狂已決非空言所能阻止的了。如果將來國聯引用盟約十六條，加以美國的同意，以致發生日本與國聯及美國的公然衝突，日本必然照他的預定政策，先來佔領中國東部，以便用中國的物資供給他戰時的需要。華府會議休會以後，在民國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海陸軍元帥會議通過的新國防方針，即是這個政策。倘或日俄發生戰事，日本亦必先占中國要地以防中俄的合作。倘使國聯及美國認爲中日問題不值他們強硬的干涉，中日戰禍也免不了。因爲「滿洲國」果能有幾年的運命，他一定是爲虎作倀，要進到關內來的。假使中國現在對日本屈服，

將東三省完全拋棄了，這也不過如宋人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於金人而仍舊免不了徽欽的被擄。從前在東三省日本參謀部政治組做事現在調到東京參謀本部的 Igawa 少佐，曾在『金鋼』雜誌上發表對於滿洲集團移民的政策。他說『滿洲國』的西界現在不必劃定，因為將來中國的河北省，甚至山西省，也許願意加入。由這話可以見日本軍閥的野心是沒有滿足的。總之，事到如今，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一定還要擴大。新近日本外交時報說：『……日本不但繼續占領滿洲，且無論在任何地方，皆可再生第二第三上海事件。……恐閩北之慘狀將擴大至中國全土……』這不祇是外交上恐嚇的話，實在日本軍閥預定計畫之內，照現在情形看，亦非意外之事。這個大禍的何時爆發雖不能預定，但恐不出五六年。五六年以內，中國各處的實業機關文化機關都可變為商務印書館總廠與同濟大學，各處的都市皆可變為閩北江灣！這不是搖惑人心的預言，實在是人人心中所應該想得到的。

中日問題的外交解決既標明了『此路不通』，中日戰禍既有不可避免的形勢，然則中國不必再在外交上努力嗎？不，除非戰事已開，外交總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中國既主和平，如果國際情形竟有意外的變化，能使日本屈

服於公理，中國自然仍願用外交來解決兩國一切的糾紛。況且中日問題既不是中國一國的力量所能解決，中國的外交至少還得努力使他不要脫離了國際與國聯的關係，並要使這個關係更深更密。即主戰最力的人也是將戰事牽涉國際關係為一要點。不過我們不能叫他國替我們來打仗。即使將來引起國際戰爭，也須我們自己能與敵人相持，方可有我們發言的地位。現在中日形勢既已如此險惡，全國的人當然應該認國防為第一大事。中國在最近的將來所受的禍，或者要遠甚於遼金元清的外患。但我們不必悲觀——悲觀是無益的。況且那時國際如何變化正未可知，果能自己努力，安知不能因禍而反得福。所以現在中國第一個大問題，惟一的根本問題，就是這如何努力國防的問題。其他一切一切，不拘何種問題，都是枝葉。

因為國力薄弱，形勢的緊迫，這個如何努力國防的問題是十分困難的。去冬我草的對日計畫書，預備一方以外交和緩形勢，一方勵行十年的國防計畫。照現在的情形看，即使我門外漢的話有說中的，要十年工夫方能完成的計畫便不適用。現在的國防計畫必須立時可實行，必須做一步得一步的效用，必須在幾年以內可以告一段落。那時如無戰事，這個計畫便可繼續下去使他較為完備，如有戰事

，也可藉以應付。非有如此一個計畫不能應付現在之局面。這是極難的題目，但是不能不做。政府經過了淞滬的戰禍，鑒於東北傀儡國的成立，諒必已有切實的國防計畫，并且已經著手實行。但鑒於過去的情形，我們不能不過慮，輿論方面的督促恐怕是萬不可少的。新式的國防本不限於軍旅之事，整個社會都得要動員。況且我們這個特別困難的國防問題，決非單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所能解決。現在非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共同努力，恐怕國防是沒有辦法的。

清共勦匪以防後顧之憂，在國防上著想，固是必須做的事。此外還有幾件必須要做到的事情，可以用常識來斷定的。第一全國軍人必須合作。廢止內戰大同盟的運動雖然碰了廣東的一個大釘子，沒有加入對日戰爭的航空軍人雖然勇於爆燬自己的礮台與軍艦，而兩陳之爭終究因反對內戰的勸告而調停了結了。但各派軍人若祇各守地盤，不相侵犯，而不能合作，全國的國防就無從計畫，外寇到來也可將他們個個擊破。到了那時，再想合作，也來不及了。所以現在廢止內戰的運動應該進一步要求各派軍人的首領聚處一堂，共同定出一個全國的國防計畫，共同去實行

第二，人心必須振起。近來有時聽見人說，如爲吃飯，不妨到滿洲國去。說這些話的人固然多是患窮。但如祇爲吃飯，亦還不必去供叛逆與傀儡的奔走。實則這些人去謀差使或是想去發財的。此輩衣食未斷而屬於士大夫的一流尙且如此，大多數終年瀕於凍餒的平民更將如何？此所以僞國有了鑑修去朝貢東洋而開北江灣有江北漢奸去騷擾。滬戰結束後，日貨輸入已自一二月八百幾十萬兩的數目增加到四月份的二千餘萬兩。華北各省所定日本棉製品及糖，據日本商務官的報告，『均爲歷年未有之大輸入』。由此可以見民氣怕靠不住了。此時急須在文學及平民教育方面鼓吹民族精神與國家思想以免將來順民族的到處飄揚。

第三，軍事訓練必須推廣。中等學校以上的軍事訓練，說了許久，並未實行。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起後，各學校也有提倡軍事訓練的，也有組織義勇軍的，現在却又寂寂無聞了。趁此時候，應該趕緊將軍事訓練推及於各學校。中國人本來缺乏訓練，也可以此來補救這個大缺點。

第四，兵工廠必須整理統一。民國五年日本要求二十一條時有人計算，如對日作戰，我們的軍火可以支持三點鐘。這個估計或者太緊，現在軍火也較爲充實了。但戰時

外源斷絕，究竟我們全國的軍火能支持幾天或幾個月？現在不應該趕緊將國內的兵工廠整理擴充并統一管理嗎？上海兵工廠遷到杭州去是對的——或者杭州還不是合宜的地方。但太原兵工廠是現在北方最大的，於將來北方軍隊對外作戰最有關係，何以現在還是「形同化外」，未聞中央去整理？

第五，航空戰力必須大加擴充。淞滬及現在東北抗日各處都已受了敵人飛機的大損害，將來全國都市皆要遭此危險。現在不應該趕緊將我們的空軍力量大加擴充以便對抗嗎？照去年九月十日日本報告國聯的軍備數量，日本陸軍飛行人員有六九四四人，飛機八三八架另在建造中者三百架；海軍飛機屬於海岸飛行隊者四七二架，載於航空母艦及戰艦者三二九架。統計日本已共有海陸軍飛機一九三九架，却還在努力擴充他的航空戰力。他在法國已定了戰鬥機的發動器五千具，他們人民還要捐助「愛國機」。我們除白送他二百餘架外，到底有多少飛機，有多少飛行人員？我們的航空學校能同時訓練多少人？我們的都市有沒有防空設備？想到這些問題，真是「不寒而慄」。擴充航空戰力比較的還是為我們的財力所許。我們應以二千架飛機為目標，在短時期裡應該備有一千架。我們人民受了他

空中爆彈的損害以後，應該比他們人民的捐助「愛國機」還要熱心。對於防空設備，各都市人民即為自己起見，也應該要求各都市當局去創辦。現在上海已發起了航空救國會了，但要空軍的大擴充，總須政府去努力。

第六，長江必須有堅固的防禦。我們的海軍不必提了，海岸防禦力恐怕一時也增加不了多少。但長江如也為敵艦所統制，將腹地變為海疆，全國分為兩截，那個危險比失去海口要大得多。淞滬戰時，首都受敵艦的威脅，軍隊不能渡江，那真是腹心之患。近年來海軍當局對於長江軍艦的建築，尙能努力，以後不妨專致力於江防。至少的限度我們應可使敵艦不能在江中行駛，不能在江口出入。

第七，毒氣必須防備。此次東北及淞滬戰事，敵人尙未用毒器。我們如不能以毒攻毒，也須預備防毒器具。這是應該在平時做的事情。如近日報載法國正在製造四千餘萬套的防毒面具以便分配於全國人民，這是現在各國政府都應有的責任。我們不能為全國人民製造防毒面具，至少應該為軍隊及都市人民預備。

第八，糧荒必須防備。號稱以農立國的中國靠外糧的接濟，年甚一年。就米說，近年來每年平均約缺乏二千萬擔。戰事一起，海外來源斷絕，東三省雜糧也不能進關，

那時糧荒民變，如何支持？這個問題原不是幾年工夫所能解決的，但不能不想法去減少危險。如設立常平倉之類不也是無辦法中之辦法嗎？

第九，戰時所需物料如鑛質中的鋼鐵銅鉛錫等，如化學品的硝酸硫酸純鹼酒精等，我國都不能自給，應該即速研究充實的方法。又如汽油若有不給，飛機汽車便都成了廢物。延長油鑛如不能開採，政府應籌設安全的汽油儲藏所。

第十，重要的鐵路工程如隴海的西展，與粵漢的連接固然須趕做，但數年之中斷造不了多少鐵路。將來軍事的交通還要多靠汽車路的補助。現時空閑的兵多得很，何不叫他們多造幾條路。一個貧瘠的貴州省能在短時期內築成全省的汽車大道，皇皇的中央政府難道不能在幾年以內與各省政府將全國的重要汽車路造起來嗎？長途汽車自己不能大規模的製造，似乎可以讓福特公司等在中國開一個分廠。

以上舉了十個例，都是常識所能想到的，也都是非做到不可的。假如以這十件事為國防計畫，那真是最低限度的國防計畫了。但這十件事裏，現在有那一件是有了具體的計畫已經著手施行？這些事並非如俄國的五年計畫，非我

們現時的物力財力人力所能舉辦的。其所以未辦者不是因為不齊心，就是因為不努力。譬如軍人的合作並沒有物質的阻碍，也沒有種族上的困難。所以還未合作者，不過因為幾個大頭目的不齊心而已。又如軍事訓練的不普及於中以上各學校也不是因為物質上的困難而因為大家不努力。固然，要大家齊心與努力，就是很難的事情。但是現在是大禍將要臨頭的時候，如何還可以不齊心，如何還可以不努力？大家如還是如平常時候的行屍走肉，醉生夢死，先知先覺的就應該喚醒他們。政府如猶是泄泄沓沓，有知識的人們就應該督促他。如若仍此因循下去，敵人大舉進來時，我們行動不一致，軍火無來源，空中無抵禦，毒氣無防備的雜散軍隊，雖如十九路軍的壯烈，亦豈能持久抵抗？那時民衆非俯首帖耳做奴隸，就得晝伏夜行做逋客。尤其是有知識才能的人與學校的青年是敵人所最不喜歡，到那時真要求生不可求死不得了。若說我是故意的危言聳聽，請看東三省的人民不已是如此？所以全國知識能力的人都應該聚精會神的各盡所能與政府一致的來解決國防問題。其他問題都可暫擱。現在各處有識的人亦未嘗不在努力去研究這件大事。但是沒有集中的機關或團體，沒有聯合輔助的方法，祇靠若干私人分頭討論，恐怕其結果

比晉人的情談差不了多少。至於如何集中研究，如何可免築室道謀的弊病，又是一個問題。我想一方要有民衆大團

結去督促政府努力國防，一方要有若干專家的團結去幫助政府解決國防問題。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錢實甫

中國自來就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農地的面積和農民的人數，都比較高出於世界各國。據美國農務部農業經濟技師兼威斯康新大學經濟地理教授 Baker 的研究中國農地的面積約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合我國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見氏所著論文農業與中國之將來載於 *Foreign Affairs* 第六卷第三號）大於農地面積最

形，却不如是。主要食糧的米，在豐富產域的長江七省中，每年的收穫還不到一萬萬石，不够自己養活，非以六千萬至一萬萬海關兩的國幣，向外國購入一千二百萬至二千萬石不可。棉的輸入，每年約在二百萬石以上，更須輸入二十萬石以上的棉紗，才可以解決國人衣的問題。這種情形，豈不是很滑稽的現象嗎？

多的美國百分之三十。全國的農民人口，約爲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據伊藤武雄所著現在支那社會研究所載，全國農戶爲五九，四〇二，三一五，人數爲三四一，六四五，一九九）已相當的高出於比率較大的保加利亞（百分之八二·四）和意大利（百分之五八·八），其總數更是超過各國。在農業生產的要素上說來，土地和勞動是兩個必要的條件，中國既有如此廣漠的農地，如此衆多的農民，無論如何，本國國民衣食的需要，當然應能充分的自給；但實際的情

農業的恐慌，本不是中國獨有的情形，全世界差不多都同陷於他的壓迫之中。不過在別的國家，或是因爲產業畸形的發展，人口集中於都市，使農業的生產無法以增進，或是由於農地過少，不足以自給，譬如英國就祇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地，農民人數和人口總數的比率，竟會少到百分之七·八；這樣，自然有發生恐慌的可能。我國既不缺分農地和農民，並且更有大量的荒地可供農林之用，多數的無業或失業的羣衆可使訓爲生力軍的農民，產業又不發達，決不足以牽動或妨害農業，又何致會和她們同出一

轍呢？在我國的情形說起來，無非是因為天災和人禍的催殘所致，科學落伍的結果所阻碍。就我個人感覺所到，其間若干現象，可以用「勞動的不足」一個觀念括之，這個現象是最能形容我國農業破產的。

所謂「勞動的不足」，可分析為兩種：一是量的不足，一是質的不足。量的不足，狼明顯的即是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太少，可以說是形式上的缺乏；質的不足，即是農業勞動者的本能過低，可以說是實質上的缺憾。

量的不足，其原因不外是來自於天災或人禍的結果，天災無論是水旱或蟲風，人禍無論是兵燹或匪患，其影響於農業的生產，程度相同；直接的損失是使（一）生產物破壞，（二）節序過時，不適用於二次生產，（三）生產工具喪失，無法種植；間接的更使（一）農民的生活不安定和（二）農村經濟破產。尤其是農村經濟的破產，影響更大。因為前四者雖不失為重大的傷害，尚可徐圖恢復，祇要有經濟的後援，最多不過是暫時的停滯。唯有在農村經濟破產的情形之下，金融既極端緊縮，利率更特別高漲，並且還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借貸。國內沒有適合於農民貸款的機關，能够接濟農民貸款的，大都是重利盤剝的地主階級，雖然有所謂農工銀行的設立，其性質早就脫離極遠，

雖然不許高利貸的榨取（十六年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一一次議決：最高年利不得過百分之二十），但事實上決沒有辦到，譬如大都市的北平，當業的利率就仍是每月百分之三；這樣的情形，農民自然不能繼續的作業，更談不到有安適的生活。

由於這種種的原因，一般毫無辦法的農業勞動者，在天災和人禍的壓迫之下，不知道死去多少！譬如近來歷次陝甘的苦旱，去年長江的大水，所犧牲和損失的農民，不可數計。更有無窮次的內戰，一夕數驚的盜匪光臨，人民在長鎗大炮之下橫遭慘殺的已是數可驚人，更間接為兵捕匪擄去填溝壑的，又不知若干！如此：農民的人數，那得不日見減少？

再有許多幸而偷生的農民，滿眼所見到的祇是亂草荒田，頹垣斷瓦，或是人亡家破，或是子哭妻啼，都是使人僅能忿懣以死的環境，那有勞苦的精神去辛勤墾植呢？同一無所有的農民，決不能赤手空拳的坐待苗之生長？最普遍的現象，就是失業。這種失業的危機，不獨是減少生產的工具，實際不啻增加批殘生產的兵匪，因為這般失業的羣衆，決不願坐以待斃，祇得挺而走險的以求暫時的生存。於是乎更是兵連禍結不已。其中更有許多的農民，因

爲無法再在農村中生活，不得不轉入都市另謀其他的出路，或者流爲乞丐勉強餬口。這雖然不致損失農業的生產，然而也減却不少的主力工具。

農民因受天災和人禍的打擊，不免趨向於死亡，失業和轉徙三方面，實際都同是減少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如果要使農業復興，生產增進，自然會感得到勞動者量的不足。

質的不足可分析爲三種情形：即（一）勞動技術，（二）勞動知識和（三）勞動生理三方面。一般的農業勞動者，並不需要如何高深的知識，大半是靠經驗來工作，如果經驗中斷，自然是一個重大的危險。老年的經驗豐富者，因爲自然凋謝的結果，逐見減少，而後來的青年，因爲種種的苦悶和誘惑，總不能靜心的安居於荒僻的鄉村，忠實稼穡，自不能求得正確的豐富的經驗。不獨如此，因爲既不專心工作，即永無進步的機會，不獨不能改良耕種的方法，增加生產，就連這一點歷代相傳的舊法，也不能繼續保存，加以農民特別富於保守性，更無機會接受新的方式。

農業的勞動者固然多半是運用經歷，但却不是絲毫不需要較高的知識。較高的知識，可以正確經驗，啓迪發明，促進改革，在農民正是一種最好的幫助，不過知識的來

源是由於教育，中國的農村教育又是如何的可憐呢！在中國既沒有實施強迫教育，也沒有普遍的設置義務教育機關，對於徒費時間而毫無裨益冬烘蒙館，又不澈底的取締，所謂農村的小學，更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廢物。我國現有的農村小學，恐怕全體都是和都市小學同樣的辦理，決不適合農村兒童的需要。因爲農村的兒童，有聯帶工作的要求，決不能像都市兒童按步就班的繼續求學，而且所教授的材料內容，和農村絲毫無關，其結果最多祇是一種識字運動，並不能滿足農村兒童的需要。再對於成人的教育，根本就沒有創設，連識字的機會也不能給予。這樣一群僅僅可以勞動的生物，如何可以負擔農業的重責？

教育程度的低落，經營方式自然不能改良，管理的方法自然不會合理，再想農業進展，當係不可能之事。我們讀過一本古老的書，克魯泡特金的田園，工廠及手工場，所描寫關於溫室栽培的進展，大可驚人，我們不但不能達到這種境地，能得合理的大量生產，就是目前現狀的維繫，繼續在這個貧弱的農業生產情況中生活着，也大有不能之勢，言之實令人痛心！

在勞動生理方面的不足，有兩種來源，一是有形的傷害，一是無形的影響。有形的傷害，很明顯的是（一）早婚

與纏足等的衰弱，(二)毒品蔓延的殺戮。早婚和纏足在中國農村的農村中是一種極普遍的現象。一方面可使身體孱弱或畸形發展，甚至能够衰弱人種，禍延子孫。另一方面容易傳染疾病，傷害健康，譬如農村中瘧疾和傷寒的流行，最是普遍的情形。其次毒品的蔓延，更已深入農村，南方的鴉片和北方的白面，隨時隨地都可以使人觸目傷心，最痛恨的是還在公然的繼續進展，政府簡直是置之不聞不問。

再有一種無形的影響，就是農業勞動者精神的苦悶。

漫 游 散 記(八)

丁文江

太行山裏的旅行(續)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平定昔陽的鐵礦不容易用新法開採，所以沒有多大的價值，已經是中國地質者所公認的事實。但是我偶然看見民國十七年武昌亞新地學社出版的大中華民國分省圖裏面山西幅的說明，仍舊有『鐵鑛煤鑛甲于全球』的話。亞新地學社是中國研究舊式地理最有成績的機關，而所見仍然

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上述種種現象的集合，使他們陷在一種痛苦不堪的環境中，潛伏高度的苦悶。自然，心靈不安，決不能適意的工作，就是勉强的支持，其效率也決不會如何的大，更不會有進展之望了。

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再將補救的方法略為敘述，僅就個人所知，粗疏的分析如上。不過提出這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使為社會所注目，實不敢故作奇論，動人觀聽。

如此，足見得這個問題還有普遍宣傳的必要。

我民國二年到山西調查鐵鑛，抱了極大的希望。因為不但山西自古以出鐵著名，而且德國人李希荷芬四十年前在山西旅行，極口宣傳山西鐵鑛的豐富。我以為這一定是亞洲的羅倫(法國最大的鐵鑛)。等到我到了陽原，在正太鐵路以北天天同梭爾格鑽土法開採的鐵鑛洞子，沒有看見有○·六公尺以上的鑛床，而且一個鑛井所能開採的範圍極小；鑛床不但厚薄不均，而且並不成功有規則的層次

，我漸漸的悲觀起來。從陽原向南調查鐵路以南的地質，纔曉得在陽原所見的已經不是平定昔陽鐵礦最好的一部分；越向南鐵礦越少，越不規則；在平定境內，鐵路以北有九百七十二座鐵爐，鐵路以南只有一百一十座；在樂平境內只有十八座；我纔覺悟平定一帶的鐵礦，在新式的鑛冶業上，不能佔任何的位置。

新舊式鑛業的經濟是根本不相同的，尤其是鐵鑛。煤挖出來，就可以燒。鐵鑛是石頭，不煉成鋼鐵，沒有絲毫的用處，而生鐵是最不值錢的金屬；一千六百多斤一噸的生鐵，在國際市場的基本價值不過三十幾塊錢，而且不過是煉鋼的原料。所以煉鐵的爐子最小的經濟單位是二百噸，建築的成本就要好幾百萬。要使得這幾百萬資本能夠逐年生利，而且可以逐年收回，必須要有極便宜極可靠的鐵鑛來供給煉鐵廠使用。所以鐵鑛必須要成大的，有規則的，開採極其容易的，方能算是『鐵』。不然，就不過是一種雜物的標本。開採這種鐵鑛，也得有相當的設備，也需要幾十萬或一百萬的資本。事先必須知道鑛的成分，性質，數量，構造，然後可以決定施工的計畫。平定一帶的鐵鑛是零星的，是不規則的，是很薄的，是要開洞子的，與上面所講的各種條件樣樣相反。土法開採鐵鑛是極單簡的

；三四人用幾把鎚子，鑽子，擊一個幾丈到十幾丈的洞子；再有一個木頭的手絞車，幾根繩子，幾個筐子，就可以開起鑛來。鑛質不好，可以用手來選擇。在農閑的時候，人工本來是不值錢的；一個人只要能混一百幾十個制錢，一天就可以過去。洞子裡的鑛挖完了，或是有了水了，不妨另找一個地方，把一套單簡的傢伙移了過去，從新打一個洞子。開爐房煉鐵的是資本家了。不過他的固定資本，多則一千，少不過幾百元。鐵鑛買了來，用人工打碎了，和上煤末子，裝在一公尺長，○·一公尺口徑的泥罐子裡面，把二百到三百個泥罐子堆在無烟煤上，再用已經用過的廢罐子四面砌起來，就成功了一座爐子。開爐房的設備不過是幾間房子，一個風箱，幾把大鐵棍子，鉗子。一爐子所用的鐵鑛，不過一千五六百斤。再有二三千斤煤，幾百個泥罐子，就可以開起爐來。鐵鑛價錢便宜，來源不斷，則多開幾爐。不然就少煉幾爐，於他的事業不發生根本的影響。我們要了解這兩種經濟辦法根本的不同，就知道爲甚麼原故，山西的鐵鑛用土法採煉有很長久的歷史，有相當的產量，而決不適宜于新式的鐵業的了。

這種煉鐵的方法，是山西所獨有的。無論古今中外，煉鐵都是用高的風爐。新式的用焦炭，舊式的用木炭：都

是把燃料放在下面，鐵礦和其他融解的原料堆在上面，然後拉風到爐子裡面。從沒有把鐵礦放在泥罐子裏，堆在無煙煤裡爛出鐵來的。這種發明大概是不得不利用無煙煤的結果。平定一帶既缺乏木炭，又沒有可以煉焦炭的煙煤。若不是發明了這種爛爐，根本就不能出鐵。據民國二年縣公署的調查，平定一千多座鐵爐，一年能出生鐵七萬噸。這大概是各鐵爐所能够生產的最大數目，不見得是每年真正的產額。假如真正的產額是三四萬噸；山西的鐵業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則最近一千年單平定一處，就出產了三四千萬噸生鐵。我們不能不五體投地的佩服我們老祖宗的本領。但是就是平定真正能出七萬噸一年，還不到新式的漢陽鐵廠產額的半數！完全說不上與新式工業比較競爭。

而且山西的土法煉鐵，還有幾個基本的缺點：第一是浪費鐵礦。平定一帶的鐵礦，平均一百斤礦，含鐵四十多斤。但是用土法來煉，一百斤礦，只能煉出三十多斤生鐵，而且所謂生鐵，不能與普通的生鐵比較，因為裏面雜了很多的渣子。要煉成熟鐵，先要把渣子去掉，而去渣子的時候，連帶的又損失了許多鐵。所以一百斤鐵礦，原來含四十多斤鐵，等到煉成熟鐵，所得不過二十多斤——三分之一

以上，都流到渣子裏去了。假如在最近一千年，平定出了三千萬噸生鐵，我們的老祖宗至少把一千五百萬噸的鐵，銷耗到無用的鐵渣裏去了。就土法而論，不能不說是暴殄天物。第二所煉成的鐵，品質很壞。所謂「生鐵」裏面的渣子是不用說的了。此外每鐵一百斤含磷二斤多，含硫磺○·三五斤。這種鐵鎔點很低，而質很脆，所以平定一帶，鐵的大宗的銷路是倒鍋；煉熟鐵的比較很少，完全不適宜于煉鋼。山西土法煉鐵惟一的好處是價錢便宜：每一噸生鐵市價不過十二元左右，不過世界普通市價的一半。但是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時候人工便宜，每一工人每日平均收入不過一百八十文制錢，所以能够如此。到了現在，恐怕土法煉鐵的成本，也隨工價而增加到兩倍以上了。

根本講起來，土法開礦——尤其是開煤礦——是與新式鑛業不能相容的。新式鑛業第一是要有確定的鑛區；在這區以內，不准另有旁人開採。因為要如此開採的人纔能够知道本鑛區之內有多少鑛可採，要用多少資本來購置機器，建築房屋，佈置井下的運輸，通風的道路，洩水的方法。計畫成功的鑛，所用的資本，與所儲的鑛量和所產的噸數，都有一定的比例，可以預算。土法開鑛則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開鑛的人只要買或是租一塊一畝或是幾分的

地，就可以從這一點開洞子下去，向任何方向開採。地底下根本沒有界址。假如我的洞子旁邊的地是旁人的，他就可以開一個同樣的洞子，向任何方向亂開。等到我們兩個洞子在地底下開通了，不是打一場架，就是各換一個方面去挖，把開穿了的這一部分做一個中立地帶。在這種辦法之下，沒有計畫的可能。我完全不能知道我可以採的礦共有多少，能開幾年。我的洞子裏面的空氣本來可以是很好的，但是因為旁人穿到我的洞子裡來，通風變了方向，燈就會點不着。我的洞子本來是乾的，但是因為旁洞子的水流了進來，隨時可以把我的礦淹沒。為中國礦業前途計，土法開鑛絕對不能存在的。第一，牠生產的能力太不成話了。平定是我們第一個大煤田。據民國二年本地官廳統計，平定縣境內一共有煤窰三百六十座，昔陽縣境內有七十一座，然而這四百三十一個煤窰每年至多只能出一百四十萬噸，抵不上撫順的五分之一，開灤的四分之一。何況所謂一百四十萬噸，還不過是各煤窰生產的能力；實在生產的數目大概不足一百萬噸。最大的煤田，用土法儘量開採，出產不過如此，足見產額與煤量完全不能相稱的。第二，土法開鑛絕對免不了暴殄天物。假如一個煤田有一百萬噸煤，用新法開採，最少可以採得出八十多萬噸，最多可

以到九十五六萬噸；殘留在鑛洞裡永久採不出的煤成分很少。同樣的煤田，用土法開採，最多可以採得出五十萬噸；最少不過三十萬噸，因為一個整個的煤田用土法挖爛了，處處都是廢窰，每一座廢窰裡都是滿的水，往往抽水的費用比存煤的價值還要大，要從新用新法開採，都不可能。況且土窰井底下又沒有圖。一旦洞口倒塌，誰也不知道地底下那裏有水。後來開採的人，無論如何小心，免不了要被老洞積水淹沒幾次的。中國近二十年來新式開煤鑛的大小災禍，損失在五百萬以上，死人在一萬左右，一半是這種積水所造成的。這種暴殄天物遺害子孫的土法，當然是不應該聽他存在的。

土窰的情形如此，半新式的「機器窰」更是如此。我這一次所看見的中國人自辦的「機器窰」有兩處：一是井陘的正豐公司，二是平定的保晉公司。正豐公司深十三丈的鑛井，砌得很是潦草。井上有幾個煬爐，一付絞車，井下有抽水機，小鐵軌，所以土人就叫牠做機器窰。但是公司並沒有工程師，採鑛也沒有計畫，井下邊沒有圖。所用去的資本，公司人當日不肯實說。據我估計總在二十萬元左右，但是每年只能出煤五六萬噸。沒有幾年，這個井就廢掉了。保晉公司是光緒三十三年所創立的，實收的股本

爲一百九十三萬兩銀子。實際用在平定的，大約總在五十萬兩以上。但是民國二年，牠只有鐵爐溝，燕子溝，老先生溝，漢河溝，莊莊溝，五處機器密，和買地溝，段家碑，後山溝三處土密。所謂機器密，完全與正豐公司一樣：沒有工程師，沒有計畫，沒有鑛圖。民國二年一共只出了十一萬噸煤。我們只要拿當年德國人辦的井陘鑛務局來一比，就知道這種半新式的機器密的不經濟了。井陘鑛務局實際股本不過二十五萬兩銀子。民國二年已經出煤十七萬多噸，不但如此，從民國二年到如今，保晉公司絕對的沒

有改良，每年最多的時候出過二十二萬噸。井陘鑛務局則出到六十萬噸。正豐公司于民國七年改組，請了一個德國工程師，完全用新法另開新井。到了十六年，也增加到十六萬噸。足見得土法與新法根本不能相容。完全用土法還有就是成本便宜的好處。把土法放大，變成功半新式的機器密，如保晉正豐之類，所用的資本比新式鑛還多，而出產的能力與土密一樣；鑛井不能永久，暴殄天物，遺害後人，也與土密一樣。可見開鑛的人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定與政治教育得同樣的惡結果的。

英庚款之管理——答胡適之先生

杭立武

近讀獨立評論第九期，載胡適之先生論英庚款管理一文。其對於管理英庚款所顧慮各點，間有與最近事實未盡符合，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借用庚款還本辦法。此胡先生所最先注意者，胡先生云，「兩國換文上明明說着借款的本和利，都是基金，然而至今沒有人注意到這種借款應該怎樣還本，還本應該如何担保，這是第一個漏洞，我們真不解這筆大借

款的本錢，將來怎樣還到基金裏去。」夫貸款于人，倘僅斤斤于計息，而無所籌畫于還本，誠一大漏洞也。此種漏洞，在董事會初成立數月間，因時間上之關係，亦事實所難免。所以然者，文化教育之經費，唯取之于貸款之利息，故目光先在于保息，極自然之事也。迨實行開始借款後，乃瞭然于保障還本之必要。故本年三月間，由董事會事務所提出還本辦法草案，經董事會議數度之詳細討論修正，

遂于四月十六日呈准行政院備案。有此還本辦法，雖不敢謂還本即有保障，然在法規上，未始非重大根據也。茲錄其文如下。

借用英庚款還本辦法

一，凡向董事會（以下稱本會）借用庚款者，除利息須依照本會所訂之保息辦法辦理外，應依照本辦法訂定分期還本辦法，其償還期限，及每期應償還之數額，另定之。

二，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能生利者，除給付應付利息外，應自借款契約簽立之日起，算至第卅年起還本，每一年或每半年還本若干，由該機關在其收入項下劃歸本會指定之銀行專戶存儲。由該銀行先行按期提付。遇不敷時，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負責籌還。至該借款全數清償之日為止。

三，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暫時不能生利者，該借款本金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指定本會認為確實之他項收入儘先清償到期之應付本金。或由該主管機關商准財政部指定本會認為確實之的款專戶存儲，按期撥付。此項手續須辦妥後方

得借撥。

上項暫時不能生利之機關，迨其事業能生利時，得適用本辦法第二條辦理。

四，凡借用庚款機關，其本身係非生利者，該借款本金應由借戶之主管機關先行商准財政部指定本會認為確實之的款專戶存儲，按期撥付。此項手續須辦妥後，方得借撥。

五，本金到期，倘借戶不能清付時，本會得停止給付借撥該借戶在中國之現金及在倫敦之購料款項各部分。

六，凡借用庚款未經全數清償時，該借用庚款機關在未經本會正式書面許可前，不得再借用本會款項，（包括倫敦購料委員會款項），或將該借款所購之材料機器或其他產業抵押或出售。本會對於該項材料機器或其他產業，在借款未還清前，保留所有權。……

（二）關於借用庚款付息保障，此胡先生提出之第二點。胡先生云，「其次是付息。付息的辦法雖有上文所引的保息辦法，然而我們聽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會起息，財政部的擔保自然是一句空話，借款機關自身的收入按

期提付也是不可靠的居多。」然此道聽之說，幸非事實也。查董事會成立僅一載餘，現金借款，已成立者，不過四種。其中除導准一借款，當時因「江北水災奇重，導准決不容緩，准予特別通融，將該會至本年年底之應得現款，先行撥付，所有手續，照保息辦法補辦（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六日第五次董事會決議案）」外，其餘皆經過長時間之審慎磋商，必獲有極確實之擔保，始與簽訂合同。且第一次之利息，均係于付款日先行扣除。至于購料借款，已成立者，亦僅六種，除建委會導准會兩借款，因董事會初成立時，規章未備，大都通融辦理，關於還本付息條件，今尚未商洽妥定外，其餘皆係先立借款草約，詳訂還本付息擔保，方得購料。但購料手續，亦甚詳密，故必需經過相當之時期，俟各批材料購定出貨付價後，方能彙計。再行簽立正式契約，開始計算利息。至現已成立之借款，為期不過數月，皆尚未至訂立正式契約計償利息之時。故雖不敢即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但亦不能預存悲觀，以為借款機關收入按期提付多不可靠，而財部擔保亦屬空文也。至董事會所以為付息求保障者，凡有所見，靡不預為計畫。今試舉最近訂立之草約一種，擇錄其關於保障利息之條文，以見一斑。

實業部借用到期英庚款一十二萬三千二百鎊為中央機器製造廠購買機料草約

(3) 為保證本借款還本付息確實起見，在本借款未清償以前，該機器廠無論組織有無變更，實業部應飭其每三個月將所有收入款項，以書面向董事會報告一次，並將其收入款項除經常費外，全數解存董事會所指定之銀行，專款存儲俟董事會將本借款到期應付之本息在該存款內扣除，如有餘存須經董事會通知該機器廠後，方可由該機器廠動支，至該機器廠經常費用，應由該機器廠于每會計年度開始前三個月編製預算書，送董事會審核備案。

(4) 本借款之本息，除依照前條規定保證償還外，並由實業部商准財政部，以全國礦產稅為償還之擔保，其頭三年應付之利息，由實業部商准財政部撥付，自第四年起，所有利息，依照前條規定給付，在本草約簽訂後，應由財政部加給同意公函，以資保證。

(5) 本借款應償還之本息，無論任何部份，如不

能依照前二條之規定償還時，應由實業部負責清償。

(10) 本草案約簽訂後，于董事會收到財政部給發本草案第四條所載之同意公函之日，發生效力

(三) 管理庚款機關組織，按之換文，該項機關有二，一為在中國之董事會，一為在倫敦之購料委員會。胡先生謂庚款之堪危慮即因該項組織不完備。其言曰，「董事會的董事，是由政府任命的，有缺額時仍由政府任命補充。董事是不免受政治影響的，如去年秋間董事黃漢樑因政治上的關係脫離鐵道部，即被政府免去董事職」。夫董事會既為行政院之直屬機關，似若不能避免政治影響者。然就愚之所知，董事會成立一載餘，事實上尙未嘗一受政潮之重大波盪。至黃先生之被免職乃緣董事會議頻繁，且任秘書董事之職，久未到會，殊多不便，故由政府委人瓜代。胡先生又謂董事會組織之不健全，更在于「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的代表，其流弊也許可以單顧到借款機關的利益，而不顧到基金的前途」。此在董事會初成立時，實似有此危慮。然人事變遷，政潮起伏，所謂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代表之現象，已漸不復存在。且經本年春間之

新任命，遂更成過去之歷史。而尤堪告慰者，則中西董事皆極審慎將事，努力于建造穩實之基金。此亦非愚一人之言，字林西報七月十二日之社論，尙可資參攷也。

最後胡先生所認為組織上之不健全處，為購料委員會與董事會之關係，未能詳細規定。此隸屬問題其重要安在，其不解決之弊又若何，請擇錄董事會呈行政院文一節以明之。文曰「董事會之負有保管庚款全部責任已見換文，則投資而欲其穩妥，購料而欲其適當，還本付息辦法，而欲其確實，皆係董事會基本之任務，設購料非由董事會辦理，則將不免發生下列流弊。

甲，購料委員會直接代各機關購料，其材料之數量價值用途，董事會無憑稽核。

乙，各機關所購之材料是否必需，無從審查。

丙，還本付息辦法，不能得有確實之保障。

總之若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董事會一日不能行使我政府所授予之職權，庚款前途殊為可慮。」查問題之發生，始于客歲十月，因時局關係，遷延半載，未能解決。董事會中西董事莫不引為深憂。然幸本年四月間，行政院于第二十二次會議，斷然通過董事會所簽呈之三項辦法。一曰「中英庚款購料委員會應遵守我政府所頒發之中英庚款購料

委員會章程」。二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爲各關係購料部會與中英庚款購料委員會之惟一轉遞機關，凡一切購料定單及其他委託文件，必須由董事會加蓋正式印章，寄交購料委員會，方爲有效。」三曰「購料委員會應將在倫敦所付購料墊款之精密賬目，隨時送交董事會，並應將該委員會事務所經臨各費於每會計年度開始前三個月，造具預算，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時造具決算，送交董事會審核。」比經將訓令轉達後，雖尚未准購料會函復遵照辦理，然事實上函電往還，兩會間之關係，已漸臻密切而趨合作之途矣。此差堪爲胡先生及留心英庚款者告慰者也。

此外對於胡先生之文，尙有須解釋者二點。一爲胡先生所引關於上海金融商業報刊載之流言所謂「最近有一大批馬口鐵在上海市面出售，價錢比市價低的多多；有人傳說這一批馬口鐵是原來用英國退還庚款買的，我們不知道這種疑心有什麼充分的證據，然而在商業場中一般人頗相信庚款的支用會有不規則之處，一種嚴密的調查，是我們最歡迎的。」查此項流言，董事會於春間，即已覺察。調查結果，知流言之非盡無憑。當由董事會議決，向某機關詢問真相。據答係因欲購某種材料爲英國之所無，遂將

剩餘之某材料，變換現金，以便轉向美國購買所需之料。惟自董事會立場言，無論其理由如何，其辦法之未能盡合，則不可諱言也。所幸者事件發覺尙早，如斯變賣之料，僅屬一部份。其餘當已由董事會商洽收回，妥密處置。抑此後購料會隸屬董事會之關係，既已確定，董事會當漸可實行其管理全部庚款之權。更益以詳密之各種規章，嚴格執行，似前此不幸之事件，當可望其不再發生矣。

又胡先生所引倫敦路透電訊，謂有議員某君，在英國會提出質問，深恐退還之庚款，其支配未能悉照換文之規定。其懷疑之理由，則在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求中國政府發給正式文件保障借款的利息，而中國政府至今不理這種請求。」愚于此無說焉。蓋英議員某君之言，愚實未能了解其意。嘗與本會英人康德黎先生，參其原詞，加以推究，亦未能析辨之。所可知言，則董事會固未嘗請求中國政府發給保息之正式文件，而中國政府亦無所謂未加理會也。

杭立武先生此文，篇幅太長，我們大胆代他刪去了一小部分，來不及先得他的同意，要請他原諒。

編者記

英庚款的管理——答杭立武先生

胡適

杭先生是在英庚款董事會任職的人，他指出的幾點，使我們知道董事會最近補救的辦法，我們讀了自然很高興。然而我還有不能不顧慮的幾點。

第一，『借用英庚款還本辦法』不過是呈准行政院備案的一件公文，杭先生自己也說『不敢謂還本即有保障』。究竟現在已借出的庚款（中國倫敦兩處）已有了還本的保障沒有呢？

第二，我說『多數的借款至今不會起息』，杭先生說是『道聽之說，幸非事實』。然而他自己也說建設委員會與導滯委員會的借款至今還不曾商妥還本付息的條件。此外鐵道部各路的購料借款究竟起了利息沒有？杭先生說：『雖不敢即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但亦不能預存悲觀』。其實我們的悲觀也不過是如杭先生說的『不敢即謂利息將來必可實收』而已？

第三，關於董事會的組織，杭先生一面說『董事會成立一載餘，事實上尙未嘗一受政潮之重大波盪』，

而他一面又說，『人事變遷，政潮起伏，所謂中國董事多數係借款機關代表之現象，已漸不復存在』。這就是說，政潮起伏可以影響各董事所代表的機關，而不致更動董事的人選。這自然是很可喜的現象，我們希望將來政府不要破壞這個很可喜的成例，並且希望各位董事不要因為他們現在不代表借款機關了而就減少他們對庚款管理的興趣。

第四，董事會與購料委員會的統轄問題，有了行政院第二十二次會議的議決案，已可算有了一個比較滿人意的解決了。何以至今購料委員會還不會『函復遵照辦理』呢？是否行政院的命令不能行於王景春先生們的購料委員會呢？

第五，最後我要請杭先生和董事諸先生以及國內外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大家考慮我在獨立評論第九號的結論：『我們的希望是要從根本上變更庚款換文所規定用投資借款作基金的原則。去年三月以前所積存的庚款，不妨依原案。……去年三月以後的庚款，

應該變更辦法，完全交董事會管理，以一半存儲作基金，以一半隨時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業上。」
杭先生對於這個結論，完全不表示意見。但我的原

文的要點只在於證明換文原則之荒謬不可用，只在於證明換文原則之不可不變更。那個荒謬的原則不更換，英庚款的管理是不會有效率的。

時代公論

第二十二號 八月廿六日出版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份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 時事：政潮平息與熱河吃緊（達）
- 述評：誰尸中央大學「停擺」之
- 抗日抵貨之合法性：雷震
- 陳井包運日貨案之管轄問題：胡長清
- 德國政局：胡長清
- 國民革命前途：郭壽華
- 自衛與自治：曾濟寬
- 英庚款之管理：杭立武
- 國殤（四幕劇）：顧一樵
- 廢止內戰辦法的討論：余貽謙
- 論壇：余貽謙
- 通訊：陝西實業考察記（一）：何慶雲

東北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要目

第一卷 第四期 要目

- ◎ 日本進攻熱河矣：元之
- ◎ 在滿日軍之內閣：馬毅
- ◎ 倭奴攻熱民衆應有之覺悟：惠民
- ◎ 東北問題最近之嚴重化：左宗綸
- ◎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王之相
- ◎ 各國金融資本伸在中國的觸角：鄧伯粹
- ◎ 「與日絕交！」：博敷譯
- ◎ 剿赤與收復失地：紀清漪
- ◎ 現代之蒙古：王之相
- ◎ 偽國事實蒐集：馬毅

- ◎ 左右兩大勢力間之中國：紀清漪
- ◎ 如此民族：博敷
- ◎ 危急的東北與挽救的方略：惠民
- ◎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王之相
- ◎ 各國金融資本伸在中國的觸角：鄧伯粹
- ◎ 抗倭要術：徐士達
- ◎ 最近義勇軍的活躍及我們應有的努力：博敷
- ◎ 東三省經濟之發展：馬毅譯
- ◎ 現代之蒙古：王之相

論 著

- ◎ 日本進攻熱河矣：元之
- ◎ 在滿日軍之內閣：馬毅
- ◎ 倭奴攻熱民衆應有之覺悟：惠民
- ◎ 東北問題最近之嚴重化：左宗綸
- ◎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王之相
- ◎ 各國金融資本伸在中國的觸角：鄧伯粹
- ◎ 「與日絕交！」：博敷譯
- ◎ 剿赤與收復失地：紀清漪
- ◎ 現代之蒙古：王之相
- ◎ 偽國事實蒐集：馬毅

論 著

- ◎ 左右兩大勢力間之中國：紀清漪
- ◎ 如此民族：博敷
- ◎ 危急的東北與挽救的方略：惠民
- ◎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王之相
- ◎ 各國金融資本伸在中國的觸角：鄧伯粹
- ◎ 抗倭要術：徐士達
- ◎ 最近義勇軍的活躍及我們應有的努力：博敷
- ◎ 東三省經濟之發展：馬毅譯
- ◎ 現代之蒙古：王之相

定價：每期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
社址：北平地安門外 後海 廣化寺